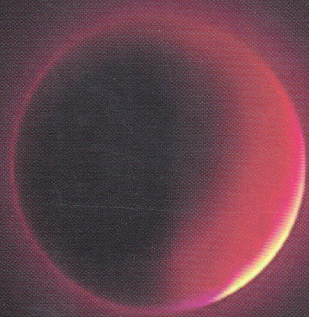


黑色文库 第十三集



廖亦武 著

中国冤案录

(第二卷 2003-2005)

黑色文库  劳改基金会出版

黑色文库 第十三集

中国冤案录

第二卷

(2003—2005)

廖亦武 著



劳改基金会
华盛顿
2006

目 录

出版缘起	9
序言 1 一个人的“大屠杀博物馆”	余杰 13
序言 2 自由的现状——境外通信节选	北明 21
盲人作家张紫葛（上篇）	27
盲人作家张紫葛（下篇）	46
六四难属吴定富	67
六四画家武文建	87
法轮功练习者陈氏	106
赶尸目击者罗天王	120
凶杀案律师魏更晓	133
思想犯李必丰	143
和尚明德	165
间谍教授谷正	186
台胞唐存理	210
作曲家王西麟	228
家庭基督教徒袁福生	253
民刊《野草》主编陈墨	282
寻访记	307
残疾妇女贾凤珍	342
附录一：恶法比无法更恐怖——给王力雄的一封信	351
附录二：蒲勇档案	355
附录三：四川冤民再次呼喊——刘友军等 201 人联名	361

附录四：静坐示威申请——汪益刚、张靖等 30 余人	363
附录五：给国家领导人要求昭雪的信(附判决书)... 张德怀	365
附录六：民主和法制的呼唤——四川蓬安县村民	371



青年时代的廖亦武



犯人名牌——狱中规定犯人一律佩名牌、着囚服、剃光头。



1989年8月，因六四入狱的同案犯们与乌江山沟的孩子们。



廖亦武在狱中



1989年6月，廖亦武（左）与同案犯合影。



左图：廖亦武（右）在访问明德时，与一位藏地活佛成为朋友。



右图：廖亦武（右）在庙里遇到了一位捷克游方和尚，他的国家还没有佛寺。



左图为作者与徐文立的合影



左图：廖亦武与高氏兄弟



右图左起：作者的难友侯多蜀
蒲勇和雷风云



左图：难友许万平

*除特别署名，照片均由作者提供。

出版缘起

劳改作为中共专制统治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远在其建党未久，在其江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革命根据地”已存在了。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之后，参照了当时苏联的劳改制度，在斯大林派来的“古拉格”专家指导下，溶合了毛泽东的“改造与生产结合”的思想，发展出这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监狱制度。劳改是一套政治工具，一方面要消灭犯人的独立人格和意志，剥夺其人身和思想的自由，并美其名为“改造”。另一方面要利用这项庞大的无偿劳动力，为共产政权创造财富。

早在五十年代，中国的劳改犯就被调动去筑路架桥，修河造坝，挖煤垦荒。这些无声无息的奴工为共产政府献出了健康、青春和生命，没有人记得他们。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生命价值的轻贱和蔑视，直接造成了对中国人文精神及文化的摧残。随着毛泽东时代的结束，原始疯狂的暴力行为和愚民式的政治运动逐渐式微，而邓小平为暴发户和拜金主义者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成了社会发展的金科玉律。二十年的开放政策使中国社会从粗暴进入俗媚，从暴戾走向糜烂。一个经过土改、反右、大跃进、文革、批林批孔、四人帮、反精神污染这些颠倒黑白是非、绝灭人性、轻视知识和道德长达四五十年的社会，如果不经反省、忏悔、痛定思痛和惩恶抚善的过程，怎么可能就直接跨入现代化的社会呢？无可讳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文化和教育等方面有了一定的变化，但是毛泽东架构的极权政治制度，包括劳改制度并没有根本的改变。

中国大陆的社会必须经过彻底的反思，对灾难的根源进行检讨和思辩，重新认识知识和道德的重要性，中华文化中特有的人

文主义精神才有复苏的可能，也只有这样才能防止荒谬无知的悲剧重新上演。然而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几十年的毁灭性破坏，得有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初具成效。这样的净化过程只有在民主制度的体制内，自由和人权得到保障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开展。

作为社会最底层的劳改犯，是制度中最大的牺牲者。以往共产党将人任意划成不同的阶级。以阶级分贵贱，以阶级区分天堂和地狱。成千上万的人因为阶级出身、思想意识、政治观点、宗教信仰，甚至因为微不足道的个人原因，被共产党政府送去劳改。劳改营里，在“强迫劳动”、“改造思想”、要求人人挖掘灵魂、脱胎换骨的严酷环境下，人被剥夺了意志、尊严、情感和良心，即使肉身备受折磨后，幸能存活，心灵上和精神上所受到的蹂躏和残害也万难愈合。人们在寻求历史的真实面目时，那个时期里，人为因素所造成的历史灾难，特别值得我们警惕。历史巨轮所辗过的苦难者的经历是一面忠实的镜子，幸存者的故事永远是最具有震撼力的。研究和整理劳改营幸存者的生活经历和资料就成为我们拂拭染上尘埃的历史镜子的必不可少的一个尘拂。

劳改基金会自 1992 年成立以来，一直锲而不舍地寻访及收集劳改幸存者的事迹和证据，迄今已达五百余份。在当前全球商业化的过程中，世界更倾向于资金财富的集中，文化事业的推动备为困难。虽然在重商业、轻文化的趋势下，不少幸存者非常艰苦地一字一行地把他们的亲身经历写了下来，却苦于无处出版。还有一些人不具备写作的能力，也有些人丧失了记忆的能力。那些来自劳改的呼声和呐喊，那些血泪记录的文字实在应该有一个机会被容纳及保存。这是我们对子孙后代的责任，也是对公正及自由的承诺。劳改基金会愿意，向散布在全球，特别是如今尚在中国大陆的劳改幸存者继续征集资料，整理、编辑并出版这些文集，我们称之为《黑色文库》。

劳改营是中国畸形社会的缩影，它的幸存者就如但丁《神曲》

里那些经过地狱炼火煎熬过的光怪陆离的众生。烙在这些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贱民身上的，是专制政权掌控下国家机器的铁的印记。劳改不仅对这些受难者摧筋断骨，残其躯体，还对他们洗脑换心。他们有些进去时是没有受过完整教育的青少年，出来时已是白发人；即使受过教育的人，一旦被投入这个大炼狱，也跟知识和信息长期绝缘。因此幸存的生还者中大智大勇者有之，圆滑机灵生命力特强者有之，至于心智消磨殆尽，看破红尘，苟延残喘者更占很大部分。《黑色文库》就是要保存这些人的声音，哪怕是文字粗糙，文体拙朴的记录，我们都愿保存其原始面貌。也有人身在囹圄，言不由衷，我们也都不加文饰，原文照登。相信读者自能判断。遇到当事人自己不能亲自执笔的情况，我们则尽量以接近原始叙述的语调和情感予以记录，以求传真。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经历了“失语”的时代，邓小平和他的继承人又想把中国人变成一个“失忆”的民族。让我们来记录历史，为专制政权谱写挽歌，为民族丧失的记忆招魂。

《黑色文库》编辑委员会
2006 年于华盛顿

一个人的“大屠杀博物馆” ——廖亦武的文学与人生

余 杰

美国首都华盛顿有一个让所有参观者都难以忘怀的大屠杀博物馆。这个由纳粹集中营幸存者、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韦塞尔（Elie Wiesel）倡导成立的博物馆，向全世界公众揭露了纳粹集中营地狱般的残暴、邪恶与黑暗。在此意义上，作为作家、历史学家和人权活动家的韦塞尔堪称灾难深重的犹太民族的骄傲，而作为那段悲惨历史定格的大屠杀博物馆则堪称受难者们的一座活的纪念碑。

然而，就二十世纪以来人类所承受的种种血腥与苦难而言，华盛顿的大屠杀博物馆仅仅是其中一个惊心动魄的横断面，而绝非全部。同样是纳粹集中营幸存者的匈牙利作家、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凯尔泰斯·伊姆莱（Imre Kertesz）在《船夫日记》中指出：“迄今为止，人们仅将惟一的一个国家——执政短暂的希特勒政府——送上了审判台。假若能够听到真正的指控！——假若整个世纪所有被无辜处死的人们能从骨灰盒里站起来的话，假若他们的尸骸在令人恐惧的‘吱呀’声中提起上诉的话，假若数以亿计的骷髅的指骨指向所有负罪累累的国家，并指出在那些国家里将国家视为已有的统治者、那些毫无胆战之心地猖狂犯罪的罪犯们、那些毫无良心可言地进行屠杀的杀人犯们以及那些肆无忌惮地剥削压榨的富人们的话！——那才是审判。”凯尔泰斯·伊姆莱不仅经受过纳粹集中营中死亡的威胁，他还在实行斯大林式极权主义统治的匈牙利度过了近半个世纪更为痛苦的生活——那是一种“日常生活无所是事的悲剧”，一种时刻都在等待秘密警察

敲门的恐惧，一种更加深入每个人骨髓的监控与自我监控。凯尔泰斯·伊姆莱的全部作品都在回答这样的问题：在纳粹的集中营和共产制度下的匈牙利，如何活下来并保持自己的尊严？

还有更多的罪行没有被揭露，还有更多的罪行没有被审判。凯尔泰斯·伊姆莱所面临的问题也是中国作家廖亦武面临的问题——用曾经调查过“文革”期间广西吃人事件的中国作家郑义的话来说：“对于生活在共产国度的诗人作家而言，我们所经历所目睹的大规模灭绝、饥饿、酷刑、残忍、铁石心肠、不义、堕落，与奥斯维辛极为类似。而且，这个红色奥斯维辛曾占据半个世界，所蔓延的时间已将近一个世纪，仅“非正常死亡”一项，就是纳粹奥斯维辛的十几二十倍。”苏联东欧的共产主义政权早已垮台，越来越多的罪行正得到揭露和审判；而依然“健在”的中共政权俨然以世界上最大的“垃圾场”（摇滚歌手何勇《垃圾场》）自居，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所有的罪恶依然是“现在式”。那么，在中国作家当中没有人立志于成为“中国的韦塞尔”或“中国的索尔仁尼琴”呢？

廖亦武不是法官、不是审判者，他是受难者中的一员，他是受难者中发出声音的一员，他是记录者和见证者，他所从事的正是这样一种“尸骸在令人恐惧的‘吱呀’声中提起上诉”的工作，他的文学与生命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建立一个人的“大屠杀博物馆”。这个博物馆的背景比巴金所呼吁和梦想的“文革博物馆”更为广阔，它将包括这个政权“过去的罪行”和“正在发生的罪行”。为此，他与一切官方的御用作家和以市场为取向的作家决裂，成为生活在伦理道德底线崩溃的中国却坚守良心的“异端”；为此，他成为秘密警察和公开警察的“眼中钉、肉中刺”，成为一名全球罕见的、大部分作品的“第一读者”都是警察的作家；为此，他以富于独创性的诗歌、音乐、散文、小说和传记等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作品，成为这座“大屠杀博物

馆”的奠基石。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廖亦武在中国当代文坛崭露头角的时候，是以一名先锋诗人的面目出现的。七十年代末期，作为偶像的毛泽东崇拜和作为“伪信仰”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同时像肥皂泡一样不可逆转地破灭了。如同美国“垮掉的一代”一样，许多才华横溢的中国青年诗人以叛逆、反讽、绝望和玩世不恭的姿态开始了他们的写作，这样的“诗歌江湖”延续了不到十年的时间。1989年的天安门屠杀终结了一个时代的文学潮流，此后的中国迅速进入商品经济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时期。与此同时，僵硬的政治体制对文学创作和新闻传播进行更加严密的控制。当年喧嚣一时的先锋诗人们，要么“下海”成为成功的商人，要么进入学院、期刊及出版机构成为循规蹈矩的“学院派诗人”。在这一沧海桑田的变迁中，廖亦武可能是惟一的例外——他因写作并朗诵长诗《大屠杀》被捕入狱长达四年之久，此后更是彻底地被抛入了社会的最底层。

用中国先贤孟子的说法：“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增益其所不能。”廖亦武在长篇自传《证词》中栩栩如生地描述了他四年可怕的牢狱生活，读者似乎可以用此种残酷的逻辑来完成以下推论：正是这四年暗无天日的牢狱之灾，完成了廖亦武从“旁观者”到“见证者”、从“游戏者”到“控诉者”的根本性的转变。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热中，四次高考落榜的廖亦武以诗歌作为叩门砖，使得自己从川藏公路上的卡车司机摇身一变成为四川某地文化馆的工作人员。那时，对“诗歌”的狂热既来自于青春时期原始的生命激情，也有某种功利性的目的。而在天安门屠杀之后全国性的镇压和搜捕之中，廖亦武却因诗歌而获罪，“诗歌”成为起诉书上无可推卸的“罪证”、成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那么，如德国哲学家阿多尔诺的追问，奥斯维辛或古拉格之后，

写诗是否可能？廖亦武的回答显然是肯定的——活着，并且写下去；活着，成为这个时代的见证。

在非人化的监牢乃至差不多会将人逼成疯子的禁闭之中，廖亦武却重新获得了艺术的灵感：他在几张巴掌大的废纸上写下了数万字的《古拉格情歌》。他用自己的笔写作，每一个汉字都比那体积最小的蚂蚁还要小，不用放大镜一般人根本无法辨认。这份手稿是中国当代文学“囚徒困境”的最为真实的写照，它昭示了一个生活在，《一九八四》和《动物庄园》中的作家捍卫文学独立价值的令人感佩的努力。这部迄今为止依然无法在中国大陆公开出版的作品，挽回了中国当代文学日益声名狼藉的声誉。从昔日名噪一时的诗歌《死城》等“三城”到如今依然只能在地下悄悄流传的《古拉格情歌》，廖亦武完成了一次巨大的蜕变，他变成一名真正具有“生命中无法承受之重”的诗人。近十余年来，他一直是警察重点监控的对象，多次遭到抄家、传唤和囚禁，与警察的周旋成为他无法摆脱的“业余爱好”。他的作品偶尔能够突破官方的封锁而以笔名发表，但无不很快便遭到中宣部的查禁并导致编辑和出版商受到株连。他的更加完整的作品陆续在香港、台湾和美国得以出版，震惊海外华人世界，却很难为中国大陆的读者所接触到——“长城”依旧在起着严密封锁的作用。

出狱之后，廖亦武即雄心勃勃地开始写作长篇小说《活下去》，五卷分别为《汉人》、《魔界》、《黑道》、《证词》和《传与记》。其中，《证词》以《古拉格群岛》般的真实性刷新了“现实主义”这一陈旧概念在当代文学中的内涵，而《汉人》诸卷则如《堂吉珂德》般堪称一个时代深切的寓言。这部不同部分呈现“两极化”的作品显示了廖亦武杰出的文学才华，他在写实性的作品和虚构性的作品之间游刃有余，两者的张力是一般的作家所望而生畏的，它反倒成为廖亦武写作时巨大的快感和动力。廖亦武发现了中共体制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戕害人性，在当代中国

的知识分子中少有人具备此种洞见，正如耶鲁大学文学评论家康正果所评论的那样：“中共的极权之恶与纳粹机械化的恶魔之恶有所区别，那是一种瘰三之恶，恶得毫无意义，恶得极其下流猥琐，颇似阿伦特所谓的‘平庸恶’。”廖亦武书中的若干小人物均有相似的人生轨迹：在庞大的暴力机器的压榨之下，迅速退化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如果说纳粹集中营致力于取消人的“人性”，泯灭人的尊严，将人变成“非人”，将活生生的人“物质化”为平面的号码和数字；那么中共的监狱不仅消灭人的正面价值，同时还强加给人以负面价值，竭力将人的高贵置换成卑贱，将肉麻当作有趣，在此种过程中，虐待狂和受虐狂达成了某种互相依存的关系。可以说，廖亦武的作品同时具备了极权主义体制的研究素材和研究成果的双重价值，他的发现为当代优秀的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们提供了富于刺激性的思想资源，康正果就是从其作品的若干细节中发现了撒旦统治中国的秘密：“同样是不把人当人，纳粹机械化的恶魔之恶的残害是技术性的，它把多余者的人命当清除垃圾一样处理，其目的主要是干净利落地消灭多余的肉体。中共的极权之恶则把残害发展成精致的恶作剧，加于肉体的伤害纯粹是一种凌辱，它就是要将你的人格尊严一脚踏扁。而制造凌辱之余，还要在伤害的手段上挖空心思，变出花样，把残忍发展成可以把玩的活动。”

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廖亦武还开始了多卷本《中国底层访谈录》和《中国冤案录》的写作。这两个系列的作品，各自以近百万字的庞大篇幅，为世界展示了与“正在迎接奥运会的北京”迥然不同的“另外一个中国”。在职业分工相当明确的西方世界，“新闻采访”、“社会学调查”和“文学创作”是三个截然不同的领域，各自有各自的写作规范和原则。但是，中国自古便有文史哲不分的传统，在当下仍无新闻自由的状况下，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作家不得不同时兼任新闻记者和社会学家的

多重角色。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廖亦武本人即身处社会底层，像古希腊诗人荷马一样以音乐说唱维持生活。他漂泊于中国广阔的土地上，与形形色色的社会底层民众和各种离奇冤案的当事人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死囚犯、小偷、骗子、警察、士兵、民间艺人、车夫、农民、和尚、巫师、上访者以及当代中国最敏感的“不可接触”的群体，如“六四”难属、法轮功修炼者等。廖亦武成功地复活了这些本来只能无声无息地诞生与死亡的无名人物的生命。要完成这两个系列的写作，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时间和精力，更需要精湛的文学技巧和丰富的语言天赋——廖亦武的写作继承了中国古代史传文学和笔记小说的传统，同时汲取了现代新闻报道和社会学调查的若干方法，从而独创了一种可以称之为“廖亦武式”的“访谈文学”——这种以原有的文学理论无法归类的“文学体裁”，正随着廖亦武访谈对象的拓展而日渐丰满和成熟。

在廖亦武的笔下，跃动着的是被蔑视、被凌辱、被抛弃的“另一个中国”，它有自己的存在逻辑和生命力。“恶”是其诞生的根源，亦是其生长的动力。廖亦武并没有将底层苦难和冤案的原因完全归结于制度之恶，他进而发现了人性之恶——人企图以作恶来抵抗生命的虚无感，却没有料到作恶反倒让人陷入更加虚无和荒谬的处境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加害者和受害者都是鲁迅式的“无物之阵”的俘虏。在廖亦武的作品中，不再有伟大而光明的正面人物。包括作为传记主人公的他在内，都无法摆脱根深蒂固的“流氓性”。正是出于对自己的“不信任”，廖亦武拒绝参与任何党派活动，他超越了一个单纯的政治抗议者和社会批判者的角色，而选择了一个对人性有着悲观而诚实的评估的哲学家的身份，将变革中的中国社会精神信仰的危机凸现出来。

廖亦武的多部作品已经被翻译为法文和英文出版，并引起许多汉学家的研究兴趣。1995年和2003年，廖亦武两度获得美国赫

尔曼·哈密特奖，其获奖理由是“面对种种迫害，仍以充分的勇气坚持独立的创作”。2002年，廖亦武还获得了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之“倾向文学奖”。廖亦武以其作品的深度和广度，以其对政治勇锐的批判和对人性深邃的体认，而成为当代中国作家中的一个令人敬重的异数。他虽然没有王蒙、余华、莫言、贾平凹等在权力与金钱之间玩弄平衡术的作家那样拥有巨大的世俗知名度、社会地位和作品发行量，但他的作品显然具有更为辽远的理想主义气质和更为真诚的人道主义关怀。廖亦武笔下的每一个汉字，都是这座“一个人的大屠杀博物馆”中具有永恒性的砖石——对于长期以来患上了严重的失忆症的中国来说，这是一笔无价之宝。廖亦武的写作乃是一个饱受摧残的肉体和心灵进行自我疗伤的过程，这位伤痕累累却始终不屈服的作家庄严地向世界宣布：在暴力与自由的较量中，最后的胜利者一定是自由。

自由的现状

——境外通信节选

北 明

……晓波、余杰、张祖桦放了，但是闻风而逃的亦武不知流落到什么地方去了，不知道他是否能够及时了解有关安全与否的信息，是否能够回到家里。他和其他兄弟们至少应该过一个平安的年吧。一定还有不少知名和不知名的、北京挂号或者各地公安部门挂号的自由言论者潜逃在外，不知道是否可以回家。

随时可能被捕，时刻需要藏好手稿、笔迹、通信，警惕一切异常动静，睡觉也要睁着一只眼，白天黑夜都不安全，还得有另外的信箱，另外的地方放些现钞，随时准备离家出走……这就是他们的生存常态。不过是为了自由地说话而已。我当年狱中归来准备上路找郑义的时候，经过了几个月这样的日子，不是人过的。惊弓之鸟，提心吊胆。我知道他们监视、监听、跟踪我，试图通过我找到他们通缉一年、四处搜索但劳而无获的老大。后来过了很久，大声说话，我都不习惯；到了香港，在书店里听见人议论共产党，我还是要下意识地回头张望。最初的甩尾巴、转火车、换方向、换交通工具，找到老大，又一同过了两年的地下生活之后，至今，偶尔，我还会梦见一个做过多次的梦：在一个宽阔的地下通道里逃跑，背后是追来的安全人员，然而跑来跑去，前面到了一条死路。出口是封死的。

一个人若是长此生活，神经、心理都会受损的。这跟价值观念、思想精神无关，这是病理、医学意义上的损伤。如同一个人72小时不睡觉，情感会变得脆弱，人会变得容易激动一样。我当年在天安门有过如此经验。

说得远一点，人的这个物质的躯体，过分折磨，就无法容纳灵魂了，无法承载精神了，甚至无法驾驭思想了。高尔泰先生在他的《寻找家园》中从来没有论述这一点，但是当他从夹边沟劳改农场出来，为了完成画毛像的任务，住了招待所，吃足了定量，有了足够休息之后，他发现自己浮肿消失之后，先是变得很胖，然后又瘦下来，几个月之后恢复了正常体重。这时他渐渐发现自己看见对面过来的人，知道躲避了，对周围事物的知觉感受恢复，有了情欲了，对与自己无关的事物，比如天上的飞鸟等感兴趣了……，他于是知道自己活回一个人了。这时候，他又开始重新思想，开始恢复自我意识，他开始反省自己一直以来所处的生存环境，开始反省人的异化了。我读这书，看到这一小段平静的描述，尤其看到那几个字：“看见对面来人知道回避了”，感觉惊心动魄，思之，满腔悲情。

灵魂，思想，精神，自尊自爱，尊人爱人，甚至包括情欲，这些人的特征是可以离开人的躯体的，只要把人当成动物对待，把他们的基本生存需要剥夺到极限以下，而且长期剥夺，人就变成动物了。埃利·韦塞尔的《夜》，描写集中营的囚徒，父子俩，为了一块面包，争夺揪打一番，死在苏军追撵下逃跑的纳粹列车上。那是几天几夜的逃跑，皮包骨头的活骷髅们，在大雪纷飞的路上跑了整夜，落队者杀，躺下喘息者杀，半途休息时，睡着者死。一路不停地死人，上了火车，睡去不醒的又有半数之多。就是在那节车厢里，发生了儿子殴打父亲，争夺一片面包双双死去的事。谴责谁呢？我觉得可以谴责那个儿子，但是更要谴责那个造成这种状况，把人变成动物的集中营。谴责纳粹。谴责劳改农场、动物庄园。最根本的是谴责极权体制本身。我记得曾经有读者还是网人嘲笑过高先生在劳改营为了一块肉，跟别的劳改犯不合。我当时觉得此人没有权利发出这样的嘲笑。因为他自己是在铁丝网的外面，不了解劳改营的残酷。极权劳改这种非人制度，正在于

把人，通过非人的手段，异化成动物。是人，除非死，没有能力抗拒这样的异化。神经都不能工作了，还能有正常的知觉吗？躯体得是一个至少接近人类的正常躯体，验血之后那几十种指标哪怕全部异常，至少也得能判断出来是人类的指标，这个躯体才可能容纳一个灵魂。我在电视上见过非洲的饥民，那些眼睛黑白分明的孩童，大大的头骨上，目光呆滞，面部肌肉木纳，没有一丝活力和笑容，没有一点稚气和灵性。他们在难民营里。连喝水都没有力气了，连食欲都丧失了。广告反复告诉电视观众说：一毛钱（美金），就能保证他们活一天。没有那一毛钱的食物，他们明天就死去。这样极限底下的生活水准，如何可以让他产生人所应当拥有的一切精神品质，哪怕是正常儿童的眼睛？吴弘达先生总是说：在劳改农场里，我要是不坏不恶不抢不打，我早就死了。我过去只是理性上知道这不是谦词。现在我明确了解他是在陈述一个事实：在那里，你要像一个人一样活着？那先死了再说。因此，人的尊严早就被埋到那沙海里，荒漠上不知名的坟墓里，死人坑里了。

我不是说亦武们落到这种地步了。我是想说，他的生存状况距离一个正常人应当有的生存状况还是不够。不能保证基本的安全需要。许多想要拥有尊严的中国自由知识分子都是这样。今天网上看见王光泽的文章：“那一夜，中国知识界无人入睡”。王怡们，大小老鼠们，其实每时每刻面对着等待门被敲响的局面。谁要求公开发言，谁就得准备挨抓。亦武的状况比他们更甚：他折腾得太凶，八九六四学潮时期他闲着；开枪了，人家都跑了，他倒跳出来了，满世界抗议。出狱这些年，他专门把这个体制制造的种种看不见的、要湮灭的悲剧剜出来曝光。而他自己还身在逆境：家二度散了。生活没有资金来源。四川的警察似乎还特别有职业荣誉感，从来也不放松他还有其他四川兄弟。廖亦武还整天采访记录生活在底线的人那些惨痛的经历。苦厄在他那里不是

文字和想象，不是过去和回忆，是他每天碗里的米和杯子里的水。他身处的世界和我们的世界不是一个世界。我有时候觉得自己根本没有资格告诉他应该怎么活着。他还能在你的督促下关心外边人的写作和健康，已经是他那赤裸在严冬季节的心，能有旁骛的最大程度了。这次，他刚写完“嫂子你保重”几个字，自己就不得不逃了。这就是他的生存处境。谁来关心他是否“保重”呢？谁来给他装一下行囊，检查一下衣服带得够不够，鞋带系得紧不紧？胡子该刮不该刮？我本来这次过节想起来要给他买一个质量好些的双肩包的包（我的一个亲戚特别喜欢这种包），让他出门吹箫卖艺时或者逃亡时用。可是包没买呢，人又流落出逃了！我和郑义在国内逃亡的时候，为究竟选择哪条路线，总是争执不下。因为事关紧要，谁都不让步，一让步，人就进去了。可是这个廖亦武，把先后两个太太都弄丢了，连个吵架的人也没有了。

这次抓人，虽然是胡温一届政府人为的做法，究其根本，是这个一党化政治体制的性质使然。所以，虽然料定晓波、余杰此去会很快返回，但是我对这种体制下任何一届政府不抱幻想，对他们的黑箱作业具体内情不屑于猜测，对其中人事之争之斗了无兴趣。当事者迷。对这个体制性质，有时候我感觉竟然是外国人看得更清楚。他们在这个基础上对中国政局做出的判断也更接近本质，对具体事态的发展的判断也更准确。八九年的时候，我周围的知识界圈子里，没有多少人认为中共会开枪镇压学生运动。游行的人越多，外电报道越多，声势越大，人们越乐观。等到各界，连官方新闻界、民主党派、中共某些机关还有共青团某些机构什么的都上了街，等到游行人群里出现了解放军官兵、警察等，北京百万人一天天出现在街头，人们更是难以想象，共产党军队如何可以当着全世界的面，对这人山人海下手？可是那些外国记者从头到尾对共产党的暴力镇压保持警惕。他们警惕的神经从来没有被万人空巷的空前抗议浪潮所麻痹，他们的忧虑总是随着民

众抗议的每一个具体高潮而加深。我看过 CNN 记者麦克·奇诺伊 (Mike Chinoy) 的著作,《中国现场》(China Live)。这书中有三章是他亲临八九学运的记述。他和他的美联社等新闻同伴、汉学专家们,总是缺乏了解中共高层内部斗争的消息来源,总是想方设法联络中国有关人士了解情况,但是即便如此,他们对时局的估计最后证明比知识界大部分人(包括我自己)准确,而且是方向性的准确。这位记者在最初的兴奋过后,几乎在每一次学运取得具体进展、民众情绪为之一振的时候,都心情更加忧郁。不是为中共的垮台操心,而是为中共的开枪镇压而忧虑: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当民众阻挡住城外军车的时候、当柴玲号召留在广场的演讲得到大部分学生支持的时候、甚至当民主女神像在天安门竖立起来的时候。我还知道有一个中国人对中共必然开枪镇压学运,从来没有怀疑。这个人是历经多年劳改、迫害,对极权体制有铭心刻骨地认识,当时人在四川的高尔泰先生。我是后知后觉者,我总是借助先觉者的眼睛学会看真相,学会不被自己的一厢情愿所左右。

评论共产党半个世纪以来的种种作为非常必要。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的评论非常必要而且及时——虽然晚了半个世纪,但是对于这个罪恶昭著的政治派别,任何时候开始评论它,都不晚,就像美国人说,为了您的健康,您任何时候开始戒烟都不晚一样。然而,接下来进一步的问题是:仅仅打倒共产党,中国还是不会有希望的。共产党的样板戏“红灯记”里,穷苦铁路工人李玉和的十七岁的女儿李铁梅的著名咏叹(调)是:“仇恨入心要发芽!”这个党当年就是以煽动、利用无产者对有产者的仇恨,扩大武装,发动国共战争,最后自己扛着枪上台的。以暴易暴。多少年了,中国没有走出这个恶性循环的厄运。下去一届残暴政府,上来一届政府残暴。所以,目的很重要,方法一样重要。造反的农民革命历来起于反抗压迫,顺理成章。但是没有一个民主体制,新的

权力独占集团同样要控制言论，要宣传自己的理念（不管什么理念），控制人们大脑，从而掌牢自己手中的权力，中国必然遭遇新一轮的谎言和暴政。这就是为什么我当今看见人们对某个政府领导人、甚或某届政府抱有好感或抱有敌意都不以为然，这也是为什么我听见看见民间对共产党恨之入骨声讨和跃跃欲试的暴力复仇，虽深以为然，但仍不能解除对国家厄运的认知和忧虑。……

北明

20004年12月15日夜

[编者按：2004年12月13日，刘晓波、余杰、张祖桦三位著名作家在京被国安人员从家中带走传讯，电脑没收。本书作者廖亦武当时闻讯后即离家藏匿，作家王怡亦出走回避。刘、余、张三位次日释放。廖、王不久之后也平安返家。]

盲人作家张紫葛(上篇)



张紫葛

采访缘起

张紫葛的名声，我早几年就晓得了。那时他写了一本算历史老账的书，叫《心香泪酒祭吴宓》，引起轩然大波。据说相关的争鸣也编纂了厚厚一本，各方都动了肝火，字间行间硝烟弥漫。去年，他又以“机要秘书”的身份，在国内出版了有关宋美龄的回忆录，同样激发了种种议论。

2003年12月18日下午，冬日阳光一路铺洒，我受流沙河、吴梦华夫妇的倾力引荐，从成都西门转了几辆公共汽车，终于在西南民族大学教工宿舍的一幢楼房内，登门拜访了84岁的张先生。在一阵“慕名”，“久仰”之类的客套之后，我切入访谈正题；张先生却以身体虚弱，经历过于曲折为由，再三婉拒。我拿出惯用的迂回手段，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嘴脸颇似一个不依不饶的政客。幸而有吴梦华师母频频敲边鼓，张先生拗不过，到底应允了。

我们商定，话题集中在反右运动和 15 年的牢狱——太痛了，不知我能否讲到底——张先生叹息道。

为了对后人有个交待，您就讲到哪一步算哪一步——我微笑着，目光却残忍而贪婪。张先生看不到，却感觉到了，他说——我自己正在写，暂时没拿出来。

我沉默着。

张先生眼全瞎，耳半聋，腿是瘸的，还气喘。这样的老家伙，活着本来是累赘，可他还要摸着、抖着，在一块钢板的空格中填字，日复一日，弄成书稿。这种拼老命把记忆留下来的过程，让人看着，甚至想着都极不舒服。不料，在我一次次登门时，张先生总坐在沙发中，以他豁达的笑声相迎。虽然这笑声经常夹杂着惊心动魄的咳嗽和痰响。

根据记录，我们的访谈从 2003 年 12 月 26 日开始，至 2004 年 1 月 8 日结束，共进行了 7 次，每次两个小时。这种安排是考虑到张先生的身心承受能力。为了保证文字的气韵和连贯，我花了大约两个月对此进行调整和处理。

张紫葛：我的经历太复杂了，老威先生，您让我从何说起呢？

老威：我晓得，就您眼下的状况，是不可能把自己的人生再追溯一遍……

张紫葛：听您的口气，是在怜悯我？不，您弄错了，我的生活是满足的，至少是充实的，虽然眼全瞎，耳半聋，一只腿也瘸，但上天没端走这脑壳，拿劳改犯的话说，这吃饭的家伙还挺健全，记忆力过剩……我只有这件事可做了！把住膝盖上这块冷冰冰的钢板，往中间的凹槽，一笔一笔填字。我不是作家，倒像个不高明的雕刻匠，左一戳右一戳，有时字压字，煮成一锅；有时五马分尸，头在赵国，胳膊和腿却跑秦国去了。这样的乱稿只有我

妻子能辨认、整理，她曾经是我学生，比我小 31 岁——这是上天对我的恩赐。回忆如洪水一般，快把我给淹死了！多少人与事，纷纷扬扬，在我眼前，仿佛一伸手，就摸着了，就感觉到几十年前的呼吸和心跳了。我热泪盈眶，我一个 84 岁的残疾人，力不从心，又热泪盈眶。能写多少算多少吧，我老是这么想。有一次，钢笔没墨水了，我还在戳字，直到天晚，妻子下课回家，一检查，啥也没有！唉，这种事故接连发生过几次。

老威：现在许多笔都不用墨水。

张紫葛：我太老，习惯用老式钢笔。

老威：哦？您就用老式钢笔写了一两百万字？

张紫葛：很多年了，自己也不晓得写了多少。97 年碰上好运气，出版了《心香泪酒祭吴宓》，险些吃官司。

老威：您揭露了真相，有的人就睡不着了。

张紫葛：其实这只是反右运动的冰山一角。

老威：我正是为此来拜访您，流沙河夫妇建议我花一些时间，记录您的右派和坐牢的遭遇……您差点就死在牢里了……

张紫葛：我这辈子已死过好几回了。

老威：讲一讲吧。

张紫葛：话太长太重，我恐怕撑不下去。

老威：如果您不拒绝，我就多跑路，多登门，尽可能缩短单次谈话时间。

张紫葛：好嘛，就试一试，如果中途而废，也没办法。

老威：行。

张紫葛：您让我从何说起？

老威：您的眼睛是怎么瞎的？

张紫葛：打瞎的，这是逮捕之前的一点插曲。当时反右已全面展开，各单位都下达了右派指标，而我成了右派中的重点对象。有一天，来了三个人，像做贼似的，溜进我的房间。

老威：做贼似的？

张紫葛：哦，您不明白。反右还不是后来的文革，还没有发展到大规模的公开的暴力。当时报纸上火药味浓，但也有政策性，比如承诺对右派不抓不管不杀；开批斗会时不喊口号；不打不骂。对知识分子，共产党还得做做姿态，表示一种猫戏耗子的宽宏大量。于是，“个别帮助”很快在校内蔓延成风。

老威：他们怎么“帮助”您的？

张紫葛：简单地问一句：“张紫葛，您还不承认自己是右？”等不及回答，其中一人就从桌上拽下台布，把我的脑壳一蒙，一顿黑打。我被弄得遍地滚，右眼被什么东西扎了，嗡地一下，就啥也看不见了。我不由自主地大喊：“我眼睛瞎了！你把我眼睛整瞎了！”他们才住手。

这三个人都是年轻老师，根正苗红的左派。就是农村娃娃，投军打仗，在部队学了点文化，解放后就转业到地方，然后又调入大学整治臭老九的那种。领头的专案组长是西政刑法教研室的副主任，最拿手的却是刑讯逼供。他按住我的手，凑近看，并压低声音说：“瞎了又咋样？”我说：“你们打人犯法！”他说：“我们没打你，有谁证明我们打你了？”我说：“我的眼睛还在流血。”他说：“那是你自己撞的。”我说：“我要求去医院验伤。”他说，“右派没这个资格。”我说：“你是共产党吗？”他说：“我们今天正是代表组织来帮助你，张紫葛，识相点吧，写份检讨。我们只要求你写一份深刻的检讨。难道你的命只值一份检讨？”

我没话说了，我这个曾经风光一时的俄文教授彻底被整垮了。因为人家既然敢弄瞎你，那弄死你也就等于弄死一条狗。我承认了自己的各种右派言行，三个人才转身离开。20多年后，受右眼的连累，左眼也慢慢看不见了。检查结果，是玻璃体破损，洞穿在视网膜当中，把光给遮了。

老威：西南政法学院可是培养执法人材的最高学府之一。

张紫葛：对，全国恐怕有三分之一的法官、检察官、律师以及其他司法工作人员曾在这儿上学。

老威：虽然是反右，却没一个懂法的人？

张紫葛：懂法和研究法的都打倒了，连吴宓那样德高望众的专家都难逃劫数。50年代，就没啥子法；到了文革，老毛的话就是法，包括胡话，包括放屁。一层层地贯彻下来，谁掌握了绝对权利谁就是法。在西政，院党委书记刘佑东就是法律，他当过西南公安部秘书长，其后，又任重庆市的公安局长。这个人太复杂了，可绝对不是坏蛋。在反右之前，由于我工作中的成绩，他对我极好。他经常来我家串门、喝酒，显得挺豪爽，没啥条条框框。56年，院常委讨论改善知识分子待遇，他还特意让我作为两名非党教授之一列席“小灶”，提建议。57年春，全国上下搞大鸣大放，许多民主党派对共产党、毛主席掏心窝子，意见越提越尖锐激动。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刘佑东把我请到他家，泡上好茶，动员我鸣放。我再三说：“刘书记，思前想后，我对党没意见呀！”刘佑东把脸沉下来：“咋可能没意见？”我说：“解放后，我一直被重用，又教俄语，又教法律，又搞翻译，还经常坐轿车，陪苏联专家到处转，日子过得风光体面，特别是您，称得上是我的伯乐嘛。”刘佑东不耐烦地打断我：“好了好了，你这千里马就帮帮伯乐的忙，在学校里带头，把鸣放有声有色地搞起来。上面催得太紧了，如果没人鸣放，我这个当书记的脱不了手。”我还是坚持不提意见，刘佑东生气了：“你这人不够义气！书呆子，随便弄两句也成嘛。”我说：“不成。”他说：“啥子不成？你就说你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有意见，与党组织有鸿沟。”我说：“没意见，没鸿沟。”刘佑东气得跳脚，连叫：“好个油盐不进”

的张紫葛！”
那会儿，广播里天天播“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

还有“宣传会议上的讲话”。作为任务，每个教授都要学习，要表态。西政的院刊转眼变成鸣放快报，我的“典型言论”登了上去，没意见改成“很有意见”，没鸿沟改成“很有鸿沟”。我大吃一惊，马上找刘佑东质问：“咋全搞反了？”书记大人答：“我叫人改的，路人皆知你我走得近，你不带头，难道你要我披挂上阵吗？上面叫我动员鸣放，没让我动员歌功颂德，若依你那么说，叫我如何下台？”

稍后，储安平“党天下”出来了，姓刘的意识到这不是闹着玩的。出于好意，他又找到我，叮嘱：“张紫葛，该转向了，再这样鸣放下去要出大乱子。”我说：“我根本没鸣放。”他说：“屎都胀拢肛门了，你不拉也得拉。趁早表个态，与右派划清界限吧。”

他当场督促我写了一篇《坚决反对储安平先生的荒谬言论》，并赶紧拿去寄给《人民日报》。57年6月28日，《人民日报》登出，标题改成《白发三千丈的手法是不行的》。可已经悔之晚矣！在同一天，校园内出现了《口蜜腹剑的右派张紫葛》的大字报。我气炸了，冲入党委办公室大吼：“我咋个划右了？！”刘佑东笑着说：“你不右，难道我右？”我说：“你把我当猴子耍啊？”刘佑东连叫：“紫葛歇火。”又拉开门，探头确认无人偷听，才压低声音说：“鸣放有任务，右派也有指标。昨天我们上市委开会，任白戈（时任重庆市委书记——老威注）要我们汇报，我刚说西政的鸣放同其他院校比，属小儿科，没人够右派资格，老任就火了。截断话头，冲我扫机关枪，并摊牌说，这百分之十的右，别人没资格，只有拿你这书记去顶。我他妈差点回不来，你说险不险？”我不吃这套，因为这和我没关系。刘佑东叹气说：“两个蚱蜢已栓在一起了，还没关系？我亲自动员你鸣放，把你的言论引蛇出洞，见了报；不大义灭亲划你右，有人就会借你扳倒我。”

木已成舟，我捶胸顿足也没用。刘佑东说：“你非右不可，

除非你给毛主席写信。”我犟道：“写就写。”刘佑东哭笑不得：“算了吧，张紫葛。看开些，过了这运动风头，右派还能摘帽嘛。我倒了，谁来给你摘帽？”

老威：这人太无耻了。

张紫葛：也不能这么说，他不这样，官就当不下去。

老威：你真善解人意啊。

张紫葛：我被专案小组整瞎后，人们议论纷纷，刘佑东就在大会上辟谣，并扬言要追查传谣之人。可有一次，我又挨打，被一位小姑娘发现，立即报告给刘佑东。他急匆匆地赶到，爬上房门天窗，望见我倒吊在房梁上，气坏了。居然大吼一声，一脚踢开门喊：“他妈的，把张紫葛放下来！”专案组长吓坏了，刘却像袍哥大爷，右脚踏在椅子上，拳头擂着桌子说：“你他妈凭啥打张紫葛？他这个右派在中央挂了号，你闹出人命，我向上面怎么交代？还以为我把他转移到香港去了。”

组长连赔不是，刘佑东冷笑说：“你这才是真正的反革命！我当过西南公安部秘书长，把你送上法院还不易如反掌？”

组长顿时面无人色，扑通跪倒磕头，让刘救救他。可风水轮流转，刘却没想到在文革中，专案组长摇身一变，成了造反派头头，带人把四处躲藏的走资派刘佑东抓回校，关进了黑屋子。“狗日的可没少打我。”刘咬牙切齿，“往死里整。”

老威：“你咋晓得刘挨整？”

张紫葛：刘自己讲的。1983年的某一天，我们在四川省检察院的大门里迎面相逢，刘佑东一把扯住我，激动得发抖，“张紫葛！”他大叫，“我可差点见不着你了。”

我故意说：“我这条命还是您给的嘛。”

刘佑东一脸疑惑地盯住我反问：“你的命？我给的？是吗？”接着又滔滔不绝地控诉文革，还牵我的手，去验证藏在衣裳底下的伤疤。我忍不住，就打断他，旧事重提。不料他还是一

脸疑惑。

老威：他毁了你，还装糊涂。

张紫葛：不太像。因为他听完我的遭遇，连声感叹，并且挺关心地问：“你真划了右派？还劳改了十几年？我怎么一点不知情呢？”我忍不住提醒：“你亲自划的右，居然不记得了？”

刘佑东一愣：“哦？大家都在劫难逃嘛。”

老威：这戏演得太好了。

张紫葛：我一下子被噎住了，甚至怀疑是自己的脑子出了差错。这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谁要较真，就一天也活不下去。

我右眼被打瞎的当晚，觉得平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此，不仅是肉体上，还是精神上，都痛不欲生。勾践能尝粪便，韩信能钻胯，图的是将来的雪耻；可我身心俱废，为了保命，还得把承认自己反党的检讨双手奉上，自我定罪，永无翻身之日……

我绝望了一整夜，次日早起，匆匆赶到校党委办公室，当众推翻了昨天的“反党检讨”，指出那是在逼迫下胡乱写的。不料一下子炸了锅。几个钟头后，专案组的一个小伙子上门来，一把扯住我就开始泣不成声。我吃惊地问：“你咋个了？”还以为人家天良发现，就反过去安慰说：“过去了就算了，我不会计较的。”不料小伙子突然哇哇大哭：“咋能不计较呢，老张？我刚递了《火线入党申请书》，向组织上保证要把你‘帮助’成右派的，可一泡尿的功夫不到，你就出尔反尔。这一闹，我的入党计划泡汤了，人人都以为我欺骗组织。”

他伤心得捶胸顿脚，没完没了。我实在熬不过，只得再写一份检讨，成全了他。

老威：您很有人道精神嘛。

张紫葛：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乎？随着斗争的深入，众右派纷纷落马，至1957年底，运动已近尾声。1958年元旦，康生代表党中央临校视察，我的问题立马升级。除了享受极右的轮流执班

看管，还有一个叫蒋仁峰的专职管我。

蒋与我住门对门，是个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的老地下党员。有一天，他隔老远就大叫：“张紫葛过来！我要教育你！”我立即应声而至。蒋四顾无人，就在他家门口悄悄说：“晓得不？康生来校，让将右派名单拿出来，逐一审核，并且点着你的名字命令：‘这个家伙必须逮捕。’——看这个架势，你通了天，两三年回来不了。”

我懵懵懂懂地瞪着他，蒋又说：“你回去与你母亲话个别吧。”

我说不行。因为一层叠一层的通栏大字报封门，谁也不敢从此进出，否则损坏了革命大字报就罪加一等。后门也钉死了，我只能在群众的监视下，每天由指定的窗口翻越。一顶象征活坟墓的招魂幡醒目地竖在一旁。

老威：什么时候了还守规矩？

张紫葛：蒋仁峰也这么说。并且让我从他家的屋后，猫腰穿过灌木丛。“明早7点钟，你悄悄去，天黑前回来。”他叮嘱说，“看母亲是人之常情，你怕什么？你要有决心活着回来，回到西政来！极左也不是党的政策——我以一个八一老兵的身份告诉你——这不是党的政策！”

我依计而行。大冬天，路灯没熄就赶车抵北陪探母。当时，我妈正在蜂窝煤炉上烤馒头给娃娃吃，一听敲门，不禁哆嗦；再一开门，魂都飞了——手里的馒头卜卜落地，因为右派逃跑，全家都得遭殃。

我妈没文化，但经历的事情多，还算镇定得快。一会儿，又有人敲门，我急忙钻床底，却是在西师当助教的弟弟回来了。

我把一些信笺和照片亲手交给母亲，却不忍心就此诀别。无奈之下，就点着一张放大的照片开玩笑说：“妈，留一个遗像给您吧。”母亲闻言色变，生气地瞪我说：“娃儿，硬扎一点，没

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接着又轻柔地拍拍我：“来，让妈给你洗个头。”

刹那间，我重返童年。因为自出娘肚，刮胎毛，到小学毕业前，都是母亲替我洗头。我曾经产生过逆反心理，闪着不让洗，她就追赶说：“啥时候找门媳妇，就用不着老妈动手了。”

老威：当时您还没结婚？

张紫葛：哪里话，娃娃都四个了，在西师附小念书。前妻在高滩岩教小学，她还不晓得自己的教授丈夫问题有多严重，所以没来得及赶回。我妈替我一把一把洗完头，她叹气说：“娃娃，你的头发掉了不少。”我的眼泪涌了出来。十多年后，母亲去世了，其时我正在被管制，不允许送终。

我掐着时间，一步三回头地离家。因怕人认出，就偷偷摸摸地沿西师山边埋头赶路，刚拢蔡锷路下面的拐弯处，有只手突然拍我的肩，一惊回头，原来是吴宓——这一情景，我在《心香泪酒祭吴宓》里写过——他笑道：“我一早就望见你过去，料想你会原路折回。”

来不及客套，他就问我的近况，我实言相告。他叹道：“毛公（指毛泽东——老威注）有负于天下书生啊！君不见明太祖时，不仅不能提相反的意见，连歌功颂德者也被怀疑其动机不纯。古今君王如出一辙，一网凭空撒下，不管鱼虾、黄鳝还是泥鳅，只要正好在网中的，都逃不脱。”

吴宓如此叮嘱我：“要学太史公，莫做三闾大夫。”许多年后，这话犹声声在耳，令我一再忍辱偷生，既不投江，也不服毒。

老威：像古代即将发配的士子，拜别高堂，就踏实上路了。

张紫葛：有点这种滋味。因为我25岁当中国文学教授，做过宋美龄的秘书，还主编过《新疆日报》，新旧朝代都曾吃香。在反右之前，由于精通俄文，能翻译苏联教材，经常陪同苏联专家视察，所以身价很高。“屁股冒烟”，意思是坐小轿车的级别。转

眼之间跌下尘埃，真不知“今夕是何年”？

老威：此种遭遇也算个案吧。

张紫葛：运动如演戏，人人都是角色，所以我身上的戏剧性不算啥。西政有个地下党出身的老革命，叫孙 XX，曾进军北平，做过全国首届政法委的法律起草组长。尔后因故连降三级，从最高政法委栽到省高级法院，然后再栽到西政任教务长。可就这么一个从政坛直线下降的书呆子，仍于 58 年 1 月 20 日在本校内礼堂作报告。讲着讲着，他便脱离了稿子，由着性情说：“反右运动的关键，就是分清龙蛇。你是龙，就借机升天；你是蛇，不识时务，就只有钻草……”

孙 XX 云里雾里讲得兴奋，从台上下来还左右打招呼，却不料礼堂外早有新出的大字报等着他——《把在党内潜伏很深的右派分子孙 XX 揪出来》。他傻眼了，怎么一下子就成了敌我矛盾？

老威：这人还有点真性子。

张紫葛：所以要改造，并且把你一次次地改造，直到成为身经百战的革命骗子。我等不堪在日常环境里改造，就得改地方。1958 年的 1 月 20 日下午，我被逮捕了。一场运动下来，被抓走的极多，而我却是西政第一个被逮捕的教授。公安人员将我在家中押解出门，满路满操场都是人，而我满脑子想的是前一段登在《人民日报》上的党的承诺：“对右派不抓不关不杀……”

经过教学楼，我把铐子举着走，将我“栽培”成敌人的刘书记正把脸贴在窗玻璃上看——我当时血气方刚，想以举铐子的动作促使他良心发现。

老威：您我还算是先后牢友呢。

张紫葛：哦？

老威：1990 年至 1992 年，我因反革命罪在石板坡羁押。

张紫葛：就是石板坡北里的重庆市看守所？

老威：对，一条溢满污水的臭巷子抵拢，大门就到了。

张紫葛：这么多年还没变化？

老威：鬼晓得。也许设施更完备，墙更厚了吧。

张紫葛：过去分东庄、西庄和老庄、老庄，我押在东庄，这在国民党时期就是监狱，关押共产党政治犯。重庆有好几处这样的地方，从前关共产党，朝代一变，要么被当作革命传统教育的场地，向广大群众开放，例如白公馆、渣滓洞、烈士墓；要么继续作专政工具。50年代，蹲过国共两党班房的人多如牛毛，我还以为自己是漏网之鱼呢。

进门就一块敞地，公安人员把我掇进去，向里面的干部打个招呼就算交割了。因为一场运动下来，反动派太多，他们还得抢时间去抓其他的。

老威：到底关押了多少？

张紫葛：两个楼都封闭着，不晓得。但我挤在犯群中候了三个多钟头，还不断有人被塞进来。洋铐越来越紧，最后钢齿都嵌入肉里了，我忍不住，就挤到桌边，把铐子举给一个女干部看。不料她说：“你享福惯了，还是自己担待一点吧。等到你真进去了，恐怕又会觉得在这儿倒立着也比在里面强。”

我正不解其意，就轮到收押手续了。一男一女坐在桌后，男干部问：“在哪儿工作？”我回答：“西政。”不料对方骂道：“混蛋！你凭啥在西政工作？”我愣了，正要再次作答，对方却敲着桌子一字一顿说：“你只能说潜伏在西政，窃取了教授之职。还有你的帽子，不能这么正戴。取下来，对，就这么翻过来，里子朝外戴。既然是反革命，就要让群众一眼能识别清楚。”

简单的登记完毕，开始搜身。当众脱光衣裤，像帽子一样翻过来，一寸一寸捏每一段缝。口鼻耳、腋窝、肚脐都检了，还把卵蛋仔细掐了数遍，最后命令“把勾子拱起”。无奈，我只好作狗爬，屁股朝天。那干部果然把两瓣肉掰开，用一根竹签捅了，再顺着股沟一路划下去。我当时臊得无地自容，因为此前的57年

4月，我还充当俄文翻译，陪苏联专家以及重庆市委书记任白戈等前来视察过，当时由所长、处长等一千官员接待，狗日的一路点头哈腰，恭敬得比奴才还奴才。今昔对照，真是恍若隔世啊。

搜身毕，方闻一声断喝：“滚进去！”于是我反穿衣裤袜帽，举双手入第一道门坎。喊报告，声音因颤抖而太小，屁股被踢一脚。接着上楼梯，又挨一脚。我像被马蜂蛰了一下，在第三脚没降临前大叫：“报告！”结果还是被踢趴在地上。后来才晓得，给我下马威的是清洁班的红头犯，他们全来自公、检、法系统，被“运动”成罪人后，就送这儿洗心革面了。

专政系统的人被专了政仍然高人一等，除了可以在监区活动的清洁班，号里的组长也由他们担任。组长下辖“清洁”和“学习”，算上层，替政府管理着几十个坏蛋。

我已成了独眼，加之监舍只有一个小窗，光线微弱，空气也不流通，所以我进房后就懵懵懂懂地靠着墙，适应了半天，周围的事物才慢慢从浑沌中凸现——一溜通铺抵拢拐弯，铺下是泥地，很潮湿。组长从犯群中鲨鱼一般浮出，命令道：“1143，你过来。”

我应声坐在湿地上，组长则坐在垫包上向我一一交待监规。我发觉当所有人都翻穿衣裤的时候，黄鳝泥鳅的确一个样了。

老威：您没过手续么？

张紫葛：啥子手续？

老威：就是挨打，或者花样翻新的肉刑。

张紫葛：那是后来的事，当时已人满为患了。我的号码是1143，没过三天我就听见有二零几几的号，这说明平常关几百犯人的看守所，已塞了2000多人，快爆了。接连两顿饭我都没吃，心事重，不觉饿。晚上吹哨点名，再吹哨睡觉，每人只有一尺宽，直挺挺地倒下去，手紧抱在胸前，否则手肘一放下，就侵占了别人的领地。我新进来，脚就蹬着大马桶躺着，尿胀了，先喊报告，得到口头批准，才一点一点起身坐便。

老威：撒尿还坐便？

张紫葛：必须像女同志一样坐便，还得手把生殖器往下按，让尿贴着桶壁淌下去，出了任何一点响，都叫违规。我抵桶而眠，方便容易；而自远处过来，就如探雷似的，每一步，都得往人肉缝里下脚。我感到梦里梦外均被尿尿给淹了。可夜半时分，却有一串尿滴溅到我脸上。惊醒之际，我不禁埋怨违规发梦癲的站尿者：“你咋搞的嘛。”不料组长闻声发话，反指我违规，叫站起来，没有口令不准躺下。我不服，双方一顶撞，清洁班就发现了，问明情由，批评了组长两句，又对我说：“1143，这是监狱，你应该懂得吧。”

第二天，有个西师的刘姓小伙子在放风时主动留下来监视我，等大伙都出去了，他才凑过来作自我介绍，并叫我“张教授”，在那种环境下，真吓了我一大跳。他又自我介绍，叫刘 XX，曾是西师外语系的学生。我不敢接受他的亲近，他却鼓励我说：“多锻炼身体吧，人材放在哪儿都是人材，运动一过，教授照样吃香的。”

老威：还是一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

张紫葛：清一色的右派。

老威：是啊，总比刑事犯成堆的地方好。

张紫葛：惭愧。不过在那种环境下，我对刘 XX 还是存有戒心，他身上的恶习不比刑事犯少。比如放风上茅坑，他回回占先，然后才轮到其他人。有时他蹲坑时间长，后面的就遭殃了，收风哨子一响，连屁股也来不及擦，他却守在那儿催人。

老威：够缺德的。

张紫葛：其实人挺复杂。刘 XX 后来判得很重。送劳改不久，他想不通，就给周恩来总理写信，企图鸣冤出头。岂料信尚未寄，就被“截获”，成为反改造的典型。开会、批斗、关小间，几经折腾，奄奄一息了。几年后，我碰巧又与他同处一室，那是在 XX

煤矿，他戴着脚镣手铐，骨瘦如柴。看在他从前尊重我的份上，我挺照顾他。有一个上午，干部叫我去看他，他说他不行了，看那鬼一般模样，我不禁叹息说：“撑一下吧，喝两口米汤回回阳吧。”他摇头，几天没吃饭了还摇头。我凑拢他耳边劝说：“想开些。”他却说：“我想看一眼天。”我把他抱起来，朝上举，他的手臂都抬不动了，脑袋却伸向顶上小窗，直到脸贴在铁栅上。他轻轻地哼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眼泪扑簌簌地下来了。我在下面叫唤：“刘 XX，看够没有？”他却不理，继续念叨着一段独白：“在天的这一边，是毛主席、共产党；在天的那一边，是爸爸、妈妈和故乡。妈爸呀，毛主席呀，我没有对不起你呀！”说完身子一软，就咽气了。

这是平生第一回有人死在我怀里。

老威：说不定这刘 XX 是个诗人。

张紫葛：那年头死个右派反革命，根本不值得感慨。

老威：您在看守所羁押了多久？

张紫葛：10 个多月。

老威：不算太长。

张紫葛：外头搞大跃进生产，里头搞大跃进审判。逮捕的人太多，十多平米的监舍，挤三十七、八人，到后来，挤五十多人，天气一热，人肉味薰得人晕乎乎的。晚上睡觉也由勉强平躺改为头脚颠倒侧卧，每个人都如扁担，直挺挺、硬梆梆，连起夜回来都嵌不进去。在这种敌人激增的严峻形下，大跃进精神是必要的，落实在政法工作上，就是草草审判，连姓名、年龄都从略不问，直接让你坦白罪恶，然后指出你的三种出路：枪毙、判刑、释放。任由选择，挽救的大门是敞开的。

在强大的宣传攻势下，每个落网者都土崩瓦解，自我坦白，并检举他人。有个湖南籍的小伙子，挖空心思，检举材料仍不上档次，竟狗急跳墙地指着某人说：“昨天放风时，我看见你对着

墙外发呆，明明就是有逃跑思想！”而对方反唇相讥道：“你狗日的昨天不仅发呆，还直愣愣地盯住哨兵，盯住冲锋枪不放，足足有五分钟，可见想劫狱！”

老威：真他妈乱套了。

张紫葛：太正常了，因为都不愿死在牢里，连累子孙后代。

老威：此话怎讲？

张紫葛：如果你被枪毙了，或不明不白死在里面了，你的子子孙孙就将成为“血仇子女”——即与共产党结下血仇，世代打入另册，不得翻身。所以，每个人，包括我都这么想——再大的个人侮辱都忍了，但“血仇子女”却万万当不得。

老威：绝大多数犯人都没犯死罪吧？

张紫葛：没犯死罪并不意味着你能活着出来。1958年大丰收，本来人人都能吃饱，但人人却去砍树、炼钢、搞运动，结果粮食没人收割，烂在地里，城头的商品粮供应也紧张起来。我先是在石板坡接受预审，4月份，又转到凤凰台的第一看守所。每天都是半饥状态，因为政府有话，如果让罪犯吃饱，就不肯交待问题了。凤凰台是一日两餐，麦麸加茄子。麦麸磨得太粗，有人饿急了，舍命胀，结果就拉不出屎来。要用手，用筷子，一点点往外掏。我比较理智，麦麸吃得少，可人却变得浮肿。盛夏天气，几十人的监舍只有一个天窗，空气和水都成了大问题，呼吸急促，挥汗如雨，每人每天只发一杯水，在可怕的窒息中，我们都渴望早日去劳改。

我总共经历了三次预审，第一次，我的罪名是“攻击共产党的领导不内行”；第二次，升格为“公然诬蔑”；第三次，就成了“阴谋推翻党了”。我想也不想，就一口承认，因为你稍一“抵赖”，审判员就起身要走，向外使个眼色……

老威：啥子意思？

张紫葛：马上“挺起”呗。

老威：不懂。

张紫葛：一种大跃进时期的肉刑。让你盘膝坐着，腰板挺直，四个人踩腿扯手，两个人用膝盖抵背，向后使劲掰肩。如此有节奏地“挺”几下，你就熬不住了。我亲眼看见被挺死过去的人，隔几个钟头，才醒转。原来这浑球被人检举：“人家喊毛主席万岁，他却叫红烧肉万岁。”还不认帐，结果一“挺起”，就喊爹叫娘地认帐了。

老威：您还笑得出来？

张紫葛：我心里没笑，嘴巴却老嘻着，这是中国式的一种习惯吧。总之，肉刑较普遍，揪乳头，掏下身，还有，我不一一列举了。所以，最后就不用审了，我干脆要纸笔，照政府要求一一呈供。按法律格式，他们加上头和尾，就成了我自己的“起诉”和“判决”。

老威：您真是破罐破摔了。

张紫葛：有个叫雷雨金的审判员，曾暗示我翻案。他先是打瞌睡，而后捏着我的供词说：“你真是个混蛋，敢欺骗政府！知道么，对自己的罪，过分夸大和隐瞒都是态度不老实！本来可抓可不抓，但为了教育大家抓了你，而你……”后面的话我记不清了，我听出他想救我，可当时，我实在不愿在看守所多呆一天。

终于庭审了。那天早晨，法警提我出牢房，空气突然变得意外新鲜，脑袋受不了，闷胀起来。一会儿，又提出一人，我定睛一看，竟是我在新疆大学任教时的学生汪志辉，现为四川外语学院的教授。师生两人铐一块，上囚车来到市中院的空坝前。我先解铐受审，审判长是中级法院著名的老虎判官。按程序，检察官念《起诉书》，把“肄业”念成了“肆业”，我出声纠正错别字，书记员反驳道：“就是肆业，啃了？真是反动气焰嚣张。”于是我此后除了回答是和不是，一律不说话。十几分钟后，过场走完了。

我回到空坝前，换汪志辉受审。不料更“大跃进”，十分钟不到就结束。我悄悄问他咋回事？学生回答：《起诉书》念完后，法官问——属实吗？我说——一派胡言。法官说——你有辩护的权利。我说——说了也当放屁。法官说——根据你在庭上的种种表现，可见《起诉书》上全部属实。我说——你们好话说尽，丑事做完。

延期几天，我和二三十人一道，候在一间小屋外等待宣判。本来我排在头里，里面却一直不叫我的名字。直到最后，我才喊：“罪犯张紫葛前来受审。”里面仍然无动静。我只好再报告，方听见低低的应答：“进来吧。”

法警出去了，就剩审判员一人，我一认，原来是我在西政的学生。她注视我一分多钟，表情凄凉地问：“怎么样？生活还行吧？”我嗫嚅道：“都过来了，还活着呢。”她起身绕过桌子，握住我的手说：“坚强些，相信以后您还会为人民做贡献的。”我暗吃一惊，这种举动可大大违规呀！

屋里暗，我感觉她呼吸急促。我想起她在西政反右斗争会上，态度激昂。她曾发言说：“张紫葛假正经，真反动。”而此情此景，恐怕师生都感慨万千吧。

按程序，本该由她宣读《判决书》，但她起个头，却读不下去。她将两页纸直接递过来说：“听清了，判15年，有5天的上诉期。”我会意地高声回答：“报告审判长，我不上诉，判得太好了。”

这是1958年的11月，天刚转凉。几天后，我就如愿以偿地投入劳改。

老威：上诉期不是15天吗？

张紫葛：大跃进，各行各业的时间都依法缩短了。

补遗——

在初入重庆市看守所之际，张紫葛先生曾亲眼目睹那个犯人

学生刘 XX “吃桶”，令人叹为观止。特补遗如下，也许对治疗种族健忘症有些微功效。

1958 年 1 月 20 日黄昏，众犯于寒风透骨中围坐开晚饭，由于我刚入监，心事重，暂无食欲，就在一隅旁观。所谓晚饭实为牛皮菜和包谷粉搅在一块的猪食，稀稀的一黄桶提出来，云蒸雾绕，我嗅一口就恶心欲呕，而众犯却直咽口水。桶中猪食晾在人圈中约 1 小时，才吹哨分享，一人一铜勺，施粥者边舀边抖，此时热粥也冷冻成冰砣矣。

大伙不及用筷，三两下便倒入口中，又滋滋卷舌舔净碗底，活生生一幅地狱图。眼看桶中已罄，我正准备起身，不料众犯仍无去意，均灼灼然死盯那饭桶。施粥红头犯发问：“今天该那个吃桶？”刘 XX 应声而出：“该我吃桶！”

我愕然人非野兽，岂能将饭桶嚼烂吃掉？却见刘 XX 亮出右掌，把住桶沿，缓缓旋转，而后将收罗之余沥丝丝纳入嘴巴。掌过一遍，食指再过数遍，把个饭桶搜刮得虎虎生风，比精心擦洗过还要亮净。

众犯啧啧叹息，我也以为见识了“吃桶”之风采。可说时迟那时快，刘 XX 竟突然翻桶，底朝天稳罩在自己头上，杂技艺人一般边旋边舔，达三分钟。待充分展示了中国犯人的舌头卷食神功，方揭桶亮相，气定神闲，大有苞丁解牛，踌躇满志的气象。

正在此时，有眼尖者却指出，桶耳内侧还沾有一点粥浆，这也是粮食，不能浪费。我不平道：“你这是骨头里挑刺，侮辱人格。”刘 XX 却二话不说，勾指直掏桶耳，还厉声教训我道：“毛主席说：‘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多吃一点粮食，生命就多一分保障，要活，使劲往下活呀。”

可几年后，刘 XX 却死于精神崩溃。

盲人作家张紫葛（下篇）

至 2004 年 1 月 6 日下午，对张紫葛先生的马拉松访问已进行了一半。阳光透过大学校园的林荫道，星星点点地飘洒着，我和上个世纪 70 年出生的诗人蒋骥一道，行色匆匆地赶路；而在另一端，张先生从午睡中刚刚醒来。

我们入楼上二层，按响了张宅的门铃。开门的是 70 多岁的石琮生老人，他自称是“学生”，经常在此照顾老师的起居——这大约是我见到的最老的一对师生了。

室内一派昏暗，拉亮日光灯，张先生一身蓝布中山服，正襟危坐于迎门的旧沙发。“廖先生？”他微笑道，随即我们紧紧握了手。

我介绍蒋骥，并提出给他照个相。张先生的胸脯触电一般挺直了，还摘下圆顶鸭舌帽。“状态不好，就不拍了吧？”他说。“拍也可以，不过不能发表出去。”

“为什么？”我表示疑惑。

“我的书上有正在创作的工作照，挺精神。”他说。“而现在的这身行头，像个倒霉鬼。”

蒋骥识趣地收起像机，张先生才放松了。稍后说到激动处，还把帽子朝后直掀，露出宽阔的秃脑门子，身子也如充足了气，不倒翁一般左右摆晃起来。

我和蒋骥不由自主地交换眼色，感到很可惜。

张紫葛：四川省第二监狱在重庆南岸的弹子石，对外的招牌是 XXXX 信箱。中国所有的保密单位都以信箱为代号，其实类似掩耳盗铃，因为附近的老百姓都晓得那是啥地方，出产的是什么。

老威：我也在二监呆过，知道里面的工种分翻砂、铸造、金工、钳工等。

张紫葛：造驱动、变压等各类大型电器，低成本高效率，很赚钱。当时还有女子队，做服装。

老威：里面有几个大队，多少犯人？

张紫葛：大概有 6 个大队，每个大队辖 4 个中队，我估计内圈至少关了 5000 余人。因为我是专政系统的教授，文化最高，被狱长封为大组长，管日常事务。同看守所比，算飞黄腾达了。全体犯人就一个大厨房，灶台之大，可以并排走两个人。一把锅铲长约四、五公尺，人抡不转，就用绳子栓住吊房梁上炒……开饭时，一条木杠抬大半人高的粗桶，热气腾腾，桶跟前排一个中队，一长溜，起码有一两百人。

老威：很壮观吧。

张紫葛：四个粗桶都抬出伙房，然后由小组到大组，层层上报到我这儿；我又转身立正向管理干事报告：应到多少，病号多少，缺席多少，实到多少，请政府指示。于是上峰下令“开饭”，我这个高级传声筒又一个转身立正：“全体听口令！预备！开饭！”

四条长龙依令向前蠕动，无论食物干稀，每人一勺。稍后，上千张嘴在同一时刻吧哒吧哒作响，我举目望去，觉得在大学里也没如此威风过。有一次，大队长巡视盛宴，竟对垂手作陪的我感慨：“张紫葛，你他妈这个反革命教授，统领过这种饭桶部队吗？恐怕美帝国主义看了这排场，也会发抖的。”

老威：这家伙挺幽默。

张紫葛：工农干部，没啥文化，却喜欢开玩笑。有一次收新犯，他弓下腰去摸一个女犯人的胸脯：“哦哟，多么资产阶级！还装假乳房！”没料到该犯反应贼快，竟投其所好解开胸部道：“报告政府，这儿是真的！”“是么？”大队长笑着捏了又捏，“狗日资产阶级长得挺肥，妈个屁！”

老威：当众耍流氓么。

张紫葛：周围犯人都不敢吱声，我们的管教干事也马着脸，他是个长相清秀的小伙子，我私下给他取了个绰号，叫“普西金”。当时像普西金这样有文化的年轻人同大老粗有矛盾，我夹在中间，与大队长的关系也不那么融洽。有一回，两名死缓犯人借加夜班之机逃跑，与他们同一监舍的人均受株连，统统上手铐脚镣，打入小间。我是当晚总值星，几乎难逃劫数了，幸好我事先向大队长递了“死缓犯不宜加班”的书面报告。

两逃犯不久就被抓了回来，枪毙了。大队长借着这杀气腾腾的氛围，召集犯人大会：“你们晓不晓得外面的形势有多严峻？饿死了成千上万！连树皮、草根都弄来吃，或许还吃不着！而你们这些阶级敌人，都有基本口粮，至少有玉米芯子和土伏苓填肚皮。狗日的，身在福中不知福，还逃跑，拿我们党优待俘虏的政策不当回事！”

接着，他挨着点犯人组长的名字，命令发言。狱中发言自有先大道理、后小道理的流行套路，于是组长甲开腔道：“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我们……”

岂料话音未落，大队长却喝断：“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用来教育你这阶级敌人的吗？放毒。来人，给我上脚镣！”

那倒霉蛋杀猪般叫屈，但40多斤的八卦重镣依旧叮当奉上。

组长乙在闻风胆寒中继续：“毛泽东思想教育我们……”

大队长照样拦截：“毛泽东思想是来教育你们这些反革命的吗？给脸不要脸，来人，上脚镣！”

没一会儿，就有七八个组长被大铁镣钉住，直挺挺地趴地上。会场鸦雀无声，连一只苍蝇的嗡嗡也清晰得令人毛发直竖。

我浑身被冷汗湿透。终于，大队长喊道：“张紫葛！”

我立正答到。大队长又盯了我几秒钟：“轮到你这个大组长了。”

我再一次立正答是，连声音也哆嗦了。可普西金却瞅瞅手表，出面解围：“时间不早了，张紫葛，你明天再继续发言吧。”紧接着又宣布：“散会。”

大队长的脸色顿时变了，却不好当众发作。

老威：一个普通干警敢为了你驳上司的面子？

张紫葛：我初入监狱时，狱长亲自召见我，认为我“在大风大浪中没站稳立场，但经过改造还有前途”。加之多数干事对我优待，所以大队长也不能太过分。

老威：混得不错。

张紫葛：人在屋檐下，岂敢不低头？比如某个夏天，某个女干部坐在过道上纳凉，见我过路，就故意一摆腿，把拖鞋甩到大太阳底下。我就得闻风而动，窜过去捡起鞋替她穿上。如果她再甩，我就再捡回来替她穿。

老威：您曾经是为人师表的教授，咋沦落如此？

张紫葛：她也这样问，并且叹息：“张紫葛，你真的变了。”我心里说：“是变了，犯人就得逮住任何一个讨好政府的机会。”她却叫我跟着进值班室，边吹风扇边问我还认识她不？我想了半天，又经反复提醒，才记起在几年前一次有苏联专家参加的舞会上，曾有个姑娘邀我跳了一曲舞，她说：“你那时多傲气多浪漫。”

往事如烟，如今角色掉换，该让我受宠若惊了。接着，她又逼我汇报当时的想法，为啥对她爱理不理的？我无言以对。她就优待俘虏，奖给我4个白面馒头和一床凉席。我已经两年半没吃白面馒头了，真是山珍海味啊。

后来，这事被大队长晓得了，就训斥我：“你这张好吃的屁嘴！”还要我交待凉席的来路。我没法子，带他去找她。她与他当我面吵起来。她说：“凉席不是我的，是张紫葛老婆探监送的，你想咋样？”他说：“张已交待，你违纪了。”她顿时火了：“我违纪？我又没把女犯弄出去睡觉！”

大队长下不了台，一跺脚转身就走。

老威：她内心对你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吧？

张紫葛：应该不是男女之情，因为我灰头土脸，又瞎了一只眼睛，教授的风光已一去不复返。逢年过节，她总是命令我担任乐队指挥，带着犯人乐队去为二监的干部舞会伴奏。一张顶天立地的幕布把乐队和舞池隔开，我站在中间，半边脸欣赏干部和家属们翩翩起舞；半边脸瞅着穿囚服的众乐手，指挥这些苦着脸的家伙尽可能把舞曲奏得热情似火。首席小提琴是个极右派，曾红遍大江南北，此时却像拉肚子一般，蹲在地上拉琴。曲名叫《共青团员之歌》，五十年代非常流行，大家伙一唱，就如共产主义马上在自己手中实现了。

在彩灯的辉映下，舞池里人越聚越多，下饺子一般，在沸腾中陶醉。有领导还赞叹舞曲太棒了，太鼓舞士气了。却没料到制造气氛的却是一帮被打下十八层地狱的牛鬼蛇神，并且泪流满面。因为他们从前都是革命青年，曾经反抗国民党的专制，还唱着歌，奏着乐去街头迎接解放，共产党、毛主席比爹妈还亲啊——我记得奏最后一支曲子，“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时，我都泣不成声了。

老威：我可是一点感觉也没有。

张紫葛：时过境迁嘛。

老威：你在牢里可一点没闲着。

张紫葛：改造嘛，就是折磨肉体，净化灵魂。不过总的来说，二监的管理还比较人道，算是我劳改生涯的一段幸福时光。听说1959年庐山会议后，狱长因优待犯人，上了右倾的贼船，被撤职了。干部大调整，监内重犯，一部分分配到新疆，一部分送深山里烧硫磺，还有一部分，包括我，去了本地的华莹山。

那是1960年8月，监狱里先把死缓和无期犯人钉上大脚镣，押上密封车带走。而大队人马被武装押解着出了内圈，在一小门口

排队。大门外的卡车倒过来，直抵小门，众犯被点着名，两人一铐，依次上货箱，如待宰的猪进了铁丝圈钉的笼子。

几千人的“活动监狱”按部就班地出发了。一天一夜，每个犯人的干粮只有两个冷馒头。从重庆南岸到北碚，只几十里的路程，却从清晨走到午夜。这是秘密转监，不能过大桥，众犯一下车，即被赶入北碚公共体育场内两个篮球场大的地方，几千人肉贴肉地立正报数，监狱政委登高宣布宿营纪律，违者重罚。

体育场的四周，巨大的探照灯交叉扫荡着，端着机关枪的哨兵更是时刻警戒。“卧倒”的口令一出，人们像被龙卷风刮过，呼啦啦地倾伏。山呼海啸中，身体压身体，宛如麦地的秋收，一排麦穗枕着另一排麦杆。大小便者，必须要在水桶粗的光柱中举手报告，经应允，方得起身，由几支冲锋枪指着，直线插入中间的小道，再由小道穿过持枪警察排成的走廊，抵达临时茅坑。沿途埋头快走，不准东张西望。

捱过五更，我才在饥肠辘辘中迷糊了一小会儿。天不见亮，众犯依命列队，搭渡船过嘉陵江，再上囚车，抵三河坝开始步行，这时才每人发一个混合面馍馍，算开拔以来的第二顿饭。接着走又窄又滑的毛坯公路，经半天加大半夜，到了华莹山脚下已近黄昏，坡太陡了，下巴朝天也望不着顶。这儿是个极大的煤矿，好像剥开一层薄薄的山皮，里面全是煤炭。煤质又好，亮晶晶的煤油浸得遍山都是。当晚就在山下露营，接管我们的矿部政委出面训话：“龟孙子们听着，这儿不比重庆，你们不是来享福的……”听这种口吻，众犯的心算凉到底了。

又饿又脏地蜷曲到次日晨，才吹哨集合；一人喝了一碗稀饭后，开始分队，认识新干部。这座山开了4个矿井，半山腰是3井，再往上，靠近山顶的地方是1井和4井，2井则高踞山顶。我被分配到2井。好几百体力稍好的犯人，在陡峭的山道爬了大半天，喘息方定，就跟“老犯”进洞实习了。

比生羊皮还硬的再生布工装套在身上，头戴竹蔑条编的矿帽，背电瓶，顶矿灯，这就算全副武装了。我们跟着组长在黑洞七拐八拐，偶尔在脚步之外，能感觉到洞壁渗出的水和耗子的声音。我估计已钻了 1000 米，总之，已在山的心脏部位了。大伙在一块洼地停下，再鱼贯笔直向上，这是一个电钻打出的矿眼，刚好一腰粗，用木柴块子一层层垒架，成两三尺高的人梯。众犯光着脚趾一下一下抠住木柴缝，手脚交替爬上去，钻进矿眼，在里面采挖。有时用电钻，有时手采。这矿很深，连一半都没采到，但犯人没任何安全保障。

采出的煤，用木轨和钢轨矿车运出去，一人一车 500 多斤，许多人刚开始推不动，可一旦速度快起来，就轰隆隆地呼呼生风，刹不住，就只好拼老命跟着车跑。这样很容易出事故，因为隔几分钟，又会有煤车冲过来，如果你跑不赢，后面的就直通通地抵上来。反应快的，一下子闪到旁边，擦层皮，伤条胳膊腿算走运了；反应慢的，咚地一声巨响，人就被车头车尾夹在当中，挤成肉饼了。

一年井下要死很多人。我熬了个把月，先挖煤装煤，后推拖煤车，整日神经绷直了。这儿同重庆天壤之别，从不政治学习，极右份子们碰面，也从不提过去。我们把罪行都忘了，只一心生产。偶尔有小组会，也是总结定额完成了多少。日、月、年，重重加码，完不成，口粮要扣，人还要被批斗，犯人和干部都对你拳脚相加。每日上班达 11 小时以上，一下班，人就疲做一滩烂泥。

在省二监时，因我个头大，体力甚好，能抬 250 斤重的石头；但到了矿上，人轻而易举就垮了。眼力也更坏了，我想如此下去，死了连尸骨也找不回来！

老威：你们的生活条件咋样？

张紫葛：一个监舍关 500 到 700 人，后面靠墙，出门见山。一律通铺，众犯齐刷刷地躺过去，墨黑一片。因为太累，也缺水，

莫提洗澡，大伙连脸和脚也不洗。煤油都浸进皮肉了，洗也白洗。在山上折腾过一段，或许你半辈子也洗不净，那种脏总是从骨头从梦里一股股渗出来。

山上的水含硝太重，涩涩地直冲鼻腔，不敢喝，所以水和食物等给养都是用索道吊上去，很珍贵。气候也太反常，冷，风大，夏季也穿棉裤，腰间扎绳子。夜里，穿堂风透过紧闭的门窗和瓦缝、墙缝、房梁，在监舍内冲荡，发出丝丝鬼叫。大伙睡觉前都搬条状石头压被子，人再蛇一般整个盘进去，作冬眠状，以免风将被子刮跑。

老威：要活下去真难啊。

张紫葛：一年到头离不开火，所以按规定，一年必须调一次班。因为那种致命的阴冷、潮湿，没有哪个血肉之躯能扛一年以上。我在井下干了个把月，每次下班都有绝处逢生之感。幸好有一天错班，突然撞上一个犯人，他从头到脚打量我一阵，问道：“老兄可是 1143？”我答是，他顿时如江湖中人一般拱手唱个肥啨：“小人 1958！”

这个 1958 跟我有一段孽缘，先是在看守所同关一个号。有回看电影受教育，众犯每人一小凳，坐了满满一操场。由于不准中途离场解手，加之白天放风时间太紧，大伙不得痛快，就只有不约而同地劈叉着双腿，抵着跟前的屁股屙尿。结果你抵我，我戳他，一根一根地屙下来，大伙的裤裆和鞋都暗暗地湿了。而当后面抵我，我又戳前头时，那小子居然一反常态地回头笑道：“你老兄的肾气太足，不但冲了我勾子，连我的脚也泡了个好澡。”

电影的内容早忘了，只记得 1958 回到号子，又一反常态，蹲下就屙。号里不准解大便，大伙拉他起来，稀屎却流了一路。莫奈何，大伙就监督着他用棉裤擦干净，接着又批判他用棉裤擦屎的行径是浪费。

头一个月，大家认为 1958 很窝囊，总是使唤他，而他也总是

应答：“1958 听吩咐。”不料大跃进审判伊始，1958 突然活跃起来。向干事立正报告：“1958 请您亲自提讯，交待罪恶！”不晓得他交待了什么，总之几个钟头后，他一回房就成了组长。号里的原组长却被弄成了狱霸。

老威：此人心机很深嘛。

张紫葛：但毕竟是熟人。救命稻草嘛，得一把抓住。当时 1958 已从极右的政治错误降格为乱搞男女关系，只有 4 年刑期；加之队上的书记与他在川东地下党时期是上下级，书记还是他的入党介绍人，所以他成了劳改犯中的红人，很吃香。

1958 念旧，去书记处一说情，我就不下井，在队部搞宣传了。

自由空间也大了，连去矿部杀猪分肉这种美差也有份。放翻几头猪，先分干部肉，我掌刀，1958 掌秤，轮到书记，刮刺一刀下去，20 斤打不住，却只算 8 斤。

其他干部也眼睁睁地占了便宜去，剩下的边角余料，才留给犯人打牙祭。

一次，书记带 1958 和我下山运粮，这是视我们为心腹了。我们抵溪口，拖个架子车去粮站，照单将一袋袋的米面装车，垒成了小山，然后拉过乡场，卸进一间小屋藏好。不用问，1958 一使眼色，我就明白这是个黑粮窝子。当时生活紧张，外头到处饿死人，书记却克扣犯人的粮票，倒卖黑粮。

转眼一个俊俏的农妇进屋，直奔灶台淘米切菜。1958 介绍，这是某某，又耳语：“书记大人的皮伴（姘头）。”并吩咐我生火。农妇见我老实，与我聊天，原来她是武胜县人，背着丈夫和书记勾搭成奸，以此赚些粮食，捎回家救急。

1958 外出了 1 小时，提了块肉回来炒，四个人饭饱菜足。书记和农妇忙着亲热，我就跟 1958 去洗了个热水澡。当时的洗澡比而今的出国旅游还安逸，我坐在脚盆里搓了三四遍，油泥如蜕皮一般去了几层，仍觉不过瘾。1958 连连催促，还嘲笑说：“搓烂

臭教授的皮，下辈子做劳动人民。”

两人出了澡房，内有油晕，外有面貌，顿觉天高地阔，陶醉得跟神仙似的。踏着落日余辉，一路哼着改造小调回山，人啊，真是一个容易满足的动物啊。

老威：祝贺您走上了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张紫葛：岂料好景不长，黑粮案东窗事发。不久，书记换掉，1958 也下山了。我因澡洗得太彻底，混在大群一年到头不洗脸不洗脚的黑炭里，格外扎眼。我的体味也与众不同，因为犯人们上山后，天冷，活重，缺水，常常憋不住尿，每个人裆内都弥漫着较浓的骚臭。

由于面貌和体味，我因福得祸，被走马上任的新官留在了原地。本来按规定，病残和劳动力差的应该换下山。

老威：您的眼睛……

张紫葛：是啊，我找到新书记，痛陈冤情：眼残，臭知识分子，不适合井下作业。书记只从牙缝里迸出一个字：“滚！”

这澡洗得我后悔莫及——我不仅被取消了红人待遇，重新派井下；而且一年半下不了山。这期间，身边的犯人换了好几拨，我熬成了老犯。

老威：我看过您的一篇回忆文章，您的命几乎就丢在井下了。

张紫葛：那次瓦斯爆炸，36 个人，我是唯一从鬼门关逃出来的。

老威：难以置信。

张紫葛：在劳改队，炊事班是老虎，狱医是老虎，而井下还有电老虎，就是专门给矿灯充电的。关系好的就冲得足足，不好的就只充一点，让你在坑里瞎摸。那次下井的全是右派，其中有个探矿专家，他晓得矿灯重要，就仔细检查，结果电虽然充足了，灯却只有 12 个。专家说：“这咋行？拿人命开玩笑嘛。”

这个专家是个书呆子，每天上下班，他都要提醒我警惕瓦斯、

冒顶等等，搞得人心惊胆战。他还曾向矿上写了有关安全生产的报告，却遭到全队批判，打得他满地滚。“这个贪图物质享受、否定毛泽东思想的罪犯是精神原子弹的狗专家！”书记这样痛斥，并且把井下时间延长到14小时——也就是今晚7点钟入洞，明早9点出来，多快好省地完成采矿的任务。

刚入马门，专家又像往常一样，耗子般落在身后冲我耳语：“今天可能进得去，出不来。”我胆子一麻，就应道：“是矿灯太少？”他抠我的肩说：“走慢点，把耳朵竖起。”

一串人勾着腰，又深入了几百米，专家喘息着说：“听见瓦斯没有？”我说没有听见。他说再把耳朵竖起。开始爬楼窑了，众犯分成几组，组内又分工，顺柴楼钻入顶上矿眼的有两三人，电采，并把垮下的原煤刨出来；而留在顶下的人除了接着刨，就是持一长铁钎戳顶上的垮碳。煤太厚了，有时一戳就刮刺垮一大片。大家刚按部就班，专家又喘气了：“瓦斯叫唤了，真叫唤了！”我屏息一听，果然有卡卡声，就停下手中铁钎。组长说：“天天有卡卡声，难道就不劳改了？”专家说：“眼下的卡卡可不是以往的卡卡。”组长说：“有啥不同？”就抬手又戳下一片垮碳。专家急叫：“戳不得呀！戳不得呀！戳多了就会引起爆炸呀！”但是大家都七上八下地干起来，不理睬他。专家一会儿拖这个，一会儿拽那个，像个疯子。组长呵斥道：“这戳不得那也戳不得，完不成任务谁负责？”

我却相信专家的话，毛骨耸然。卡卡声更大了，我相信每个人都看见窜起来的蓝火苗了。因为铁钎都不约而同地落了地。大约8点钟，我刚下意识地举钎一碰顶，瓦斯的尖叫突然震耳欲聋，与此同时，垮炭将我直冲起来，犹如连续的闷雷。柴楼像积木一般塌了，人与炭搅一块，从楼眼里直泻而下，我一屁股砸在地上，转瞬又随气浪翻起来，接着整个顶咣当盖下来。我昏厥过去。那一刹那，在极亮的光圈中，我看见了妈妈、老婆和几个娃儿的影

子。

醒来时我已躺在井外的煤坝上。原来瓦斯爆炸引发大面积冒顶，埋了 36 个人在井下，惊动矿部，组织人力抢救，刨出来的却是一具具黑尸。你想想，花大半天刨出的 36 具尸体一溜摆在煤坝，全都血肉模糊，没鼻子没眼，壮观么？

埋人组出动了，从头开始抬，连席子也不裹就草草葬了。轮到我，刚好凑足 36 整数。不料我卜地吐口气，吓了人家一跳。有个熟人的声音说：“还活着。”另一个声音说：“活个屁，只剩张紫葛了，埋掉就完事。”熟人的声音说：“真的还活着！”另一个声音说：“是么，莫吓人。”熟人的声音说：“的确鼻孔还在动！”于是许多脚步跑拢来，七嘴八舌议论：“见鬼了！”“狗日的命太大了！”

狱医是解放前叛逃过来的蒙古国卫生部长，有两下子，翻眼皮一检查，就叫人抬我到队部烤火。接着遇见一个对我有好感的干部，命令“马上送医院”。

被我党判刑的前蒙古卫生部长护送我，徒步 50 里地，入住矿部医院。犯人医生尽力抢救，我才从鬼门关归来。又扛过了三个多月的黑痰期。

老威：没得矜肺病？

张紫葛：黑痰一口接一口，比墨汁还浓，两个月后，才渐渐淡了，咳嗽也没那么撕心裂肺了。幸好从小身体底子打得结实，倒霉前的生活条件也优越。

老威：您是怎么度过大饥荒的？

张紫葛：天照应吧。我有一肚子苦水没倒出来，上帝也不忍心我做个憋死鬼。在山上，犯人每天的定量是 7 两米，只够熬两餐稀汤汤的粥，趁热喝下去，屙两泡尿就没劲了。三天两头死人。1958 下山后，我因得罪了炊事班，被诬蔑混吃混喝，消极怠工，粮食定量就叫扣去一半。这样一个星期，我就饿趴下了，想站起

来，腿肚子就抽筋。胃里没一粒米，虚脱，正躺着等死，却遇见一个同情知识分子的干部。他悄悄塞给我一个冷馒头，并且提醒说，新书记与炊事班穿一条裤子，你先忍着吧。

可没过多久，炊事组长因偷肉案发，竟被愤怒的犯人活活打死，其他同伙也被整成残疾。我的处境又拨云见日了。

跟着经历了死里逃生。住院后，因会一点医术，就被留下来当中医。有一次，我跟一位姓冯的右派中医上山挖药，爬到中途，撞上埋死人，我们急忙躲在一丛茅草后偷看。只见七、八个人轮流用铁锹在山壁间掘孔，一会儿，孔渐渐扩大成洞，洞又扩大成一个穴。一堆人亮着枯柴样的膀子，干完这活儿，已累得不行，风箱般的喘息百米外均能听见。接着，一卷破席摊开了，为首的汉子从衣兜搜出一把尖刀，开始翻来覆去地割席中尸肉，屁股、大腿、小腿、肩背、手臂都剔了，再把整个生殖器官切下。最后，撬开嘴，另有两个人凑近帮忙，他们把死者的舌头一点点抠出来，齐舌根挖了。为首的汉子右手血糊糊地握住刀把，那死去的僵直的舌头黑红黑红的，在阳光下像一张扑克牌，不，像半截蘸了辣椒酱的黄瓜。那汉子还把舌头嗅了嗅，一笑，凄惨极了。大伙把被剔得七零八落的残尸塞入土穴，每个人都向里面扔了泥块，然后填石头密封了。

剩下的碎肉堆在席中，大家围着默哀一番，然后捡枯柴生火。人们吞着唾沫，井然有序地各捡一块肉，架在火上烤；待肉发出滋滋欢叫时，又撒上盐。肉终于熟透了，人们狼吞虎咽，每张嘴边都沾着一圈油和柴灰。一阵风把焦肉味吹送过来，很香，迷糊人心智的那种香，我和冯医生面面相觑，喉咙和肚肠均咕咕山响。神经起了一阵痉挛，那一刹那我们都忘了自己还是人。

肉吃光了，有人又蹲在火堆旁刨出黑糊糊的阴囊，捧在手中，边拍灰，边剥蜷缩的焦皮，白生生的卵蛋刚绽露，就一口下去。周围的家伙发出惊呼，手爪从几个方向抓来。可惜，拖着一条软

筋的蛋已塞了一满嘴。

为首的好汉主持公道，才虎口夺食，把面目全非的生殖器切成若干块，每个人都尝了。“很大的补药呵！”有声音意犹未尽地叹息。

剩下的一条人舌头被高挂在远离火的树枝上，任呼啦啦的风吹得摇晃。待人肉晚宴告一段落，大伙才一起把目光转过去，听为首的汉子即兴创作以下这段祭文——

安息吧，XXX！很对不起。你是我们的同类，你先饿死了，也算为你的同类作了最后一点贡献。为了活着，我们不得不将你的屁股肉割下来烤吃；为了活着，我们还吃了你身上稍微有些嚼头的地方；我们还吃了鸡蛋和鸡儿，这是很大的补药——为了活下去，我们不得不这样做，对不起了，XXX。

我们没吃你的内脏，人毕竟与饿老鸦还是有区别，你好歹留了全尸。

我们把你的舌头高挂，任你随便乱说，对风，对太阳，对我们，你尽可以把讴在肚里的反动话统统倒出来。你生前不自由，三两句话就当右派，现在解脱了，揭帽了，死毯了。说吧，你随便反动吧，一直反动下去吧。

安息吧，XXX。我们再不会响应号召检举揭发你了，而且还要向你道声永别。因分享了你的反动肉，大家还要——向你鞠躬。

至此葬仪完毕。为首的汉子垫脚伸臂，取下枝头人舌，宝贝一般揣进裤兜。

老威：这家伙该不会拿回家炖舌头汤喝吧。

张紫葛：冯医生讲，人舌可是灵丹妙药，不能晒，不能烤，

不能焙，不能沾任何烟火气，否则就废了。正确的泡制方式是，晾除水气，用细麻绳缠于肚脐、后腰、大腿等贴肉处，以人的体温徐徐烘干。待其缩透变色，则细细研磨成面粉。此为外伤奇效药，遇淌血、发炎、化脓之新旧伤口，捻上舌粉少许，不大功夫就平复了。

老威：真是物尽其用啊。

张紫葛：那年头饿死鬼太多，估计这玩意不会缺货。

老威：您是怎么熬的？

张紫葛：转来转去，又得提到 1958。我充中医时，他又跟老书记“换防”到医院，任厨房和护理的大组长，比一般干部还有实权。1958 对我还算照顾，但这家伙太邪，最后连我也看不过去了。

老威：一个劳改犯能邪到哪儿去呢？

张紫葛：拿现在的行话说，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1958 随书记换防好几处，几乎成了贴身跟班，他经常狗仗人势，搞犯人的家属。比如有一次，一位杨姓犯人的妻子赶了几百里地来探望丈夫，门岗不让见，1958 就上前说情。于是夫妻抓住这难得的见面机会互诉衷肠，难舍难分了十几分钟。杨妻还把那年头比钻石还珍贵的一茶缸红烧肉带给了丈夫。

岂料探监毕，1958 就对女的说：“天快黑了，我送你一程。”结果他在溪口的一间房里要强奸人家。女的反抗，他就凶相毕露地说：“你莫吼，一来吼也没用；二来对你男人的改造不利。”女的继续反抗，他又说：“你依我，我就给你 10 斤大米，还让你男人不受罪。”于是就得逞了。

老威：这也太嚣张了。

张紫葛：更嚣张的是他还搞干部。有两位高级知识分子因营养不良住院，按规定，只能开半流食；一个 20 来岁的女护士出于同情，就擅自开了全流。1958 一晓得，马上打小报告。那年月，

这是立场问题，于是小护士被脱掉军装，押往矿部交待与反革命右派勾结的罪行。书记命令 1958 日夜监督，他终于逮住机会，在一个深夜把小护士给强奸了。为了封口，他给我拿了个白面馒头。

小护士来自知识分子家庭，了解我的背景后，就把种种屈辱私下说了。我安慰她，莫着急。她说不着急不行，1958 还在死缠我呢。于是我找到了几个住院的少年犯，一拍即合，且群情激愤：“犯人可以日干部了，成何体统！”

过了几天，该发零花钱了，可事务长的公款却不见了。如此通天大事，立即惊动了院长和书记。命令搜查全体犯人，却一无所获。事务长说：“他妈见鬼了！”院长问：“都搜遍了吗？”解放军报告：“都搜了，除了他！”当时 1958 作为犯人最高头目，正耀武扬威地站在书记身后，见解放军指自己，还不服。院长说：“是犯人就没有例外！”于是 1958 被搜身，当场查出公款。1958 大叫冤枉，书记却扇过去一耳光。院长命令：“绑起来押往反审中队！”

此时，我与几个小贼对了一下目光，心里顿时明镜一般。

1958 被突击预审，扛不住，就把书记贪污公粮的破事抖了出来；继续牵连，整个炊事班都成了贼窝。1958 罪大恶极，差点毙掉；可接下来，他又戏剧性地被平了反。释放之际遇文革，参加造反，成为工宣队员；再往后，他旧病复发，在野合时被一个女的杀了。据说那女的先骗他脱光衣裤，然后趁宽衣解带之机，把匕首捅进了他的心窝子。

老威：善哉善哉。

张紫葛：死就死罢，悲惨世道那来“善哉”？现在我一闭眼，还常梦见 1958，梦见被 1958 搞了老婆的杨姓犯人。这家伙也是个右派，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的同学，本来响应号召回国搞建设，却落到如此地步。他居然把老婆送的红烧肉拴在腰上，舍不得吃，只在馋得受不了时才拣两颗放嘴里，惹得同监犯人眼睛发绿。

姓杨的时刻警觉，连上厕所也带着红烧肉。蹲坑时，先捧在手心，感到不雅，才把肉缸放在一尺开外的地上。不料这一刹那的疏忽，肉就被人抓跑了。杨提起裤子急追，一路滴着星星点点的屎……

老威：追上了么？

张紫葛：追上个鬼。姓杨的后来因一点小错，扣口粮，只能靠麦麸充饥，结果憋出了大问题。送医院一查，确诊是一节硬屎卡住肠道，任凭什么药都化不开，只有开刀。本来是犯人医生的分内事，可值班的政府干部医生却抢着来做，因为犯人的命贱，可以当试验品练手艺。姓杨的被送入手术室，但见该医生大步流星地赶入，连白大褂也不穿，就吆喝犯医“准备家什”。姓杨的吓出一身冷汗，竟从手术台翻滚而下，连连磕头作揖：“我这犯人不够资格让干部亲自动手！”不料对方以毛主席语录相答：“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姓杨的哀号无效，被举回手术台，几人按住打了一点麻醉。屠夫军医一意孤行，全然不顾犯医在旁边的不断比划、提醒。结果一刀下去，堵塞物没有逮着，倒把肠子给挑断了。

手忙脚乱、草草缝合后，军医扬长而去。姓杨的挣扎了三天，一命呜呼。通知家属，杨妻又风尘仆仆地赶到，哭得死去活来。幸好此时，玷污过她的 1958 已东窗事发了。

老威：您在这种地方，可谓沦落到地狱底部了。

张紫葛：所以如《神曲》描绘的一样，我的命运又开始螺旋上升。刘少奇搞三自一包后，中央有精神，要对县团级干部、教授和共产党高知中的右派进行重新甄别。我被挑出来，送到四川简阳的平泉农场特殊队。这儿原是疗养院，现改为几千人的农场。特殊队里待遇极好。每人每月 36 斤粮，两斤菜油，两斤猪肉。我们在这儿养着，做些力所能及的体力活，全川 300 多人集中一块，等待着揭帽松绑，重新安排工作。可天有不测风云，文革来了，

刘少奇倒了，作为修正主义黑窝的平泉农场一夜之间就宣布撤消。1969 年秋天，我又被转押到雅安的苗溪茶场。

老威：您一个人么？

张紫葛：又是浩浩荡荡几千人。这儿横跨天全、芦山、宝兴三县，在深丘陵与大山区的交叉地带，是个劳改总队，下辖三、四十个大队，专用输电线长达 500 多公里。有规模很大的制茶厂。据说，从前这儿的原始森林望不到头，解放后全伐了，开辟成茶山。

平泉来的几千人像一把沙子漏入沙漠，转眼就没影了。大约有两三百人分在地势最低的队，统称为“新犯”，我虽有 10 年牢龄，也是新犯。当时正在学大寨造梯田，准备种旱作水稻，所以我们一来就投入挖土石方，垒堡坎（即石头砌起来的梯田边埂——老威注）。这是一面阴山，整日云蒸雾绕，湿气很大，人走在笔直的烂泥路上，得处处小心。我那阵儿不到 50 岁，虽然只剩下左眼，视力浑浊，却被当作强劳动力，派去挑土。我担起一百多斤的土石，右手拄一根棍子，战战兢兢在溜滑的陡坎上挪，不敢有丝毫偏差，因为脚边下去是 200 多公尺的堡坎。

至今，我还梦见那情景，腿肚子一阵阵抽筋。有个姓方的干事，看不惯我磨洋工，骂我死狗，猛然从斜刺里踢翻了我的探路棍。我失去平衡，身子一歪，就同土石一道轰隆隆滚下去。一刹那，我和在煤矿那次一样，以为报销了。我腾空而起，被抛出堡坎，在下坠的过程中，只觉得风声像一大片蛙鸣，透过身体，把内脏也变成向外蹦的青蛙。老娘和四个子女的影子一一闪过，我想叫声“完了”，嘴却张不开，直到嘭地一下，粪臭呛满了鼻孔。

原来有一辆粪车从坎下路过，这是三人拉的架子粪车，我恰好顺着飞入车上棺材大小的粪槽里，不偏不倚，连根毫毛也没伤着。不过臭粪四溅的壮观景像惊动了三山五岳，犯人和老百姓都奔过来，嚷着：“看空中飞人哪！”

我从粪槽坐起来，连打几个臭喷嚏，听见有人骂：“狗日的，尿泼了我一脸。”我连忙道歉，人们却纷纷避开。第二天，照常出工，我以坏了眼睛为理由，请求换工种，被方干事拒绝。

老威：这样下去会出大事！

张紫葛：天无绝人之路。此时我的一个女学生冒充我老婆来探监，文革中论派性，刚好管接见的陈姓女干事与她同属一派。

“亲不亲，阶级分”，她托她照顾我。于是，我被调到了集肥组。

集肥组长还提一双脚码子（鞋底带铁齿的防滑鞋套，山区专用——老威注）给我，称是我老婆送的。我穿上后，踏实多了。

当时劳改队同全国其它地方一样，两派互相打，今天你掌权，说不定明天我就夺权。比如整过我的方干事造反起家，不久就做了革委会主任，将参加过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场部政委弄成走资派，将关照我的陈干事搞成保皇狗。又打又斗又游乡，然后勒令加入收粪组，与犯人一起改造。

陈干事的腰被打坏了，连走路都艰难，我们私底下很照顾她，一见四下无人，就将政委和她抬着走。有次住在荒山野岭的农户家，就一间茅屋，里面除了一间大床，一张方桌，啥也没有。而热情的农妇却让我们歇床上，自己却在灶前蹲着。半夜，陈干事呻吟着，要解手，就蹲在床沿，伸手让我拉着屙。床后是猪槽，两头瘦猪一闻响动就嗡嗡过来，以为喂食呢。

政委平时养尊处优，这回算真正见识了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百姓，泪水不禁扑簌簌地往下掉：“唉，我们过雪山草地，打小日本，打老蒋，迎来的就是这种日子？社会主义几十年，还让人民过这种穷日子，作孽啊！我该挨斗啊！”

可没多久，政委就解放了，被一辆轿车接走了。

老威：您的好日子有望了。

张紫葛：无望，方干事还掌权，他派了个姓苟的犯人心腹监视我们。姓苟的是个强奸犯，想打陈干事的主意，却有袁组长碍

眼。袁组长是个血性汉子，有次拉粪车，路滑坡陡，恰巧又遇见方干事。姓方的嫌爬坡累，就骑高头大马般坐在车头上，吆喝着让我们拉。袁组长体力强，把中杠，我和陈干事一左一右，拉边飞。遇特别陡的长坡，三个人的脑袋一齐点地，背脊绷直，那大颗汗滴毛虫一般钻透衣裳。袁组长喘着气请求：“方主任，您就下车走几步吧，上完坡……”可话音未落，头顶的杠子就下来了，并且在三人头上，崩崩崩连敲数下。我见打得狠了，就躲闪，车把卡地一歪，就将陈干事撬滚到坡下，袁组长也差点被弄趴了。

姓方的还不下，袁组长火了，就抬手夺过杠子吼叫：“我他妈一杠子干了你，大不了填命！”

姓方的顿时面色如土，乖乖下车。几人一路无语直奔场部，姓方的马上召集干部会议。袁组长晓得闯祸了，就亲手把自己在伙房存了很久的油渣端出来，按收粪组人头，分成了29份，让大伙共同打顿牙祭，然后一一抱拳诀别：“今天我得罪了姓方的，肯定没好下场。大丈夫死则死矣，本无遗憾，只可惜栽在一个祸国殃民的小人手里！”接着，又向方家走狗苟某呸了一口：“油渣很香，可没你的份。”

话分两头，这边厢群情黯然，那边厢干部会议已结束，狱警荷枪实弹地出动。黑屋的门也森然洞开，一付百把斤重的脚铐哐当抛在门外。袁组长主动向前去，而陈干事正在另一群人中挨斗，交待罪行……

可说时迟，那时快，一辆吉普车拐过坳口，疾驰而来。姓方的刚杀气腾腾地露面，吉普车就猛然刹在他跟前，随着跳下三个军代表，宣布对农场实行军管。

姓方的一下傻了，他的领章与帽徽也被撕了下来。而正被打到在地的陈干事初闻喜讯，若痴若狂，竟手脚并用，一跃而起，连连高呼：“毛主席万岁！”

眨眼间乾坤倒转，姓方的及一帮走狗均被专政；而陈干事被

结合为军管小组成员，袁组长和我也跟着扬眉吐气了。

陈干事把我当残疾人照顾到草鞋组，这儿有三个瘸子，一个双腿断了的瘫子。都是知识分子，相依为命，从此日子就顺多了。

1973年7月，我刑满出狱，回到重庆，在西南师范学院继续管制劳动4年。此时，前妻早离婚，我靠分享弟妹们供给老母亲的基本生活费过活。直到1978年，中共中央下达了给右派平反的55号文件，我的政策才得到全面落实。

1979年2月，我重回西南政法学院，任中文教授。若干年后，双目全部失明。

六四难属吴定富



吴定富和妻子

采访缘起

约大半年前，我随刘晓波去拜访神往已久的丁子霖和蒋培坤，临近告别，丁老师写了一张小卡片递给我，说：“你能抽空去看看这对夫妇吗？要不，打个电话也可以，因为你们是同乡。”

我没有一丁点乡土观念，却觉得应该不负所托，去了解一下这对在六四屠杀中痛失爱子的父母的近况，给丁老师一个回复。返成都后，我三次拨通了 028——82510512 的住宅电话，却没人接，于是就耽搁了下来。

光阴悠忽，转眼就几个月。这期间，我跑了若干地方，追访了若干冤案；还经历了又一次婚变，又一次逃亡，已疲惫不堪，可丁老师的嘱托始终压在心里。为了释怀，我于 2005 年 5

月 17 日又打两次电话，终于听到了吴定富先生的声音！地道的
的新津方言。当他知道我是丁老师的朋友时，即盛情欢迎“去
家里坐坐”，还一再询问丁蒋二位老师的身体好不好？最近出
门方便否？

我支支吾吾，却敲定了访问的时间。

在丁蒋两位老师编纂的《见证屠杀》的书里，吴定富、宋秀
玲有一小段证词，并配有儿子吴国锋惨遭杀害的遗照——我反复
地端详，愤怒竟如 16 年前那般新鲜。而窗外高楼林立，日影昏沉，
饭粒似的人群被商业时代的口腔越嚼越含糊。我想，1989 年 6 月
4 日凌晨，我 31 岁，正在家里朗诵诗歌《大屠杀》；可在北京街头，
一个叫吴国锋的不满 21 岁的大学生，仅仅因为记录历史的热情而
连中数弹……

一颗流星划过天穹，人们大约不会去追究 16 年前的流星是否
与眼下的一样？

2005 年 5 月 19 日，星期四上午 11 点，我空着肚子，行色匆
匆地搭上一辆破旧旧客车，从成都西门的金沙车站出发。由于沿途
捡客，待客车晃晃悠悠抵达几十公里开外的新津县城车站时，已
近下午两点。花 3 元钱雇一辆人力三轮，穿越半个城镇，就拢五
津镇模范街嘉宁公寓外面。我左顾右盼，直瞅对街的牛肉面馆，
咽了几口唾沫，即转头寻找“A 幢 4 单元 4 号”。插入一条靠围墙
的背巷，进入一老街道企业的那种锈铁门，门内有四个脏兮兮的
妇人正打麻将，见了我，均边搓牌边齐刷刷地扭脸。其中一个戴
红袖章的胖大嫂还问：“你找谁？”

我不予理睬，径直上了单元楼梯；待胖大嫂起身，我已上了
二楼。在梯口，一个大鼻头男人笑着俯下身子：“老威？”

我习惯性微笑点头。在跟他进右边门的瞬间，发现身后站着

一位头发斑白的老嫂子——她就是不幸的母亲宋秀玲。她说已在楼外向街望了好一会儿，没料到贵客已直接上楼了。

我的眼前展开了一个日趋颓败的家庭，四壁徒然，旧家具和人在其中显得灰暗。然而迎门之处，夭者吴国锋的黑白照片却格外鲜明，那眼镜片里的始终的笑意，如星辰，如朝露，引起我对如梦人生的阵阵追忆。正发愣，吴父却邀我坐，上茶毕，我唐突地问：“可以采访你吗？”

“丁老师的朋友，当然可以，”吴父揉了一下大鼻子，爽快作答。“况且，儿子死了，全家的希望早破灭了，没啥值得怕的。”

我掏出录音机。吴父又说：“我们在几年前，就站出来接受过海外电台的采访，不过时间太仓促，讲不了啥。你算第一个登门来访者，不知从何说起呢？”

“从小时候说起。”

“哪太费时间了。”

“从小时候一直到眼下，你们放开讲吧，有的是时间。”

此时，楼外传来一波波孩子们的喧哗。“下课了，”吴母喃喃道，“吴国锋在这后面上过小学，他的班主任至今还没退休呢。”

老威：这是丁子霖老师写的卡片，我从她家里得到了你们的地址和电话，大半年来联系过好几次，今天终于登门拜访了。

吴定富：我们一直在家等你呢，老威先生。

老威：我还在丁子霖和蒋培坤编著的《见证屠杀》的书里，读到过你们的一小段文字——这种回忆太痛苦了！可我目前做的，就是记录痛苦，人家讲不下去的事，我还煞费心地挖。

吴定富：我们老了，又死了儿子，所以不用你挖，我们也愿意讲。至于怎么讲得透，老威你有经验，就开个头吧。

老威：尽可能完整一些。

吴定富：好的，那我按时间顺序，从小往大说，吴国锋这娃

儿，从小聪明，被他爷爷奶奶当作掌上明珠，他爷爷虽然是拉板车的工人，却有些文化，经常把孙儿带在身边，一笔一划，在墙上写字教他，吴国锋反应快，记性好，几岁就能看出是个读书的材料。

老威：你们家有几个孩子？

吴定富：3个。大的是女儿，吴国锋是老二，他上小学就考的第一名。由于我们家在新津土生土长，几代都是劳动人民，家庭负担重，所以没有条件去娇惯娃娃。

老威：你是老知青吗？

吴定富：我生于1942年，国锋妈妈生于1944年，那是抗日战争的艰难时期，没想到，日子就这么一直艰难下来了。政权更迭，似乎有那么点朦胧的盼头，我们却在该长身体的时候饿肚子，穷得没钱上学。我在1960年初中毕业，还做过社会青年，随后分配工作，当街道企业的采购员，而国锋妈妈一直是家庭妇女。

老威：也就是说，全家生活都靠你的工资？

吴定富：我的工资30来块，国锋妈妈在家里做些小手工，比如缝个衣扣，锁个边，一天能挣几角钱。我们的收入加起来，不过40块，却要糊5张嘴巴。计划经济时代，不敢有其他生财之道，只好一家人掰着指头过。一分一厘都要算，连衣裤也是大的穿不得，补上破洞，小的接过来穿。值得安慰的是，吴国锋聪明、争气，年年是三好学生，学习成绩一直是前几名，并且不骄傲，受到老师和同学的一致称赞。

老威：这叫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吧。

吴定富：由于经济负担过重，吴国锋初中快毕业时，我就劝他考中专，这样就能提前参加工作，保险得到饭碗。没想到这娃儿有心计，表面满口答应，私底下却与几个同窗好友约定，打死不读中专！就这样，他以优异的成绩升了高中，我的盘算落空，只能暗自叫苦。

老威：你有点缺乏远见嘛。

吴定富：没办法。本来大女儿就成绩好，考中专拿饭碗很稳当，结果一家人出于“远见”，让她继续读，以为考大学没问题，结果却落榜了。竹篮打水一场空，遍街都是名落孙山的高中生，一时找不到工作，只好在家吃闲饭。

儿女都大了，走一个算一个吧，我们俩口子身体都不好，这辈子就认命了。可吴国锋把生米煮成了熟饭，做父母的只好节衣缩食，硬撑起。好在80年代中期，社会允许自谋生路了，国锋他妈就在门口摆了个小摊，卖些日常小零碎，贴补家用。而我在工作之余，要煮饭、洗衣、照顾娃娃们的起居。还忧心忡忡地给吴国锋敲警钟。这时他已成近视眼，我就说：“眼镜哎，你只能背水一战了，万一考不上大学，莫得哪个单位肯要你这个书呆子近视眼。”

吴国锋懂事，不顶嘴，还安慰我：“老汉，你放心嘛。”

我说：“你在班上的成绩最多算个中上，咋个叫我放心嘛。”

他说：“老汉你就不懂了。目前才高一，如果学习过于拔尖，老师和同学都会天天盯住你，要求这要求那，太累了，没功夫耍。所以嘛，能过得去就行了。”

我怀疑他吹牛，他却认真了：“我每科都搞懂了，你若不信，我就在期终考个前三名给你洗洗眼睛。”结果，真就考了前三名。

老威：做儿子的比父母还沉稳，前途真不可限量。

吴定富：我们这一代父母被政治折腾来折腾去，整个被报废了，就希望儿女有出息；有时希望过头了，就显得痴傻。高中三年，关键之关键，我们这头含辛茹苦，他那头却心里有数。到高考前夕，上强化班了，他仍然该学的时候学，该玩的时候玩，弄得我们提心吊胆。有一天，竟然有三门课的老师通知吴国锋：他可以不上课复习了。我们还以为发生了啥子事，就立马找校方，可任课老师却出面安慰：“老吴，你还担心个啥？这三门课，你

儿子早就精通了，与其让他在课堂上浪费时间，不如让他回家休息，养足精神去参考。”

接着就是高考，那是1986的夏天，炎热无比，考场上还昏过去一些考生。而吴国锋似乎考得很轻松，头天上午考完，我把中午饭摆上桌，就迫不及待地问考得如何？他懒洋洋地回答：“不理想。”我心里咯噔一沉，但为了不影响他继续作战的情绪，还强作笑颜地说：“没关系，赶快休息一下，下午加把油。”

下午更热，许多父母都挥汗如雨地站在考场外等。我们差点把心脏病急出来了，吴国锋却像没看见，你要问，他就始终是那句：“不理想。”我彻夜失眠，还要做饭，搞卫生，把脑神经都要绷断了。

老威：你还去单位上班么？

吴定富：早就请了假。当时，全国统考是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啊，考上就鸡犬沾光，落榜就凤凰掉毛。所以当熬完最后一场，我终于忍不住冲儿子叫：“吴国锋！你到底考得如何？！”不料他回答：“还是不理想，我还有一道题没做完。”

我的心一下子就凉到底了，不禁埋怨：“你咋个搞起的？！你不晓得爸爸的负担有多重？”——话音未落，却见吴国锋笑眯眯地站在那儿打包票：“老汉你着啥子急嘛，不是吹牛皮，我都考不起，这世上百分之九十五的人都考不起！”

我一楞：“此话当真？”

他肯定道：“当真，虽然我是有道题没做完，但总分绝对领先。”

我松了口气，立即换了幅笑脸：“好嘛，你的仗已打完，现在该逍遥了，你想咋个耍，给爸招呼一声。”

他这是才露出理直气壮的神色：“我与同学们约好，轮番在每一家办招待，自己慰劳自己。”

我当然毫不迟疑：“好的，轮到我们家，你开个口，爸给钱。”

他说：“我需要几十块。”

我说：“爸给你 100。”老实话，我这辈子从来没这么大方过，当时的 100 块相当于现在的 1000 元了。

他大喜过望，又得寸进尺：“还有个条件，我办招待那天，家里人都必须出门，把这空间全部腾出来。”

我理解他的心情，因为我在二十几年前就考过初中第一名呢。于是，一到那天，我们带上他弟弟，早早去邛崃走亲戚，直到夜深了才回家。我不晓得那些少年郎如何狂欢的，因为屋子已经收拾得干干净净。他妈说：“国锋从小能干，肯定亲手弄了大桌子的菜。”我看见旮旯里有一大堆啤酒瓶，晓得他们还“违禁”了——因为在平时，我们的要求极其严格，除了看书学习，一律不准看电视（自家没电视，更不许串门看电视），不准东游西逛，啤酒更是想都莫想。

考过试，野马放了十几天，就开始填志愿，为了保险起见，我让他第一志愿填四川大学，他迟疑了一阵，眼泪汪汪地填了。可一拿回学校，他的班主任廖老师坚决反对，并亲自跑到家里来说：“吴师傅你放心，这娃娃是我一手教大的，他至少能读个中国人民大学！”于是就把志愿改成人大。

接着通过了政审。又隔了个把星期，他的分数查到了——平均总分 91.5，为新津县本年的高考状元！全家人欣喜若狂，连远舍近邻也涌上门来祝贺；又过了十来天，人大的《录取通知书》就下来了，是四川省第 7 号通知书。

我伤伤心心，又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姓吴的家族终于出了个名牌大学生！这可是多少代以来出的第一位状元啊！我当时以为，我们家的命运从此将得到改变。

托运行李和买火车票都是吴国锋自己去办的，我只是借了单位的车，亲自把他送到成都火车北站。那儿人山人海，吴国锋排了几个小时的队，还反过来安慰我们。他真的与娇生惯养的富家

子弟不一样。

老威：这是 1986 年的秋天吧？

吴定富：对，这一年他 18 岁，考取的是北京人大工业经济管理学系。老威你看，这是他入学时的照片，还有他宿舍里同学们的合影。吴国锋独立生活能力强，人缘好，所以很快就适应了北京的生活，还被推选为管生活的副班长。你看这组照片，他正炒菜，这张已端上桌子了，他走到哪儿，哪儿就皆大欢喜。他是左撇子，小时候，我花了好大力气才纠正过来，现在除了写字，用筷子，干其它都用左手。

我们每个月给他寄 100 元生活费，因为他妈妈的小生意也有了起色，社会也越来越开放，有盼头了。大概入学第 2 年，他交了个同校不同系的女朋友，东北长春人，父母都是医学教授。开头我们回信表示反对，怕影响学习；但吴国锋性子犟，我们拗不过，当他又来信，谈到要在假期陪女朋友回东北，见未来的岳父母时，我们只好又汇去足够的路费。

老威：这照片上的姑娘蛮秀气，看样子，他们正在热恋。

吴定富：这姑娘要求进步，还入了党。吴国锋暑假曾把她带回新津，我们见他们如胶似膝，也放心了，觉得是美满的一对。当然，吴国锋后来不在了，人家年纪轻轻，只能重新选择。她留校了，迫于压力，也在血的真相面前闭嘴了。老威你在提到这一段时，就含糊一点，或者一笔带过，免得连累人。

老威：你放心吧。

吴定富：总之，吴国锋在学校事事都顺利，充满希望，充满活力，而儿子的希望在当时也是父母唯一的希望！转眼到 1986 年 4 月，他写了封几页纸的信回家，谈到胡耀邦的逝世……

老威，应该是 1989 年。

吴定富：对，89 年！89 年！89 年 4 月他写的信，这是自入学以来最长的信，满纸激动，用诗人的语言，描述了天安门悼念胡

耀邦的情况，集会、口号、标语、哀悼文章等等。他周围的同学、老师几乎都介入了。我当即回信，表达了父母的担心，提醒他的主要任务是学习，不要沾政治的边。

老威：这倒符合胡适先生“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的主张。

吴定富：我们没考虑那么多，只是凭感觉认为不能与专制政府对着干，否则没好果子吃。我们这代人，经历过饿肚子、四清、文革，见得太多了。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共产党的惯用伎俩，心知肚明啊。我们的胆子是整小了，但胆小麻烦就小嘛。吴国锋身处北京，热血沸腾，当然不同意我们的世故。父子俩通了四、五封信，达不成一致，可我还是满足了他的恳求，在两个月之间给他汇了 1000 元钱，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

老威：那时我在地区艺术馆任创作员，正式工资才 100 多块嘛。他为啥要这么多钱？是捐款吗？

吴定富：他说丢了自行车，要买新的，还有其它什么开销。我疼子心切，就没深究。

老威：你儿子正处于“国难当头，匹夫有责”的年龄和关口，手中钱多是很危险的。

吴定富：虽然心急如焚，可当时只有写信这个渠道。我晓得儿子在追求真理，大道理掰不转他，就只好昧着良心，一再规劝：“共产党是残暴的！整死人从来没填过命啊！”我们的父母，吴国锋的爷爷奶奶，过去拉板车，起早贪黑，担着挑子赶场，做小生意，一分一厘攒钱养家；我们长大了，结婚生子，又重复父辈的劳作。太艰辛了，要避开共产党的一再折腾，太不容易了！而吴国锋是一代一代积下来的机会，他终于遇到了好时候，政治环境比毛泽东时代宽松；他入读高等学府，将来定能够大展鸿图，家族的苦命也就由此改变了。

可吴国锋毕竟是个涉世不深的娃娃，他听不进去，也不愿跟

我们争辩，后来就干脆不回信了。出事后我才晓得，他要 1000 元钱，是为了买一台好相机去记录历史，留下些珍贵的镜头给后代。

老威：你儿子算得上“天之骄子”，在那种时代风气下，他非常有远见。

吴定富：我们像热锅上的蚂蚁，在家里熬着，天天瞪着电视看。《人民日报》4.26 社论里，李鹏狗杂种早把学潮定性为动乱了；接着又是游行、绝食、下跪、请愿、对话、戒严，部队也开始调动了。我几乎沉不住气，想往北京跑了——却终于在 5 月 31 日，接到了吴国锋的电报，内容是：“我准备回家，没有路费。”

当时我还不晓得他买了相机，所以有些疑惑。可仍然高兴地电汇去 200 元钱，就比较放心地坐在家里等候他回来。吴国锋一直没回来。那几天，事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却尽量朝好的方向猜测——比如戒严了，坦克都朝天安门开了，我们还以为，吓唬一下学生，把他们关在校门里也不错。

我的体质平时就差，那些天焦虑过度，就患了面神经瘫痪，天天去医院针灸。6 月 8 日上午，我感觉病情减轻，就坐在门坎上晒太阳，这时新津县五津镇政府来人通知我去谈话。我穿过一条街，刚跨进政府大门，当官的劈头盖脸就问：“吴定富，你的儿子在北京参加了反革命暴乱，你晓得么？”

我一下子懵了，条件反射地迸出一句：“你说啥子？”

当官的又重复：“你的儿子在北京参加了反革命暴乱。”

我回答：“不清楚。”

当官的清清喉咙，一字一顿地宣布：“我们正式通知你，你的儿子吴国锋已经死了！”

我的脑子一片空白，只听得另一个声音用自己的嘴巴在问：“真的？假的？”

对方板着面孔答：“我们接到北京的政府专电，你的儿子真的死了。”

我觉得身体软得像面条，要瘫下去，但还是强撑着：“还有啥子要通知？”

对方又补充道：“详情尚不清楚。政府决定，明天我们替你们买票，并由张副书记陪同你们，前往北京料理后事，并领回你儿子的骨灰。”

我应了句“可以嘛”，就哆嗦起来，虚汗直淌。挣扎了一会儿，才从椅子上起身。当官的怕我栽倒在衙门里，急忙来扶，我推开他说：“我不要你们送！又不是上刑场，我走得动。”

我摇摇晃晃地过街回家，汽车喇叭响得特别遥远。一进门，我就靠住墙喘气，泪水和汗水哗哗下来，把衬衣都湿透了。老伴见状，过来牵住问：“你咋个了？”我不禁哭出了声；她又连问几声：“死老汉，你咋个了嘛？”我一咬牙，使出全身力气吼叫：“吴国锋死了！”

只听得扑通一响，老伴已倒地，怎么抢救也醒不了。她就这么昏了一天一夜才活转来，满眼垂泪，不吃不喝，只一声声喊：“吴国锋，你咋舍得丢下我们哦！”

6月9号一早，政府就把两张火车票送上门，原说由张副书记陪同前往，此时也不见他的影子……

老威：变卦了吧？

吴定富：小地方当官的胆小，怕犯错误，就干脆溜了。

老威：请原谅，我打断一下。你们接到吴国锋最后的信是在5月31号吗？

吴定富：是的。

老威：你们当时没有一点不祥的预感？

吴定富：我们只有电视一个渠道，我们做梦也想不到会开枪！李鹏狗杂种发布了军事戒严令，部队分几路进城，我们也没想到要屠杀。假的！全是鬼话！啥子“为了维护北京市的社会秩序”，我还认为大不了就抓几个人，如果吴国锋运气不好，撞上了，在

校学生的身份也会从轻发落；更严重一点就是判刑，劳改回来还是我们的儿子嘛——我经历过政治运动，这也不是丢脸的事。所以，六四镇压我们还蒙在鼓里……

老威：是么？

吴定富：千真万确。

老威：当时全世界都震惊了……

吴定富：全世界都震惊了，老百姓也不一定知情。江津是小地方，共产党一封锁消息，我们就两眼抹黑。

老威：除了政府通知，你们从别的渠道得到过儿子的下落么？

吴定富：6月8号下午，我们接到吴国锋的干姐姐吴国房从徐州发来的电报，称“国锋遇难”。

老威：这个吴国房是徐州人？

吴定富：是江苏人，在北京第二外语学院读书，比吴国锋大1岁。她6月4号就得到干弟弟的噩耗，可那几天，北京已成一座死城，戒严部队卡断了所有的通讯。她报不了信，心急如焚，只好约了一位新津籍同学，冒险坐火车溜到徐州，才发出电报。

长话短说，6月9号下午，我们从成都上火车赶往北京，因为悲伤，两天一夜没吃饭，只靠一点水维持着。北京接站的是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管理系的张副书记，这位女同志简单地问了一下我们路上的情况，就沉默了。直到把我们安顿到人大的招待所，才叮嘱我们先好好休息，第二天谈正事。

第二天上午，系上的书记和副书记都出面，向我讲了六四前人大和吴国锋的情况。书记说，6月3号晚上，他们亲自挨个寝室给学生们打招呼，千叮万嘱，外头开枪了，大家别出门；系上甚至宣布，破例允许在宿舍打牌、搓麻将。书记还说，吴国锋是个老实娃娃，那几天脚脖子扭了，走路都是瘸的，他满口答应不外出，可我们一转背，他就拧起照相机，发疯一般冲出楼，骑上自行车跑了。

此时我们才明白，寄出的 1000 多元巨款，都被吴国锋用来“记录历史”了。从胡耀邦逝世开始，他用崭新的海鸥相机拍了几百幅学潮的图片，其中有一沓就压在枕头下。我们整理他的床铺和遗物，除了工具书、换洗衣裤和照片，只发现一枚 5 分硬币和 10 斤全国粮票。

老威：你儿子当时没在天安门？

吴定富：5 月下旬以后，北京本地的大学生差不多已回校，但从全国各地仍然源源不断地涌来声援学潮的人，每天聚集在天安门。据吴国锋同学小李说，他当时和我儿子一起逃出校园不久，两人就跑散了。小李遇见黑压压的军队，追着他开枪，丧魂落魄之际，他拐进一条巷子，胡乱东窜西窜才回校。一打听，吴国锋下落不明。

老威：你儿子在什么地方出的事？

吴定富：大概在西单附近（宋秀玲插话——坦克和步兵已沿着长安街开过来，只要遭遇照像的，呼口号的，扔石块的，挡路的，不管什么人，一律格杀勿论。吴国锋刚好挎着相机，当场就被杀害了，连自行车都叫压扁了。屠夫们过去后，他才被老百姓抬起来，送到邮电部医院）。

老威你来看这些照片，我们曾再三要求把吴国锋的遗体运回四川老家，系上答复不行，称是中央命令，遇难者一律就地火化。于是我们说，吴国锋还有爷爷奶奶，姐姐弟弟，如果不能运回遗体作最后告别，也得让我们拍几张照片带回去，有个交待。系上经过商量，答复可以，但是必须严守秘密，不借此损害国家形象（宋秀玲插话——你看，全是血。右胸的枪眼是致命的，经验伤，是手枪近距离射击；另外，肩膀、肋骨、手臂也有枪眼。你看这小肚子上边，一刺刀扎进去，然后拉下来——这个职业杀手使出吃奶的力气，所以这条口子有七八公分长，里面的肠子全部搅碎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大夫分析，可能是吴国锋前后连中几弹

都没死，刽子手就动用了刺刀。吴国锋两个手心有极深的刺刀划痕，肯定是他痛极挣扎，本能地伸手握住刀刃时留下的）。



被戒严部队杀死的吴国锋



吴国锋遗体

老威：听说有一项医学研究成果证明，被害者的瞳孔具有照相机的作用，能在骇然遭遇不幸时，摄下刽子手的映像。如果双手握住刺刀的吴国锋当时圆瞪双眼的话……

吴定富：这娃娃是死不瞑目啊。

老威：原谅我的饶舌，请继续讲吧。

吴定富：在北京期间，校方派了四个本地同学陪伴我们，轮番劝慰。12号去医院整理遗体，先是由专人清洗血污，然后换衣服。我们按老家的传统习俗，替吴国锋裹了一身从家里带来的素白。

老威：这有什么讲究？

吴定富：因为吴国锋没结婚，没后代，还是孝子孝孙，所以穿着一身素白，表示纯洁无暇。13 号上午，我们就在医院为他举行了告别仪式，吴国锋在京的同学和一些老师都参加了，大家围着他转了一圈，满含热泪，却说不出啥子。同学们始终搀扶着我们，直至结束，我们把他的遗体送往八宝山公墓火化。

那几天火葬场异常繁忙，尸体源源不断地运来，炉子红通通的，24 小时没歇过空。这儿早已接到上面的紧急通知，身份为学生的死人，火化优先。所以在望不到头的尸体长龙跟前，我们没排队，就开后门把吴国锋送进去了。在骨灰登记处，坐了个双眼熬得通红的老头，不停地写，已经成了一架机器。我报上材料，他头都不抬就刷刷登记；我担心出错，刚讨好地唤了声“师傅”，他就不耐烦地甩甩手：“不要说了！我知道怎么开单子！我已经在这儿连续作战好几天，连撒尿也顾不上！所以你放心，不会搞混的。”

骨灰盒也成紧销货，我们刚拢的时候，还有好几十，国锋妈妈要买雕了龙的那种，我不同意。要另一种内外透明，能看见骨灰的。我们争执了几分钟，像变魔术，几十个盒子转眼就没了。我们赶紧随手抢购一个，只觉得脑后一片嚷嚷：“这儿还有一个，那边还缺一个！”

老威：这火葬场成闹市了。

吴定富：我们耗了几个钟头，领到骨灰，就赶快离开了。16 号乘火车，18 号就回到新津，在家里搭起灵堂，亲戚朋友都从四面八方赶来祭奠。不料刚满 3 天，镇政府就来人找到我，劝拆了灵堂；我拒绝，他就说：“这两天，乡下的泥腿子干部要进城，听上面传达邓小平对部队军以上干部的讲话，乡巴佬就一根筋，懂个鸡巴，他们一见你的灵堂与中央精神起冲突，肯定要雄起，而你也耿直，不会退，咋办呢？”于是我迟疑了一下，答应拆了

街面上的部分，但屋里的主祭灵堂绝不拆，因为吴国锋的许多同学正在赶来。

又过了一段时间，灵堂没了，但吴国锋的骨灰一直保存在家里。原来我们想，六四不平反，亡灵得不到告慰，骨灰就一直不埋。可到了2002年，吴国锋的弟弟也死了，我们在万念俱灰之中，把他们兄弟俩的骨灰合葬在对面山上。

老威：他弟弟这么年轻，怎么死的？

吴定富：他的弟弟，我的么儿子，非常懂事。见有远大抱负的哥哥没了，就替父母挑起生活的重负，每天起早贪黑。原打算挣点钱，让全家人过得宽裕点，精神的创伤也愈合得快些；不料人算不如天算，他竟积劳成疾，患上尿毒症。这一下，为了治他的病，全家所有的积蓄都是杯水车薪；连丁老师和海外捐的几千块都搭进去了，毫无起色。

吴国锋是几代人的希望，他去了，姓吴的这一脉也就完蛋了。先是他患高血压的奶奶，得知孙儿噩耗就中风了，老年痴呆症接着来，吃喝拉撒全没感觉。他的爷爷奶奶均于2002年去世。他爷爷本来身子骨硬朗，差9个月90大寿，还腰不弓，气不喘，却因最钟爱的孙儿遇难，想不通——终于在老伴撒手尘寰后，两次自杀。先拿刀片割动脉，淌了一滩血，被发现；后又故意从床上硬摔下来，断了几处骨头，折腾半个多月，临死还连叫：“国锋！国锋！我来继续教你认字。”

2002这一年，吴家连办三起丧事。目前，我的大女儿下岗，拖了两个女娃，日子相当艰辛；么儿夭折，他的农村媳妇跑了，丢一个几岁的孙女给我们养；而国锋妈妈自十几年前闻噩耗跌倒后，脑袋受创，留下头疼的后遗症，引起视力下降，只能在家做些简单的家务活了。

老威：那家里只剩你一个健康人了？

吴定富：我也有病。

老威：不严重吧？

吴定富：肾脏癌。

老威：什么？！

吴定富：我么儿患上尿毒症不久，我就发现腰部长出一个包，经常痛；可当时为了筹款救娃娃，顾不了许多。拖一年余，么儿死了，心空了，才发觉那个包已经长大了，足有两公分。前年不得不动手术，把右边的肾脏割丢了。

老威：肾脏癌有啥症状？

吴定富：经常尿血，甚至尿不动，被堵塞了，身体整个垮掉。那次动手术，一打麻药，我就不晓得了（宋秀玲插话——我一直守在旁边，开完刀，医生把切下来的肾递给我看，形状像猪腰子。不过猪腰子一划开是光滑的，纹理清楚的，而他的腰子全烂了，里头乱七八糟）。

刀一开，马上感觉轻松。现在我不能干重活，只能慢慢养。贵重的药吃不起，就一幅幅捡中药；买了些便宜的干灵芝，瓣碎了泡茶喝——这一次，把家里最后一笔积蓄，4000元钱花光了。我撩衣服给你老威看——这就是刀口，足有半尺长。

一般的事，我们都不敢给丁老师打电话，她太忙了，身体又不好。她一听出是我们，不说也明白又需要帮助，太不好意思了。

老威：你们是怎样和丁子霖老师联系上的？

吴定富：吴国锋死后，他妈妈买了一台收音机，专门收听外台。有一天她说，国锋学校里有一位教授，叫丁子霖，也死了儿子，现在她出头联系其他难属，要一起为六四冤魂讨个公道。

老威：还挺顺利吧？

吴定富：当时双方都没有确切的通讯方式。过了好几年，在有蒋培坤老师参加的一次朋友聚会上，他们才从一位新津籍的友人口中打听到吴国锋的家属。于是写来一封投石问路的信，地址不详细，名字也写成了“吴正富”。幸而老天有眼，我有个熟人

在邮电局工作，我还真得到了这个信——这叫“瞌睡遇枕头”，再合适不过了。丁老师后来说，她找了我们整整8年。

老威：你们眼下的状况丁老师知道吗？

吴定富：我们眼下是太穷了，每月只有一两百元病退的生活费，还要拉扯孙女，供她读书——因为她是吴家最后的一点希望，算两个儿子留下的唯一骨血。可尽管如此，老威你也千万莫去传话，打扰丁老师。我们倒下就算了，她不能倒下！六四屠杀16年，迟早会有个说法，哪怕我们等不着，也不能让共产党赖掉这笔血债，便宜了李鹏狗杂种。

补遗：

从吴家出来，已近傍晚，残阳如血，染红了半边天际，犹如正在临盆中的母亲。我匆匆赶往车站，购票上车，天上的血色变紫了，接着，变黯了。我回到成都，在一层薄灰的桌子上回放录音，手边有一份旧报纸，我下意识地边听边拿过来看，却见报上正在介绍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凯尔泰兹，一个匈牙利籍的犹太作家。

凯尔泰兹14岁就被纳粹投入奥斯维辛集中营，后来奇迹般生还，当过记者，当过兵。退伍后失业，就和妻子蜗居在布达佩斯的一个仅25平方米的单间公寓内坚持写作达35年；可时运不济，他在美国等地出版的书销量很少。小说《没有命运》出版十年只销售了3500本，而代表作《为一个未出生的孩子祈祷》更惨，在得诺奖前只售出1600本——以下是这部不朽之作的只鳞片爪——

“不！”我毫不犹豫地脱口而出，毫不犹豫，完全出自本能，是本能反抗着本能，是反本能在起作用，而不是本能本身，这一声——

“不！”不是一个深思熟虑的、

“不！”也不是一个期望中的回答，表达我的不置可否。而我的妻只是笑我，她理解我，后来她也说，她从心底知道这声“不！”来得多么艰难，尽管我的内心苦苦挣扎想使它成为一声“是！”而我的回答——我相信我理解她，也知道她在想什么，可是那个

“不！”是那样一个

“不！”不是那种犹太人似的“不！”，那个“不！”的意思她已了然。不是的，我对这个字的确像我对这个字本性的不确定一样，这个

“不！”只是一个

“不！”我说。即便我有大把理由，我也可以想象一次失望透顶的谈话是什么后果。让我们想象一下，这个孩子，我们的孩子——或者你的——如果这个孩子听说了什么而尖叫：“我不想当犹太人！”……犹太人意味着一无所有，一无所有也意味着犹太人……

不——我不能做另一个人的父亲，注定的，上帝啊，

不——我孩提时代的经历再也不应发生在另一个孩子身上，

不——我的心中有声音在尖利地叫喊，是可能的，这个孩提时代的经历，应该发生在这个孩子——在你——在我身上。是的，是开始对我的妻讲述我的孩提时代的时候了……

我从这段文字推断，凯尔泰兹没有孩子。在这次堕胎之后，他再也不会要孩子。他拿起了笔，为这个未出生的孩子祈祷，他喊了一连串的“不！”声泪俱下，因为犹太人一生下来就没有安全感，甚至没有祖国。凯尔泰兹永远记得，一个14岁的少年，被关入集中营等死，却突然得到一杯热牛奶，他舍不得一口灌下去，而是躲在角落里，小口小口地吮。虽然牛奶的表皮蒙了一层黑灰，

这黑灰就是焚尸炉落下来的，但他忽略了这一切，全神贯注地吮吸——这是一种怎样的幸福啊，那种黑牛奶的回味令他多年后想把它写出来……

我的眼眶湿润了，而录音机里，失去孩子的父亲正在讲述这个孩子的童年——他的嗓音颤动着情不自禁的笑。后来，这个叫吴国锋的孩子去了北京，燃起父母对未来的种种梦想，再后来，他被杀死在异乡街头，父母的梦想又成死灰。绝望，绝望无尽头，如果把吴国锋的父亲换成凯尔泰兹，孩子就不会生下来，免得在21年后夭亡。

再如果，把凯尔泰兹文字中的“犹太人”换成“中国人”，我们也不该生下来，免得一思想就犯罪，连累亲人。可我们生下来了，和一场接一场的灾难一样，繁衍着，耻辱如冰雹一般打得人抬不起头。

“不！不！”

可在“不！”过之后，我又阳奉阴违地说“是！”。

1990年10月，在我入狱大半年后，我的孩子出生了——这是不情愿的，本来我不想要这个孩子——眼下她已15岁，可我与她在一起的总时间不超过三个月。

“不！”我不知道这个孩子将来的命运是什么，天啊，我不愿再听到苟延残喘的父母追忆遇难孩子的幸福童年，笑声和泪水我都不愿再听到。天啊，不！

我关掉了录音机。但是

不——我还会打开它。

六四画家武文建



画家武文建在访谈中

采访缘起

2005年5月26日下午，星期四，经艺术家高氏兄弟牵线，我在位于北京大山子的798艺术工厂内访问了出身工人阶级的画家武文建。

天气晴朗，我眼前的武某穿火红衬衫，显得神采飞扬。刚闲话了几分钟，高氏兄弟就请客，吃东北菜。不用我的诱导，武某即在一片嘈杂中打开话匣子，似乎早埋下腹稿。我边吃边习惯性地插问，而武某说了个把钟头，只动了几筷子。

餐毕，觅一偏僻去处，让武某继续过嘴巴瘾——1989年6月4日前夕，他才19岁，酷爱艺术且血气方刚，懵懂卷入爱国风潮，却在北京城头目睹了一幕幕血腥场景，自己也差点叫大棍子打趴下。

稍后，国家勒令人民住嘴，他却没住嘴，所以被逮，判刑

7年。因既不是学生领袖也不是知识精英，他就只能与动乱暴徒关在一块。“这些人和你老威挖掘过的底层人物一样，没历史，没社会面貌，甚至不知该怎样定位。”他叹息道，“16年了，没人站出来为他们吆喝一声，罪都白受了。”

我说：“哪麻烦你牵个线，弄两个暴徒来我接触一下？”

他说：“坐牢一二十年，老虎也被关成老鼠了，认命吧。你看那个请暴君像吃臭鸡蛋的鲁德成，当年被大学生扭送公安机关，电视一报道，就闻名遐迩。可如今事过境迁，好不容易逃到泰国避难，却要被迫被异国警方遣返——这就是不认命的下场！”

我哑然片刻，就操起巴掌大的照相机，拍下武某悲愤和自嘲的脸。说实话，连我都差点忘记曾是六四主体的成千上万的暴徒们，更别提如何为他们重新定位了——文章是由精英来做的，我每年都通过各种渠道读到不少。

直到午夜12点过，武某才不得不闭上嘴巴。我和他走至街口，然后分别。我的背包里揣了一组血洗天安门的油画照片——多年来，他已涂抹了若干噩梦似的油画，却一张也没拿出来。“等吧，”他说，“16年都等了。”

“等吧？”我猛地愣住了。出租车发动了，曾经作为历史舞台的街景纷纷退去。我不禁想起大半年前，丁子霖老师在家里私下说过的一段话，大意是，真到了六四有个说法的那一天，北京的地缝想必会突然涌出无数“英雄”；那时，我和你蒋老师倘若活着，就去远处隐居，把脚下的名利场腾出来——因为，我们孩子的灵魂需要真正的安息。

武文建：今儿上午，高氏兄弟突然来一电话，口气与平时不一样：“文建，过来一趟好吗？”我问什么事？他又答：“没事，

就吃个饭。”我想，从西边到东边，我要跑大半个城呢，请个饭费这么大劲儿？况且，这老高也不是喜欢吃喝的人。所以我就猜，要见什么难得碰面的人（高氏兄弟插话——六四前夕的北京，还是提防一点好）。

老威：昨天见着老高，他告诉我，有个很有意思的画家，六四栽进去，被当作暴徒关了几年，出狱后，专画屠杀的题材，与这个健忘的时代搞不好关系。

武文建：我的饭碗是画广告，简单、技术化的没脑子的活儿；但我的激情还停在那儿，时光流逝了，它却凝固成烫手的石头，搁在那儿——16年前。我老是画坦克压人，血把天安门淹没，民主女神像……画框内的每一笔，都哇啦啦地喊着。这是永远的题材，或许我画得不好，或许应该反思反思再画，但是不行，我管不住我的梦，我的手脚。这些画，我不会卖；将来六四翻过来，我也不想卖——但愿那时能建一个种族耻辱的博物馆，我就把它们捐出去。

老威：这个想法不错，不过眼下，我们还是从头说起吧。

武文建：从六四说起？

老威：六四之前。你的家庭，你的职业？

武文建：按共产党的阶级成份，我出生于根正苗红的产业工人家庭。北京地区有两大国企，一是首钢，一是燕化（即燕山石化，直属中国石油，地点在北京房山区，有几十万职工）。父母是燕化工人，我和我哥都是燕化子弟；再往上追，我爷爷毕业于林彪任校长的抗日军政大学，1941年就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了；我姥爷也是四几年火线入的党；另外，我爸，我叔，我两个舅舅，全都是共产党员。所以，我从小就受革命传统教育：艰苦朴素，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解放全人类，军民鱼水情之类。

老威：穷棒子翻身闹革命么？

武文建：我家也不穷，我爷爷在旧社会上中专时，就秘密入

党。据我姥爷讲，他哭着喊着，死活要上抗大，具体怎样牺牲的，连我爸也不大清楚。我姥爷干地下党，被日本鬼子抓过，严刑拷打，背上还烙了一大块印。由于姥爷口紧没招，日本人也没拿到实在把柄，所以村里乡亲就凑了两头猪去慰劳皇军，把姥爷给换了回来。我妈说，姥爷文化没爷爷高，革命意志也不十分坚定，被皇军一吓，胆就破了，甘愿做纯粹的农民。在战争年代，胆小自然做不了干部。

家族就这种传统，所以，虽然根正苗红，父母也就是做老实工人的命。我也老实，子弟校毕业，分配到燕化后勤，学厨子。年轻人不乐意，但我爸说啦，组织叫干啥就干啥，不准闹情绪。到了1989年，我刚19岁，在餐厅工作了两年，还没转正。

那时我迷上了油画，专门拜了个老师；我每天疯狂地学习，连炒菜也琢磨着绘画，联想着梵高、高更。我不知道学潮怎么开的头，我对政治气候也不敏感。胡耀邦逝世没多少天，我搭公交车进城，去中国美术馆看一个画展。出来后逛大街，发现有许多学生在游行，抬着胡耀邦的像。我站在街沿边看了一会儿，还捐了一块钱呢。

老威：此刻你还是一个旁观者。

武文建：许多所谓的暴徒这时都在旁观，也没想到自己日后会卷进去。

老威：你具体投入是什么时候？

武文建：我是一个小人物，像一颗芝麻粒掉进汤锅，所以谈不上“投入”。当时天安门还没多少人，热闹都集中在王府井一带。我一小伙子，自从做了画家梦，就不爱上班了，只要没事儿，就喜欢往城里跑，竖起耳朵到处听新鲜呗。

直到5月20号，李鹏傻屌发布戒严令，部队分几路准备进城了，北京市民才开始起来，声援学生。燕化也在那天组织了大规模的游行，我们先在火车站集中。当时从长安街到天安门广场，

人山人海，比国庆典礼还喧闹，我跟在队伍里，很激昂，却没有任何政治动机。许多人和我一样头脑单纯：就是爱国，声援学生。

老威：你参加过几次游行？

武文建：大概 4 次吧。天安门热闹起来后，我莫名兴奋，有时进了城，就一宿睡在草坪上。5 月 20 号游完行后，有人说：“我们工人阶级能否帮这些学生做点什么事？”于是大伙就派我去天安门指挥部接受任务。

我是楞头青，一挽袖子就上了。当时设了六、七道卡，可真够严的。我口袋里揣着《工作证》，一被挡住，就掏出来，哇啦哇啦解释。好不容易进到最后一道卡，见到的所谓“指挥部”就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台阶底下，一些学生领袖裹着灰不溜秋的破衣裳，胡子拉碴的。我当时就立在那儿，衣领歪斜，也不认识谁是谁，就大声说：“我们是燕化工人，你们需要帮忙吗？我们有一大帮人。”学生们把我围在中间，上下打量好一阵儿，其中一个说：“让我们研究一下。”

我等了几分钟，刚要出去，一张纸条还真递过来了，内容是：“请你们去天安门东北角维持秩序。”署名为“高自联常委遥远”。

于是燕化的 100 多人就去东北角维持了一宿的秩序。当时的广场可真够乱的，因为李鹏的戒严令下达后，各种谣传蜂起，北京的市民们非但没叫吓唬住，反而被激发了，拿老毛的话说：“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

老威：广场聚集了多少人呢？

武文建：汪洋大海啊，我哪数得清？我几乎累趴下了，但是被那种人性突然之间的升华所触动。许多老百姓自愿到天安门，送水送东西。有个 70 多岁的老大爷，由他儿媳妇领着，挤过来，递上两大包。他媳妇嚷着解释：“我们不让老爷子过来，他偏过来给你们送吃的，家里拦不住啊！”

我都感动得掉泪了，那种人性的纯粹世界，唉，真是一去不返了。

老威：你就留在天安门了？

武文建：没有，撑了一两天，燕化的人还是回去了。在之后的十几天，我只进过一次城，我呆在家里画画。直到6月3号晚上，我边看电视边画画，突然屏幕换了，并且宣布“不许市民上街，不许什么的，要采取行动什么的。我急坏了，一宿没睡，第二天大早就急匆匆地进城去。

老威：你可真够勇敢的。

武文建：我已经作好了死的准备。我打小被共产党洗脑，相信“军民鱼水情”，所以做梦也想不到会开枪杀人！我按捺不住，一定要去天安门看一看，我暗地希望那一切都不是真的。

公交车在天桥停，我下去，沿着大街一直走到天安门，地上全是一滩滩的血。我有一张画，就涂的这些情景，一块血，一个圆圈——我十几年的红色教育就这样全被颠覆了。

老威：还能走得通吗？

武文建：能走得通，就是乱。这一滩血，那一滩破烂，枪声稀稀拉拉的。当靠近前门底下，我突然望见一大片解放军，人人手里都握着齐眉的棍子，就迎着跑过去。

老威：你找死？

武文建：我是个和平主义者，别看我只有19岁，却反感扔砖头，砸瓶子一类的过激行动。我还是愿意相信解放军——只要不被激怒，他们还是不会丧失理性。所以我就迎过去，可这时，有市民蹦出来，从我身后向当兵的扔砖头。我急忙挥手叫道：“别打！别打！别激化矛盾！”

老威：你太傻了！

武文建：是傻。甩砖头的转眼跑了，我没甩砖头，就理直气壮地站在原地。可说时迟，那时快，蓦地从斜对面爆出一声吼：

“就这小子闹的！就这小子嚷嚷得欢！！”我本能的扭头，哎呀！绿油油的一大片，都把棍子举过头顶，直扑过来，我浑身一麻，蹭地就窜开了。

老威：你还能进到广场？

武文建：坦克和部队都扎在里面清场，进不去，只远远望见在冒烟。

老威：当兵的训练有素，你能跑掉吗？

武文建：农村兵普遍腿短，再训练，先天不足，也跑不过我这腿长的。加上这是奔命呀，一大片绿追一个蚂蚱，有一刻腿软了，棍子头估计是铁的，擦着我的背梁骨，嗡地就下去了。我一炸，跨腿就窜了2米多远，真疯了。

我是北京人，熟悉地理，拐进了一条胡同，当兵的也害怕，就不追了。可我背上淤了一大块伤，黑紫色，半个多月也没消。

老威：到底有多少人追你？

武文建：魂都飞了，还记得数？估计有好几百吧。

老威：只追你？

武文建：像赶鸭子，我感觉前后左右都有人在逃。一个小伙子，只比我慢了两三步，就被一棍儿给撂翻了，接着叫绿色盖住，棍子密密匝匝地打下去，卜卜卜，发闷。我估计铁器砸肉体都这种声儿。

老威：你在逃，怎么能看见呢？

武文建：我已窜入老北京火车站旁边的胡同，见当兵的回头，就趴在那豁口看。就50米，清清楚楚，把人打死过去了。后来当兵的撤了，我和躲在车站里的几个人，才敢出来救护。我抱起那人的脑袋，与其他人一道穿了一条挺长的胡同，（可能是糖人胡同）直接把他送到治眼的同仁医院。

老威：那人是谁？还活着吗？

武文建：当时还有气儿。可那脑袋已经变形，这出来一大块，

那出来一大块。

老威：烂了？

武文建：没烂，也没血，可脑袋已经不是脑袋了，胀大了一倍。像有个外国画家，专画变形脑袋的，叫，叫培根，对，培根的作品。我搂着他，边跑边问：“你是哪儿的？”他还应了声：

“首钢。”后来我们截了辆三轮板车，一路狂奔，进了同仁医院。但见那过道上，一溜，全躺着伤员。我们把人交给两个身上沾满血迹的护士，就退了出来。满腔悲愤，脑子乱极了。

老威：医院里躺着多少人？

武文建：真不知道。在过道的门口，护士就过来接人，不让进。我绕楼一圈，感觉所有的房间都是满的。走在街上，我的眼泪还哗哗地掉，天晚了。六月四号，铭心刻骨，我在街头歇了一宿，想的都是大问题，国家怎么办？我怎么办？

老威：你睡在哪儿？

武文建：前门附近的 5 路公交车站，寻了辆公汽就上去了。车内有十几个落难者，学生、市民、工人，外地和本地的，大伙聊了整夜。

老威：聊什么呢？

武文建：除了骂大街，没别的。还提到拿枪干他娘的。直到天亮，我才搭班车，回到家已是中午了。由于热血还在胸中荡漾，我就找了件恤衫，用毛笔写上：“还我民主！还我自由！”后背还是国父孙中山的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我穿着这抗议衫在燕化厂区游走，逢人便说城里的情况。厂区十字路口聚了很多职工，把路都堵断了，公共汽车开不动，连乘客也下了。大伙推举我讲话，根本不由我分说，许多手就又推又举，把我弄上一辆 130 货车；还嫌矮，就把我弄上转盘旁边的架子楼……

老威：你演讲了一番？

武文建：我一19岁的小伙子，哪有口才？不过呼了一阵儿口号：“打倒邓小平！打倒李鹏！”“罢工！罢市！”“反对镇压！”我还推磨一样旋转着，让大家看身上的字——后来这些举动都上了《起诉书》。我成了“暴徒”，可我哪有暴徒的本事，我连石头都扔不远。

老威：我估计混在群众中的便衣不少。

武文建：都是一两代、两三代燕化职工，从小就在一块混，谁不认识谁呀？谁家的孩子在干啥？谁家的老几在派出所干警察，都熟悉，所以用不着便衣。人们都疯了，一千多人哪，后来不用我喊，下面也狂呼口号，甚至叫嚷着开车进城干解放军去。可正在这时，我爸赶来了，是派出所报的警：“武师傅，你家老二在造反！”我爸一拍大腿就来了，刚撞上我从架子楼下地，就被我爸劈胸一把揪住：“兔崽子你……”

我一把抓定老头扬在半空中的巴掌，像个英雄一般断喝：“你别打！”

周围簇拥着不少石油化工学院二分院的学生，不认识我爸，见有人打英雄，不干了，转过去扯住老头就要下拳头。我立即拦住并大喊：“大家别打了，他是我爸！”

老威：后来呢？

武文建：大势所趋，群情激愤到天晚也就罢了。我爸的劲儿可真大，死拽着不松手，直到我跌跌撞撞跟他回家。父子俩都感觉落差太大了，一贯光荣、伟大、正确的共产党、人民政府、解放军一刹那翻了个个儿。我爸是条汉子，在我的印象中，只有我生母去世时熊过一次，可这次，他熊到底了。在屋里，他没再打我，而是说：“你六月四号进城，那么乱，连招呼也没打，晚上也不回。我一宿都没睡踏实，外头一刮风，我就惊醒，去你屋里看，折腾了六、七次，天亮都合不了眼。你妈死得早，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的罪就大了。”老头子话到这儿，泪花儿都出来了，

他又说：“上午上班，我又从单位回家，进你屋看，见被子抖散了，知道你小子没被乱抢打死——刚松了口气回单位，派出所的就叫来了。”

我爸熊了，我的情绪也落下来，挺心酸。我说：“已经这样了，好不了，肯定要抓我。哪我还是先躲躲吧。”我又说：“这么大的一场运动，不会说完就完了，估计要打内战。”我爸可听不得这个，他说：“你不能再闹，再闹我就死去。”

我还能辩什么？他再拥护共产党，他是我亲爹呀。于是我匆匆收拾，连夜逃到河北老家。当时奶奶还没去世，我就住她屋。农村狗多，夜里一有响动，就吠成一片，于是我就跳起来朝外瞅瞅。那十几天，我就没睡过好觉；后来落网了，我反而睡了一踏实觉。

老威：什么时候？

武文建：大概二十几号。

老威：这么快？莫非是你爸漏嘴了？

武文建：也不算漏嘴，人家上门一问，我爸直接就说我回老家了，还把详细地址都给说了。

老威：你爸出卖你？

武文建：相信政府相信党，这就是我爸。他跟燕化分局一位副局长是朋友，去求了情，人家也答应，只要找出你的儿子，一定宽大处理。副局长还向派出所打了招呼。我爸以为，他儿子最多关几天，教育教育就放了。他做梦也没想到我会判7年。

我爸还从单位借了辆车，亲自到奶奶家接我。他还挺高兴，说文建咱们回去吧，北京平息啦，没事儿了。于是父子俩说说笑笑上车，刚开出村口，却见两辆车拦在那儿……

老威：设了个套吧？

武文建：差不多。当时农村好躲人，陌生人一进村口，狗就叫。我还给我的绘画老师打了电话，他催我：“你赶紧跑吧，越

远越安全，估计你在外头躲个一两年，这事儿就平了。”我边答应边天真地说：“行行，我带着画箱子，沿途还能画个素描，讨个饭钱。”我老师一听就急了：“带狗屁的画箱子，你赶紧逃吧！身上多带点钱。”

我正在谋划逃离农村老家，却不料我爸已与公安局有口头协议，接我之前，他亲自给副局长朋友通了电话，口气挺轻松——一个毛孩子，不是大家看着长大的吗？明摆着就那么点事儿，回来说明清楚就行了。

就这样，我一见两警车挡道，就意识到糟了。旁边是庄稼地，正麦收季节，一马平川。我下了车，但没跑。这时警察全从车里下来，有人迎头就问：“你叫什么？”

我答我叫武文……

音儿没落，就闻一声嚎叫：“抓的就是你！”

老威：有多少人围剿你？

武文建：抓北京来的暴乱分子，这是大好的立功机会，所以整个县公安局60多个人，全出动了。我被捕回县局，叫铐在一棵树上，才听见他们口气兴奋地打电话给北京：“武文建落网了。”

我被大致审了一下，接我的人就到了。衡水县局一个处长，领着一帮人，还扛着摄像机，与北京方面相见。那处长像个演员，当众啪地立正，行礼，然后大吼：庆贺北京平息反革命暴乱成功！

尽管我铐在树上，还是笑得差点背过去。我们家乡派出所所长与我很熟，这时也冲着我笑道：“嘿，你小子跑得够快的！”我回道：“嘿，你们也来得够快的！”可不是吗？500多华里，感觉转眼到跟前了。

但那个处长大约受过文革洗礼，不懂调侃，竟用他粗大的指头直戳我的面门，咬牙切齿道：“你还这么嚣张！”那种气急败坏，似乎我强奸了他家闺女。临走前，县公安局长倒还平和，与我聊天，我说：“你别跟我谈这个，咱们5年以后再见。5年，就

5年，这事儿肯定平反。”

就这样，我被铐回去，在派出所关了两夜，转分局关了两个月的小号，再由市局执行逮捕，罪名是反革命宣传煽动。89年9月7号，有一批同样罪名的人被集中关进七处，即北京市看守所。从此，我在这儿一蹲大半年。

由于我的事实清楚，只审了7次，没费多大的事儿就拍板了，7年。

老威：一个号子关了多少人？

武文建：我们把号子叫“筒”，大筒关几十人，小筒关7、8个人。那是苏联援建的老式监狱，够牢实，一进门，两边都是通铺。当时在里面的还有诗人叶文福，他写过《将军，你不能那样做》，名气很大，学潮期间却宣布退党。我亲耳听见他在楼下吼：“我操你妈！”看守拿他没办法，就抱怨：“还是诗人呢，真脏！”

还有往天安门老毛像扔鸡蛋的三人——余志坚、鲁德成、俞东岳也关在这儿。余志坚曾先后和我关一个筒，我读到过他写在墙上的诗：“仍然要砸，砸不碎的酱缸/仍然要爬，爬不上的山巅……”以前我能背下来，时间一久，就记不全了。

老威：这三人太惨了，谣传两个人疯了，鲁德成冒死逃到泰国，申请政治避难，还被拒绝，几乎要被泰国警方遣返。

武文建：回来就死定了。余志坚判无期，鲁德成16年，关楼下，听说他曾与混入天安门的一台湾特务住一筒。北京第一批大概毙了9个六四“暴徒”，有一个二审改判，活了，因为检查出有神经病。还有一个传奇人物，叫朱中生，他在天安门广场进第一辆坦克时，跳上去撬那铁盖子，结果被拍了下来。这老朱一二审都死刑，已经脚镣手铐，打入死筒等待复核上路了，可那张纸始终没下来。他在死筒囚了两年多，人都变形了，才改判死缓。受的刺激太大了。你知道在看守所，隔三差五就有人上路，开一次门，受一次刺激，如此心惊肉跳几百天，才改判。依法卸铁镣

子，你猜怎么着？他不习惯了——瘦成鸡脚的腿发飘，一迈步就腾云驾雾。他告诉我，还不如拖着镣子来得踏实。

劳改时，我和这老朱睡上下铺，经常聊天。知道他爸爸曾是北京市邮局一小干部，在文革中下放改造，自杀了。剩在外头还有两个姐。我曾对他说：“你知道你为什么没死成吗？你爸在阴间保佑你呢！就一儿子，没了，香火就断了。”他连称“有道理”，否则没法解释自己还能捡一条命。

老威：我先后和 20 多个死刑犯呆过，知道判了死要活，真比登天还难，这人的命也够硬的。

武文建：还有好些身为退伍军人的所谓“暴徒”，想法很纯粹：因为自己当过兵，当然不愿当兵的挨群众的打；可也不愿那些单纯的学生挨枪子，所以在关键时刻，出头阻挡军车，结果一判就是死缓、无期。

老威：对比之下，你觉得自己挺幸运吧？

武文建：19 岁，判 7 年，当然幸运啦。当时一辆中巴囚车把我拉到中级法院，下到地下室，法警就直接塞我进一铁笼子，演戏就开始了。

说起来真没面子，地下室两边的屋子全满了，法官看样子有些尿急，就在过道上开庭。律师也是指定的，程序快走完了，他才说了一通“年纪尚小，无知，请求从轻”之类。

老威：庭开了多久？

武文建：就 1 个多小时，宣布延期宣判；1 个多月后发给《判决书》。我懵了一下，想想出狱才 26 岁，就适应了。后来下了监狱，比较周围的人，更觉自己划得来，好些人也没干什么事，就在人群中叨唠叨唠，激动了一番，就判了七八年或十来年。

可判决下来我还是上诉了，主要是拖延时间，怕去劳改。二审开庭倒挺正规，好歹在屋子里。我没请律师，就自己辩护说：

“赵紫阳不是总书记吗？不听他的听谁的？当时全国都在传，李

鹏是非法政府——我还是受害者呢。你们现在审判我，当初为什么不去制止谣言的扩散？”

法官没来得及反驳，旁边的哮喘陪审员却用老妇女的腔调插一杠子：“你看我们当时就能把握好方向，不受影响。”

我说：“你们法院也游行啦，公、检、法系统都游行，你们政策水平高，为什么不上街制止去？现在判我，算什么本事？”

这话一出，陪审员啪啪拍桌子，立马升级为泼妇：“我不跟你这种人辩论！”

我却犟起来了：“你们说我‘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我才19岁，有这个能力吗？”

老威：的确滑稽，但判不判，也不是法院说了算。

武文建：对，上面已定好了。比我冤的人多啦，比如大兴县有亲哥俩进去了，哥哥无期，弟弟13年；还有亲哥俩，哥哥21岁判15年，弟弟19岁判9年。张宝生你知道吗？年龄最小的暴徒，没爹没妈，掏羊粪的，15岁判15年，罪状是揍解放军……

老威：15岁？有力气揍解放军吗？

武文建：被拍下来，就跑不了。还有个哥们，往坦克上扔了个筐，火着了，判个死缓，现在还关着。还有挡坦克的王维林，筒子里盛传他栽进来了，可死活不知。我估计在当时，活着也得扒层皮。连明星陈佩斯都关了一宿，我算什么。

我是90年3月9号离开看守所去北京市第一监狱的，分在直属队。那时代号01的大政治犯徐文立还在。他走的时候，我刚好在著名的王八楼中厅画文化衫，他在下面望我一笑，招呼道：“我走啦。”挺瘦的一小老头。

老威：你认识徐文立？

武文建：旁边人告诉的，并叮嘱保密。刚进去，我还挨了揍，因为这是规矩，每个新犯都得挨揍。之后就是学习，上面挺重视，不断有官员来视察，大概是看看这些暴徒是否长得青面獠牙吧。

老威：除了秦城，六四暴徒们都关在这儿吗？

武文建：10 年以上在这儿，10 年以下关天津茶甸，劳教在大兴。我送一监是因为戴反字，反革命暴乱、组织、煽动等等，大约有一百五六集中在这儿。而秦城，除了部级就是精英吧。

老威：我听说陈子明曾在一监。

武文建：在二监。一监原在市内，因为要申办奥运会而取缔了，我们就转到二监。我老见陈子明在楼下溜跬，也不穿囚衣，冬天着蓝色羽绒服，夏天一身运动衫，剃一秃瓢。听人说，监狱长找他：“陈子明，我们聊聊。”他却挥挥手道：“去去，你没资格和我聊天，要聊，就把司法部长叫来。”

老威：有脾气。

武文建：他判了 14 年，是监狱里唯一拒绝穿统一囚服的犯人，因为没有罪。后来他得了癌，保外就医，可就是不出国。所以陈子明称得上是六四精英里的一条汉子。

老威：那些六四“暴徒”的劳改状况怎样？

武文建：非常惨，干活，一直干活。入监集训后，就干外加工，锁边缝扣子，一天十几个小时。六四以后，共产党的宣传机器一致声称暴徒们绝大多数为劳改释放犯，这惹火了当时的国家劳改局长魏孝如（译音），他快退休了，就站出来公开说不。他列出一个统计表，证明这批暴徒身世清白，有劳改劳教前科的比例极小。这事儿在国际上引起了轰动。

我觉得，共产党的这个劳改局长比许多海外流亡精英强，他至少敢说实话，不管他出于什么目的。16 年了，谁替这些暴徒说过一句话？都是普通的北京市民，有优点有缺点，激于义愤，就干上了。扔几块砖，几个瓶子，一个筐；还有拦军车、演说、撬坦克盖，可同一个目的：是不让部队进城去屠杀学生。后来学生们撤出天安门，他们就成了“天安门事件”的主体——可在精英们创造的历史中，他们没有地位。

有一个瘸子，判了 10 年以上，我感到奇怪，就要过他的《判决书》看，上面写着：“用皮带猛抽坦克，打完之后，扬长离去……”还有人捡一钢锥，也判了 10 多年；还有扣下给养军车，把食品分给学生和市民充饥——一个叫朱 XX 的，大公无私地分了半天，车空了，自己却没捞着吃。他东寻西找，终于在旮旯里发现有只烧鸡。不料，这烧鸡上了《起诉书》，他判了 13 年，后来他在狱中冲我叫屈：“这鸡贵啊！”

老威：你同“暴徒”们相处得不错。

武文建：都是苦命人，一起干活儿呗。

老威：什么活儿？

武文建：什么活儿都干。我们还检查过橡皮手套，清洁工或者手术台上用的，套嘴上卜卜吹，看是否漏气。累极了，有个大胖子受不了，仗着脂肪厚，往肚子上拍针——因为他手指头粗，缝西服里子别扭。自杀不行，反改造行为，那就拍针自残。我还与《人民日报》的吴学灿是难友，我们缝，他帮着剪虚毛。一年多后，我都练得能背过手去穿针了。

老威：你们替哪家服装厂干？

武文建：北京友谊服装厂。夏天缝冬装，冬天缝夏装，满屋子飞着衣服毛，汗把小裤衩都湿了。太苦，真他妈想把厂子给他砸了。我受不了，绝食 4 天，有人劝我：“你丫真不吃啊？做个样子就得啦。”还喇地往我铺里揣一火腿肠。

我是 1995 年释放的，减了几个月的刑。我爸做梦也想不到父子重逢要等这么久，但他的共产信仰没变，不愿说政府一句不是。他依然警告我：“你要再折腾，我就去死。”有啥办法，再不开窍，他是我爹呀。

六四暴徒也陆陆续续出狱，无声无息，得不到一丝关注。当年的激情烟消云散，时过境迁，世态炎凉，他们都极其厌恶政治。我还有个画画的手艺，卖过一段服装后，就能弄个广告，搞个设

计。但我的多数难友，以前就是普通市民，世道一变，没工作，连谋生都困难。有一哥们，六四前开饭馆，很有钱，学潮时送吃送喝，跟着栽进去十几年，出来后接着开一夜总会。他接济了许多难友，相当于“暴徒”们的民政局，但他一口也不愿提过去，特别是民运那档子事儿。

前不久，我与一难友通电话，他会雕章，我懂画画，本来挺投缘。但我告诉他，画了一批六四屠杀的油画时，他一下子就打断我：“你弄那玩意儿干啥？牢还没蹲够啊？”我答：“这口气没出哇。”他答：“我的气早瘪了。兄弟，别去碰政治，太残酷，太脏。”

老威：中国有句俗话叫“无娘的孩子天照应”。

武文建：天不照应，就互相之间照应呗。先出来的，有一点家底的，就接济后出来的。目前判15年的都在外面了。死缓和无期，大约有十几个人，还在里面，硬着头皮扛呗。海内外的六四精英，这些年来，估计写了几十篇文章吧——我每年都要看一些，就没一个字为这些“暴徒”而写，好像这些人根本没存在过；好像六四事件就只有天安门，除了那儿，牢牢吸引住世界的眼球，其他地方发生的事儿，一天天全被淡忘了。

这些人到底怎样定位呀？官方叫“暴徒”，而你们这些学历史、文学、新闻和社会学的有发言权的精英们，你们把曾是天安门运动主体的“暴徒”们叫什么呀？你们在广场慷慨激昂，群情激愤，好像为国为民为自由为民主，没一点私心，好像已经豁出去了——北京市民就是受你们的感染去挡军车，不让你们挨枪子，但是你们倒好，跑得比兔子还快……那柴玲，站在纪念碑下，一次一次地煽乎，纯得跟天使似的；后来跑海外，要退出民运了。你靠这个起家的，现在捞够了，要退出了——这当然是你的自由。但你不要忘了，当初多少人就是受你们——柴玲、王丹、吾尔开希、李录、封从德等等的感召卷进去的……就我吧，六四那天

在城里听信谣传，说柴玲，王丹，吾尔开希都被当兵的枪杀了，悲愤异常，我随后的勇气，就来源于这种悲愤。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人太多了，你们负不起责；可你们在一篇篇回忆文章中，说的就是学生的那一点事儿。你们每个人都发展得顶好，聪明啊，算计得不错。

还有方励之先生，需要他挺身而出，却躲在美国大使馆不出来，被人家给接走了。方先生曾是我最尊敬的人，他在中国科技大学当众说：“民主不是靠施舍，而要靠争取。”既然是争取，哪你就走出来呀！和千千万万的北京市民站在一起呀！知识分子怎么都是些关键时刻掉链子的人。

老威：你对知识分子期望太高了，文建。其实在1989年胡耀邦逝世后，已是山雨欲来，知识分子们卷入学潮的动机很复杂，不少人以为要改朝换代了，都不愿失去这最后的介入历史的机会，因为一旦失去这机会，就意味着丧失对未来的话语权。

武文建：没说话权就没历史吗？

老威：从古至今的规则就是这样，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挖掘真相，寻求改变这种精英划定的历史定局。

武文建：可我写不了，许多人不仅写不了，连讲也没人听。六四难属中出了个丁子霖，真是幸事；但六四“暴徒”中有谁呢？

王丹的回忆录我也看过，他没提一件事儿，就是在监狱中曾与六四暴徒们狭路相逢。隔了好几米远，他大声问：“你们怎么进来的？”暴徒们答：“我们是为六四进来的。”王丹于是很激动地说：“我是王丹，大家都是一路人，为争民主而坐牢，要挺住啊！”可其中一暴徒回答：“你才4年，我可是15年！怎么挺得住啊，哥们？”

话音一落，全场哑然。精英和平民擦肩而过，他们之间的墙是无法逾越的。



武文建的油画：《永远的痛-1》120x90cm,2004 年



武文建的油画：《永远的痛-7》120x90cm,2004 年

法轮功练习者陈氏

采访缘起

2004年12月6日中午，我刚起床洗漱毕，突然响起轻微的敲门声。我迟疑了几秒钟，就将左眼凑拢猫眼，但见外面浮现出两位陌生农家妇女的人头。哦，原来是乞丐！我叹了口气，急速掏皮包搜出5元零票，脑子里却闪过过关唱着连花落乞讨的传统群丐图——有一年有一天的大早，我父母家门口一下子来了五个河南男女，一边说一边唱“新年大吉，福寿无疆”，闹得人不好不给压岁钱。

我右手开门，左手把5元钱递了出去，门外迟迟没接，我就抬起头。两个女人衣着挺旧，却显得朴素而干净，她们镇定地盯着我，目光中没有乞讨者惯有的畏缩和讨好。几经推让，我尴尬地垂下捏钱的手，她们却悄声说：“我们是练功的。”

声调轻若耳语，我的脑门却在一瞬间轰然炸开了。好半天，脸前的雾才散开。而她们也一直警惕四顾，把斜挎的黑塑料包搂紧——后来知道包里是法轮功的宣传单，她们大约已在附近的居民区挨门挨户散发了几百张。

我犹豫了分把钟，才顺水推舟地接待了她们，我感觉到自己怯弱得心跳得剧烈——由此证明，我不是一块当英雄的料，也不敢妄想做底层贱民的代言人——正如若干年前，我不该录制那盘招灾惹祸的《大屠杀》磁带，我怕得要命。

这些年，我听说过不少法轮功的事儿，除了报纸、电视和网络上的正反报道，就是朋友们在饭桌上的种种传闻。老李曾说，他们的西郊养鸡场发现了一包资料，我们急问什么内容？

老李却叹息道，他都没来得及打开看，就被怕得要死的岳母夺过去销毁了。

王胖子接着讲了法轮功练习者进四川大学校园撒传单，被大学生当场捉拿的事。“邪教的定性已深入人心了，”他板着宪政学者的面孔评论道，“共产党洗脑太厉害。”

接下来，一名记者谈起法轮功练习者被集中关押的地方，“全省被抓的法轮功练习者都在那儿，大概有上千人，”他说：“官员、教授、农民、下岗工人，什么职业都有，把他们分别安插在普通刑事犯人间，三个或者四个刑事犯对付一个法轮功练习者，24小时轮班监护，不准盘腿，两手不准互握，嘴巴也不准念念有词，否则就一窝蜂上去掰腿掰手掰胳膊，并吼读反邪教的正面报刊文章以干扰思维。”

“这么干？太新鲜了。”大伙议论道。

记者继续说：“这叫转化。据说转化法轮功是有奖金的，按社会地位的高低，劳教警察转化了一名处级以上干部或教授，得500元；科级或讲师200元，农民或下岗职工转化容易，只给50元。”

“教授和农民的差距这么大？”我觉得不可思议，就趁着酒劲吹牛说：“能混进劳教所采访就好了。”

“你是无业游民，”王胖子可恶地讥笑道，“比下岗职工又低一等，转化你也许只得5块，连买一斤猪肉都不够。”

大伙忍不住哄笑。火锅里的辣汤翻滚着。

这两个头发花白的女人来自另一个世界，在我没有开门递出5块钱时，她们与我的生活是不相干的，也与绝大多数精英知识分子不相干。当我找出几页纸，克制住手脚的哆嗦，按习惯记录“天气：晴；姓名：陈XX；年龄：55岁”之际，某种抽象的同情和可以作为谈资的正义感就随着血的涌动而变得

具体——这也是日常生活！我想起昂山素姬的话：“不要让恐惧成为你的日常生活。”

我访谈了三个半钟头，然后梦游一般送客。记得还握了手，说了“当心尾巴”。门一关上，我又从七楼窗口俯视她们的背影，眼眶不禁湿润了。

这个世道真是疯了，连这么平和的女性也进过精神病医院！随后几天，我一直尝试整理记录，却始终心绪不宁——这种预感终于在 2004 年 12 月 14 日傍晚成为现实：刘晓波和余杰因言论罪遭传讯，在他们被拘留审讯的十几个小时里，互联网上炸起一片片“他们动手了”的惊呼。

作为两个著名文人的好友，我却在便衣们的阵阵擂门声中不明不白地翻窗而逃。我长跑多年，外表结实，内里却已吓破胆子。我竟忘记了 610 办公室的厉害——采访法轮功迟早要惹事！

老威：您们敲错门了吧？

陈氏：老师……

老威：哦，明白了……这是 5 元钱……

陈氏：您误会了，我们不是乞丐。

老威：我没说您们是乞丐。快过年了，在外头讨生活不容易嘛。

陈氏：谢谢老师的慈悲心，我们真的不要钱。

老威：就别客气了。哦，家里还有些女人穿的衣裳，我清理一下……

陈氏：我们啥都不要，我们是，是练功的。

老威：功？！

陈氏：法轮大法。

老威：是么。

陈氏：能进屋吗？

老威：这个，这个。

陈氏：我们没安歹心。

老威：你们……没长尾巴嘛？

陈氏：尾巴？没有。如果有，我们能感觉到。

老威：请进。

陈氏：谢谢。

老威：随便坐吧，我来泡茶。

陈氏：谢谢！看这屋里的布置，书和字画，老师您是文化人。

老威：勉强会写几个字。

陈氏：您和大法有缘啊。

老威：知道得比较早，但我生性懒惰，任何功都练不了。

陈氏：您能让我们进家门，就是缘分，就是真善忍。因为现在这形势，许多人都害怕，莫提进门，就是瞅见我们在门外站着，也心头发慌。有的还打 110 报警。

老威：这么近距离看，你们不是妖魔鬼怪嘛。

陈氏：我们不过是普通百姓，一辈子胆小如鼠，怕这怕那，可自从信了法轮大法，心里有了李洪志师父，心态就放平了，就不怕了。日夜不停的转法轮使人百毒不侵，所以每个大法弟子都有义务让更多的兄弟姐妹了解：法轮功是正，共产党是邪，不管他们动用如何的邪教手段污蔑、迫害，可邪不压正。我们的弘法行为也就正正大大。

老威：我曾在小区内捡到过法轮功散发的宣传单。

陈氏：只要有空隙，每家每户我们都送。今天上午，从温江县城一路过来，20 多公里，我们散发了几百张。提包里还剩一些，估计天没黑就能送完。老师您上网吗？我这儿有明慧网址，通过动态网、自由之门、无界浏览都能打得开。

老威：你们也能用代理服务器？

陈氏：我们岁数偏大、文化偏低、眼睛偏瞎，弄不了电脑。可功夫中的能人很多，经常从明慧网、踩江网上搞资料下来，私底下印刷了再传播出去。

老威：你们的地下工作搞得不错。

陈氏：我们没组织，不搞地下工作，不违法乱纪。

老威：退回去五、六年，在我这楼底，天天有法轮功聚会。老头老太太，好几十，一早一晚都从五湖四海的家门口汇集到“法轮大法”的小横幅下，念书练功，秩序井然。我记得黄忠小区辅导站站长是位40多岁的女同志，笑模笑样的，经常在大堆人群里边讲边示范。说实话，当时我可没料到这也会成邪教，顶破天，集体气功嘛。不管治不治病，中老年人成群结队，有自己排解孤独、苦闷的去处总是好的，比打麻将好，比扭秧歌好，犹如日日上心理诊所，将家庭里两三代人的鸿沟也填平了。还有，一练功就不吃药，又为祖国节省了大笔公费医疗。我还嘀咕呢，人人都“真善忍”，逆来顺受，共产党的江山岂不成了铁打的？

陈氏：老师您在开玩笑？

老威：没有，是江泽民在开国际玩笑。因为许多共产党员也练功，他担心练功的人数会超过党员的人数。风向转得太陡，功不敢再练，可一早一晚，不敢练功的人们还聚，干啥？跳民族舞。录音机里放的音乐很烂，宋祖英唱的《爱我中华》，《56个民族56朵花》，那些粗腰肥臀扭得实在太难看了……而那个法轮功的女站长也经常在舞阵里，有时也站出来做做示范。看来，她是个文艺活跃分子。

陈氏：老师您只看了表面现象。练功不是凑热闹，而是为了消孽，清除心上的毒素，治人先治心嘛。不能公开聚会，就化整为零，在家里练嘛。如果家里不安全，要被告密，株连亲人，就找更秘密的地方。不瞒您说，我躲在公墓里也练过。当然，练大

法也有层次，有些人，像您刚才讲的，外面不练了，和大伙一道换一副汤头，跳舞、做操、打麻将，好让政府放宽心，可私底下呢？内心呢？练不练？悔不悔？因为人一旦相信并练习过大法，尝过甜头，身体和精神自然会向往更高的层次；如果因为外部的逼迫而退缩，而放弃，罪就更大了。

老威：比不练功的人还大？

陈氏：对。我是温江和盛镇某企业的退休职工，加入过共产党，有 30 多年党龄，可到头来孽报深重，不能自拔。我只拿几百元退休工资，一年却至少有一个季度在看病吃药打针。长期下来，不仅药罐罐越背越沉，身体也变成过敏性体质，每遇大病，任何医院都束手无策。当时我觉得下半辈子没救了。

1999 年 4 月的一个太阳天，我偶然在和盛街上碰到一个熟人，神清气爽，显得极年轻。我不禁大吃一惊：他过去也是著名的药罐罐，弓腰驼背，要死不活的，咋几个月不见就换了一个人？于是我拽住问长问短，这样，我才第一次听说法轮功。

老威：我 1997 年就看过《转法轮》，可惜没照着练过。

陈氏：我那时正处于病急投不了医的情况，心想死马当活马医，就借了本大法入门书，躲在卧室内对着镜子偷偷地学练，日夜不停地坚持了三个多月，感觉身心变轻松了，一做体检，长期折磨我的肾盂积水，肾功能衰竭，尿毒症，重风湿，以及心跳过缓（每分钟只搏 40 次）等病，居然神不知鬼不觉地痊愈了。

老威：这么神奇？

陈氏：对，就剩过敏性支气管哮喘还没断根。

老威：我能感觉到你的喘息比一般人重。请喝点水。

陈氏：您住得太高，放在几年前，我爬不上这七楼。

老威：所以你成了大法弟子？

陈氏：对，并且带动我周围的人练。大家经常交流，邻里关系也变和睦了，只要碰面，开口闭口都笑；活了几十年，我也算

过上了看得开、不发愁的幸福时光。可是到了 1999 年 7 月 22 日，镇上突然开大会，宣读中央文件和《人民日报》，不准党团员和干部练习大法。我当时的反应是，明明是一种能治病的正派功法，咋会转眼就上升到政治高度，定为“非法组织”“歪理邪说”了？不过，我们这个岁数的人，经历过文革等大小运动，晓得共产党的脸说翻就翻，像个情绪不稳定的泼妇。

我们先以为化整为零，悄悄练，过了这一阵风就完事。可后来，政府的调子越定越高，挨家挨户地查，跟抓逃犯一样，个人“犯事”，还要株连家属。于是，无立锥之地的我和另一个功友，在 2000 年 1 月 15 号进京上访。我一路打腹稿，准备心平气和地找上面评理，我想说：“你们搞错了，法轮功能治病，我自己就是证明。”那天我们下了火车，连水也没喝，就去了天安门广场，脚跟未稳，警察闪过来问：“法轮功？”我们答是。马上就被反剪胳膊弄上警车，押送到天坛公安分局。一群警察围着审，姓名，住址，哪里人，练功几年等等。

北京打电话通知四川，我们被关到第二天，就被当地的 610 办公室接了回去。临行前又搜身，我们的随身现金 680 元全没收了，并且没打收条。冯姓民警还说：“老子们这一趟太辛苦，就当出差补贴吧。”

回温江后我们被治安拘留了 15 天，行政拘留了 2 天。

老威：上访一趟，行程几千里，连一句完整的话都没说就叫弄回来了。

陈氏：是的。

老威：曾有句玩笑话：天安门广场上，每隔 5 块地砖就立着一个特务。你们为啥不警惕？一问就承认是？

陈氏：修炼大法不可说谎，否则孽报就落到自己头上。

老威：原来如此啊。

陈氏：我从派出所的拘留黑屋放出来才三天，镇上又有功友

继续上访。610 怀疑是我唆使，于是我第二次被治安拘留 15 天。再次释放后，我的房子被查封，政府指令我搬到一处便于他们监视的又臭又潮的猪圈房里。2002 年 2 月我的退休工资被扣，每月只发放 120 元的最低生活费。由于我不放弃大法，生活费又从 120 元降为 50 元。50 元连米面钱都不够啊！

这还不算解恨，2000 年 7 月 1 日，镇政府通知我下午 3 点去学习，但我刚刚按时进了门，就被镇党委副书记黄某当胸揪住，噼里啪啦扇了十几个耳光。手打痛了，他又卜卜吹气，捏起拳头，凸出中指关节，雨点般敲我的脸。一会儿，我就肿得满脸花，看人模糊起来。支持不住摔地上，脑壳又挨了十几皮鞋尖。跟着，我被倒拖出办公室，在中心院坝内，我像一个肉皮球，被人们又踩又踢，我不由自主地遍地滚，却无缝可钻。围观者越来越多，许多街上的群众都拥入政府大门看热闹，还大喊：“打法轮功啰！快来看嘛！”

老威：没人劝阻么？

陈氏：没有。

老威：无法无天呀。

陈氏：不晓得，我已看不见听不见了。只感觉到四周密密麻麻的人腿杆，一会儿退一会儿进，天和房子一会儿高一会儿矮。大概怕我被当场打死影响太坏，他们又倒拖我双腿，弄进大会议室。群众被隔在外头，又跳又喊：“打死！打死！！”于是镇党委副书记黄某，副镇长黄 X 和张 X，在大堆人脑壳的鼓舞下，轮番上。一人整累了，就退后歇气，另一人变着花样上。我被弄跪着，光脚板被拧成股的铜芯电线细致入微地抽打。4 个小时啊，折磨没间断过。

老威：你当时的意识还清楚么？

陈氏：不晓得。晓得的只是“真善忍”。

老威：其他呢？

陈氏：偶尔也有一两句话飘进耳朵里：“陈 XX，你已陷入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还有：“打死法轮功不负责！”

老威：还有呢？

陈氏：没有。除了“真善忍”，除了李洪志师父。法轮在转啊，从五脏六腑向外，越转越开，把那些打你的手，踢你的脚都转没了。痛，这下子没痛过，接着又来了。但是减罪消孽，这是有人替你减罪消孽……

我浑身又青又黑，没一块好肉了。直到傍晚 7 点多钟，我突然听见 70 多岁的妈妈在隔壁哭。有人逼问她为啥哭？她都不敢承认是为自己的女儿哭！

当晚，我妈妈的家也被抄了。警察卷走了所有值钱的东西，包括电视机、被褥、蚊帐、衣服、暖瓶及各种家电，还有我从前收藏的旧银圆、铜钱、像章等，甚至菜刀和挂肉的钓钩都没放过。接着，我和妈妈被架进货车，强行送回农村老家看管——他们说，这是为了不给和盛镇的政府形象抹黑。

老威：真是暗无天日。

陈氏：这才开了个头。2001 年端午节前，我和两个功友结伴去郫县，刚在品东寺墙外写完“法轮大法好”，就被受共产党蒙蔽的和尚抓住报了警，我们被关进了郫县看守所。由于怕连累家人和功友，我始终不报姓名、地址。我还试着在号子里练功，可这边一动静，两个受政府指使的犯人就扑上来，掰开我的手脚，狂喊“报告”。于是所长出面，用胶皮棍暴打我，直到浑身青紫，才喝令给我戴上自制的铁枷。这种俗称“铁烟杆儿”的刑具是专为想自杀的死刑犯预备的，严重违规的犯人也用。我“披镣戴枷”，像小说《水浒传》里描写的杀人放火、刺配冲军的梁山好汉，被扔回号子，整整 10 天，连大小便也不能自理。后来轮到集体洗澡，铁枷方被除下，脖子、手腕全溃烂了，下身红肿，出狱后疗了几个月的伤才平复。

接着是 2002 年 4 月 25 号，在成都郊区的机投镇龙门村，我再次被 610 抓捕。关押两个多月后，宣布判劳教两年。7 月 3 日，押送到蒲江楠木寺女子劳教所。因新旧、内外均伤病累累，入狱体检不合格，我被退回温江和盛镇。

老威：打不死，活不了，镇里拿你怎么办呢？

陈氏：政府和派出所见“瘟神”回来了。个个气得咬牙切齿。他们开了一夜的会，最后集体决定“陈 XX 是走火入魔的精神病人”，7 月 5 日，我被五花大绑着投入了万春精神病院……

老威：有医生的诊断书吗？

陈氏：副书记说，组织决定就是最权威的诊断书。我进了三道铁门，终于咣当一声，被架入铁窗、铁床、铁椅、铁柜的 A 病房，里面的病人目光呆傻，抽筋、流口水，围着我嘿嘿地痴笑。我吓坏了，急忙拽住要转身离开的镇武装部长胡某的胳膊叫：“这儿不是我呆的地方！”胡得意地大笑：“你老人家是首长，专门送你来疗养的！大家绞尽脑汁才选中这儿，还要缴 3700 元钱的疗养费呢。”

我又抱住他的腿哀求：“我的脑子没毛病嘛。”胡笑得更厉害了：“这儿的人都说自己没病！喂，你练功去吧，地税局还有个杨崇玉在里面，你们做伴儿，往死里练吧！”

我被绑在铁床上一通宵，第二天，医护人员见我很老实，就松绑了。刚自由下地，我就追问杨崇玉的消息。医护不吭气，我就趁他们在晚饭后松懈，溜到各病房去查找，终于看见她了，骨瘦如材，跟鬼似的。我拉住她交谈，才晓得她已被关进来快一年，早不学法，不练功了。她说跟疯子学疯子，在里面如果显得不疯，病友们就要来掐你，吐你口水，甚至扳倒你，骑在你身上屙屎屙尿。我责备说：“你咋个要乱翻白眼乱唱歌呢？习惯成自然，假疯最后也弄成真疯了。”她说：“刚进来时，还一心想要练功，可一摆动作，手脚就被硬生生地掰开；嘴巴一蠕动，就有人贴着

耳朵吼念《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扰乱思维，搞得你岔了气，虚汗直淌。这样下来，政府天天灌输报纸、电视上污蔑大法的‘科学’，乱了心智，就真假难辩了。”

我为她难过，就把明慧网上的消息告诉她，大法已在世界各地不同人种中弘扬、传播，千万上亿的人在练功呢。我说：“澄清了谎言，继续修真善忍吧，没得错。师父说过，我们都是为了修法而来的，既然得到了，就应该珍惜，抓紧时间修炼。还要向世人讲清真相，救渡更多受蒙蔽者。”

第二天，我们又恢复练功，默诵师父的经文。医护们发现了，就赶过来阻止。医院的邓主任如临大敌，立马喝令周围的精神病人把我们拖出去电疗。杨崇玉先被绑在电疗床上，电源开关一动，她就不由自主地抽搐，惨叫“师父救救我”，那声音真不像人类发出的。我不忍心，就垂下脑袋，但是邓却上来抓住我的头发，抬膝盖顶住脊梁，逼迫我挺着身子去看，去“学习”。只见杨崇玉又抽了几个回合，浑身就由硬到软，皮肤由白到青，由青变紫，连那不像人类的喊声也发不出了。我受了感应，也哆嗦着哭叫：

“你们还是人吗？你们要下地狱，遭孽报的！天理何在啊！”邓说：“喊天有个屁用，反正人早晚要死，你们活在世界上显得多余嘛。”

往后，我们被隔离开，24小时的“特级监护”。只要我一放风，就把她给锁起来，我只能隔着窗玻璃感觉到她模糊的身影。但是，我还是在窗下喃喃念叨师父的法音，盼望彼此有个心灵感应。没料到，这个也被检举了。恶人医护二话没说，就绑住我和杨崇玉的手脚，逼我们喊大法是邪教。我们不屈服，就选了一间紧靠厕所的病房，将我们一圈圈捆在屎尿四溢的床上，让我们喂了一夜蚊虫。第二天，扣除饭食，给我们输液。我们动不了，只见输液管滴得风快，一上午就要输好几瓶。我说：“也不知输的是啥子。”杨崇玉说：“万一是损坏脑神经的药呢？他们才是疯

子，啥子事情都能够做得出！”我点头说：“日本电影《追捕》里就有这一招，用一种‘新药’把健康人搞出毛病，最后连跳楼自杀也不晓得。”

我们越想越害怕，就拼命挣扎，我先撞翻了输液架。瓶子碎了，却惊动了一个疯子，他舞动双手，大吼“报告”。于是我又被结结实实地捆了重新输液。

“医护”还逼我们吃“治疗”精神病的药，早晚一大把，吃后全身瘫软无力，老想睡觉；并且止不住地淌口水，嚼东西也没知觉。我吃了一回，就拒绝再吃，“医护”就命令一群疯子按倒我，撬开嘴，用开口器顶着，将药和开水强灌下去。我憋着气，卜一声咳出药片，他们又二次强灌，滚烫的水烧灼着喉管和舌头，滋地一下将我痛晕过去。第二天，我的头皮和脸都烫起了许多水泡，经过化脓、蜕皮，半个多月才结痂。

从此，我们只好像所有疯子一样，乖乖地吃药、喝水，并且主动向“医护”张嘴，搅动舌头，让他们用手电筒检查口腔，确认已经吞咽下肚。

老威：你们终于被炼成精神病了？

陈氏：开头脑子还念念不忘大法，接着就提不起精神，再接着就感到身子向下坠，眼皮比铁还重。日夜分不清楚，不吃药就心情烦躁。也许我梦中都叫“师父救救我”，院方又给我和杨崇玉转了病房。这一次，他们用拇指粗的铁丝封死了窗户，取走了灯泡，屋里黑漆漆的，跟停尸房一样。后来我们晓得，隔壁果然就是停尸房。病房的外间，还住了两个等死的老年精神病人，骷髅似的，已猜不出他们的年龄。她们除了靠两顿猪狗食维持生命，连药也不用喂，因为他们长年累月被锁在屋里没人管。她们已习惯光着身体，夜深人静，也自言自语，偶尔还唱两句农村的野调调，听得人起鸡皮疙瘩。

终于有一天，这房子要改建，老年疯子要被安排去别的病房。

门一开，天光照进来，她俩像掉毛的老耗子，在光影中惊恐万状，用巴掌挡眼。她们还是拒不穿衣服，“医护”叫疯子给她们裹大衣，她们还呲牙裂嘴，边躲闪边拉屎尿，把“医护”熏得站在五米开外，捂着鼻子指挥。

老威：这精神病院真是个大粪坑！

陈氏：我被当作疯子“治疗”了110天，杨崇玉还比我早“治疗”近一年。有一天，和盛镇妇联主任和信访办的人来“探病”，我隔着铁栅栏会见。她们问我生活情况，奉劝我“改邪归正”，并且胡说：“法轮功已害得你家破人亡，身败名裂，精神失常……”我打断她的话，纠正说：“我没有精神失常。”并且强烈抗议院方逼我乱吃药，损害了我的健康。

妇联主任答应去过问，可还劝我“回头是岸”。从此医院对我减少药量，由一日两次改为一日逼着服一次。

虽然服药的“待遇”改变了，但是妇联主任代表政府，给医院下命令，不准任何人来探望我，除非镇政府出证明。

老威：这为什么？

陈氏：做贼心虚，因为是不是疯子，一眼就能看出来；即使看不出，通过谈话，也能辩出异常。有一天，我妹妹骑自行车来探望，被拒之门外，她就在墙外一声声喊姐姐的名字。有个疯子听到了，赶紧来唤我。可等我跑到出声音的墙下，要答应，却被追来的“医护”逮住，捂了嘴巴拖回去。更可恶的是，我妹妹也被院方邓主任拖走了，他还威胁：“再喊，连你也关进疯人院！”

老威：官方一再强调练法轮功会“走火入魔”，我以前虽然不相信，但也觉得过分迷信不好。可没想到的是，真正“走火入魔”的是迫害，那些制造疯子的人，真比疯子还邪。

老威：你何时从疯人院出来的？

陈氏：2002年底，一辆警车将我接出来，直接送蒲江县楠木寺女子劳教所。一体检，又不合格。可这次，他们铁了心，一定

要所里把我关进去。劳教所医生说：“她是半条命，死了咋办？”610回答：“死了就死了，还能咋办？”于是，我就进去了。

老威：后来呢？

陈氏：我趁外出劳动逃了，警察也懒得来撵。

老威：你劳教了多久？

陈氏：判两年，差两个多月就刑满了。

老威：那你逃啥子？

陈氏：我怕到时又生变故，不“悔改”不放人。

赶尸目击者罗天王

采访缘起

无论在中国南方还是北方，赶尸的传闻一直都有，但往往是以讹传讹，神秘得不着边际。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曾在《吹鼓手兼嚎丧者李长庚》的文字末尾，虚实参半地描述过“三位一体”的赶尸情景，引起不少读者的特别关注。

但此篇对话却是具体的，时间为 2003 年 10 月 7 日晌午，我父亲李德奎逝世一周年的忌辰。记得其时天气晴朗，我、妈妈、妹妹、王鲁、两个侄女……总之，一大堆人，开了两辆车回老家盐亭县境李家坪乡下拜祭。默哀、烧香、放鞭炮都是免不了的，但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拜访住在乡场上的风水先生罗天王——他曾是我爷爷早年的朋友，父亲下葬的时辰由他推算之后确定。他还一笔一划写了黄贴，慎重地交付我和妹妹。因为腿脚不灵便，父亲隆重的入土仪式即由他的长孙主持。

“罗天王”是在方圆百里传扬的民间绰号，暗示某种通灵的能力。他已 90 岁出头了，却眼不花，气不是太喘，显得非常祥和。我至今感谢他花了几个小时的精力跟我摆龙门阵，把一桩赶尸引起的冤案活生生地凸现出来。要知道，那已是 50 多年前的事儿，若是一般人，记忆早被磨损得千疮百孔了。

“罗天王”的确名不虚传。

老威：这吆（四川方言，意为吆喝，借声势驱赶。）死人的传闻，我打小就听说过。文化大革命爆发，爸爸成了牛鬼蛇神被关进学习班；妈妈自身难保，避祸回成都，有一段时期，我和妹妹

就流落到这李家坪乡下。我爷爷您晓得不，那个穷得虱子成团的老地主？

罗天王：你爷爷李树凡嘛，我们是老相识，在旧社会，他可是个勤劳致富的老好人，已做上保长了，还保持着泥腿子的本色，与长工一道耙冬水田。有一次牛太累了，在田里犟着不走，他也拦住不准长工鞭打，而是自己扒个光脊梁，去代牛拉犁。可 49 年一解放，他就惨了，砖头竖着放，让他站上面挨斗，不知摔了多少跟头，老骨头都散架了……

老威：我晓得，一直到 80 年代初淡化阶级成分之前，我爷爷都没好日子过。那破四合院，拆去两面屋，剩下的两面风雨飘摇……爷爷已去世多年，可我还梦见过他，腰间系牛鼻草绳，上唇挂清鼻涕，被生产队民兵押去开地、富、反、坏、右五类份子斗争会。那年月，给我幼小的心灵莫大安慰的，却是隔着堂屋与爷爷比邻而居的贫农王三婆。她养了很多猫，一到冬天，猫就钻进被子和她一起睡。月明之夜，王三婆就坐在我家的祖坟头下，边摇蒲扇边讲鬼故事，还叫我和妹妹把筛子扣头上，让我们透过针孔大的筛子眼见识六一、二年的成群饿鬼。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吆死人。

罗天王：你说的是李王氏，那个五保户孤寡老太，她吹牛呢。

老威：她讲得活灵活现。多年以后，我还把这种记忆写进叫《死城》的诗里了，什么“我透过筛子目送赶尸人远去，我烧完纸钱钻出山崖”；什么“赶尸的吆喝不绝于耳，我的发根溢荡着尸臭”之类。

罗天王：你说啥子？“赶尸人的吆喝”？谁听见了？

老威：小子卖弄了，还是听您老人家讲。

罗天王：我可不背诗，我说的是真事。吆尸这一行虽然在正当的 72 行以外，但据说从古至今就存在。我已 90 岁了，早年在兵荒马乱之中，跑过陕西和河南，那时贩盐的脚商，由于交通不

便，一般都是六、七个青壮年同乡结伴步行，遇上运气好，也花几个铜板搭上一截便车。蜀道太难了，没有整段的跨省公路，有时汽车还没脚板快呢。

从盐亭经梓潼、剑阁、广元到陕西南郑的汉中地界，翻的几乎是山路。在荒岭野店之间，我们偶尔也瞧见地摊上铺开几个大字：“包吆死人过界。”阴风刮起几张纸钱，我们急忙掩面而过，心悸之余，却怀疑：人死了就硬梆梆的，怎样过界？又不是猪狗鸡鸭，你吆喝几声就能跑起来？

老威：“过界”是指阴阳界吗？

罗天王：也指省界或县界。旧社会，没高速公路，所谓国道跟现在的乡下机耕道差不多，泥泞难行。如果游子外出，不幸身患重病，不治而亡，总得有人收尸。当时不兴火葬，如果死者的福薄，经济条件一般，就只能由同伴凑几个钱，买一幅棺材，草草葬于异地。

老威：对，我的五舅在 40 年代领着戏班出川，后来在江西鄱阳湖边遭遇大难，五舅横死，就葬于当地。

罗天王：中国传统讲究叶落归根，死不能归里入土，就叫孤魂野鬼。所以，有经济能力的死者，都无一例外地遗嘱子孙，要不惜一切代价把自己弄回去！可咋个弄？没车运没人抬，而且路上耽搁的时间太久。

老威：您亲眼见过吆死人哪？

罗天王：见过，可那是一桩奇冤哪。

老威：老人家您慢慢道来。

罗天王：1950 年初吧，四川全境都解放了，盐亭县里的工作组也下来了，开始清匪反霸，土改和划阶级成分的动员。运动一个接一个，轰轰烈烈的，可我现在回想，却觉得迷迷糊糊的。

总之，乡下不安宁，大户人家跑了许多，山沟里躲城里藏，有袍哥背景的就合伙上山。我家三代都看风水，成分就划为“迷

信职业者”。有天晌午，刚下过雨，天气阴沉，我才从家门出来，忽然有体积很庞大的东西从眼皮下一晃就过去了。我不禁打个冷战，就好奇地跟上。我终于看清楚溅满泥浆的黑袍子荡起，有一双落地很重的皮帮鞋，咚咚咚，沉得像夯土的木桩。这时，恰好有个和我一样好奇的本村人撵上来，对我耳语：“吆死人囉。”

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更仔细地看，原来在黑袍子的前头，还有个引路的，对襟短袄，扎着裤腿，特别精悍。此人左手挽个装纸钱的篮子，右手提个白灯笼，斜斜地倒退着走。他每退走几米，就向冥空扬扬手，一枚纸钱撒出去，窜过人的脑袋，而后旋下来——这叫黄泉买路，乡下死人出殡都有这道手续。

老威：白天还打灯笼？这也是制造气氛吧？

罗天王：不是。所谓“死人”的黑袍子从头罩到脚，并且比常人高出一头……

老威：怎么会呢？里头有啥机关？

罗天王：黑袍子内的“死人”两眼一抹黑，顶上还扣一顶大草帽，草帽下还吊了一张纸壳糊的脸，惨白惨白的，像川剧舞台上遭冤枉的小生。你想，他的上半身犹如被捆着，只有两条腿在挪动，在咚咚咚地往前打桩，那么，他凭啥辨别方向？

老威：凭灯笼发出的白光。

罗天王：对，从黑袍里看出去，就是一团暗淡的光晕，再加上引路人嘴里不断发出“荷荷荷”的声音，“死人”只要配合就行了。

老威：这“死人”没手臂么？

罗天王：没见手臂在行走时摆动。

老威：那上坡下坡咋办？

罗天王：“死人”全凭引路人的招呼，比如上坡就叫：“坡，坡！”有石梯就叫：“梯坎，梯坎！”得提前叫。“死人”略略停顿，而后如笨熊，端着架子，亦步亦趋地仰面“打桩”；如遇

下陡坡，就大吼“稳起”，“死人”就事先减速，再一颠一颠地稳步下去。另外，拐弯、急弯，都要令行禁止，比兵营操练还严格。

老威：我还以为吆尸是一种世代相传的巫术呢，像港台电影里演的，一揭镇尸符，那东西就直挺挺地蹦达，双手还平伸着。

罗天王：我是风水先生，见过的死人还少么，你就不要取笑了。

老威：抱歉。不过听您的讲解，吆尸就没一点神秘感了。

罗天王：这是一种不见光的职业。那一次，我一直跟踪到七、八里以外的冯河乡，见他们穿过两三米宽的街，拐进靠河边的那家僻静的客店。“死人”在台阶下候着，引路人先闪进门，扑到柜台前拍两下巴掌，轻轻叫：“喜神歇店来！”

老威：啥意思？

罗天王：这一行的切口（行话）。一叫“喜神”，店家大约就明白了，心下又惊又喜。虽然那草帽下的纸脸壳怪吓人的，但可以客气地收三倍的房费。况且，“喜神”一进门，就再不露面了，其他客人也不晓得。

老威：旅店又不是停尸房，店家就不怕沾上晦气？

罗天王：你刚好弄反了，梦死得生嘛。传统风俗：“喜神”一冲关，财运挡不住。店家笑嘻嘻地将他们领入最里面的客房，把脸盆、马桶都递进去。我们凑拢看，见“死人”就直直地靠在门后，而引路人摘下灯笼和纸钱篮子，横在门口，瞪了我一眼，喝道：“爬开些！”店家也板着脸附和：“走嘛，嘴巴加锁，莫乱开腔哦。”

我们两个看客自讨没趣，就退回来。店家从引路人手里接一块旧银元，心花怒放。他趴在柜前边吹边拿在耳边听响，好一阵，才锁进去，换些零票出来，并招呼我们陪他一道去街上置办伙食。先买几斤卤猪耳朵、猪拱嘴和油炸花生米，又在馆子里炒

了四个荤菜，其中还包括一条两斤多重的豆瓣鱼，最后才采购了白蜡烛和冥钱，供明日上路用。

我们跟着瞎忙，店家过意不去，就留饭。他把伙计打发开去，三个人就边酌点小酒边摆龙门阵。由于“死人”给的店钱可观，他喝酒也竖起耳朵，只要那头有些微响动，他也颠颠地窜过去，问“有啥吩咐”，连耗子打架也不放过。

趁着酒兴，店家渐渐把持不住，吹自己在20多年中，打理过十来起“喜神”。我们故意不相信，他就急了，说：“死人一进房，就笼着黑袍子立在门背后，草帽也不揭，恐怖得紧。”我问：“死人自己真走路么？”他说：“传说是死人走，其实是活人走。秘密就在袍子里头。”我说：“吆死人嘛，当然是活人吆，死人走。据说人家还带着一只黑猫，反复让猫在尸体上下跑几遍，叫‘过电’，然后死人就木偶一般开动，然后就用棍子和灯笼吆。”店家斥道：“一片胡言！”另一人接口：“既然你觉得是胡言，我们就一起去看看。”店家说：“人家的门顶得死死的，看个球。”我说：“听一耳朵嘛。”店家说：“那人有武功，当心你的耳朵被他割了下酒。实话告之，这行当最忌见光，一般住进去就不露面了，吃饭屙屎都在里头。明早三更天，又得上路。”

正说得热闹，一阵阴风却嗖地刮进堂屋里，店家缩了缩脑袋，骂伙计咋不点店前的灯笼，此时壁上的挂钟铛地响了一下，8点半，门外已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店家呷口酒，又说：“你刚才说的黑猫啦过电啦都是封建迷信。”另一人讥笑道：“封建迷信都进店了，你还有脸批我们？”店家说：“吆死人是真的，反正已经是新社会，这营生看着做不久，我就索性把这谜底揭了：吆死人的活人是两个，一个明处，你们都看见了，打灯笼抛纸钱和动嘴的；一在暗处，把死人背挂在自己身上，再铺天盖地罩黑袍。这样，像移动门板，必须硬扳着腰，垂直着臂，握拳用力去撑起死人的重量。因为死人有个向

下沉的特点，刚魂飞魄散，骨肉又温有软，还比较好弄；可渐渐就变僵变硬，接着越僵越硬越沉，犹如石头，没丝毫弹性。如果他活着时 100 多斤，一个人轻易抱得动，可死时的重量要增加许多，两个人抬还费劲……

我插话说：“也许是心理因素，一口棺材还要 8 人抬呢。”

店家点头说：“这还像人话。总之，黑袍里面生死两人都苦啊，从北边的汉中、天水、宝鸡，经剑阁、梓潼入盐亭县界，在乡关路上多少起伏，掐指一算，走捷路也得近一个月！所以春夏季干不了，死人要臭；从九九重阳到来年春节，吆尸正好。”

我惊讶道：“你咋这么清楚？”

店家说：“我这客店已历三代，我爷爷在光绪初年开业才三月，就接了一桩‘喜神’，所以这行当从何朝何代开始的，谁也追不清爽。史书里记载，尧舜禹的上古时代就有，你信不信？”

老威：在哪本史书上有记载？我咋没看到？

罗天王：《史记》吧，或者《左传》《吕氏春秋》？

老威：没印象。

罗天王：秦始皇焚书坑儒，把许多上古的记载都销毁了，所以现在的人对秦以前的历史只能瞎猜。店家的话还算有根据吧。

老威：不错。

罗天王：店家说，死人上路要有一些仪式，那是做给旁边人看的。可主要还是往死人的七窍灌注水银防腐。吆死人特别苦，虽挣大钱，但一般人干不了。因为在黑袍内背着死人，膝关节不便弯曲，行动起来又直又沉；况且视力模糊，听使唤只能凭耳朵，如此折腾奔波十多个钟头才歇脚，一天却只吃一顿饭。

老威：所以……

罗天王：所以干这行当要经过秘密而专门的训练，有厉害的武功。明暗轻重两路活儿，一天一换。店家说：“明早的引路人肯定是另外一张脸。”此时，我们才明白店家为啥要送两幅碗筷

进去，原来“敬喜神”只是幌子！

我们把炭火盆里温着的一壶高粱酒喝光，才酒足饭饱地起身告辞。店家满面堆笑，打躬作揖地恳求我们守住口风，因为新社会新风尚，政府晓得了，麻烦就来了。我说放心嘛，就与本村人一起，深一脚浅一脚地摸回家去。

老威：这事儿就算完了？

罗天王：我也认为完了。进门脚都没洗，倒头便睡，便捱第二天清早。朦胧间，突然听见村上打锣。老婆说，快起床吃饭，贫协主任在亲自鸣锣喊话，通知全村去乡上开大会。我心上起了疙瘩，就胡乱喝了两口稀饭，带上老婆儿女一起出门。这时虽下着牛毛细雨，但天已大亮，在坡上路上，到处都有人钻出来，都往乡上的粮站聚集。我眼尖，忽然瞅见昨晚那个本村人，就招呼：“猪娃子，早啊。”不料猪娃子神色有点慌张，要躲。我一把拽住说：“一块走嘛。”他敷衍说：“一块儿走一块儿走。”却加紧脚步。我说：“你娃被吆死人的把魂牵了？”他忙叫唤：“啥魂不魂的？封建迷信要不得！”我说：“咋一觉醒来，你阶级觉悟就提高了？”猪娃子急忙狠揍我一巴掌，才悄悄说：“老子世代扛长工，觉悟本来就比你这风水先生高！昨天分手回家，我越琢磨越不对头，都解放了，还搞迷信，这不和反革命会道门差不多？知情不报罪加一等，于是我就连夜转回去找乡上的工作组。工作组有8个队员，都操起家伙，全体出动，并且还叫醒了警察分驻所的三个解放军，把那家客店包围个水泄不通。”

我埋怨说：“你答应了人家守口风，这不是吃里扒外么？”

猪娃子不服气：“一壶酒几片肉才值几个钱？我们又没分他的银元。”

我说：“你是穷苦人，是政府的依靠对象，哪能这么贪心？”

猪娃子说：“贪心？这叫政治觉悟。马上要土改了，大家都要图点表现。”

老威：穷人一旦翻身，就成合法抢劫了。

罗天王：解放军打头阵，冲进店里，先把睡大觉的店家和伙计俘虏。然后押着去敲死人的门，喊：“查号的！”里头不应，就擂了一通，里头方答：“啥子事？”外面喊：“我们是政府，快开门。”里头答：“等一下。”外头喊：“少啰嗦，快点！”

又擂了两通门，还是不开；于是解放军使枪托砸门，三两下，门板就轰地倒了。一伙人冲进去，手电乱晃，见死人还靠在门旁，草帽下的纸脸壳与长袍黑白分明。解放军扯开袍子，死人真面目露了出来，原来是个阔太太，烫着披肩卷发，一身绿色旗袍，颊边还抹了些胭脂。工作组组长进一步检查，发觉口腔、鼻孔、耳朵都堵了水银。

猪娃子嘀咕：“大户人家呢。”解放军立即纠正：“剥削阶级。”

两个吆死人的吓得发抖，衣衫凌乱地站在床边，高举双手投降。解放军过去搜了身，又搜枕头、铺位和床底，证明的确没藏伤人的利器，才允许他们垂下手，贴墙根站直，开始盘问。店家应命掌上煤油灯，也被指令并排站着。三个活人的左边一米远，直挺着一个死人，那情景，比包公夜审鬼案还叫人起鸡皮疙瘩。

原来这是兄弟俩，陕西南郑农村喜神坝人氏，其父亲就干这行当，在川陕交界那方圆数百里的民间很有些名气，被誉为鬼见愁。于是父传子，兄弟俩从十几岁习武，操练了四、五年，才开始正式接业务。估摸着自己的体力、耐力及应变能力，业务也由近至远地做。当时，哥已35岁，细眉细眼，却有一身石头硬的肌肉，弟31岁，稍稍瘦些，但也差不到哪儿去。

工作组长问：“你们家里是干啥的？”

哥愣了几秒钟，才答：“您都看见了，就干这个。”

问：“种田种地吗？”

答：“有田有地，但没种。”

问：“为啥不种？”

答：“没那功夫。”

问：“哪你家的田地雇人种吗？”

答：“收成太薄，有时就荒在那儿。”

问：“还有空地荒着？”

答：“闹饥荒，人往外跑哩。”

问：“你们那儿开始土改了？”

答：“开始动员了。”

问：“开会了？”

答：“开会了。”

于是下了结论：“开过会还干这个？屡教不改的迷信职业者。”

兄弟俩被定了性。接着又追问死人的背景，两人面面相觑，吞吞吐吐。原来按行规，这是要保密的，犹如押镖，不能将镖底告之外人。于是大家怒吼一顿，进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轰炸，解放军还拉了两回枪栓，作势要毙人。两个外省乡巴佬虽会武功，也吓得跪下交待了——果然查出，死人为一个国民党军队团长的太太，在败军之中颠沛流离，终于不堪劳顿，因肺癆客死他乡。其时，陕西境内大小城市都已“解放”，团长也同其他的国军光杆司令一样，两千多部属在眨眼间就作鸟兽散。他自己只好雇了滑竿，抬起奄奄一息的老婆和两口皮箱，从汉中、南郑被一路挟裹而出，终于流落到喜神坝一带的乡下。团长自身难保，按常规，他就该把咽气不久的太太草草掩埋，但夫妻情深，他又于心不忍。而太太原籍为四川盐亭县 XX 乡高子甸，她在临终之际，一定要丈夫答应，允其还乡，叶落归根。当此生死诀别，团长只好点头。可国破家亡，蜀道艰险，故土迢迢何止数百里！要实现太太的遗愿谈何容易啊。

正焦头烂额，恰好有阴阳先生指点迷津：团长步行 20 多里，

终于在喜神坝某一僻静的去处请出鬼见愁的两个儿子，重金托付。幸好是隆冬，尸体只需灌注水银堵塞七窍的简单防腐处理；也幸好那一带刚“解放”，新政府立脚未稳，还腾不出手来破除迷信。

兄弟俩得了大钱，在路途上早行早宿、紧赶慢赶，辛苦了两个半月，眼看离终点还有三十多里，只一天的路程就送到了，却没料到节外生枝，活人、死人都被扣押在他乡。手电照路，他们被长枪指着，只好抬起尸体，去乡政府黑房子内蹲了一夜。

次日上午开斗争会，冯河乡的男女老幼都被鸣锣通知到粮站晒坝，人脑壳在毛毛雨里涌来涌去的，后来，场里场外都挤得水泄不通了，连房顶、树杈都趴着人。农民嘛，一年四季连县城都去不了几趟，世面见得少，连狗打架都要围观。

晒坝靠仓库一边，搭了台子，新任乡长、工作组组长和分驻所的三个解放军都坐上面，台子周围摆了些板凳，民兵连长、农协及不少紧跟政府的积极分子挤着坐。时辰一到，乡长把熟铁广播筒拢住嘴巴，宣布清匪反霸的斗争大会开始。“把土匪，恶霸地主押上来！”于是粮站到乡政府的百米米厚的人墙豁开了口子，十几个坏蛋们戴着纸高帽，挂着黑牌，被五花大绑地攘过来。

会后毙了5个人，有土匪、袍哥和本地的大户。直到晌午以后，吆死人的俩兄弟才露面。群众顿时大呼小叫，都涌去看，把小孩都踩倒了几个。台上台下的洋官土官都站起来维持秩序，乡政府的五个广播筒全拿出来吼：“不要挤嘛！”“不要让阶级敌人趁机捣乱！”“退回去！”“再不退就抓几个！”

老威：政府干部也这么反常？

罗天王：刚解放，农村情况复杂，本来下乡干部挺注意维护党的形象，特别是土改前期的摸底动员，真是农民的贴心人。可当时的大会热闹过头，有点控制不住。要毙的人刚刚架下去，群众就议论纷纷：“吆死人的在哪儿？”“是不是造谣哦？”突然，真出现了，还把死人背在背上！并且，还是个女人！还是个穿旗

袍的官太太！乡巴佬哪见过这种稀奇，一下子全场就哗啦疯掉了，都一齐呐喊：“嘿哟！死妖精！”

洋官土官加积极分子手拉手抱成团，才把俩兄弟簇拥到台上。哥哥与官太太背靠背绑着，哥哥一低头，官太太就仰面朝天，而罩尸袍、灯笼、纸钱篮子都作为罪证捆在弟弟身上，特别是那张纸脸壳，就扣在他的后脑勺——这一来，兄弟俩的扮相如同演鬼戏。

老威：褻渎尸体要遭报应，这是中国民间的传统说法，难道一下子就不灵光了？

罗天王：那种情景就像急性传染病，人人都手舞足蹈，顾不了那么多。哦，兄弟俩前面还挂了大黑牌，上面写着：“国民党死人的走狗。”

老威：死人还有走狗？不可思议。

罗天王：按理，他们该算体力劳动者。文革后，我曾遇上当年主持斗争会的退休乡长，我说，吆死人的不应该算剥削阶级吧？乡长说，这活路比种庄稼还苦，当然是劳动人民。可糟就糟在他们从事的是封建职业，这种吆死人的迷信把戏影响太坏。我说，啥影响太坏？生计所迫嘛。乡长摇头说，迷信骗人也罢了，人民内部矛盾，教育教育就过关，可他们啥子死人生意不好做，偏偏要去做国民党官太太的生意！我说，难道除了国民党，其他死人生意就合理合法？他又摇头说，那时候，地、富、反、坏、军、警、宪、特的生意都不能做，劳动人民替剥削阶级吆死人，天理不容！我说，那劳动人民替劳动人民吆死人呢？他回答，公开不行，私下默许，但灯笼、纸钱等迷信工具要没收。我说，劳动人民出不起吆死人的大价钱，他回答，那就免费。

老威：不愧是共产党的干部，什么都想着免费。

罗天王：我又说，共产党干部真干脆。他说，唯物主义嘛。我说，那你为啥要找我来看风水呢？他说，人人都要见马克思，你

觉得他家的风水旺不旺？

老威：斗争会那场戏怎么收的场？

罗天王：群众涨潮一样，你越挡，它越高，终于轰隆一声，泻上台去，把牢固的实木台子都踩塌了，连仓库的挡板都挤断了，好几个干部从板凳上一个倒栽葱，就翻进了仓。兄弟俩仗着功夫抵挡，可几秒钟就被踩倒，现场一塌糊涂。

最后解放军朝天鸣枪，打了两梭子弹，群众才安静下来。于是先替死人松绑，并把受伤的兄弟俩架回乡政府。当晚，兄弟俩越狱逃跑，才出乡场，就被查号的解放军发现。穷追一里地，哥哥在一陡坡边被子弹击中腿部，摔下百米深沟，脑浆迸裂。弟弟被捉住，天一亮又被押解着去为哥哥收尸。

真是造物弄人，吆死人的哥哥和国民党官太太各裹了床草席，双双就地埋葬。可谓生死相随。弟弟被勒令“自我遣返”，当他向政府要张死亡证明，好回家给父母交待时，“证明”上竟赫然写着：“为反动派殉葬……畏罪自杀……特此证明。”

老威：唉，也算以身殉职吧。

罗天王：谁都没料到，这事儿还没了结，因为几天后，官太太的娘家人从30里外找来了。因为按风俗，他们接到团长寄出的报丧信后，就照信中估计的大概时间，设了灵堂，准备迎丧。可一等二等三等不到，他们就往北路去寻。

老威：但已经入土为安，咋办？

罗天王：他们哭哭啼啼找乡政府恳求。虽然要站稳阶级立场，但干部们实在被死人给弄烦了——斗争会差点酿成事故，加之击毙了一个罪不当诛的受蒙蔽群众，受到上级严厉的通报批评，于是，就立即恩准掘坟起尸。

历经波折，官团长太太到底还乡入土。迎丧队伍有二三十人，唢呐、笛子、铜钹、铜锣，吹吹打打，好不悲切。但叫人意外的是，乡村干部们都装聋作哑，没去干涉。

凶杀案律师魏更晓

采访缘起

8年前，当我与看上去有些油滑的律师魏更晓认识时，还心存戒惧。因为老魏的阅历复杂，他当过兵，上过警察大学，还和专管我的某某政治警察是同窗学友。我不明白他看上了我哪一点。

后来混熟了，我直截了当地问。他却一脸茫然道：“看上你哪一点？看上了你无用嘛，无用的人好玩。”

但他不总跟我玩，遇上敏感的时期，敏感的事，他就要借故避嫌。由此我推断，他和密探不是一路货。况且，他经常有忘形之时，会向我提供些访谈的线索——但却支离破碎。这不是卖关子，而是他的某一根敌情神经始终绷着。

老魏偶尔出其不意地做点令人感动莫名的事儿。例如有一次，他发现书刊稽查大队把从印刷厂搜缴的《漂泊——边缘人采访录》（即《中国底层》的单行本）倾销到旧书市场，于是就买了40册送到我家里，还直骂如今警察素质低，没文化；还有1999年6月4日，我在电话里对着自由亚洲电台朗诵《大屠杀》。老魏后来透露，当时国安局的警车在我住的小区外来回兜了好多圈，终于没有上楼来抓人。“原因是开车的科长听进去了，觉得弄一个脑子缺水的干嚎的诗人没意思。”

2004年11月24日这天值得纪念，因为已改行搞房地产的律师老魏到底松口，在我屋后的黄忠农家茶园接受了我的访谈，并且讲了一个比较完整的雇凶杀人的很戏剧化的故事——透过这故事，我看出已年过不惑的老魏心底充满无可奈何的愤慨。我突然觉得自己欠了他的。是啊，我欠了许多普通人的，

可又一时说不清到底欠的是什么。

魏更晓：老威？嘿，这一晌在哪儿发展？

老威：我还要问你呢，我们大约有一两年没碰面了吧？手机也换了，老打不通。

魏更晓：时间晃得快，人也该有些变化嘛。你咋样，还弄底层访谈？

老威：在这兵荒马乱的年头，我一文人，也做不了其它的。

魏更晓：8年前，我们刚认识，你就做访谈，现在还做，这玩意挣钱吗？

老威：哪能和你这大律师比。

魏更晓：我已没做律师了，去年到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挂了个名。

老威：与时俱进啊，房地产又比做律师来钱快。只可惜，我又少了一个渠道——你过去的确给我提供过很多访谈线索。

魏更晓：我不干律师也能提供线索，也许更方便，不涉案嘛。

老威：我做一个你的访谈如何？

魏更晓：你别掏录音机，别这样！我头皮都麻了。

老威：就随便摆摆龙门阵吧。

魏更晓：行，今天就放松一下。老威，你知道两月前发生在内江某地的离奇盗车案吗？

老威：不晓得。

魏更晓：有个劳改了8年的贼，出狱后，在黑道兄弟的帮衬下，摇身一变，成了某工地的包工头，发了些不明不白的财。为了改善与警方的关系，此贼送了当地刑警队长一辆桑塔纳2000。但没过多久，刑警副队长又来找茬，此贼急忙赔笑请客，几杯酒下肚，副队长就骂开了：“你他妈的势利小人，就晓得拍队长的

马屁！这摆不平嘛。”

听话听音，此贼连连打保票：“摆得平摆得平，不就一辆桑塔纳么。一周之内，给您老人家送去。”

老威：这劳改犯发的什么财，出手这么豪放？

魏更晓：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可此贼的财横过了头：他当机立断，招呼了三个同窗牢友，乘夜去 200 公里以外的某市夜总会偷车。刚要得手，却被女车主突然撞上。于是使个眼色，按住人家脑袋，硬绑进后座。再开车狂奔至 80 公里外，先奸后杀，再碎尸几段，分装入几个编织袋埋了。

众贼把轿车清理干净，没事儿一般回到当地，倒头一觉睡至第二天下午，才把这礼物送到副队长指定的某汽车市场的路边。牌照、发票都伪造得妥妥贴贴，面对必恭必敬的贼们，副队长的脸笑开了花。

这案子直到大半年后才翻了，还是副队长休假到外地，因驾车撞伤了人，被交警扣住。上网仔细一查，发觉牌照有假；再一追，事就闹大了——不仅副队长，连队长的轿车都是贼货。

老威：这警匪一家，老百姓的日子就难过了。

魏更晓：你是文人，翻翻历史书就晓得，这官贼勾结，历朝历代都有，又不是这个时代的特产。包公铁面无私，算北宋时期的反贪局长，可他手下的七侠五义，个个都是惯偷，甚至偷到阴曹地府去了。

老威：那不叫偷，叫侦察。在北京的朋友家里，我就遇见一个东北的刑警队长，彼此聊起来，他就说有时为了摸清案底，还去人家屋里开保险柜。窗下门前留有暗哨，如果有意外，比如房主提前回来，或有人路过，就得发手机震动暗号。如果来不及，撬保险柜的警察也得跟贼一样，该躲该溜，自己看着办，万一不慎被捉，挨了打，也得忍住，哀求人家送派出所去“悔过自新”。

魏更晓：你连警察做贼都知道？

老威：道听途说嘛。

魏更晓：我下面讲一个雇凶杀人的故事。申明一下，这不是道听途说，而是我曾参与辩护过的一个案子。已过去 4 年了，当时法院指定我做一桩人命案的律师。我的当事人是农民工，出不起钱，我也就准备按惯常的做法，见见人，走过场一般问问案情，挑几个法定从轻的细节，以便在开庭辩护时提出来——没用，杀人偿命，天经地义，我就做做聋子的耳朵。摆设，总比在法官左右一言不发的陪审员强些。

当事人叫姚文贵，盐亭县黑坪区水罐乡人，几村几组忘了。小伙子 27 岁，黝黑的皮肤，浓眉大眼，很帅。有点像香港的娱乐明星郭富成，就是又蹦又唱肌肉又发达的那个。可姚文贵是乡下人，说话也脸红，没那种时尚的气质。

我在开庭前一周才去看守所见他。已经深秋了，还下着雨，可姚文贵穿着单衣，镣铐加身。他结结巴巴地探问我能不能不判死刑？面对这么个法盲，我能说什么。

会见不过十几分钟就结束了。尽管是走过场，我还是问了他的家庭情况。原来他的父母、老婆、妹妹、孩子都陆陆续续在 5 年内从乡下迁到了成都市内。我问他老家还有什么人？他回答还有个婆婆，已 70 多了，守着老屋和山沟里的几亩地。

回家浏览了案卷，又照姚文贵写的地址，去一趟肖家河一住宅小区的院门，姚的爸爸是这儿的门卫。传达室有七、八平方米，除了一张桌子就是床。我溜一眼床底，还有旧钢丝床。估计到了晚上 11 点后，关大门，再关传达室的小门，这逼窄的空间就会填满 6 个人。

姚父 50 出头，可头发已差不多花白了。他的月工资从小区住户的费用中扣除，仅 120 元钱。其他人不在，我不知不觉在那儿和他聊了两个多小时，不由自主地生出许多感慨。

老威：你不是个钱串子律师么？咋会“感慨”？

魏更晓：你开这种玩笑，我可要生气了。

老威：对不起。

魏更晓：你不能自认为是作家，就占有从精神上审判别人的制高点。今天一开头，我讲了个警贼一路的故事给你听，因为我晓得，你这反革命分子，喜欢听坏警烂贼，现实里拿这专制机器没办法，就打打精神牙祭嘛。可我说的，也是个极端的事儿。

老威：行啦，别借题发挥了，求求你。

魏更晓：案情开始比较平淡：一家装修公司的老板，就叫 A 吧，在外面有了情人，两人好得如胶似漆，于是自然而然，A 就想和已相处了 12 年的原配老婆 B 离婚。本来离婚也自然而然，如今三四十岁的男人离婚已成时尚。可接下来是财产分配，A 辛辛苦苦折腾 10 来年，有 120 平方米的住房，有价值 10 多万的捷达王轿车，还有几十万的存款。如果男方无故提出离婚，至少得把财产的一半分给女方；况且他们还有个 7 岁的孩子——还有，“第三者插足”的情况一点不能见光，否则，A 作为过错方处境更加不妙。

下一步你肯定猜着了：要离婚，又要保全财产，唯一办法就是除掉原配 B。A 受过高等教育，亲自动手的事不敢做，于是就通过社会关系，在永丰立交桥下面的烂茶馆与黑社会接上头。眼下商业时代，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已成为一个不见光的职业。在这个行道，人身上的每个部位都有价格：比如削一只耳朵，2000 元；砍一根食指，4000 元；无名指 3000；整只手 12000 到 15000。捅一刀，肩背，视深浅，800 至 1400 不等。总之，致命，不致命，或半致命的分寸都有基本、较高、最高的价位。

除按部位论价，还得按人的身份、阶层论价。这就是无底洞了，因此买命钱可以是两三万，也可以是几十上百万，甚至两三百万。A 同世上多数发横财的官与商相比，只能勉强算个中产，因为经过一番比划，A 咬死只出 3 万元。对方迟疑了三天，大概已通过调查，摸清了 A 的家底，还价 5 万。

于是双方达成协议，A 先出 2 万元“预定货款”，半月内搞定，即付清 3 万余款。

老威：这种事敢定协议？

魏更晓：表面上看，这是一份购买装饰材料的正规合同。连公章、私章、经办人都有，两万预定货款甚至有发票。

老威：天哪。可杀手是谁呢？就是你的农民工当事人？

魏更晓：总之，A 自从按规矩交钱定合同之后，感觉踏实；而且暂时断了与情人的交往，天天回家陪老婆孩子，伪装得一丝不苟。

老威：我关心的是怎么下手。

魏更晓：这和承包工程是一样的，通过谈判而接单的人，也就是包工头，是从来不动手的。他拿了“货款”，先扣下自己该得的百分之五十，再发包给下家。在好几年前，这行当刚兴起时，下家得了另一半，就直接干了；可现在，黑白两道的人都精，又想吞钱又不想沾血——于是下家照样扣一半的一半，再发包给下家。如此一来，两万变 1 万，1 万变 5 千，落到我的当事人手上的，只有两千五百元，而且也是先付一半，完事再付一半。

老威：真是命贱如草。

魏更晓：姚文贵不是黑社会，可他走到这一步，恐怕只是早晚的问题。

老威：雇农民工杀人的故事早就听过。

魏更晓：话至此，得分两头，我先讲讲姚家是如何进城和立脚的。现在的边远农村，除了太老的和太小的，几乎都进城了。

老威：这个我晓得。2002 年父亲去世，我们送他的骨灰还乡，就发觉农村更加地广人稀，青壮年跑得差不多了。有本事和胆子大的，就去广州、北京或乌鲁木齐打工，至少也来成都找机会；老实一点的，去稍近的绵阳，或干脆在县城混，挣些钱寄回来交各种税费。总比在家里刨土强。

魏更晓：可越来越多的状况，是乡下人通过进城打工，一步步割断了与家乡、土地的血缘联系。比如姚家，先是儿子姚文贵和村里的小伙子、姑娘一道进城，奔某建筑工地下苦力。没日没夜地混了几个月，城市的灯红酒绿肯定比农村的黑灯瞎火诱人，于是人人都在寻求继续留下来的机会。姚文贵聪明，打听到一些小区缺门卫，特别是80年代形成的老小区，没有物管，住户们又想安全可靠又不想多出钱，这种“好事”只有乡下人肯干。

于是姚文贵瞅准机会，立即带信回家，召来46岁的父亲，并且顺利地让其当上肖家河某小区某大院的门卫，月工资120元。虽少得可怜，但传达室好歹是个住人的窝，父子俩不用另花钱租房子了。况且乡下人勤快，经常替院里居民干些杂务，也能挣些补贴。

由于农民工群体的帮派势力，姚文贵被资阳或简阳帮一手遮天的建筑工地排挤出来，先后擦过皮鞋，修过自行车，虽然总被城市管理人员撵来撵去，可还是从牙缝里抠出两百元钱。于是他买了辆无照偏三轮，利用已熟悉的地理环境，在肖家河一带拉客挣钱——一年后，随着姚父工作的日益稳定，姚母、姚妻及姚子陆续进城投奔，两三年后，连过年也不回老家了。

传达室住一大家子，居民们开始有议论，但乡下人吃苦耐劳，经常为他们充当免费差役，况且这么多人守门，也的确安定团结。

老威：一部农民离乡迁徙史就这样完成了。

魏更晓：往大处看，整个中华民族都在迁徙，农民家庭离开世代代的土地，这是最基础的那块砖的挪动；而城里人也一样，县城居民向往大城市，只要有办法有条件，谁都不想待在祖传的原地，谁都愿意削尖脑袋朝更大更没约束的天地钻。所以，在这个由低级到高级的迁徙循环中，西方成为中国人终极的天堂——有钱有势有门道的官、商、娱乐明星是飞向那儿的第一批候鸟，其实从骨子里，他们还是中国农民，与姚文贵一家没有区别。

老威：高论高论。

魏更晓：嘿，扯远了。总之，时光一晃，姚父就做了4年门卫，居民们逐渐习以为常了。在这4年里，姚母姚妻分头替人擦皮鞋，也到饭馆里当过杂工，运气好时，也有院里居民雇他们做家庭保姆。而姚文贵一直拉偏三轮，这生意来钱比固定工作快，可蚀本也快。在交警的拉网清剿中，他一年至少要损失四、五辆车。姚文贵说：“一辆车本钱150元左右，全年就要蚀本1000多元，可我拉一个客才挣两三元钱，这都是血汗啊，要多少个两三元才凑得够1000多！”

老威：他一直没改过行？

魏更晓：在底层社会，那一行都有帮派，有门道，不是同乡和熟人，难于插进去。由于交通的便利及城市扩张，来自成都郊县的打工者肯定比更远的外地打工者占便宜，在建筑、装修和其他劳务市场，也更容易抱成团。一两个人是弱势，如果本乡本土的人成群结伙，就感觉不到弱势了——大家的共同目标是求生存，求发展。初级黑社会就这样形成了。

回到姚文贵，在与警察的猫鼠斗中，他最终放弃了这个饭碗，可哪儿去找其它饭碗？而他自认为是男子汉，是能挣到大钱的。他说：“一家六口总不能老挤传达室，连同老婆亲热都不方便。可在外头租个笼子屋也得一两百。”

在种种不可化解的烦恼中，一个两年不见的同村人牵线来了——他有了挣大钱的机会！2500元在他的习惯性思维里，立即转换成近17辆偏三轮：天文数字么！况且要搞定的还是个弱小女人。

老威：这是杀人哪，他那么轻易就答应了？

魏更晓：真的简单。姚文贵喜欢看香港的录像片，就是在建筑工地上搭一大棚，一元钱可以进去看两三部的那种警匪烂片。他还目睹过多次民工之间为抢活儿干的斗殴，棒子、砖头、刀，啥都派上用场了。大伙头破血流，却连一分钱也弄不到。你呀，

看来是真的写字致富了。

老威：啥意思？

魏更晓：脱离底层群众呗！不明白许多人干一年也挣不了 2500 块。

老威：唉，你说得对，老魏。

魏更晓：雇主给姚文贵指定了猎杀对象，丢下定金，限定一周内搞定。A 家住战旗小区，越过一条笔直的大马路就是金沙遗址，好几个大的房地产开发集团都瞄准那未来遗址公园的商业前景，纷纷在这儿圈地。楼盘还没开工，在一人高的大片荒草中，经常在这儿散步的人们已踏出了好几条人行土路。A 家也有散步的习惯。姚文贵在土路上迎面碰过两次 A 和 B，还牵着一个小女孩，看上去挺和谐的一家。

姚文贵斜挎一个装榔头、菜刀的布包，跟踪了三四天，甚至深夜还在那围墙外瞎转，但始终没找到下手的机会。已经秋天了，这家伙竟不顾蚊虫叮咬，选一拐角处，在杂草丛中埋伏下来。如此守株待兔，又耽搁了两天，眼看明日就到限期，姚文贵急了。刚巧，这天 A 一家的散步时间比平常晚，大约 8 点 40 分，天已黑尽，但一轮明月将四周照得亮晃晃的，那一家三口靠近了，并且前后都没其他人。本来姚文贵很绝望，他对付不了三个人。可这时 A 的手机响了，他喂喂地接听了两分钟，就对 B 说：“家里来客了，你带孩子先回去。”B 嗯嗯地答应：“一块回去吧。”A 却坚持让 B 先走，他要一个人想些事情。B 嘲笑说：“结婚这么多年，我还没发觉你是个哲学家。”于是就拽着孩子快步而去。

姚文贵蹲在杂草中，眼睁睁地瞪着猎物溜掉，却不敢弄出动静。A 继续溜达，还亮出家伙，对着草丛撒了泡尿，直到彻底放松了，才又掏出手机与情人通话。他来回走着安慰对方：“解脱的日子不远了。”姚文贵觉得无趣，正准备要悄悄撤退了，却突然听见 A 说：“我给你备了 1 万块，你先用着，熬过这一阵，我的

全是你的。”

“1万块”这三个字，刺痛了已被花脚蚊子叮麻痹了的皮肉和神经。在月光下，他又窥见A从西装里面抽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他眼冒金星，忍不住喘起来，而情意绵绵的A还在重复“我等着你，你也永远等着我”，并且啧啧亲那虚无的嘴。

姚文贵醉汉似地窜出来，A正背对着。他右手举着榔头就扑过去，A刚好关机转身，太阳穴就挨了一下。姚文贵后来交代：“没想到人也这么不经搞。”

姚文贵把昏厥的A拖进荒草深处，在浪漫的秋天的月光下呼哧呼哧敲了他几十锤。太阳穴被砸出一个坑，脑浆和血渗了出来。接着，A的牛皮纸信封落入贼手，他还坐在温热的尸体上，下意识地抽出钞票直瞪着，这可是他这辈子见到的最大数目的钱！

老威：人家要他宰老婆，他怎么把老公宰了？

魏更晓：而且是主谋出5万元雇凶的老公，你说离奇不离奇？

老威：转了一圈儿，就是为了找人杀自己啊。

魏更晓：上帝拿人的命运赌博，姚文贵咋晓得？他把死者身上的钱财搜得精光，顺手将榔头和菜刀扔进河沟里；他逃回肖家河，继续拉他的偏三轮。由于B当夜报警，A的尸体很快就被找到，姚文贵的直接雇主大概要避风头，没敢再露面。

一个星期后，姚文贵就近租了一间房子，每月160元。他和老婆进城这么几年，到底可以过没有干扰的性生活了——可是，刑警也上门了，他作案的凶器被捞上来，一审，他当然供认不讳。

老威：他晓不晓得真相？

魏更晓：晓得，所以觉得自己不该死。他对我说：“律师，你一定替我申冤！因为我杀坏人没杀好人。”我问：“你是故意没杀好人吗？”他就不吱声了。

老威：真是个老实人。

魏更晓：对，有朴素阶级感情的老实人。

思想犯李必丰



在往事中啜泣的李必丰

采访缘起

有关李必丰，我在文学纪实作品《证词》里，曾花费过不算少的笔墨。记得 93 年的某个夏夜，监狱院子里放老掉牙的革命露天电影，众犯看得津津有味，我和李必丰却退在人群外面仰望星星，讨论在宇宙当中，生命到底自不自由等大问题。李必丰突然说，他创作了一首上千行的诗，探问我有没有“指教”的兴趣？我却倒抽一口凉气，摆手答“不了不了”。

在我们那批六四难友中，李必丰的文字才华很醒目，所涉文体包括诗歌、小说、剧本、札记、哲学探讨、政论、呼吁书等等，但我从未把他的作品读完过。因为他的思维和双腿一样，走得太快，有时还是跳跃的，令人费解。例如“二进宫”才几天，在审讯的间隙，他就坐在黑牢里思考：“蚊子是谁发明的兵器呢？”

真有点古希腊哲学家的味儿。

李必丰真正打动我的，是以下这首诗：

“但冬季过早地来临/我们的树木开始干枯/我们再也没有养份去供养/于是我们的黑发被岁月的雪/冻得渐渐斑白/我们的皮肤像龟裂的田野/冬季来了/我们都爱冬眠/心脏累了/血液累了/我们在雪底下冬眠。”

这首诗带给我的回忆，首先是上世纪 80 年代，我读叶赛宁的青春时光。叶诗写到俄罗斯的冬季，阴郁的晴空，用了“打补丁的碎花布”或“肮脏的包头帕”等比喻；接着是政治犯在狱中仰望星空，讨论自由的情景；然后才是作者本人。“我们都爱冬眠”——李必丰说，其实他是个起早贪黑的人，一天睡不了两三个小时的觉；他“心脏累了，血液累了”，梦想“彻底冬眠”——他才 41 岁啊，就先后坐过两次共 12 年的牢，还曾偷越过 3 次国境，畏罪逃窜若干次！

我还回忆起 26 岁就卧轨自杀的海子；还回忆起自己——一个曾经才华横溢的诗人，是什么令我一行诗都写不出来？

于是，在 2005 年 5 月 18 日，我专程赶回成都，在金沙遗址附近重逢了刚刑满释放的如今的诗人。

老威：时间晃得太快，一眨眼，你的 7 年刑期又满了！

李必丰：六四都 6 年了，廖胡子，你算我们这批难友中最幸运的。

老威：你指没有“二进宫”？

李必丰：不错。当年关在三监狱，你和余万宝是上下铺，都判 4 年，没料到几年后，余万宝又因中国民主党的案子裁进去，判了 12 年。你我加上许万平、蒲勇，总爱凑一堆，在晚饭后兜圈子，半个操场那么大的院坝，我们要暴走几十圈，还上气不接下气地畅想将来，猜测六四什么时候翻案，共党的寿命还有多长，

等等。可如今，关满 10 年的蒲勇，出来 3 年就死了；许万平已经三进三出，累计刑期十几年，这次又栽了——他本来只有半条命，重庆警方又那么黑，再判个十年以上，就只有报销在狱中；而我，六四 16 周年，就坐了 12 年牢，人都快疯掉了。

老威：听说你在里面写了 200 多万字的作品？

李必丰：被搜去了许多，剩下的还有几十万字。我整理一些出来，你看看有没有市场。

老威：我手里还有你一沓诗和日记，保存了好些年。我晓得，你狗日的命贱，越遭整，想象力越丰富。古希腊有个哲学家，叫什么忘了，被关押了 50 年，写了一本青史留名的著作：《太阳城札记》，北岛曾借用这个书名作一组诗的题目。还有更厉害的一位，被绞死的前一天，完成了《哲学的慰藉》，从容解脱……

李必丰：所以……

老威：所以丰子啊，即使大限将至，也不可绝望。

李必丰：可我既不是哲学家，也不是民运家的料，咋办？

老威：那我们在此地此时，一句话一句话地说。

李必丰：原先我们已经说过很多了。

老威：那是断断续续的闲话，十几年了，大部分都忘了。

李必丰：我想想，你得有点耐性。哦，眼下最早的记忆是 1970 年，我 6 岁时，背着书包上学堂。大群同龄娃娃，放羊似地涌进教室，我个头最矮，所以抢坐了第一排。老师进来了，在黑板前宣布：“毛主席教导我们——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同学们，大家都出去，按老师的点名，一个个地进来，照先后秩序坐。”

于是，小朋友们就乖乖听指挥，重新进一遍教室。一会儿，53 人都坐好了，就剩下我一个人在外头。老师放下点名簿说：“现在开课……”

我急了，以为老师没看见自己，就垫脚探头，叫道：“老师，还有我呢！”

不料老师回答：“没有你的位子。”

我哭了，可还是鼓起勇气问：“为啥？”

老师笑了，并且一字一顿地说：“因为你是四类分子的狗崽子。”

我才 6 岁，当然不懂，只能挂着眼泪回家问妈妈：“啥叫四类分子？”妈妈不好说，我就死缠，稍后才晓得，我爸爸在解放前加入过袍哥组织，当过保长。那一年，姐姐和三哥都小学毕业，也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被剥夺了升初中的资格。妈妈见我懵懂可怜，就托熟人关系，找到小学校长。校长沉吟再三，才在最后一排给我放只独凳，后来见没人检举，又悄悄添了张桌子。

就这样，生命在屈辱和贫穷中萌芽，我从小就穿补疤衣裳，满山遍野挖野菜，因为父母的收入加起来才 10 多元钱，远远填不了 6 张嘴巴。我不得不学会忍辱偷生，但往往忍辱也偷不了生。比如有一次，几个娃娃到家里玩，比赛着在糊墙的报纸上画圈圈……

老威：糊墙的报纸？

李必丰：70 年代，由于太穷太匮乏，城镇居民普遍用过期的报纸铺天盖地地糊砖墙。刚巧，我碰到了毛主席及其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的头版合影，就鬼使神差地用铅笔“包围”了副统帅的头像——这非同小可，没隔几天，不知被谁检举了，我们家突然降临了大帮公差：包括绵阳县公安局、丰谷区革委会、人保组、所辖居委会等，穿制服和不穿制服的十几个人，屋里屋外，反复勘探。还拿相机四处拍，重点钉准被圈的副帅像，啪啪地闪。临走前，干脆把屋里有图片的糊墙报纸小心翼翼地起下来，都揣走，据说要带到县里去作透视化验，检查有没有隐形反标。当时，我一个 8 岁儿童，吓得钻床脚，公差们一出门，却被爸爸拖出来，狠揍一顿。这是我第一次挨父亲的打，也是第一次与政治沾边，很莫名其妙。

老威：后来呢？

李必丰：后来没查出个啥，才不了了之。但从我降生以来，阶级斗争的阴云一直笼罩着。14岁那年，我爸爸患胃溃疡住院，我们在替他收拾床铺时，突然从凉席底下发现了许多份《申诉状》，还有《思想汇报》一类的东西。原来爸爸对戴“历史反革命”帽子一直不服，已申诉多年，却至死没个结果。当时哥哥姐姐要把这些犯忌的材料销毁，我却把它们捡起来，在心里，我发了个誓言：将来有一天，把家里经受的这一切写出来。

由于家庭背景，我的小学和初中教育不完整，经常被赶出校门，只好忍辱求情，再转学。我曾经转过六、七次学，还曾失学去河滩拉船、背鹅卵石，备尝生存之艰辛。1985年高中毕业，本来考上了上海戏剧学院，却因户籍上的名字错误（把李必丰弄成“李必凤”，连性别也错了）耽搁了。为减轻家庭负担，转而考国家干部，以优异的成绩进了绵阳税务局。

文学的痴心不改，我在工作之余，创作了许多诗歌和小说，并接触了一些文学青年，大伙一道搞了个“寻梦园”。不料文学青年的聚会也引起公安们的警惕，1987年的某一天，绵阳市公安局一处传讯了我……

老威：上个世纪80年代被称为文学的时代，诗社多如牛毛，咋会独独传讯你？

李必丰：绵阳是四川最左的地方，我在狱中对你提过的《剑南文学》编辑刘德¹，他仅仅讲了一堂课，质疑电影《高山下的花环》，就被判刑7年。所以，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之后，吓一吓我这种小虾米，不算反常。我进了一处办公室，见桌子上有一份《本地区国民党特务名单》，就溜了一眼，竟瞅见“李XX”，我爸爸的名字！

¹ 刘德案，见廖亦武著《中国冤案录》2001—2003，劳改基金会出版 2005年出版。

震惊之余，急忙后退，一处的便衣出现了，他问：“你就叫李必丰？我还以为有多大岁数呢。”接着他又自我介绍姓罗，并且说：“据调查，你们的诗社是非法组织，国家法律对跨行业、跨市县的结社行为不允许，所以要取缔。”那时我才23岁，血气方刚，就反驳：“你是公安，头顶国徽；我是税务，也头顶国徽，难道你说取缔就取缔？”

姓罗的愣了一下：“当然，目前是人民内部矛盾，我们对你还很客气，可总有一天……”

我没理睬，转身就走。可没想到，诗社很快就被查封，印《寻梦园》的油印机、刊物、纸张全叫没收。公安一处找到我单位，要送我去劳动教养，但我是业务骨干，单位领导替我作了担保。

事后，局长亲自到我家，找我妈妈谈心，还叹息道：“这个李必丰啊，工作、生活都没啥毛病，可以后在政治方面要出问题！”

老威：税务局长有此先见之明，也算难得。

李必丰：80年代初，绵阳警方取缔过一份叫《自由魂》的地下杂志，抓了不少人，而《寻梦园》上登了一篇评论，名为《试论西方文明》，其中引用了《自由魂》上的东西。当局捕风捉影，将两者牵扯上，暗地对诗社重要成员进行监控。后来成为我同案犯的唐先全这时也回来了，他曾是新疆《阿勒泰日报》的编辑，思想活跃，在该报上，他甚至搞了“20世纪影响中国的十大人物”的评选，其中有孙中山、蒋介石，也有魏京生。所以，在反自由化运动中，全国首先被砍掉的，就是《阿勒泰日报》。唐先全惹了祸，就跑回绵阳，我们一碰面，即臭味相投。对于我，这两年是黄金人生，我创作了大量的诗和小说，也结识了更多的文学同道。

转眼到了1989年，胡耀邦逝世之后，学潮兴起，我因不堪公安机关的迫害，就向单位交了辞职报告。5月份，绵阳大中专师生上街游行，我们看了，心潮澎湃，就亲自跑到城郊的建材学校，企图与学生联络，却被纠察队拦在校门外，骂我们是“社会闲

杂”，图谋不轨。把个唐先全气得跳脚大叫：“凭啥子？龟儿子们懂个卵！”我急忙劝住，耐心向对方解释：“人人都有权爱国，我们也可以组织市民游行。”

第二天，我们当真弄了些“声援学生”的标语和横幅，动员了一些市民参加游行。5月21号，太阳热辣辣的，却有两三百个学生娃娃在市政府门口静坐。围观者不少，竟没人给汗流浹背的爱国者递一杯水。于是我的脑子一热，就站上一辆三轮车，开始演讲，号召大家给学生送水、捐款。那天我口若悬河，一讲几个钟头，嗓子嘶哑了也顾不上喝水。于是路人纷纷解囊，学生有了老百姓的支持，也士气大增。而我却因公开煽动，惹火上身，公安局扬言：“要抓税务局的眼镜！”

几个月后，演讲了啥子我自己都忘了，可警察记得，并且还上了《公诉词》。开场白大意是：“我不是学生，也不是工人，而是李鹏所说的‘社会闲杂’，一小撮中的一小撮，而这一小撮，就是被压在社会底层的广大人民。”

为了追溯我犯罪的思想根源，《起诉书》里还引了我登在《寻梦园》上的诗句：“这天太黑/月亮上的火山今夜看不见。”检察官曾是书生刘德的检察官，法官也曾是刘德案的法官，好像绵阳地区的政治案都是这套审判人马。检察官曾将大学同学写给刘德的毕业戏言——“莽娃子，你要改；若不改，要劳改”当作证词当庭宣读。而这次，这个文盲竟故伎重演，质问我“这天太黑”是啥意思？我答：“天黑就是天黑，没有任何意思。”他说：“你狡辩，这是诬蔑社会主义制度一团漆黑。”我说：“我的眼睛不好，看黑就写黑……”

后来，经过绵阳《剑南文学》主编，你的盐亭老乡谢宗年的“专家鉴定”，“这天太黑”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反动诗，构成铁证。

老威：你当场落网了？

李必丰：我闻风而逃了，径直去成都投靠同学。在爱国运动中心的人民南路广场，我们宣告成立成都市青年自治会，我当选为主席。

老威：具体有什么组织活动呢？

李必丰：与北京大学南下演讲团接触；并去西郊的四川工业学院，动员学生参加5月30日的全球华人大游行；还开会，想组织敢死队去北京声援。凭着诗人直觉，我发表末日演讲，认为“民主的5月将变成黑色的5月”，引起部分学生的不满，甚至去派出所告密，说我是“台湾派遣特务”……

老威：你怎么预感到末日的？

李必丰：5月28号晚上，我睡在老毛招手像的脚下，梦见6个公安，手持警棍，凶神恶煞地喝问我：“干啥的？”一下子把我吓醒了——可没料到，6月4号凌晨，梦境重演了——我在同一地点昏睡至7点，朦胧中，先看见两辆救护车钻出若干医护人员，忙碌着；而后有几辆警车哇哇叫着冲到观礼台下，清场开始了，坚持在广场的几十个人都被带走。嘿，果真有6个公安沿观礼台阶上来，用警棍指着我问：“干啥的？”我出身冷汗，就答：“记者。”随即摸出《四川经济文汇报》的《记者证》。公安没查出破绽，我又漏网了。

这期间，有一件事令我至今内疚：我们通过与院长辩论，好不容易从四川工业学院带出了几十名学生，不料在成灌公路上游行时，被仁寿县XX酒厂的货车直冲进队伍，当场造成1死6伤，死者为该校食品工艺系女生沙洁——而交警在处理这桩特大车祸时，却指责学生阻塞公路，拒不拘留肇事者。

话说回来，我漏网后即去四川大学，找地下高自联报信，于是大批学生又去广场声援。我亲自蹬了辆三轮，充作宣传车，直驱广场。车上除了印刷品、喇叭，还有川大二年纪的一位女播音员。学生与警察对峙时，宣传车就插在中间，女播音员举着喇叭，

在我肩头上向敌阵喊话。可突然，一片绿森森的钢盔和盾牌冲过来，嘭嘭乱响，催泪瓦斯就弥散开来。我泪水长流地瞎撞，待眼前清晰，宣传车和播音员都失踪了。当时传言播音员死了，多年后才证实，她没死，只是被俘虏了。

我们都徒劳地扔了些汽水瓶子，但很快抱头鼠窜，差点连鞋都跑掉了。我们又满怀硝烟地去工厂动员工人，无效；再转回广场边缘时，碰到绵阳朋友杨伟，未及寒暄，一颗催泪弹击中我的屁股，我哇地一蹦三丈高，眼睛针扎一般疼。杨伟拽住我瞎跑，远远近近，全是棍子打人的闷响，许多脑袋被敲得鲜血淋漓。

我们目睹人民商场燃起大火。许多警察聚在那儿，有救火车，但没去救火，而是追打扔石头的行人。有个女娃在二楼窗里喊：“不准打学生！”一个警察就闻声把催泪瓶甩进去，只见一股腥红色的烟嘭地喷了出来。

四处狼烟，我只好又回到四川大学。高自联的人却警告我：马上逃，部队已占领科技大学，转眼就进入川大！他们提供了三轮车和一顶草帽，我又落荒而逃，回到街头，见到六四这天感人的一幕——6个居民老太太，跪在东风路中间，苦劝电讯工程学院的声援队伍别去广场：“全部都是兵，你们莫去送死！”

4号和5号，我都在大街小巷晃荡，部队和手无寸铁的市民和学生在进行拉锯战，许多人受伤，鲜血迸溅，我亲眼见成都五医院里躺着不少伤员，有个女学生正在抢救中。

人民商场的大火燃了很久，直到5号下午，我又转回来，还见焦梁断柱在冒烟。有个人从灰烬中捡了瓶高橙，却被围观群众痛打一顿，责骂他“发国难财”。

有人说，人民商场大火是隔壁人民东路派出所警察开枪引发的，他们甚至抵着人的胸脯抠扳机，激起众怒。大伙把固定栏杆的水泥桩子撬起，去封派出所的门，阻挡里头的警车冲出来。

6月6号，成都沦为一座兵营，大势已去，我们七、八条落水

狗就结伴逃往云南，其中有工人、学生和记者。我躲在昆明一个同学家里，喘息未定，又遇上6月8日公安局的大搜捕。于是从上海、北京逃亡至此的各色人等，重新结伙窜向西双版纳，到了景洪，再遭遇搜捕，大部分人被抓。我也落网，在景洪县看守所关了一宿，我坚称自己是记者，在边境一带体验生活，写报道，就蒙混过关。释放后，我重新联络了几个幸存的逃亡者，在缅寺雇了个和尚充向导，开始偷渡。

边防较混乱，我们过国界时还照了集体相，跟着进入原始森林，不久和尚失踪了。我从小腿快，加之逃命心切，所以在林子里猛窜了一会儿，就与其他同伙失去联络。我“哎哎”叫唤了几十声，也不见应，于是牙关一咬，透过枝叶判断过方向，朝南走。我起码奔了三天三夜，人都累虚脱了……

老威：这段历险，我在监狱就听你讲过。

李必丰：印象太深刻了。原来想象密林内有毒蛇猛兽，还买了把砍刀带着，后来也嫌重，就丢了。出密林时我躺在地上，稍远处，隐隐有缅甸村庄在阳光下闪烁。我眼泪一下子出来了，就顺着山坡朝下溜，直到屁股接触到一片旱地芦苇，才站起。我拨着一人多高的芦苇，哗啦啦地往前，走了几百米，突然出现了岔路口。

直觉告诉我，向右拐是正确的，而我却鬼使神差地直走。脑袋嗡嗡响，“向右拐！向右拐！”的声音老在回旋，可我还是不回头——这个意识无法支配双腿的情景，我曾经梦见过多次。直到树叶越来越密，迈不动脚，有一枝头还斜插进镜片，啪地扎了眼皮。我一痛一惊，方猛然刹步。我的耳边响起人声，听不懂，待我听懂“不准动”三个字时，已被包围了。

估计有七、八个人端枪指着我，“举起手！”又是三个字。我下意识地刚把双手举过肩头，蓦然看见一团红光冲着我——那是乌黑枪嘴上闪耀的太阳！汪地一声，我双膝一软，灵魂骇出窍

了，裤裆也尿湿了一大块。

待灵魂回窍，我已被两个人架着，双腿拖地进了一村庄。你猜怎么着？俘虏我的居然是四川老乡，70年代跑过去参加缅甸人民军的重庆知青！当时，人民军正在中国的支撑下，与政府军打游击战，所以虽是故乡人，他们还得遣送我。

我怎样哀求都没用，他们通过中缅百姓杂居的村子，把我五花大绑，交给边防武警。松绑后，8个武警列队，叉开腿，命令我从肉胯的通道钻过去。我不干，武警班长一起腿，我被踢飞起来，至少几米开外，才一个狗吃屎跌下来。裆内一阵剧痛——自此，落下了疝气这病根，夏天乘凉，稍不留意就漏出一大砣。

我差点没被打死。而后，哨所雇了辆拖拉机，把我双手捆牢，连一根长绳，在后面拖拉着跑。脸已变形了，衣服成了刷把，他们就这样把奴隶带回景洪，关在看守所。审问我：“烧了多少军车？杀了多少解放军？抢没抢东西？”我否认，他们嘲笑我：“哪你为什么越境逃跑？”

我还是那句话：我是记者，来边境体验生活，写报道，不慎迷路越境。他们搜出了我的《记者证》，竟意外地释放了我。

兜里揣着他们发放的1元钱释放费，我露宿景洪街头，走投无路，却不敢贸然去联络任何人。缅寺更不敢接近，因为和尚向导一旦暴露，问题更严重。我只好走回头路，过了澜沧江大桥，一天一夜步行到思茅，再爬了一个长坡，顺坡一下，又耗了一天，到了普洱。这其间，花1元钱买东西充饥，敲老百姓的门讨水喝，却没脸讨吃的。沿途都是芒果和芭蕉树，我爬不来树，偷不来东西，抛石头砸，累瘫了，芒果也不落下。芭蕉涩口，咽几口就头晕目眩，有中毒的感觉，所以不敢多吃。拢普洱，半步也挪不动了，就晃着《记者证》，死皮赖脸拦了一辆车，许愿到昆明再加倍补车费。

如此到了昆明，找到我的同学，他二话不说，就下了一洗脸

盆面条，我嗖嗖地吞下，才揉着肚皮，有了说话的气力：“报国无门，逃亡无路，我只有回家。”同学当即给了我几十元钱，让我住店一宿，再乘火车——可没料到在当夜 10 点钟，我刚出门，没走远，迎面就来了十几个便衣。

“李必丰？”

我点头。

“你被捕了。”

跟着，我被关进昆明西山派出所。

老威：你被抓抓放放了几次？

李必丰：景洪看守所就进了两次，虽然发现了我随身带的《成都学潮记实》，可还是放过了；昆明看守所关了 7 天，又放了，让我自己回四川。最后是在绵阳老家彻底栽的——审讯时，出示了我这一路的照片，同谁接触了，全记录在案，太悬了，幸好这长线没钓到大鱼。

我的同学受到牵连，关了几夭，教育释放；98 年我再度东窗事发，又去找他，刚从他家出来没几分钟，就被钉上了。我二进宫后，他被命令天天去国安局报到，工作也开除了。

老威：你兜了一大圈，耗了多少时间？

李必丰：我 7 月几号栽的，差点连脑壳也要没了。当时，成都东城公安局连夜提讯，追问人民商场被焚的细节，我吓出一头冷汗，晓得一旦定性为纵火犯，就死硬了。于是，提供了一连串证人名字。幸好天下有良知的人比较多，有两个书面证明商场起火时我不在场——这一定是父亲的亡灵在保佑。

我在收审所关了两个多月，定了性，就转绵阳市看守所。本来警方想以“成都市青年自治会”为题目，做成集团案，无奈证据不足。于是就以“反革命宣传煽动”治罪，我判 5 年，唐先全 3 年，杨伟劳教 3 年，刘家梦、刘应德另案处理。

老威：你在看守所关了多久？

李必丰：加上收审，总共一年多。

老威：里面的状况如何？

李必丰：自从坐牢，你一直在写作，我也是。受你的影响，我也描述了这段经历。有一次，我托跑巷道的贼向外头寄信，却被告密，我被整惨了。

老威：我在看守所挨过整，看守惯常的刑具是土铐、绳子和电警棍。他们怎么整你的？

李必丰：拳打脚踢，还把其他犯人提出来打，让我欣赏；使电棍烙舌头，一股青烟，一个跟斗；还端来一盆水，令我站进去，以电棍戳水，触电的波纹一翻，人就痉挛，向后一个倒栽。反复几次，就鼻青脸肿了。

老威：看来，各地狱警弄人都挺有智慧。

李必丰：我在自己的小说里，用大量篇幅记录了一个叫王某的变态女警察，她喜欢提英俊犯人出去，举行专场演唱会；还喜欢提着电棍巡视监房，只要发现门底有洗澡水淌出，就蹑手蹑脚拉开铁门，大吼：“狗日的，你不要脸，老娘也不要脸！”举棍直取全裸犯人的命根。入地无门，犯人越惨叫她越狠毒，两眼冒红光，还不由自主地哼哼。还有，每隔一两个月，她要领医生来检查性病，有病就一脚踢回来，没病就提取精液，不知派啥用场。

老威：怎么取法？叫大伙打手虫？

李必丰：自己当众弄不出来，医生就掐敏感部位。总有办法嘛。

老威：继续讲。

李必丰：1991年夏天，雨水密，涪江暴涨。你的《证词》写过狱中雨季：发霉、挨饿，我们更惨。有个晚上，正迷迷糊糊，却梦见蛇在舔我的脚板心，本能地一缩，却溅起一片水花。我惊叫一声跳起来，原来洪水已淹上床铺。众犯睡在水里，逃跑无门，大伙一齐呐喊：“开灯！开灯！”可平时通宵通明的灯却没了，

大伙漆黑一团地搅着水，没人敢挪半步，因为一跌下铺板，就陷入灭顶之灾。

放风天井的水已三米多深，我们垫起脚，避免水进嘴巴。此时听见门响，一个警察游泳进号，指挥大家手牵手地转移。一直折腾到天亮，我们脱险了，水还没退。

我们被转押至收容遣送站，一间号房约 15 平方米，却塞了 70 多人，肉贴肉。雨过天晴，盛夏的毒日头一出，号内热毒蒸腾，许多人的嘴像缺氧的鱼一般开闭着，太可怕了。

下午，看守所的水抽空了，我们又转回原地，满号的稀泥浆子，没法弄，人都变成赖蛤蟆了——将就着活下去吧！

不久，高院的裁定下来，维持原判，我被送往南充的省一监狱劳教。

插记：

李必丰在四川省第一监狱“改造”了 1 年多，由于会写诗，得到一位爱好诗歌的女警察的赏识，被分派卖小百货，日子好过起来。他还结识了民运战友杨伟、倪凯波等人，“杨伟当时不满 20 岁，做仓库保管员，却出其不意地往监狱生产的羊皮手套内塞纸团，提醒这是劳改产品，希望顾客不要购买。结果，一批价值 200 万的货从香港市场被退回。狱方轻而易举就查出内奸杨伟，于是恼羞成怒，倒吊他几天几夜。”

李必丰还见着了六四期间入狱的“打、砸、抢”暴徒，都是普通的成都市民，由于声援学生而对抗军警，下场是死里逃生，却被重判死缓、无期或十几年。“暴徒”中不乏根正苗红的共产主义接班人，甚至包括川绵一厂的团委书记。

对于我，李必丰提供的极有价值的见证，是他亲眼看见我访谈过的冤死者杨继年²，“那是 91 年秋天，我跟政府去监外进货，见一个乞丐跪在大门口，一声高一声矮地吆喝，求人民政府继续关押他：‘坐牢至少还有张床，还有个房顶盖着，一放回家，连块瓦片也没有了。’

“回舍房一打听，才晓得这个杨继年很出名，他 11 岁坐牢，关了 34 年，放回去却无法糊口，所以一门心思要重返监狱贡献余热。”

1992 年 10 月，李必丰、杨伟等煽动类反革命被转往位于川东大竹县的四川省第三监狱。不久，我也从重庆郊区的省二监转了去。于是，六四的难友圈急剧扩大，从四川各地陆续转来的 20 余人都集中羁押在 2 大队。

2 大队一楼一底十几个囚室，加上篮球场大的院坝，装了近 200 犯人。我曾在这儿接触过中共建国以来的不同时期的反革命犯：会道门、暴动、封建迷信、土皇帝、潜伏特务等等，形形色色，这为我日后完成《证词》及《中国底层访谈录》积累了较丰富的原始材料。

因背景原因，六四犯与其他犯常有龃龉，但至少我在的时候，大环境还比较宽松。狱方响应邓小平南巡讲话，“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变着法子赚犯人的钱。我与李必丰成了伙食搭档，日日享用高价“大肥肉炖萝卜”，把脸蛋滋养得红扑扑的。我还学会了吹洞箫，还在逢年过节时，以高墙电网为背景，照了不少高价相。

我拍摄的一张政治犯集体相后来成了海外竞相刊登的抢手货：两排六个人，一律着囚服，大背手，面目深沉，如抗大学员。我没料到此事引发了地震般的连锁反应，1994 年初夏，我开释几

² 杨继年案，见廖亦武《中国冤案录》2001-2003，劳改基金会 2005 年出版。

个月之后，李必丰说：“狱方突然袭击，将六四这伙人集中控制，然后从身体到铺位，探雷一般仔细搜查，把我们所有的照片、家信、文稿都缴了。此后，照相被禁止，我们被化整为零，分散在各大队的刑事犯中间实行严管，一举一动都不自由了。”

我深感歉意，李必丰却摇头：“谁也没埋怨你。因为露露脸，也算给外头一种提醒，总比付出了代价却无声无息强嘛。”

然而，1994年7月4日，美国的国庆节，李必丰，一个普通的政治犯却无声无息地刑满释放了。像成千上万同种类型的政治犯一样，他被警车专程押送回老家，移交给当地派出所，接受法律规定的“剥权期管制”——如此种种，海内外至今不见任何报道。

老威：你出狱不久，我去绵阳丰谷镇上看你，还在你家乡的河里游过泳。当时，你似乎在社队企业打工，整天早出晚归……

李必丰：我想躲你，过一段平静的日子。因为家里人像警察一样，把我看管得很严。况且，我女朋友等了5年，不能再让她受累了。

老威：跟我出狱的状况差不多。

李必丰：你出狱就离婚，而我匆匆结婚了，有了孩子。本来，我规规矩矩，不再想入非非，政府也渐渐放松警惕。可是你来了，并且住了一个多星期，太扎眼，人家又以为我们在策划啥阴谋。特别是，你还爬上丰谷镇背后的小山，观察地形。镇上的天主教堂正在拆，你也天天赶去看，嘴里骂骂咧咧的。

老威：我骂骂咧咧什么了？

李必丰：忘了。总之你前脚离开，警察后脚就登门了，把我弄到派出所，逼我交待。我无名火冒，就吵起来了。此后，我不断地被骚扰，生活全乱了。家里都埋怨我，而我，无法与任何人交流，在父母家里却有寄人篱下的感觉。为证明我的确贼心已死，

我就结婚，搬到永兴，住我老婆的单位宿舍，很小一间屋，身子也转不开，煮饭就在楼道上。也许我天生面相不好，眼珠子贼溜溜的吧，即使见着警察只点头，不说话，人家仍疑虑重重。我被派出所呼来唤去，蹂躏得不像个人了，就产生了逆反心理：都啥时代了，还搞阶级斗争，还监视“四类分子”吗？于是又去成都，钻入大学参加一些社会改革的座谈。

老威：你还到我家，替我用《易经》算命。

李必丰：你，还有汪建辉，除了写字，就对算命感兴趣。

老威：占卦是为了心里有数，有方向感，不至于像你，无头苍蝇乱撞。

李必丰：我的腿虽然野，但没乱撞。1995年夏天，当我听说绵阳的民运人物余XX从深圳逃跑，就动心了。当时，我的儿子出生不到100天，贫穷，加上被“关照”，我太绝望了，就与老婆商量，去搏一搏。她同意了。我立即动身去深圳，拢中英街，像个蹩脚的游客，边走边东张西望。叫武警发现了，命令我过去，查《身份证》。我强作笑脸，可腿肚子已抽筋了。不足3分钟，武警就让我进哨所；他打了个电话，不足3分钟，又让我上中队。跟着，我被关进沙头角派出所。此时，绵阳警方已在罗浮区公安局等候，我连资本主义的地皮都没踩着，就又回来了。

老威：你有渠道吗？这么瞎闯？难怪有人封你为“民运圈里的行为艺术家”。

李必丰：圈内朋友让我直接去，有人在沙头角桥头接应。我手里拿了张报纸，作为接应暗号，可我转来转去也不见同志。却迎头碰见我的高中老师，我愣了一下，就招呼：“王老师，你咋在这儿？”

事隔多年，我才听公安局内部的人闲聊，他们是一路旅游，跟踪我去越境。幸好身上没带任何嫌疑物品。这次我只以“偷越国境”的罪名被拘留15天，出来后，政府再次重申，外出必须事

先汇报。

为了让他们放心，我就去一个朋友公司打工，做过几天部门负责人。这期间，国内民运比较活跃，北京上书请愿频繁，刘贤斌等人也在成都公开活动，经常在四川大学参与讲座。重庆的王明也来串联，要搞《公民自由宣言》，可没露几次面，大家在西南民族学院的窝子就叫警察端了。我算倒霉，偏偏耳根子软，受人邀约去歇脚，刚躺下，警察就敲门。这次抓了好几个，我和王明都进了铁笼子，审了个通宵。天一亮，我们被弄出户外拍照。我心里咯噔一下：“糟了，拍照意味着验明正身，要劳动教养！”

老威：你没把柄吧？

李必丰：当时我兜里揣着一份致香港同胞的人权宣言，谈 97 回归的骗局。我曾瞅空子把这罪证丢出窗外，不料又叫警察给捡了回来。你曾在《证词》里说：“这年头，写作就是制造罪证。”我一次次临阵毁灭罪证，几乎都不成功。

我再次被押回绵阳，很意外，关几天就释放了；而王明被劳教 3 年，他第一次坐牢 5 年，才自由了两年，又二进宫。

这次事故导致随身的若干公司资料被没收，我失去工作，就邀约熟人张姐去成都北门大桥开“泉水鱼”。本来生意还过得去，可一帮吃不起饭的民运朋友天天来，有的干脆以“出谋划策”为名，住在饭馆里了——这一搅，警察就找麻烦。我记得关门大吉的那一天，你和老汪来白吃，顾客点了鱼，我也不卖，因为最后一条鱼要孝敬落难朋友。

老威：在我的印象中，你始终是“来无踪，去无影”。

李必丰：我们这类人都没安全感，做梦都在逃。

老威：你一年有多少时间呆在家？

李必丰：几乎都没在家，如果我在家稍久，老婆孩子反而不习惯。

老威：真他妈不是人。

李必丰：对，不是人，是民主的困兽。

老威：终于又进笼子了。

李必丰：文学创作的同时，我也搞一些民生调查。在绵阳地区，老国营企业处境维艰，你晓得长钢工人几个月没领到工资。绵阳丝厂濒临倒闭，可厂长不是东西，居然抱着职工们的住房集资款去成都炒股票，结果亏了，血本无归。这一下激起众怒。闹事那天，有人在厂内黑板上公布消息：“冯市长今天要来解决我们的吃饭问题。”可工人们耐心盼到上午 10 点多，连市长的影儿都没有！于是群情激愤，4000 多人吼叫着涌出厂门，将门外的川陕公路扎断了。跟着，事态扩大，绵阳绢纺厂等几家企业职工也呼着口号，前来声援。10000 多人顶着毒日头静坐路中，交通堵塞达几个小时。当然，专制政权解决社会冲突的手段只能是暴力，警察出动了，抓了 200 多人，并且通过绵阳电视台发布在高新区实行宵禁的通告。

有人把这起事件捅了出去，国际社会极为关注，于是当局陆续放人，可仍然有 80 人被扣押。1997 年 7 月 16 日，《绵阳日报》登载了市公安局局长任某答记者问，为“骚乱”定了性。我读罢义愤填膺，就连夜给国际劳工组织写了呼吁书，并要求彻底放人。我将文章传真给美国的“中国人权”，很快，联合国的调查小组就下来了。

老威：后来呢？

李必丰：工人全部释放了，警方气得发疯，就来抓我。

老威：你在外头逃窜了大半年吧？

李必丰：先在重庆的难友家躲了几夭，杨伟来了，领我到广州。可等来等去，“人权观察”的人又在电话里说香港吃紧，去不了；无奈折回，再去云南中甸边境晃了一圈，有人传话，偷渡得自己想法，在泰国清迈才有人接应。他妈的，就这么耗。

老威：我猜各地警察也不是太卖力，否则你早落网了。

李必丰：的确。重庆和成都警方都曾通过第三者传话，要我别在他们眼皮下晃。

老威：你为啥不跑远点？

李必丰：一言难尽。我与中国人权一直有联系，刘青说要资助我一点钱，办“下岗工人培训中心”。思前想后，种种收钱渠道都不安全，于是，我就在 1998 年 3 月 8 日，天麻麻黑的时候潜回家，要找老婆的表哥（当地邮电局长）设法。

刚入税务局大门就被人发现，可我还是硬着头皮上三楼，闪进门。老婆猛吃一惊：“你回来干啥子？”我在她耳边匆匆交待了事情，就转身要出去，可娃娃却突然抱我的腿，哭出声来：“我要爸爸！”

我真是肝肠寸断，因为这是娃娃平生的第一句话！但没办法，我只能狠心扳开他的手，红着眼圈出来了。从进门到出门不足 10 分钟，但我下楼时眼皮剧跳，赶紧出街喊了辆三轮，上公路又换了出租车，没讲价，就叫往成都方向开。

几十米开外就是收费站，十几个武警荷枪实弹候着。出租车还没进站，两辆警车就夹过来。我刚探头，就被拽出来，手铐咔嚓一响，我被捕了。

老威：又是人赃俱获？

李必丰：对，我落网 10 余次，都是人赃俱获。接着，在城郊的 208 招待所过夜，再转到江油市看守所。由于是个案，我自然“供认不讳”。但这次，当局没有以政治定罪，而是四处网罗污点证人，以“经济诈骗罪”判了我 7 年。

老威：当时你老婆找到我，一定要请律师。于是我与正大律师事务所商量，分析来分析去，认为这是上面定的铁案，有没有律师，结果都一样。可是你“执迷不悟”，就满足你吧。

李必丰：其实经济罪名根本不成立，因为绵阳九院把一批保险柜寄存在某公司，而我只在里面打了几天工，签了个收条而已。

但政治案以非政治手段解决，已逐渐成为他们的策略，比如刘水嫖娼案，许万平白粉案等等。

老威：判刑后送哪儿？

李必丰：老地方。

老威：省三监狱？

李必丰：对，关了几个月。1998年1月17日，才将我转到川西的雅安监狱，两地相距近千公里。我被拖垮了，尿血，手指头也滴血，脸色跟死人差不多。有一天，我吃完饭刚起身，就突然昏了过去。我住院几个月，担心活不出去了，才给汪建辉写信。老婆也在这个时候提出离婚，为了孩子，就依她吧。

捱到2003年，我在监区碰到一个熟人，摆了10分钟龙门阵，却被人打小报告。于是第二天大早，我被转到20里外的名山监狱。

老威：里面的情况如何？

李必丰：犯人的状态与三监大同小异，生产机器配件，工种有金工、车工、铸造等等，劳动强度大，很惨。而我大部分时间都病着，临出狱，才通过营养和锻炼恢复了一点。我创作了几百万字的诗歌、小说、戏剧，但大部分被搜走，我想通过回忆重写一遍。

老威：我有体会，重写的难度更大。

李必丰：逃跑，坐牢；坐牢，逃跑，转来转去，我就这个命。我不断在写“命”，可“命”到底是什么东西？目前，我娃娃9岁多，正需要钱，需要安稳的父爱，可我一无所有。

公安局安排我去保险公司，他们说：“你不是有宣传煽动的特长吗？那就用在正道上，去挨家挨户推销人寿保险吧！”

老威：我出狱时，公安局还替找铺面，让我去卖服装呢。

李必丰：两三个月过去了，我一份保险也没弄出去。40多岁了，还白端家里的碗，脸皮厚啊。我目前的出路就是写，争取在海外发表和出书。

老威：你写时评吗？

李必丰：写不出来，也不感兴趣。

老威：我熟悉你的诗歌和小说，要靠它们糊口比较困难。你在诗中骂上帝是：“天上的老地主”，一心只想“用太阳的金币收买人类”，谁懂？

李必丰：你懂。

老威：可我，给不起价钱。

附：李必丰的诗作

诗

你是
我头颅里蠕动的虫子
自由在高墙外面
爱人在高墙外面
儿子在高墙外面
母亲朋友都在高墙外面
我在监狱里
你在我的血液里
尽管蠕动的虫子让我烦躁
可你从我的里面为我疗伤

和尚明德



和尚明德

采访缘起

有的人，是天生注定要做传奇人物的。

譬如我这次要写到的和尚明德，就曾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的诗歌江湖上，号称“马贼”。

马贼祖籍贵州，1960 年出生于四川省大凉山的雷马坪劳改农场，父亲是根正苗红的管教干部，效忠党的劳改事业，与成百上千的苦役犯打了大半辈子交道，却没料到自己疼爱的小儿子也长了反骨，最终由一个流浪汉诗人堕落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1986 年，他北上兜售地下诗歌杂志，不料正撞上学生运动风起云涌，马贼热血上头，曾在北京大学等高校朗诵诗歌；也曾混迹于大街上的游行队伍，领呼要自由的口号，不幸被挡获。有关部门迅速甄别，虽此贼身段矮小，面貌稚嫩，但不是学生，也无正式的工作单位。

当时还没有自由职业者这个称呼，所以马贼作为最早的“三无人员”之一，其混水摸鱼的事迹上了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由于是小人物，不配被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国家喉舌点名，因此就以“一个来自贵州铜仁的流窜了十几个省的社会闲杂人员”代之——到了1989年，更大规模的学潮席卷全国，“闲杂”一词通过国务院总理李鹏之口，确定并扩散，沿用至今。

闲杂先驱马贼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的罪名，被判刑3年。1990年出狱，流窜的恶习不改，身无分文，豪情万丈，常把大好河山当做自家的庭院。有鉴于此，我在《中国底层访谈录》的某篇中记载过只鳞片爪：“圆明园画家村来了大帮不速之客，搭张桌子在外面狂饮免费啤酒。其中有个矮个子，频频起立，拧着啤酒瓶到处找人碰。遇见我，打雷般连吼：‘久仰！’‘诗人马贼！’朋友介绍说。但见此人浑身上下涂满花花绿绿的绘画颜料，腰间扎一草绳，一顶旧军帽翻戴，帽前写‘超越！超越！！’帽后写‘突破！突破！！’八个大字赫然醒目，吓坏了周围的绅士淑女……”

时为1994年10月，我刚出狱不久，终日以吹箫卖艺为生，落魄也如一头饿狼，于是与马贼相见恨晚。至今记得他率领五匹狼，挨户敲门向穷画家们叫卖我的《萧和啸》的动人情景，一盘成本两元五毛的黑磁带，售价为20元，竟没人敢还价。

光阴荏苒，打个盹就翻过了世纪之坎。某一天，我爸爸从自由亚洲电台收听到一起“颠覆国家政权”的集团案，其首犯居然是诗人马贼！据报道，这帮反革命分子还制定了政治及文化纲领，在地下刊物上发表了《宣言》，马贼因此被判刑5年。

我大吃一惊，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啊，一个糊涂虫诗人居然学会制定纲领和宣言了！我当即向老父亲表示了哭笑不得的心情。不料爸爸反唇相讥：“你不也是反革命集团的首

犯么？”

又打个盹，马贼就被淡忘了，因为贵州诗人坐牢的大有人在，像元老级的黄翔，坐过六年牢，仍不见得有多清醒，而马贼虽与老黄有相似的癫狂，名声却小多了，或者谈不上有何上得了文学史的名声——直到 2005 年 3 月底，我在云南客居地和贵州画家片山不期而遇。

马贼从记忆深处浮现出来，仍旧披散着长发，肩头倾斜，吼叫着诗句。然而片山说：“马贼在鸡足山出家了，如今的法号叫明德。”

“是么！”我被冷不防地骇了一跳。

“我先出家，由于孩子还小，舍弃不下，就还俗了；马贼随后上山，与我是同一个师傅。他修行的根基比我牢，悟性也高，正式剃度才一年多，就受了比丘戒，目前称明德师。”

“我与他 10 年没见面了。”我还有些魂不守舍，“没想到……”

“我与你也 10 年没见，”片山感慨道，“大家都变了。比如你老威的长相，胖了，圆润了，两眼隐隐有慈悲透出来；而我和明德师也经历了一轮循环，寻着了归宿，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我应和道。内心却涌起寻访明德师的强烈欲望。

鸡足山位于云南宾川县境内，为汉传佛教的五大名山之一。据片山介绍，从山脚到山顶，原有 72 座庙，36 座庵，香火非常鼎盛，却不幸遭遇了文革等历次政治运动的浩劫，驱僧焚寺。终于仅存残垣断壁，荒蒿孤魂。“邓小平掌权，落实了宗教政策，山上众寺才得以在原址上重建，但由于资金、材料、工匠等问题，规模已大不如前。”

“没人把这灭佛兴佛的过程写一写？”

“出家人遵纪守法，不与世俗政权对抗。你打人，我念阿

弥陀佛；你烧寺院，我也念阿弥陀佛。文革中，曾有一位高僧大德自焚护塔，后来众僧就一遍又一遍念经超度他去西方极乐世界。”

我刚要继续追问，片山却转移了话题：“你应该见见我师傅，真正的大德，有不少文化人通过他皈依佛门。曾有一位像你这样的艺术家，一两个钟头内向他提了100个问题，他都圆满地回答了。”

2005年4月15日上午，我和金琴、吴闯三人，带上录音录像设备出发。先乘长途客车到大理，然后转车，抵宾川县城，在一家清真馆子狼吞虎咽了一顿，又继续赶路，天黑尽时才拢鸡足山脚。我们一问门票，每人62元，感觉肉疼，我就用吴闯的手机给明德师打电话，几经周折，到底通话了，明德的声音低沉而平静，似乎当年的一切已灰飞烟灭矣。

他的点拨与我们逃票的念头不谋而合，于是在山门外寻了一家下等旅舍住了。由于被子散发着浓烈的脚臭，我虽然疲惫之极，却几乎彻夜未眠。后来这种惧臭本能遭到吴闯的一再嘲笑，认为“底层作家的嗅觉终于贵族化。”

访谈这种文字形式我已经用了十余年，与马贼即将久别重逢却使我首次产生映像记录的冲动。我把想法电子邮件给美国的北明嫂子，她回信强调在现代社会，映像记录有时甚至会超越文字。她谈到一个记录片，主角是柬埔寨人，是波尔布特政权种族清洗的受害者。他刚从大屠杀的血腥烟雾中逃出来，惊魂未定，此刻却坐在一只机动木船的船尾，面对摄像机镜头讲述着。脚下是时急时缓流淌着的湄公河，背景是瓦蓝的天空和两岸的丛林。马达声，柴油的烟尘飘升着，绕过讲述者的耳际，而镜头却一动不动，死盯着那一张幸存的、尚未摆脱死神的脸……

这一宿，我反复咀嚼着北明的信，并且通过咀嚼，看完了

不止一个人的记录片，天大亮了，我抹了把脸，匆匆检点行装，
三人就一道上路了。

2005年4月16日早上8点左右，我们用罢早餐，在寺前村花50元钱，雇了一位70多岁的老村民作向导，就开始穿行密林。吴闯短衫短裤，一腔豪迈地走在前头，却时常因误入岔道而沮丧折回，大家的合力嘲讽仍不能阻止那种东北人自以为是的莽撞。我骆驼一般驮着大包行装，和金琴亦步亦趋跟在老人背后，流了许多汗，却没感到有多累。老人戴着老花镜，因读过私塾，所以说话走路慢条斯理，犹如在自家院子散步，我们在横穿山腰时，路过了三四处庙和庵的遗址，老人说，都是58年大炼钢铁和文革时毁掉的，能否恢复，就看有没有大老板投资了。老人还指着一塌了半边的庙顶介绍，曾有两位和尚在里面上吊自杀，犯了出家人的忌讳。

一直爬山，一直在密林里走，终于到了山梁，风如海潮一般，漫过山谷和树梢，呼——！呼呼——！！呼——！来了又去了。“好风！”我叫道。不觉歇步，抽出箫，由着风声，信口吹了一阵。吴闯急忙操机就开拍。

下午两点多钟，我们抵达千丈悬崖之下的寺院。外貌如一幢普通平房的大殿里传出诵经之声，我未及放下背包，就奔过去，刚从门外朝里一瞅，一个粗眉大眼的灰衣和尚就从门坎跨出来：“老威！”

我按捺不住地叫：“马贼！”

“阿弥陀佛。你们稍等20分钟，待我下课休息再安排。”

20分钟后，明德下殿，他挽起僧袍，大踏步地赶来，这和周围出家人气定神闲的步态对照鲜明。随后，除了两个旧友的紧紧拥抱，其它都按寺院的规矩进行——叩见知客师；向大乘佛教净

土宗的三祖师（即光明善导和尚、龙树菩萨、天清菩萨）顶礼；用素餐；拜会寺院住持法师。其时，45岁的法师正与28岁的藏地活佛辩经论道，有一些居士散坐旁听，氛围轻松，犹如一个大家庭。

大约五点钟，功课告一段落，明德和他的师兄赶来拜见师父，极为虔诚；师父微笑指坐，我趁机将话题引向他，并在众人笑过一阵之后，向师父提出访谈明德的请求。

师父道：“文人多年不见，访谈是自然的。”

明德合十请道：“弟子不知哪些该讲，哪些不该讲。”

师父道：“我不管你该讲不该讲。”

于是在当晚，明德破例没上晚课，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和拍摄。紧接着的17日和18日，我们又在镜头前交谈了4次。其间，拍摄者吴闯曾插话若干。

老威：我们还是从头说起吧？

明德：哪是头哪是尾呢？

老威：当然，在六道循环中，人生是没有头尾的。那我们就从童年说起。

明德：我的记性比较糟糕，眼下能想起的，就是我的一个姨娘，打着一把花雨伞，在田埂上走。那时我大约五、六岁，觉得她的影子挺好看。我的童年一直在流动，沿着铁路线，因为我爸爸的单位是流动的。

老威：你爸爸是干啥的？



廖亦武与明德在寺院重温往事

明德：我父亲祖籍贵州，世代务农，50年代搞土改，阶级成分划为下中农。由于在斗地主中立场坚定，积极靠拢党组织，就受到提拔，走出大山沟，考入公安警校。毕业后分配到四川省大凉山的雷马坪劳改农场做管教干部。在60岁退休回贵州之前，他几乎天天与劳改犯打交道。

老威：雷马坪在劳改系统名气很大，十几年前，我在重庆市看守所时就听说过。

明德：地盘极大，有两万多犯人，不知算不算四川最大的劳改农场，由于地处雷波、马边、坪山之三县交界，所以叫雷马坪。

老威：你算监狱里长大的孩子，你还记得里面的情景吗？

明德：比较模糊。因为父亲总是带领那些被关押的人在野外修铁路。

老威：劳改犯可以在“野外”工作？

明德：严格的说，是些刑期满了却无法回家的人。

老威：就业人员吧？

明德：对，是刑满后，被强迫留下来的就业人员。在农场，除了犯人大队，就是就业人员的施工队，可以在外面揽活，增加农场的经济收入。我父亲带着这些人，餐风宿露地修铁路，我们作为干部家属，就随着他，几年中迁了好几个工地。

老威：你在哪儿读的书？

明德：从凉山州迁移到宜宾一带，我就在宜宾一带上工地附近的乡村小学，与农民孩子混。我觉得这种童年经历造就了我朴素的本性，因为接近自然的孩子比城里的孩子要简单些。听父母讲，在两岁时，我就干了件惊天动地的事，那年父亲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得了一支大号红星钢笔……

老威：就是笔尖上点了纯金那种？

明德：对，在文革前，那是中国最昂贵的钢笔，价钱相当于父亲一个月的工资。而我却用钉锤，把这象征荣誉的奖品一点点

砸成了粉末。当然，笔尖是金的，成不了粉末，但我也极有耐心地敲平它。当父亲回家寻笔不着，却在地上发现残骸时，浑身都气得哆嗦了，他捡起薄如纸的笔尖端详了一分钟，由于又要去开会，来不及收拾我，就狠狠地瞪我一眼说：“回来再收拾你！”

我被吓坏了，就离家出走，沿着山区的崎岖公路，走了四、五公里。60年代的公路很窄，坑坑洼洼，并且还有带拖斗运原木的大卡车来来往往。而一个两岁的步子还不太稳的孩子，却在这种极危险的路况中，摇晃了几个钟头，抵达一个叫西宁的小镇。这是凉山州的一个不起眼的乡镇，我趴在镇头的石桥栏上看脚底的水，叫父亲队里的就业人员发现了。这人的名字我至今记得，叫谭少轩，是从山上下来采购油盐和蔬菜的，他远远望见会计的儿子，就跑过来捉住我问，两岁的孩子自然什么都不知道，他就把我放进箩筐，另一只箩筐放生活日用品，然后用一根扁担挑了回去——这段儿时记忆后来成了我闯荡江湖的原动力。

老威：你父亲的专业是会计？

明德：是。后来我参加文革后第一次高考，差3分落榜，只能读中专，学的也是会计。

老威：你出家后也任会计，算子承父业了。

明德：寺院里的会计和父亲那种单位的会计是两回事。

老威：你在凉山州待了多久？

明德：呆到六、七岁，就出来，随铁路工地迁移，12岁又回到凉山州。当然，作为整体的劳改单位不变，可我们一家总是跟着父亲，从一个队到另一个队。有些情况我不能对你透露，因为出家人不与世俗政权对抗，况且寺院需要安宁。

老威：我能理解。

明德：我的家教很严格，我7岁时，曾私自拿了家中的7分钱，去买了几根生黄瓜，分给哥哥妹妹吃，被父亲狠狠揍了一顿。

老威：你父亲脾气有点坏？

明德：可能与他的工作有关。他了解许多人是如何犯罪的，所以对未经允许，擅自动用家里和他人的财务这种错误，从根上就要杜绝。这对孩子以后的人生大概有益处吧。

时间之水不间断地流淌，可剩下来的儿时记忆只有零零星星。跟着就是高考差 3 分落榜，遭遇了挫折。我对文学着魔是上中专的时候，天天跑凉山州图书馆，通宵看中外名著，我当时是团支部书记，就把这种超级课外热情传染给同学，引起老师和领导的不满，想撤我的职，但群众不答应。

老威：你这时开始写诗了？

明德：上中学就写诗，高中时，我给暗恋已久的一位初中女生写求爱信，把人家吓哭了。那时候校规不能谈恋爱，过了一个多月，她的母亲把我的情书上交到劳改农场，那边追查到子弟校，幸亏我已毕业了——这场单相思弄得我灵感大发，可能写了上百首诗，至今却一句也记不住。

中专毕业后我曾在四川雷波县商业局和贵州铜仁县劳动局做会计，文学梦想令我厌恶写写算算的铁饭碗，于是就辞职出来闯荡江湖，身无分文地流浪，尽可能去多经历一些人和事。

老威：这也算上个世纪 80 年代的文学风气，遍地都是诗歌流浪汉。当时我住在四川涪陵，一个极其炎热的船码头，却经常有你这样的家伙敲门，一进来，递上某一诗歌老大写的简单路条，打个拱手，就一屁股下去不动了。这一来，我就得酒肉招待许多日，去时还得奉上微薄的路资——我家客房曾有五、六个人同时打地铺——当然，我离家流浪也享受同样的待遇，80 年代的车船票很便宜。

明德：我是混火车的高手，从不买票。查票的来了，别人像鸡鸭一样躲，我却镇定地站在原地，一问票就答没有。问为什么没有，就答诗人没钱，又想坐火车游遍祖国大好河山，积累些灵感。在那个年代，这个理由是能得到人民拥护的。接着列车长会

出面，提些文学问题，直到确认我不是冒牌货。

我一生下来就随父辈跟铁路打交道，所以上车，就如鱼得水，运气好，吃喝也混。即使被撵下去，也能保住诗人的尊严，没挨过揍，还能这号车厢下，那号车厢又上。四川我 86 年以前就去了，在万夏家里喝过酒，“马贼”这个绰号就是他送的，当场就乱糟糟的叫开了。我是南方人，却喜欢说自己是北方人民的儿子，因为北方人豪爽，喝酒干脆。西藏、新疆都是那时候去的，都呆了一个多月。我还进过西海固，就是张承志在《荒芜英雄路》中写过的村庄。睡在马槽旁边，裹着草，冷得丝丝发抖，但瞅见穆斯林顶着寒风，在稀疏的星光下走向礼拜寺，就莫名其妙的感动……

老威：这就是你最早的宗教情怀？

明德：文学情怀吧。在接触到佛之前，我对天主教和基督教都有强烈的兴趣，直到今天，我也认为耶稣是了不起的菩萨，并为他那种博大的救世精神所折服。我多次出入教堂，划十字，聆听圣诗的合唱，但我还年轻，有热血，有脾气，还是想惊天动地一番。

老威：于是就出了 1986 年的那件事。

明德：虽然出了那件事，但我不懂政治。哪怕写过许多政治抒情诗的贵州元老级诗人黄翔，对政治也一窍不通。他坐了六次牢，现在流亡海外，可他人生中的所有重大事件都是诗歌事件，比如组织“天体诗团爆炸”之类。

老威：你与黄翔有相似之处吗？

明德：他是大诗人，1984 年我乍一听说就如雷贯耳了。而我是行为主义诗人，许多人都认可，比如黑大春和俞心焦就一再说，马贼的行为就是诗。有一次，我们一伙人到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去宣传诗歌，当挤进学生食堂，里面有两三百人，个个都是自大狂，谈天说地，喧哗打闹，没谁在乎我们的存在。诗朗诵不下去了，

我就一时兴起，脱下油腻的老棉袄，挽在膀子上，轮几圈呼地飞出去。但见老棉袄如飞毯一般，贴着密密麻麻的人头陡然而起，旋过了整个空间，落到对面去了。所有人被惊呆了，食堂里转眼鸦雀无声，于是我打雷一般吼：“贵州诗人的大作，你们快听！”

观众回过神，对我的杂耍报以连环雷一般的掌声，诗歌宣传大获成功，这一行为艺术通过众哥们的添油加醋，在江湖上传为美谈。

老威：你的行为艺术代表作应该算 1986 年那件事，江湖上流传过若干版本，其中之一是，你在那年冬天去北京大学食堂朗诵《狼与梦》，拿出吃奶的力气上窜下跳，赢得阵阵喝彩。你在台阶上望见从天边涌来的人脑袋，心潮澎湃，一下子觉得民主革命的时机已成熟，就抖一抖浑身的野毛，开始发表推翻专制的演讲，煽得群情激愤。你就趁机振臂一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同学们跟我走！”

于是你昂首挺胸，脑门扎红布带冲在前面，领唱着《国际歌》：“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真是一呼万应，队伍越来越庞大，终于穿越校园的林荫道，突破校方的劝阻，冲出大门，涌到街上。“要民主，不要独裁！”“废除终身制！”“自由万岁！”口号声此起彼落，惊动了警察，可在围观者组成的人墙前，全副武装的警察不敢公然镇压，只好改变策略，维持秩序，但对许多企图混迹学生游行队伍的闲杂人员却毫不客气，又打又抓。你这率众爱国的自由神就这样落网了，由此引发了导致总书记胡耀邦下台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你的事迹还上了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

明德：这个版本有一些混淆。首先，我是为了交流地下诗歌报去北京，会了不少诗人，也在北大、清华等地朗诵、喝酒、混日子。当时大学里文学社团多，气氛活跃，特别是胡耀邦在作家大会上公开说：“自由化不提了。”深得民心。我的朗诵事件（包

括黄翔在京的朗诵)就在那种气候下发生的。稍后我去了上海,与一帮地下诗人混,感到气氛比较平静,不太过瘾,刚好从电视节目上感觉到北京的“山雨欲来”,神经就兴奋了,觉得自己在诗歌上影响不大,干脆去凑一把热闹。于是打点行装回到北京,一下子就撞上游行,我自然混进去了,但此次落网离上次朗诵诗至少间隔3个月。

老威:你领呼“反动口号”了?

明德:激动过了。

老威:什么口号?

明德:既是出家人,就不用再提了。

老威:当时的《人民日报》上怎么说的?一个社会闲杂人员混进学生队伍吼反革命口号?

明德:我已在牢房里,所以对事情的进展不太清楚。以后才听朋友讲,我的光辉形象上了中央电视台,我成了“社会闲杂人员”,还戴着手铐当众签字。大概政府把没正式单位的人都叫“闲杂”吧。

老威:在1989年学潮中,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公众场合也一口一个“闲杂”,这个中国特色的名词一下子就流行开了,但只有我等地下诗人才晓得,它最早来源于诗人马贼。

明德:我自认为不是搞政治的,所以气坏了,在北京XX看守所审讯两个月,我几乎不说话。大半年后我被正式判了3年刑,押送回贵州,在凯里监狱服完了刑期。

老威: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的罪名?

明德:阿弥陀佛。

老威:请了律师吗?

明德:流浪汉哪有钱请律师?况且,我看过许多诗和小说,觉得诗人坐牢也是一种体验。我经常笑,审讯人员不晓得为什么笑,其实我在想父亲,他就是管劳改犯的,如今自己儿子要劳改

了，不知他怎么想？

老威：牢里的状况如何？

明德：在文学时代里，诗人坐牢待遇还可以，没挨打。至于其它，我本着出家人不议论朝政的原则，不便谈。总之，那里面没有诗情画意，我自小在劳改场所长大，本就能懂得适应环境，老实劳动。

老威：没写诗？

明德：一句也没写。

老威：没打架？

明德：无架可打。

老威：你那么早就修炼到家了？

明德：在外面，诗人酗酒、打架是时尚；在里面，没酒，也就没刺激，不写诗也就不乱想，完全变成标准的犯人吧。我还坐在牢里，从电视上看 1989 年的学潮，感觉有点恍若隔世。

90 年出狱，我遇上了我的前妻，她是体育老师。酷爱文学，崇拜传奇人物。那时我已够传奇了，可我哥哥在她跟前还添枝加叶，弄得我们见面之前，她就仰慕已久。稍后恋爱、结婚，并一起去深圳打拼。我的想法和许多文人一样，下海挣够一定的钱，再回头是岸。但我前妻比我更适应 89 后的商业环境，1992 年，我们宣布离婚。为了保护她，我要求见一见夺走她的那个男人。她说：“你不要动手打他。”我点头；于是情敌相见，却没有分外眼红。我握住那人的手问：“你很爱她吗？”他答是。我又转头握住前妻的手问：“你爱他吗？”她也答是。我确认无疑了，就像神父一般宣布道：“好的，但愿幸运降临到你们头上。”

我情绪平静地走开了，一直回到我的住处，在深圳大学的一个空房间。突然感觉万念俱灰，诗歌不见了，伟大、崇高、真理也不见了，流浪和家乡也没意义了。我是如此眷恋她！我不能没有她！一个诗人因为诗歌和坐牢，得到一个女孩子的崇拜；为了

共建美满的家庭生活，又去闯荡发财，结果却两手空空。爱人一走，我连吃饭都成了问题！我骂自己弱智，就疯狂地寻碎玻璃，想割脉，还想上吊，还去扯电线，跳了几下没够着，摔下来，脑袋撞了一下。可轰地一刹那，心里闪过一念头：“我凭什么为一个女人，特别是已经不爱我的女人自杀？！”

老威：你清醒了？

明德：应该是我的保护神出现了，当时没意识到，我的保护神就是观世音菩萨。随后从深圳败退回贵州，与诗人画家们厮混，渐渐出了人生的低谷。

老威：你与片山在这段时间认识的？

明德：我的事迹在江湖上已传开了。有一天，他顺着诗人南鸥的指点：“对面街上那个疯子就是马贼。”立即穿过马路，拦住我的去路说：“几个兄弟在那边喝酒，敢不敢去？”我当然敢去。于是喝到半夜，敲桌子唱崔健的摇滚，把老板和服务员都感染了，不做生意了，光着膀子和我们一起玩。

之后，又与四个穷得半疯的画家一道闯北京，没路费，有人就出主意，让我醉了后去找贵阳最大的黑社会头子借。当时那人在夜总会指挥小姐，我就直楞楞地拨开人群过去，摊开手大吼：“我们几个人要上北京去搞艺术，想让你资助一点路费。”

都以为我会被暴打一顿，或叫捅几个窟窿。可没料到，我不仅不损毫毛，还真“借”到了1500元钱。于是马不停蹄地上京，难民一般四处打听，才进驻圆明园福缘门的画家村，租了一大间村民房，五个人打通铺。由于吃了上顿没下顿，我们挂了个木牌在外，叫“五匹狼画室”。

接下来的情景你在《中国底层》里写到过……

老威：那天上午11点我去“五匹狼画室”，一进门，地铺上的五匹长发披肩的狼才起身。你拨开我出门，在自来水管下冲脸，顺便把食指戳进嘴巴抠几下，算漱了口，才冲我嘿嘿笑。问：“吃

了没？”手里却明明只有一包方便面。

明德：那段日子比你想象的还要穷，村里曾经流传着一个笑话，说的是警察扫黄，在画家村附近捉了一个三陪小姐，就带回派出所审讯。警察问：“喂，你和商人搞过没？”小姐理直气壮地答：“当然搞过。”“和民工搞过没？”“也搞过。”“卖菜的？”“也搞过……”小姐有些气短。“和村里的艺术家也搞过？！”警察突然吼道。

“没搞！”小姐的吼声比警察的更大，“你把我当什么人啦？”

老威：艺术家就这么不值钱？

明德：比大白菜还贱，我们经常饿得几天不出门，一把挂面一撮盐，熬成汤给大家喝，哪还有钱嫖鸡？不过也有贵人突然降临，放下一大袋米，什么话也不说，转身就走。这类行为会让我们的精神升华很久。我写过不少诗，也在王强主编的《大骚动》上登了一些。后来，圆明园被警察扫荡过好几次，画家们像跛脚的鸭子，被赶、被成批地收容。我感到再混下去有危险，就出了村，骑一辆破自行车，准备流浪全国。我的第一站是天津，身无盘缠，我就按上海诗人王一梁的主意，卖诗。即沿途朗诵、游说的同时，把诗句写成小纸片，什么月亮、星星地瞎扯一两行，下面写“请赞助五毛钱。”我从北京跑到广州，兜一大圈，从云南折回贵州，头发都拖过腰了。

老威：画家村什么时候被荡平的？

明德：1995年冬天，我离开不久。在路上我继续创造传奇，比如我身无分文，还上公共汽车，那种野人的气质，把乘客给镇住了。售票员问票，我坦然面对，说：“我没钱，但要去火车站。”于是售票员就闪开了；跟着混上火车，遇查票，就高声宣扬自己5个月骑车漫游的壮举，引起一片惊叹，吃喝又有了。

老威：你这么一個习惯流浪的诗人，怎么会又陷到一桩政治

案里去呢？

明德：阿弥陀佛，我又被政府给误会了。如果说第一次还有点不成熟的冲动，还想凑热闹，那么第二次的确想振作起来，做一点文化上的事。大约是1997年2月份，我离开贵阳，去北京待了几个月，决定和一些朋友共同弘扬老庄精神。

老威：你在北京先找的谁呢？

明德：我在流浪途中积累了不少人际资源。和我一起的老熊就是研究中国哲学的，他认为，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老子和庄子被忽视，其实他们的哲学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心理结构，所以，需要有人来公开复活老庄思想，作用于现代人，以重建一种无为的和谐。

老威：老熊是你的第二被告？

明德：老熊是理论家，负责起草文化宣言，我没这方面的头脑，就负责联络和迎来送往。这件事在口头阶段就夭折了，到这儿走过场的诗人和作家有一些，都被老熊的雄辩所折服，但我们哪有实际运作的能力？

后来诗人愈心焦歪打正着地进来了。他会朗诵，有激情，在江浙一带的大学生中有很大的影响，他一来，气势就来了，好像是一面文学旗帜在迎风飘扬。我趁机成天灌酒，清醒的时候较少，那段日子到底接触了多少人，我至今都讲不清。

老威：你们当时在哪儿活动？

明德：有时在北京，有时在上海。

老威：俞心焦被判刑，罪名好像是强奸。

明德：江湖上传说是政府栽赃。因为老愈特会煽情，他搞了一个文化复兴运动，其实就是个纸上的东西，诗人的癫狂，但警察认为是件特别大的事。老愈在北大还被不明身份的人暴打，弄瞎了一只眼，狂劲依然不减。

老威：俞心焦被判了8年吧。

明德：对，掰着指头算，80年代以来，诗人被专政的还不少。

老威：你们的案子和愈心焦没牵连？

明德：有一定的气场。也就是说，老愈使我们的头脑升温了。后来，老愈利用他的影响，筹了一些钱，印了本大家的作品合集。这只是名义上的合集，从目录上看人多势众，其实愈心焦的私货就占了60%的篇幅——长诗、抒情自传、鼓吹中国文化复兴运动的理论等等。当然，老熊弘扬老庄的文化宣言也登在上面——这就出了麻烦，国家认为这本集子里有文化以外的非法内容。

老威：什么时候？

明德：97年秋天开始活动，98年春天就出事了。

老威：那首犯是愈心焦？

明德：老愈当时漏网了。问题主要是老熊起草的宣言。热闹了一阵，大家就散伙，没谁意识到有麻烦。我和老熊已回贵阳，正无所事事地喝酒呢。突然有一天，我在家门口撞上几个便衣，为首的问：“你是马贼吗？”我答是；他说：“请跟我们走一趟。”我楞了，就反问：“你们是干什么的？”他说：“我们是负责国家安全的。”既然是这样，作为守法公民，我只好跟他们去。与我同行的三个朋友也栽进去，审查了三天，确与案情无关，才释放了。

我一肚子气，如果第一次还有凑热闹的冲动，那么这次，我是一门心思搞文化，并且是出世的老庄文化！所以，整整两个月，我要么一句话不说，要么和审讯人员吵架，我的脾气大得惊人，你要给我扣帽子，我就给你反扣回去。某一天，他们终于终止审问，说问题查清楚了。

我在贵州省看守所关押了一年多，然后出庭，大约半个小时就完事了。一个星期后下发《判决书》，获有期徒刑5年。我不服上诉，减了一年半。

老威：江湖上传说你本来事情不大，却因为“咆哮公堂”，

辱骂法官，被人家桌子一拍，就重判了。

明德：后来听上诉律师说，我在法庭上的态度的确严重影响了判刑。我没罪，连一点动机也没有，公诉人却偏要那么指控。

老威：你是怎样咆哮的？

明德：我已经出家了，眼下再去叙述这一过程，又会涉及对当政的态度，所以，你们能理解吧？

老威：你的语言很激烈、粗暴吗？

明德：我的辩护用语挺文雅，但我的态度，包括肢体语言很丰富，像在朗诵诗，把句子哇啦哇啦地拍出去。真是恍若隔世，因为自己陈述的和法官说的根本不是一码事，我们互相听不懂。后来他就不理我了。

老威：这也算一次行为艺术了。

明德：的确，因为就算罪名成立，也是老熊的文化宣言犯了禁，可他关了三个月就放了。

老威：据 XX 说，他一进去就与审讯人员辩论，口若悬河，结果化敌为友，审讯人员被他的理论素养折服，也信了老庄。

明德：不错，他折服了人家，关三个月；我折不服，就判 5 年。

老威：除了你们俩个，这个集团案还有谁？

明德：贵州就两个，其他省就不知道了。

老威：你有律师吗？

明德：一审没有。上诉时，问我要不要？我就反问：“什么样的？”意思是收不收钱。回答：“指定的。”我当然要了。没想到，却是位大律师，在省内非常有名，老百姓送了他不少锦旗。

老威：你的运气不算太差。

明德：佛报不浅。《判决书》一到手，我就写上诉状，16 开的纸，写了满满 11 页。我把二十几年所学的文学、哲学、宗教知识全用上了，从东方阐述到西方，从古代搞到当代，真是思若泉

涌，才比天高……

老威：这太可笑了。

明德：为什么？

老威：你是为弘扬老庄的文化宣言辩护，而老庄的精髓就是无为，既然“无为”，为何要为自己辩护呢？

明德：不错，如果老子或庄子站在法庭上，不管法官说什么，他们都肯定不吭声。但我哪有这个境界，连皮毛也是仗着记性好，照搬的。

老威：可老庄想不到，你在几千年后，为他们的学说坐牢。

明德：当作修炼吧。我在牢里读了不少书，朋友们送进来，我通宵地看。号子内要值夜班，守死刑犯，有时我就把几人轮值的班一个人包下来，从夜里到天亮，呆坐六、七个小时，或看书，或苦思冥想。周围都是刑事犯，很普通，却因为种种原因犯了国法，葬送掉人生，挺令人悲悯的，阿弥陀佛。

老威：你在牢里就与佛教结缘了？

明德：是的，朋友们送进来一些书，其中有学佛的。2001年开春的某一天，我心中蓦然产生一个念头，就合掌向观世音菩萨祈祷：“菩萨啊，我实在不想在这儿熬下去了，如果您也觉得我坐够了，就用你的神力把眼前的铁门打开吧！”没想到，几天后，一纸裁决下来，我的刑期减掉一年半，真被释放了。

出狱后，我从老家给律师提了一口袋红皮花生米，登门致谢；律师却鼓励我，从哪儿跌倒从哪儿爬起来，争取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老威：你见着你的同案犯老熊了？

明德：当时没有。两三年后相见，大家都皈依佛门，只谈学佛心得，绝口不提往事了。

补遗：

我们应明德和尚的挽留，在 XX 寺住了三天，由于朝山的居士较多，除了金琴宿寺下的尼姑庵，我和吴闯就客随主便，睡了寺里的正殿。虽然凌晨四点多钟就得和衣而起，腾出 5 点正式开始的早课地盘，但明德说：“这是特别大的佛报，我刚剃度时，就睡了两个多月的大殿。”

我还身裹袈裟，踞于明德旁边，做了两个早课。这是我一生中最奇异的经历之一，起首的中年和尚，一边缓缓击钟，一边吟唱着古老的诗句，与寺庙上空的绝壁和星空遥相对应，令人感动或感伤，明德解释说，这种形式叫《叩钟句》，即以叩钟的节奏吟诗。

接着是鼓、疏密有致，在天地人之间引起共振。应着鼓声，和尚们双掌合十地鱼贯进殿，礼佛毕，各就各位；鼓声变幻着，逐渐消沉而隐逸，再下来是磬和木鱼，再下来是嘎然而止。默祷。处于核心的领诵和尚用捏细了的嗓子念道：“南无阿弥陀佛……！”

和尚和居士们立即依韵律跟进，先汉文，后梵文，转番若干遍，持续了两个小时，中间穿插了若干礼佛的仪式，我笨拙地模仿，沉侵在一片虚拟的天国中。

据了解，马贼与 XX 寺结缘于另一位艺术家，两人曾一同流浪，一同惊世骇俗，马贼出狱不久，在万念俱灭中得知他在此出家，法号德洪，逐循踪前往，皈依佛门，并拜该寺的住持法师为师父。但在几年之中，马贼几起几落，几上几下，足见骨子里的野性难驯矣。

我对住持法师也有短暂的访问，我以为他更像依旧在寻找人生真谛的知识分子，其神态因过分操劳而显得疲惫，但双目炯炯有神，语气执着。他在宣扬了 20 多分钟佛理之后，方告诉我，马贼在山上做居士的头两年，人在庙里，心还在社会上，整日躁动

不安，甚至不守清规，一会儿上金顶发呆，一会儿下山脚祝圣寺游逛，“本该逐出山门，但我还是不忍。”

“后来呢？”

“他已经无路可走，除了这儿，他能到哪儿去？”法师叹气道。“所以有一天，我点破了他，我说，马贼，我也救不了你，我没那么大能耐。马贼一下子就愣了，跟着泪流满面。我又说，你可以回家，想通了又来。”

“他回家了吗？”

“他出家了，受了剃度，还受了比丘戒。不过，路还长呢。”

我曾经问明德想过家吗？他答：“我担心父母找上山来，因为引我进寺的德洪还俗了，他爱他的女儿，某一天他老婆抱女儿上山来，他就受不了。所以我坚决回避任何亲属，来了也不见。听人讲，我母亲很生气，她说，就当这个儿子已经死了。”

“你难过么？”

“我心里一阵轻松。母亲能这样想，我就放心了，阿弥陀佛。”

净土宗里有一种修炼密法，称《般舟行法》，其要旨就是在 15 步的距离内，昼夜不停地来回走，昼夜不停地念佛，直至 3 个月甚至半年。寺里不少出家人行过这种密法，连每日必须的饮和食都得站着。明德也行过，他说：“比行 3 天、7 天的要强些，我行了 9 天，终于见着了观世音菩萨的金身。”

他还说：“总有一天，我会在师父老人家的加持下，行够 3 个月。我目前的层次还达不到，不过，许下这个愿，我终会还的。”

“阿弥陀佛。”我不禁合掌念道。

间谍教授谷正

采访缘起

谷正教授是黄河象的发现和研究者之一，所以，当友人余杰于 2004 年 4 月把有关他的“间谍申诉材料”转来时，我困惑不已。记得多年以前，中央电视台还播过“发现黄河象”的记录片，当时作为一名观众，我还心潮澎湃了一个晚上。

更让我吃惊的是，谷正是被客死日本的国民党元老马晋三拖下水的！刚好我看过马先生的晚年传记片《两小时》并与导演李缨熟悉。“什么间谍？！”李缨在电话里听了我的简述，失声叫道：“八竿子打不着的事！”

为了弄清真相，我照材料上提供的号码给谷正教授打过去。两个人在电话两端客气了几句，就挂断了。许久，谷正又把电话回过来两次，确定了号码是固定的，然后说，他已经上网通过 google 搜索了有关廖亦武或者老威的条目，知道了我的情况，并答应我登门拜访。

2004 年 8 月 4 日中午，日头很毒，我约艺术家胡建一道前往。从北土城西路到谷教授在北京的住处双柳新居，路线比较复杂，虽然这几年有轻轨，方便多了，可我们在途中还是用了近两个小时。

谷教授骑着单车，顶着太阳在轻轨出口等待，凭着在电话里描述过的彼此特征，接上头，然后一起回家。

谷清瘦、机警，已习惯用两眼余光沿路查看，同我和胡建的大大咧咧对照鲜明。只有进了屋，他的神经才松弛下来。“已经像个特务了。”胡建耳语道。

我们在谷家打扰了近 6 个小时，直到被盛情挽留，与一大

家子共进晚餐，才依依不舍地告别。第三天，我联系上在北京拍片的李缨，让他和谷正在一家四川菜馆见了面。都是马晋三先生的“忘年之交”，自然有说不完的话。我作为李缨第二部正经电影《飞呀飞》的主角，就倾力举荐谷正教授为李导演第三部作品的主角，我说：“片名都取好了，就叫《特务》。”

老威：我看了您的材料，似乎您的间谍罪名与国民党元老马晋三有关。

谷正：不是“似乎”。我背后的主谋就是马老嘛。

老威：教授您？可真幽默。

谷正：再不自我幽默一点，这日子就没法过了。做了“间谍”之后，我经常上网搜索马晋三的条目，结果与此关系最密切的，是一部叫《2H》的记录电影，导演李缨，是在日本定居多年的中国人，同马晋三结成忘年之交后，就用摄像机追拍了两年，直到主角某天早晨突然去世。《2H》在柏林电影节上获过最佳亚洲电影奖，和中国的地下电影《小武》是同一个奖。

老威：这电影我看过好几遍，其中最震撼的，是马晋山的尸体从几十层的公寓楼上被抬下来，楼道阴暗，曾被誉为中国工兵之父的世纪老人沿着楼梯，一圈一圈盘旋而下，抵达地狱出口——楼外的人世间，明亮、喧闹而拥挤不堪。但是我却关心地问坐在身边的李缨：马老吹过的那支箫到哪儿去了？因为我也吹箫，知道求得一支几十年的老箫不容易。

谷正：你认识李缨导演？

老威：不仅认识，我是他的第二部电影《飞呀飞》的主角，演一个出监狱不久的讨债杀手，死死地咬住过去的好朋友（滕胧诗元老芒克饰）不放。您看，这脑壳正中，还有痕迹，是我自己在电影里用杯子砸的，我都忘了是在演戏。当时鲜血满头，没法

再往下拍了。

谷正：哎呀老威先生！这么巧！

老威：更巧的是我上世纪 80 年代就认识李缨他爸李士非。行啦，越扯越远了。李缨这几天正好从东京来北京了，咱们做完这个谈话，我就介绍您们认识。说不定，您这个“间谍”教授还能成为他第三部电影的主角。

谷正：见笑了见笑了。那就开始吧。

老威：我嘴笨，不晓得该咋问。

谷正：你用录音机吗？

老威：先不用，等到特别重要的细节出来，非用不可，我才用。

谷正：我也准备了录音笔，还有遥控装置。安全厅有的设备我都有。

老威：教授您真厉害呀。

谷正：我早已不是过去的那个书呆子教授了。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我苦钻法律和取证的技术，同搞专业一样，下了很深的工夫。

老威：好，请从头说起吧。

谷正：我 1936 年出生于山东威海，1947 年随父母迁天津。父亲原是天津检修公司的会计，1949 年在新旧社会交替的激动中，举家迁北京。我的青少年时代在北京度过。1960 年，我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随后去了条件较为艰苦的甘肃，在 XX 大学地质系任教。

我的人生阅历就是我的工作阅历，没啥讲头，我就一嘴带过了。直到文革结束，我都没受多大冲击，反而在停课做逍遥派期间，没丢外语和专业。所以在邓小平复出，否定文革，改革开放以后，我顺利地通过政审和国家考试，成为首批受益的出国留学人员。当时出国与现在可不一样，相当于闭关锁国的清朝向西方

首派留学生。

老威：对，我看过有关资料，清朝的留日学生首批是几十名，全部公费。

谷正：我们也算官派吧，先政审，即所谓内查外调、政治表现，海内外关系，完全水落石出了，再一层层上报审批。然后由国家教委统一出题考试，除了常规考核，就是外语，英、法、德、日。

老威：全国有多少人参加出国考试？

谷正：大概有 4000 名吧。经过筛选，通过了 1300 名。这其中又分普通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当时的国家教委在北京西单商场附近的大仓胡同，宽 20 米，深 100 多米，一天到晚车水马龙，跟赶集似的，你稍微去晚了点，连巷口都挤不进去。这比考状元还诱人呀，连司局级以上的官员，只要分数没过线，都通过各种门路来争名额。我可是过关斩将，硬考，结果成绩在甘肃省名列第二，在全国前 30 名以内。

老威：不简单呀。

谷正：1980 年 4 月，我们那批 480 人抵达日本，先进行语言培训，按考试成绩优劣分成 16 个班，口语进步很快。

由大使馆安排，我和另外 3 个留学生住进东京目黑区下目黑的一所叫“睦庄”的公寓里，是老式日本房子，很狭窄，只能睡觉和做饭，没办法洗澡。那时国家、个人都穷，出不了更多的钱，就只有住笼子似的便宜房子。不过，我们是来学习的，报国心切，也不在乎。1980 年 7 至 8 日，中日合办“中国猿人展”，周口店北京猿人的发现者贾兰坡先生和周明正先生赴日参展，引起较大的国际关注，而我是参展人员中唯一搞古生物研究的。有一次，我和中科院的代表团一道在一个华侨饭店吃饭，认识了在店里打工的台湾人沈玉井，出于客套，我们聊了几句。他听我说住在下目黑，就挺热情地要介绍我认识一位“爱国老先生”，我随口问：

“方便吗？”他答：“太方便了，马老就住在你的街对面。”

过了几天，沈玉井抽空来睦庄，领我穿过马路，上一所高级公寓的20楼拜访了马晋三先生。我们随便聊，马老听说我是搞古生物的科研人员，就非常高兴；而一听马老的云南口音，我也倍感亲切，他在外漂泊多年，仍旧乡音未改嘛。于是，就成了忘年交。

睦庄没办法洗澡，此前我只能休息时上公共浴池，极不方便；偏偏日本人很讲整洁，瞧不起不洗澡的人。马老问明我的情况，就主动邀请我上他家洗澡，天长日久，彼此更熟悉了。马老好客，在星期六和星期天，家里会来许多朋友，日本、台湾、海外的，形形色色。

老威：在80年代初，你能适应这种社交场合吗？

谷正：大陆去的人，特老实。刚接触马老，我还请示过大使馆，允许了，才进一步交往。东京是个自由世界，各种势力都有舞台，台湾国民党几乎每天都给留学人员的住处投寄报纸、杂志，以及各种宣传资料，上面甚至有魏京生的报道，刘宾雁等人的文章。开始翻看这些东西，还挺害怕，大使馆也要求一接到反动宣传品，就打包上缴。可后来，一天收一大叠，我们遵命送大使馆，他们也叫苦，说装不下。再往后，他们就拒收了，要我们就地销毁算了。

老威：真是海内外两重天！直到现在，政府也要求人民上缴反动书刊。

谷正：见多不怪。比如我刚在马老家里认识某某名人，真有点“如雷贯耳”，久了，就“雷打不动”。

老威：所谓两岸三地的名流都有？

谷正：对。比如有个台湾画家，张大千的弟子，名字我忘了；书法家启功的亲戚；卖钢琴的商人；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据说是王任重的女婿；赵紫阳的经济顾问后来也拜访过。引荐我们相

识的沈玉井，也不简单，在台湾犯过法，就跑日本了。

老威：这个马老，真是不甘寂寞啊。

谷正：马老是与周恩来同时期的黄埔教官。做过国民政府的交通部长和工兵总司令，在国共两党中都有许多学生。他信仰三民主义，却与周恩来私谊颇深，总理临死前，还派罗青长秘密接他回大陆，见最后一面；在国庆 35 周年，他还作为特殊贵宾上天安门观礼。所以这么个人物，你要说他是那一门那一派，都不太准确。他晚年住日本，当寓公，也算一种两难选择中的自我放逐。

这里我要特别提到王继贤，他是马家常客，我每次去，他都在。这个老王，曾是国民政府的朝鲜半岛专家，一度派驻韩国大使馆任武官，不料朝鲜战争一爆发，他拔腿就逃日本，搞得台湾四处通缉他。

老威：此人与你有什么关系呢？

谷正：安全部门也认定他是大特务。1987 年 9 月，我第 3 次赴日学术交流，曾向王继贤介绍 XX 大学开发的甘草甜素产品，由王在他的店里出售，因此，王就成了这桩间谍案的重要环节。记得 85 年的一期《瞭望》上，登了一篇张学良亲戚的回忆录，其中提到王是特务。我却没一点“敌情”意识，在东京时，还追问他：“到底是不是特务？”王气坏了，直骂“胡说八道”。还说：“国民党也邀请过，共产党也拉拢过，现在都不来光顾了。”我问他想不想回大陆看看？他发感叹道：“大使馆来游说过几次了，我敢去吗？我老妈 80 多岁，还在文革中被斗死了，我回去探屁的亲！我说：“文革早否定了，现在国家重用人材。”他笑道：“是吗？抗战时我也是热血青年，投笔从戎，出生入死，可下场如何？张学良的外孙是个混蛋，有什么脸写回忆录！”

后来，我把老王的话说给马老，马老笑道：“你别管这些，历史烂帐扯不清楚。”

老威：你明白这话的意思吗？

谷正：多年以后，才有点觉悟吧！马老的许多经历，我是回国后才陆续知道的。比如他做过现任日本天皇的家庭教师。刚去日本时，由于与台湾断了往来，还比较潦倒，曾骑摩托车为饭店送外卖。有一次送到半路，他突然感到耻辱，就把所有的外卖倒掉。他说：“8年抗战打跑日本人，现在又撵到这儿来伺候日本人，真是上天的惩罚啊。”所以，他后来皈依了基督教。

老威：他靠什么生活呢？台湾政府的养老金吗？

谷正：间接直接帮他的人很多，东京有家四川饭店，经理是四川人陈先生，马老在店里也有小投资。总之，马老也没什么积蓄，可闲赋在家，也过得下去。1980年底，我从睦庄搬到横滨宏明寺的留学生会馆，20名左右的留学人员住一处，离下目黑还有1个半到两个小时的路程。于是我只有每个星期天去看望马老，借一宿，第二天赶电车回去，可马老每次还硬要塞给我一两千日元的路费。

老威：马老对你真是无微不至。

谷正：这个好老头，帮过很多落魄的人，而他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乡情重，没有仇恨。他说蒋先生和毛先生都想把中国的事办好，可往往事与愿违。1982年4月12日，我结束留学回国，马老送我3万日元（相当于2000人民币），让我给家人买点礼物带回。我很感动，因为在海外两年，不想家是假的。那时我才40多岁，离家时也包了一捧故乡的土带在身边，而马老，已风烛残年了，却还孤身一人在外。

1986年，我又两渡日本学术交流。一直到1998年2月，马老去世前，我与他通过一些信。后来我受学校委托，建古生物博物馆，我也去函告之，并请他提写馆名。可老先生热心肠，还通过银行汇款1000美元，资助科研。

老威：真所谓拳拳报国之心，可昭日月。

谷正：可这1000美元，加上在日期间马老给过我的零钱、车

钱、礼物钱，以及王继贤给的介绍费等等，都成了马氏特务机关的间谍经费！

老威：一共多少？

谷正：18年来，这所有费用折合人民币17500元。

老威：您这间谍当得真廉价啊。

谷正：荒唐人世嘛。

老威：您的材料上讲，回来不久安全部门就开始调查了，您怎么察觉的？

谷正：学校里都传开了。连我的学生都提醒说，公安人员找过学校，检查了我的通信。系总支还布置某某老师，专门监视并汇报我出差、出野外的情况。为此，我和老伴都找过学校领导，要求澄清。校长开头吱吱唔唔，后来干脆说：“出国人员嘛，被盯上也正常。你就不用管，该干啥还干啥，组织是了解的。”

有了学校这句话，我就释然了，于是全身心投入研究和教学。1986年我满50岁，还实现了学生时代的夙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9年，我出任地质系主任。我担当的社会职务有：国家教委地学教学指导委员；中国地质学会理事；省地质学会常委理事等等，并享受国务院的专家特殊津贴。可在我事业上步步登高时，安全部门却加紧了对我的监控。1985年到89年，当时隶属公安厅的安全处警察，频频登门与我“交朋友”。他们有时着便装，有时穿警察制服，出入学校很惹眼。

老威：作为公民，您有权拒绝这种“朋友”。

谷正：80年代过来的人，对公安还是有传统的惧怕心理。况且他们的态度比较客气，逢年过节，经常送些礼物，如烂油画、塑料果盘等。

老威：他们问过马老的情况么？

谷正：只字未提。只转弯抹角地闲聊在日本的生活，与那些人交往，还单独问了王继贤这个人。

老威：您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劲？

谷正：无可奈何。共产党员嘛，有配合公安机关调查的义务，况且我又没干什么。时间一长，我和警察都混熟了。学校离安全处，骑自行车就十来分钟，他们有时脱不开身，就打个电话，约我到处里去谈。1989年六四后，我还买了几罐麦乳精，去公安处还礼。虽然他们送礼是用公款，我是私人掏腰包，但谁也不欠谁的最好。

记得有次那个处长还盘问我XX大学的学潮情况，提到我的学生如何。我暗自生气，这不叫我告密吗？于是就无可奉告。

1994年的一天，我刚上完课，安全处突然来了辆高级轿车，把我接到甘肃师范大学招待所，设宴款待。除了我，周围都是便衣，作为主宾的安全处杨副处长频频举杯，向我说了许多奉承话，我却心里犯嘀咕，因为“交往”近10年，这次是最隆重的，莫非……果然，吃了饭，又招待洗澡，杨处长说：“您彻底放松我们再聊聊。”

正式讯问时，杨处长再没习惯性地兜圈子，而是直截了当：“你与王继贤是什么关系？”我照实回答。警察们都绷着脸，看得出，他们不满意。

接着，又问我内蒙古博物馆李荣的情况。原来李荣私自带化石出国，过海关手续不全，被扣住了。安全部门大概推断王继贤与化石案有关，就来“光顾”我了。

李荣我不了解，而王继贤给我的印象，就是嘻嘻哈哈，玩世不恭，还擅长弄麻婆豆腐。于是，我搜肠刮肚地“配合政府调查”，结果双方都不愉快。

天擦黑时，轿车送我回家，还硬塞给我一袋水果。我遵嘱写了有关李荣的材料，够冤的，啥也不知道啊。

过了一周，安全处的阎云来取材料，安慰说：“谷教授，您别放心上。”我委屈说：“无中生有嘛。”阎云说：“您也太老

实，他们再来缠你，就骂出去。”我一听警察这么说，真愣住了。可过了几天，阎云又登门，声称：“不想吃这碗缺德饭，成天当二流子。”他后来下海了，推销什么产品，还来问我有没有门路替他卖。

这一次，围绕我，周围的人也都被调查了。不过也难怪，我是黄河象的发现和研究者之一，学校博物馆的化石很多，他们就怀疑起来。

老威：也算“误伤”吧。

谷正：我真这么想。还以为趁这次把包袱抖完了，就彻底断绝与安全部门的交往，“配合”也该有个限度呀。

再接下来有点像小说。1998年，我退休，不仅事业有成，而且桃李满天下。特别是去年，我和儿子及老伴合译了两本古生物名著，一本是英国学者西里尔·沃克/戴维·沃德的《化石》，一本是克里斯·佩兰特的《岩石与矿物》，都由友谊出版公司推出。市场还不错，出版社又和我们签约，要把《自然珍藏图鉴丛书》系列全部翻译出版。

另外，去年也是黄河象化石发现30周年，举办了一系列的展览和学术研讨，很有点热闹。去年还是中日建交25周年，日本的东京国学院邀请我讲学，整一个月，可带夫人，所有经费由日方提供。我废寝忘食地闭门赶写学术报告，三个不同题目，论证起来一点马虎不得，因为东京国学院是世界顶级学府，我必须要为国争光。

护照、签证、机票早就办好了，也通知了东京方面，我定于2004年9月25日启程并抵达。9月17日上午10点左右，我正在窗下看英文资料，而老伴儿在口译，突然电话铃响了。

开始怕受干扰，我们不想接；可电话响得很固执，似乎不接不行。我拿起电话——命运就在这一刹那改变了——对方说：“您是谷教授吗？我是安全厅的。”

我的心一下凉了，因为自 1994 年那次款待后，他们再没登过门，我已完全忘记我在什么国家，在什么机关的掌控之下。

老威：当时您们还住在兰州吗？

谷正：不，已来到北京，住在这儿——我儿子的家里。我强作镇定地问：“你们在哪儿？怎么知道这个电话？”对方很蛮横地说：“等见了面就清楚了。”

一会儿，一辆黑色轿车进小区，刹在楼下，两个身强力壮的陌生人闯进家门，为首者从上衣口袋掏出甘肃省安全厅的《警官证》，对我亮一下说：“对不起，请跟我们出去谈谈。”我老伴儿说：“就在这儿谈不行吗？”警察说不行，就着急地动手拽我。当时还有许多资料堆在屋里，我光着脚，只穿了一件衬衣。我呆若木鸡，任凭他们一左一右地挟持住。老伴儿扯住我叫：“你们要带人到哪里去？！”他们不回答，其中一人掰开老伴的手，后来我知道这人叫李际群，主管与我的联系。

我光脚蹬上鞋，没带任何日常用品，就木偶一般被弄上车，一口气拉到南苑。事态突变，我的魂儿都吓出窍了。直到进了一个顶天立地的红门，红门四周都牵着铁丝网，我才下意识地注意到十几米外的高墙——明摆着那是监狱。

下午 1 点，我被带入监狱旁边的招待所，一排红楼。接着，他们口头宣布对我“传唤”，并让我在一张纸条上签字。再下来是搜身，仔仔细细，连一条缝都没放过，手表、零钱、钥匙链、字条全拿走。这些过场走完了，我才被命令坐下。椅背上还挂了一副手铐。

跟电影里演的差不多，三个便衣警察坐在桌后，周围还站了些人，而我这个罪犯坐当中。我不禁问：“我有什么权利？”为首的刘处长回答：“你可以请律师。”又补充道：“不过目前不行。”

老威：跟绑票一样，够恐怖的。

谷正：我一个快 70 岁的老头，哪经得起这种惊吓！这次审讯，主题直奔大特务马晋三，连王继贤也不提了。我只能“配合”，一五一十，从 1980 年出国，怎样认识马老开始，筛了一遍，连蚂蚁爬过的细节也没放过。当然，给王继贤带甘草甜素，王付给我 3 万日元介绍费的事也主动坦白了。我自信没有见不得人的勾当，就越交代越感到委屈。他们也问得特细，极有耐心，哪怕措辞有一点含糊，也让重新讲。

如此这般，从下午 1 点审到开晚饭，拔拉了两口又继续，一下子又拉到午夜 12 点，把我这匹老马搞得筋疲力尽。我觉得，他们记录在案的那一厚本马晋三材料，都可以写长篇传记了。当时我还天真地想，马老明明都死了，还要怎样？难道要摸清马老的亲戚？不过，我对马老的爱国之情是深有感触的，他家里挂着不少名人字画，其中一幅就是他自己亲书的《爱国三字经》，著名诗人李士非写了首献给马老的长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1975 年周恩来病重/你决定前往探望/分别半个世纪的老友/双方都不是当年模样……晋三兄，感谢你这个老工兵/在中日之间架设无形的桥梁……”

老威：周恩来的老朋友是大特务？

谷正：我心里也憋着这问题，一直扛到凌晨 1 点，法定的传唤时限 12 个小时到了。一个女警察进屋，替换刘处长继续夜战，看来她的级别比刘处长还高，口气也霸道：“谷正，你很不老实！我问你：在境外参加过什么组织？”我顿时懵了，心里回答：“除了共产党，我什么组织也没参加。”可嘴上却说不出。女警官步步紧逼：“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听说过吗？”我摇头，女警官冷笑道：“马晋三就是这个组织的头儿。”]

紧接着，刘处长一拍桌子：“不老实！宣布拘留！”

我浑身哆嗦，又被命令在一张三折的纸条上签字，事后知道那是《拘留证》。

老威：按现行法律，传唤和拘留证明应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罪名也要说清楚。

谷正：我啥都顾不上，只有害怕。女警官又继续威胁：“谷正，你知道对面是什么地方吗？监狱！一旦把你扔进去，就彻底消失了。你不承认？没事儿，关起来，关到死。”我抗拒说：“我家里人会找来的。”女警官双手一摊：“找谁？我们到你家去过吗？证据呢？”这种流氓腔调我可从来没有见识过，一瞬间，我被击垮了，永无出头之日啊，谁不怕？

见我脸色煞白，她就向后仰着身子，放缓了口气：“其实啊，你的问题说大也大，说小也小。改革开放嘛，国门刚打开，你们这批早期留学人员中，不少人因政治运动，因家庭出生受过冲击，有骚动，对现实不满，见到国外的花花绿绿，岂有不动心的？内外一对照，就动摇了。敌对势力掌握了人性的弱点，无孔不入，小恩小惠啦，你就一步步上钩了。”

我茫然地望着她，不知所云。

她又说：“你年纪大了，一时糊涂不要紧；只要坦白了，悔了过，事后照样做人，照样是党员、领导、教授、专家。对国家做过贡献嘛，功过可以相抵，政府对你这类人的一贯政策，是不管陷多深，只要坦白、改过，一律即予谅解，不公开，不追究，全部包揽。否则的话……中国人多，意外也多，死你一个不算什么。”

“你们要我怎么交待？”我终于汗流浹背地问。

“你是教授，不会写？”周围的警察都发出猫戏老鼠的笑声。女警官同情地盯住我说：“问题的大小，处理的方式，结果的好坏都取决于你。最好的结果是，从这儿走出去，过去就与你一刀两断了。别说学校，连妻儿老小都不知道。我们是反间谍的安全机关，处理过太多类似的情况，我保证。你以后照常生活，照常体面，照常出国，一样不会少。”

形势所迫，我只有坦白。马老，不，马晋三，又名马崇六，的确是台湾国民党派驻日本东京的大特务，我一到日本，他的眼线就盯上，百般拉拢，于是我就加入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开始，我还以为是群众团体……

他们问我填表没有，我自然回答：“填了。”他们又问表是什么样式？我哪儿知道。于是我就套用中国共产党的《入党申请书》，及其它学会申请表的格式，一项接一项的交代，只是把内容掉换了。

我说了许多诬蔑马老的话，心里却直骂自己不是东西。凌晨4点多钟，我的身体顶不住了，直冒虚汗。宣布收兵时已快天亮，我从一楼审讯室被押往二楼一个套间，约七、八平方米，我住里间，外间由两人一班轮流看押我。

我已睁不开眼睛，没脱衣服，就要关灯睡觉。不料警察不准关灯，我抗议，他们解释说：“这样安全些。”从此，在这窗帘紧闭的囚笼里，电灯24小时亮着，门敞着，电视也24小时开着，噪音轰炸机一般，搞得我这个老头儿再困也无法安眠。

老威：中国监狱都是通宵亮灯，没有夜晚。

谷正：第二天下午又开场，我继续胡编间谍故事，问什么就借题发挥编什么，比如在马老的介绍下宣誓效忠等等。唉，现在想起来，都感到对不起马老的在天之灵。

老威：这样编下去，您可死定了。

谷正：所以我的弦绷得太紧。放我吃饭时，心里堵得慌，我终于冲着同桌用餐的便衣们大叫：“我全是编的！不算数！”把他们一下子搞愣了。

我被架进套房稳定情绪，李际群跟上来，神神秘秘地关上门说：“谷教授，您有什么思想包袱就抖出来，我们该尽力就尽力，可怎么能出尔反尔呢？这样您不把自己给套牢，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吗？交待一半又反悔，比不交待的罪更重呀！”

“我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我哭喊起来，“我缺了八辈子的德！还不如死了干净！”

李际群见我哭喊这个，脸色一下子就变了，摔门而出道：“你吓得了谁！”

老威：您如果把翻供坚持到底，就赢了。

谷正：我现在当然知道，可当时，唉。到了晚上，女警官又出面了，她板着面孔，二话不说，就开始宣读了一段《国家安全法》，然后才一钉一眼地说：“有罪而翻供，也就是妨碍执行公务，给侦察工作造成重大阻碍的，最高判刑可达 15 年。”

我被一棒子打进深渊里，恍惚中听见她问：“清楚了吗？”

我回答“清楚了”。审讯又持续到次日天明，我再次“供认不讳”。内容大致包括：1. 出国及与马晋三的交往；2. 加入特务组织，代号××××，并被任命为大陆地区的负责人；3. 发展特务，我三渡日本，直接和间接介绍了一些熟人、同事去见马晋三，这是为了让他最后考察和拍板，看这些家伙是否合适当特务；4. 情报工作，我与马老和王继贤的通信；科技，包括考古和甜素的日常情报，报纸上各种信息的汇总、分析、统计；5. 经费，是少了点，20 多年加起来共约 25 万日元，折合人民币 17500 元，我就胡诌说：“这边物价涨了，农村万元户多了，他们的经费标准还没跟上。”

口头坦白了，他们又拿来笔记本电脑，我按他们列的题目，打成书面自供状。他们办案可谓一丝不苟，根据我交代的间谍经费，他们一点一滴地加，后来竟说，马晋三那次不止汇来 1000 美元。我百口难辩，结果再核对，原来马老汇的是日元，折合 1000 美元，就有零头。

老威：您被审了几天？

谷正：2003 年 9 月 17 日至 23 日，一周时间，我均被看押在那儿，进出房门要喊报告，上厕所也不准关门。我一直想着 25 日

出访日本的事，他们先保证事儿完了还可以去，23日却告知不能去了。

这中间我又翻了一次供，自然受到更严厉的弹压。还说间谍案涉及国家机密，可以不公开审理，神不知鬼不觉，你到时想见我们都困难了。于是我泄气了，他们才放缓口气说，鉴于我不是惯犯，情绪反常很正常，为了不加重“罪责”，就不做记录了。

老威：后来呢？

谷正：就称“结案”，责令我写《认罪书》。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写这种玩意，小菜一碟。什么“追悔莫及”“感激涕零”“回到党和人民的怀抱”“脱胎换骨”之类，全用上。我以为交差了，因为车轮战术打了三天，将罪名坐实后，他们就让我给家里打了个电话。23日上午，他们说写好这玩意就可以走人了。可没想到，交卷时，一个老警察还指令我写下这样的抬头——“潜伏间谍谷正认罪书”。

我几乎晕倒，连忙报告“上厕所”。我哭了起来，觉得这辈子完了。

午饭后，还是那辆黑色轿车把我押送回家。上楼进屋，我老伴含泪在《取保候审通知书》上签字，同时没收了我的护照。

在路上，刘处长对我说：“间谍经费17500元，得上交国库，你自己回兰州缴钱，并缴出与马晋三的全部通信，争取早日结案。”

（谷正老伴儿插话：我莫名其妙就做了间谍保人。警察一走，老谷还像个木头人，立在那儿，一双眼睛空空的，魂儿还没回来。我心里发怵，就摇他的胳膊：“老谷，怎么啦？说话呀！”他却没话，过了好几分钟，眼珠子才开始动，那脸色，就跟冬天的荒地，灰灰的。终于，两行泪坠下来；终于他哭出声了，双手突然死死拽住我，小孩一般抽搐着说：“桂兰呀，我对不住你！”）

老威：为什么对不住呢？您也是受害者。

（谷正老伴儿继续插话：是啊，我急忙又是倒水又是插嘴。待老谷诉明了原由，我也吃了一惊。晚上儿子下班回家，一合计，这是天大的冤枉，怎么能认！列祖列宗在上呀！

按国家部门的要求，老谷 10 月 1 日必须返回兰州结案。我儿子拍着桌子说：“爸爸，您为了我们，也一定翻供。”）

谷正：我精神和肉体都彻底垮了，儿子托熟人，让我躲进香山休养。我不断自责，马晋三，一个飘零异乡的爱国老人，死了，连灵魂都得不到安宁，被我这个“忘年之交”泼了盆污水。但是要翻供，就要面对锦衣卫，我这无权无势的老书呆子，怎么能斗得过专政机关！思前想后找不到出路，感觉人就开始恍惚，5 个月，一通宵一通宵睡不着，心跳过速的药，大把大把地吃，体重从 72.3 公斤降到 61 公斤。我被送入北京安宁医院，一检查，得了反应性精神障碍，说白了，就是脑子出了毛病。

（谷正老伴儿：《遗书》都写好了。）

谷正：家里怕我出意外，24 小时都留人，入院了，病房也不离人。我把遗书留在电脑里，可找不到单独待的机会。有次要在卫生间上吊，可一磨蹭，门就被老伴儿弄开了。老伴儿哭喊：“几十年都过来了，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呀！”我说只有一死干净。老伴儿说：“你不翻案，干净不了，变了鬼人家还说你畏罪自杀。你没听见安全厅一天一个电话催咱们吗？老谷啊，你是考古考成蠢蛋了。”

（谷正老伴儿：非骂不可！不骂醒不了！）

老威：对，将近 70 的人了，怕什么呢？送到监狱，也劳改不了，最多守守车间门，甚至连门也守不好，眼花嘛。一生病，还得办保外就医。

谷正：我想不到这一步，我得慢慢从脑子和心脏出毛病的状态缓过来。就如一个煤气中毒的人，必须要抬到通风处，一口一口做人工呼吸。我一旦从濒临死亡里回过头，就感觉被水洗过，

从骨头和内脏里都洗过。我振作起来，用研究和教学的那股劲儿，学法律。我买了几十本书，条条框框都熟记了。可说千道万，法律讲究证据。他们吃准我是法盲教授，抓我没《传唤证》，拘留也没《拘留证》，搜查连个条也不留，我告他，凭什么呢？于是，我又买了许多破案小说，通宵达旦学习，我要的是取证方式。慢慢，我迷上了这个东西，成了名副其实的“反间谍”教授。

老威：安全机关还没觉察？

谷正：没有，否则不会在电话里讲话那么放肆，那么赤裸裸。我的录音电话很高级，可以接电脑，电脑识别声音，一则能够直接刻录成 CD 盘，一则整理成文字也方便。我的证据一般要考贝几份，藏几个地方。从去年到今年 4 月，不足半年，我已整理了 24 万字的电话记录，有的段子，那种地痞腔调，很精彩。您感兴趣吗？我送你一本。

老威：我太感兴趣了，24 万字？相当于一部长篇小说。

谷正：没啥文学性。

老威：也不见得。说不定还能改编成话剧呢，那种精彩台词，别的地方听不到。哦，教授，这些电话记录只是一问一答两个人？

谷正：有时那边打电话来，开头很勤，畜生似的，不管你疯也好死也好，只一个劲儿催你回去；以后拖了下来，估计他们已经把马晋三调查了个底儿透，才觉得不对劲，这个死去的老头，北京和海外的来头太大，碰不得。总之，那边的电话就不那么勤了。可我要打过去，并且扭住不放，取保候审已经一年多，早超期了，该有个说法。

那边有个人固定负责我的案子，叫李济群，电话记录大部分是他的，但也有处长和其他人的，学校方面也有，国安部、北京市国安局都打过交道。我的《申诉状》递了许多机构，附录材料很充分，除了电话记录，还有日记、翻案的申明、信件、家里及各方面的旁证，甚至还有写给胡锦涛的公开信。他们想赖帐，没

门儿。

老威：捅了这么大的漏子，这帐怎么赖？

谷正：从今年4月9号以后，我打过去，他们不接了，失踪了。堂堂一个上千人的省级安全厅，居然没一个人接电话！我打兰州市查号台，安全厅的门卫、收发、一二三处，电话号码都找到了。我依次打，真找到人了。管我的李际群气急败坏地威胁我：“姓谷的，你不要四处写信，八方打电话，造谣诬蔑！引起了政治后果，你要负法律责任！”

我说：“你不是说要交朋友吗？朋友之间为什么不能打电话？

他警告我：“我们是保密机关，知道什么叫保密机关吗？你查我们的号，到处打，就是泄密！万一通过电话网，传到海外间谍机关，你……”

我笑起来：“作为一个公民，我要向你们咨询一下保密常识呢？什么人可以在公开场合抓，什么人，比如说我，秘密抓？

老威：他怎么回答？

谷正：他气得挂了电话。我又打过去。他接起来喊：“有本事你就上法庭告我们！拿不出证据，我们就要反告你诬陷！”

老威：除了打电话，他们没上门找过您？

谷正：他们来过两三次，还有北京市国安局的陪着。家里人把我藏起来，不开门，老伴通过小窗和他们对话，说还在医院躺着呢，到底谁跟谁要人，走着瞧。今年4月7号，他们的车进了小区，我就通知我弟弟去跟他们谈。我弟弟身上揣了比较高级的录音设备，双方一开始谈，声波就被传到几里以外的家里，我戴着耳机就能听见，效果不错。

你看，我手里的录音笔，比你的录音机高档多了，对付他们，设备一定要跟上。我听见那头还做我弟弟的工作，要他说服哥哥，不要翻供呢。

老威：具体怎么说的？

谷正：我弟先说：“赵处长，一级警督，哎，我记一下警号：621002。”然后，对方的三个声音分别是：赵 XX、刘 XX 和李 XX。刘说：“20 多年来，一直关注他。”赵说：“什么案子养人？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我们有证据呀！”最后临走了，他们想要回我弟弟抄的警号，李说：“这是保密的。”我弟不给，李大吼：“把那页纸撕下来！那上面有我们的警号！保密的！你要干啥！”

第二天，4 月 8 号。兰州的三个人，加上北京安全局的王某又来了，我弟又去了。我先后听见他们说：“他参加组织。”“判不判刑以法律来定。”“我们是保密单位。”“关七天六夜？我们找他谈话。”“你甭管代表谁。”“转变你哥哥。”“那关系搞错搞不错的问题，由法院定。”“他签过字的！他都签了！该给的都给了！”

老威：看来，教授真成超级间谍了。

谷正：过奖了，也算大器晚成吧。

附一：

绝命书

我禁受不住安全部门的“锻炼”，只求脱身保命，在逼、诱、指供下，全面“配合”他们，作出了子虚乌有的供词，最后假的成真，如今铸成“铁案”，一半也是咎由自取。我已无力再抗争，只有接受命运带来的一切。

此举是：我出卖了自己的信仰、尊严、一世清明、我为之奋斗一生取得的一切；出卖了我这美好的家庭和所有的亲人；出卖了给过我帮助的朋友，还有同学与朋友；……；使所有的人蒙受耻辱。这是我软弱、糊涂的代价，痛苦不堪。

我已无颜面再苟活于这个美好的世界，只有一死表明我的清白无辜，只有一死抗争这强加给我的耻辱。

我无颜面于祖宗和生我养我的父母在天之灵；

我对不起与我共患难，成就了我和这个家的命苦老伴，是我毁掉了这一切，还使你蒙羞受辱；

我对不起我的三个正在起步、蒸蒸日上的儿子，你们和父母有过美好的生活，就让那些作为记忆留下，除次，我带给你们的只有终生的创伤和羞辱，我不配做你们的爸爸，忘掉我；

我对不起好儿媳，公公如此下场，乃是咎由自取；也对不起你们的父母，还有何脸面与他们面对；

我对不起兄弟，他不惜一切，给了无限的关爱，而哥哥竟如此软弱和不争气。使得一切付诸东流；

我对不起所有的兄弟姐妹和下一代，我还能向他们表白什么？

所有我的朋友、同学和学生，只求你们理解，但不必原谅我这软弱、糊涂，葬送了一切的人；

……如今我“解脱”了，留下的只是笑柄和耻辱，还有给后人的不尽的麻烦。

记住：“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为了摆脱一时的恐惧，保命脱身，早回家，竟不顾后果违心的诬认自己参加了国民党和敌特组织，做了像是真的口供和笔供，出卖了自己，软弱和糊涂葬送了自己和一切。切肤之痛，后悔莫及。

“忠厚、老实是无用的别名”，我一生本着对人对事忠诚无私的原则，与世无争，夹着尾巴做人，挺起腰杆做事，作为一个普通人能做的好事做尽，实际是无用和软弱。人应该为维护自己，坚强和战斗。

我处处堂堂正正的做人，勤勤恳恳、一心为公的做事，没有做一件对不起党、祖国和人民的事；我爱自己的家，孝顺父母，亲爱自己的兄弟姐妹，友爱同学、同事、朋友、学生及一切接触到的人；我和老伴儿一生为许多人做了许多好事；……最后竟遭此厄运，受此污名，实不知为何老来受此“天遣”？命运啊！为什么如此不公？！

最后，我只能呼叫：终有一天能还我以公道与清白！

就让我悄声的去吧！我们是老百姓，无力去抗争。我是个懦夫，耻辱懦夫。

沉舟侧畔千帆过，枯木前头万木春，世界还是那样美好，珍惜、切实的维护生命和你拥有的一切，大家都好好生活吧！

春节的初三、四时重病中写。

附二：

致胡锦涛的信

尊敬的胡锦涛总书记：

领导好！

深知您国事繁重，日理万机，仍提笔给您写信，实在是出于迫不得已。

我叫谷祖纲，68岁，是兰州大学退休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是著名的黄河古象的发现人之一。1980年因组织上信任，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赴日留学的访问学者。在日期间我时刻不忘党和组织对我的信任与栽培，努力学习，学业有成。多次受日方挽留，终因我热爱祖国，思念报效党和人民关爱，于82年返回兰大，后任地质系主任，仅我的学生现已有许多名当了博士导师。

在日期间，偶然与原国民党高级将领马晋三相识，因同是中国人，自然谈吐相投。也许由于我做人真诚，以及对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的研究有些专长，和其他留学生一样，受到马晋三先生的关爱。马晋三后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三十五周年受中央政府邀请到天安门观礼台与中央领导一起检阅阅兵式。

尽管我不知马晋三与国家哪位领导人关系密切，但是从我的知觉中我认为马晋三肯定不是政治上的反动派，否则，35周年中央政府怎么会邀请他来北京？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在马晋三生前我们有过一些书信上、物质上的往来。我给他送过一本书法书，马老也雪中送炭的汇1000美元资助我的科学研究。

然而正是这些人和人之间的友谊，却被甘肃省安全厅调查20年，个别人还借此大做文章。利用我和老伴儿不懂法、胆小怕事，并利用我年老体衰，身体和精神的脆弱，在2004年9月17日至23日，在没有出示传唤等手续的情况下，（他们声称）派10人（我见到9人）来京，强行将我从儿子家中带走。审讯7天，采取恐

吓、噪音、光照、不能睡觉等手段，逼供、诱供、指供。最后在折磨了7天我这个近70岁的老人后，在精神已经近崩溃的前提下，强迫我承认加入了国民党和某特务组织并潜伏下来。把马晋三给我买书、科研等一些补贴，约1万多元人民币（换算后）硬说成是20年的特务经费。由于我的一时软弱与害怕，在他们出题、指点下，被迫违心地编造虚假的供词。他们并命我在《认罪书》上写上“潜伏特务、间谍”的罪名。

2003年后10月后，我不断地向甘肃省安全厅等部门申诉，可是至今没有得到该厅领导对迫害我这知识分子的元凶的调查和惩罚的任何消息，他们仍然不断地打电话骚扰、恐吓、威胁正在北京治病的我（经此事后，我的身体、精神状况均大幅度下降）……。

尊敬的领导，毛泽东时代“阶段斗争天天讲、月月讲”的悲剧虽然早已过去，但是甘肃省司法个别腐败干警，把知识分子、归国人员当成眼中钉、肉中刺的左倾思想还大行其道，我就是这些左倾思想幽灵的牺牲品、受害者。

在此诚望领导在百忙中，对我反映的问题给予过问，并责成安全部成立对我的问题重新调查的专案组（但甘肃省安全厅的人必须回避），以还我清白之名，并对制造假案的责任人追究纪律、行政及刑事责任。我宁可死在北京，死在中南海、死在天安门的国旗下，也绝不想见那群无事生非的人！也不想成为一起人为制造的冤假错案的受害者和牺牲品。因为我是忠诚的共产党员，对党的新一代领导抱有极大希望，如果十五个工作日内仍然得不到任何答复，那我视共产党非要把我赶入国民党，这是我极不乐意的事，我将不得不把我受迫害的事实在互联网和其他媒体公开，让一切热爱良知的人，为我主持公道。

祝工作愉快！

一个有良知、饱受司法腐败折磨与迫害的高级知识分子

2004年3月5日

台胞唐存理

采访缘起

2005年1月25日，星期二，我在成都西门的金沙遗址旁访问了从台湾回来不久的唐存理先生。

唐先生高个子，黑风衣，目光阴郁，笑容苦涩，与冷雨连绵的盆地天气挺般配。我们在约定的茶房单间落坐，唐先生取下围巾和大衣，搓着双手说：“总算暖和一点了。”

我点头应和的瞬间，却蓦然从这下意识的搓手动作中，看见了若干劳改犯的影子。十几年过去了，我仍然从梦里一次又一次回到监狱，里面有一位长相同唐先生酷似的国民党特务，他在大陆潜伏了20多年，刚一露头，恢复与台湾的组织联系，就被破获了。

经国安部门审讯，此特务的接头暗号为——把沙漠改造成绿洲——于是他在狱中的绰号也叫“绿洲”。我栽进去时，“绿洲”已被劳动改造了十几年，差不多成沙漠了。

我刚要提起这个话头，以活跃一下气氛，却见心直口快的唐先生道：“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家庭背景吧。”

我在打开录音机的同时，动笔记录。

唐先生原籍江苏盐城，却于1940年10月5日出生于抗战陪都重庆。其父1932年毕业于由蒋介石任校长的南京中央政治学校第一期，为国民党元老戴季陶、朱家骅、罗家伦、陈果夫等人的学生，因此同中统CC派关系密切，也曾参加军统前身“复兴社”。唐父毕业后，即派往黔东南，任过岑巩、黄平的县长，接着升任

贵州省烟酒专卖局局长。自此平步青云，担任过庐山军官训练团教官、别动总队中队长、陪都烟酒专卖局局长、湖北省政府主任秘书，直至中央合作金库主任。在国民党政府败退之际，负责将一部分黄金美钞运往台湾。

唐先生的母亲为四川简阳人氏，毕业于国立北平女子师范大学，曾受教于钱玄同，并与刘和珍、许广平同学。曾辗转于山东济南、青岛、烟台及广西梧州等地，教书为生。1948年冬，为躲避战祸，离开丈夫，携儿带女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却不料国军兵败如山倒，作为大后方的四川很快陷入动荡之中。唐母惶惶不可终日，就以数封电报催促已准备弃家出境的唐父来川。

其时，唐父身在广州，伸腿即可抵香港，然而亲情难舍，他不顾朋友和同僚们的警告，在大溃败中逆流而上，企图接引老婆和孩子一道逃离。可事与愿违，四川眨眼之间就“解放”了。唐父于1950年初被捕，在次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惨遭枪杀。

话至此，唐先生悲叹道：“生死关头，父母都铸成了大错！”

我疑惑道：“国共交兵，按你父亲的官阶，应该作为战犯的。”

唐先生道：“在战场之外，有多少俘虏被屠杀，至今也没个确切的数字。母亲为此悔恨终生，她认为父亲没有杀人放火，只要缴械，总会放一条生路。哪料到不仅搞得家破人亡，还要殃及后人。”

我心想：“放一条生路又能怎样呢？‘绿洲’潜伏了几十年，仍然被改造成沙漠了。”

唐先生接着发出感慨：“人生跌跌撞撞到如今，虽然还没至‘名利于我如浮云’的境界，但也犯不起错误了。”

“此话怎讲？”

“人在二、三十岁时犯错，哪怕是不可饶恕的大错，到了五、六十岁，差不多会随着时光的流逝，时代的更迭，被冲刷得干干净净；可已经60多岁的人，如我，就犯不起错，哪怕不是不可饶

恕的大错，因为没有改正的机会，人们将会为一个小污点而记你一辈子。”

“这么严重吗？”

“你现在才 40 多岁，勉强来得及浪子回头，当然体味不了浪子回不了头的悲观。”

“那就书归正传，”我沮丧道，“人生若梦啊，明早醒来我也 60 多岁了。”

唐存理：父亲被镇压后，家里的顶梁柱倒了，作为“新知识女性”的母亲只能忍辱负重，靠江苏老家亲戚们的微薄资助，艰难度日，拉扯儿女。1951 年，我刚 11 岁，就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历史悠久的名牌学校——石室中学。

老威：黑五类的子女也能进名牌学校？

唐存理：政权交替，为安定人心，共产党提出了“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口号，不少旧社会过来的公职人员还参与政府的工作呢。我那时小小年纪，就知道要有出路，只能发奋读书，学好本事，为社会作贡献。我的成绩在学校一直名列前茅，并且还在课外自修高等数学、流体力学等大学课程，我在这方面有些天赋，我的理想是做个工程师。

1957 年夏天，由于毛泽东“引蛇出洞”阳谋的成功施展，大规模的反右开始了。我父母的亲戚，绝大多数成了右派。在如此“黑云压城城欲催”的政治环境下，我高中毕业，并且参加高考，结果尽在意料中——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高材生全部落榜！多年以后，我才从一位前中共教育官员口中得之毛泽东在当时的内部指示：“培养他们（指关、管、杀）的子弟，无异于栽林养虎。”

由于落榜的打击，我们那一批因家庭出身而被扫地出门的高材生经常聚在一块，边喝茶边发表对现实不满的言论。由于怀才不遇，心理失衡，有些走极端的同学甚至主张偷越国境。有个姓

叶的，还来动员我一起逃。因为我胆子小，对母亲、妹妹也比较依恋，就拒绝了。后来以叶为首，酿成一起企图投敌叛国的集团案，我无端受到连累，几乎死无葬身之地。

老威：我想起《四川文学》曾有个编辑，57 年做青年学生时被弄成右派，一时冲动，就跑到深圳。那时的深圳还是个偏僻的小渔村，他选个水草密的地方，四顾无人就下了水，不料才游出 20 多米，就叫兜头一排子弹给打了回来。后来，他以投敌叛国罪，坐了 20 多年牢，平反出狱时已 50 多岁了。

唐存理：可叶没等到平反释放，就死在狱中了。这起案子判了二十几个人，许多人我都不认识。

老威：你在社会上流落了几年？

唐存理：高考落榜到 1959 年底。由于家境贫寒，我一直打临工，其间也在小学和民办中学代过课。被捕之前我正在成都市交通局平车处，地点是南郊红牌楼。我们当时修土铁路，干得热火朝天。

老威：什么是“土铁路”？

唐存理：这也是 1958 年大跃进中诞生的奇异风景——中间是一条简易铁路，铁轨上趴着三、四节货厢，你猜用什么作动力？

老威：火车头嘛。

唐存理：汽车头。骑在铁轨两边，吭哧吭哧拖货厢，远看像机械马拉车。可铺铁路要耗费大量人力，我们干了几个月，辗转了好几个工地，直到 1959 年 12 月 29 号。

那天上午还在卖苦力，下午我就被暗中看管住了。接着在工地食堂召开几十人大会，领导和积极分子先后发言，把斗争气氛搞热了，才大吼一声：“把反革命分子唐存理抓起来！”

我的胳膊被擒住了。此时一辆小轿车驶进工地，那年月，这非常扎眼。从车内钻出一高一矮两位便衣公安人员，他们目不斜视地走进会场，从积极分子手里接过我，转身押入轿车后座。

群众都涌出会场来看戏，轿车发动了。接着绕出工地，经过大街，驶入成都市中级法院的大门，就停在院坝里。而我下了车，被继续朝前带，直到拐了几个弯，才在挂着“成都市劳动教养办公室”的平房前遵命刹步。

从下午4点折腾到傍晚，我已心力交瘁。劳教中转站有许多野兽笼子一般的监房，我被丢进其中一间，面积约10来平方米，却羁押了20多人，满得像开了锅的汤。起夜蹑手蹑脚靠近旮旯里的尿桶，倍觉艰辛，待尿完折回，却寻不见原来的铺位了，只好支着半边屁股作思索状。

我在这儿关了6天，熬得双眼通红，却辗转难眠。我以为自己会同许多人一样，判劳教，去边远苦寒之地，再也回不到成都母亲身边了——窒息般的绝望一阵阵袭上心头。

1960年1月5号晚上，我被唤出监房，押解至劳教监所外面的一个十几平方米的房间。靠里的条桌后，并排坐了两个人，我猜，大概是审判员和书记员，而旁边小桌后，坐的就是陪审员了。审讯过场走了约10分钟，无非是对照已打印好的《判决书》——核对姓名、年龄、住址、个人和家庭成分，验明正身。

我双手颤抖地接过《判决书》，见上面的日期为“1959年12月30日”。

老威：劳教是公安机关说了算，还需“判决”吗？

唐存理：劳教是不需要法院判决，只要一纸《劳动教养通知书》就搞定了。但我判的是管制。

老威：群众管制也要法院判决？我可是第一次听说。

唐存理：不是像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那样，放在当地管制，而是管制劳教，比劳教的性质更严重。

老威：我还是不明白。

唐存理：劳教在名目上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走法律过场，因此派出所的民警瞧你不顺眼，都有权送你去劳教；而管制劳教

是“敌我矛盾”，有正式起诉和判决，可管制的地点在劳教农场。

老威：算不算正式的劳改犯？

唐存理：程度上稍轻吧？不知道。总之在当时，判管制劳教的不少。也不上正式的法庭，连《起诉书》和《判决书》都是一块儿给我的，辩护就更别提了。在我的印象中，律师这种新鲜事物，也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有的。

《判决书》的原文是这样的——

唐存理，男，现年 19 岁，本人出身学生，家庭成分伪官僚。对我党有阶级仇恨。攻击我社会主义制度没有民主，攻击反右斗争是压制民主。与叶××、周××等纠集成反革命集团，企图从广州偷越到香港（或西藏偷越到印度）等等……判处管制 3 年，送劳动教养。

落款为“成都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而公诉机关为成都市公安局，局长林佐夫。

老威：你的罪状太不过硬了。

唐存理：也就喝茶的时候发过几句牢骚，或者别人发牢骚时我附和了两句。至于偷渡，纯属无稽之谈。可就因为这个，我劳改了将近 20 年！

老威：你没想到会去这么久？

唐存理：我太年轻了，还随身带着数学教程，想在里面自学成才呢。

老威：1960 年初，全国正发生着大饥荒，饿死了不少人，你是怎么熬过来的？

唐存理：记忆已经很模糊了。

老威：怎么可能呢？当时我才两岁，饿出了水肿病，差点死了。直到如今，做梦都怕挨饿。

唐存理：我不是张紫葛那样的作家，把人吃人的细节对你描述得身临其境。我只是个记忆很糟的普通人，脑子里有就有，没有也编不出来。我先被送到雅安里面的天全硫磺矿。那是大山区，一年四季阴霾密布，气温很低。劳改犯从海拔极高的地方背矿石下来冶炼，毒烟弥漫，经常出事——我曾亲眼见一场大火烧死几十个人。幸而我体质太差，就分在蔬菜队，不久，就饿出了水肿病，住进了医院。

老威：当时的粮食定量是多少？

唐存理：27斤。

老威：干部的定量也是27斤？

唐存理：这是小秤，也就是16两为1斤，金裹银，红苕为主。

老威：金裹银？

唐存理：也就是玉米粒煮饭，金灿灿的一锅。粮食不够吃，有经验的犯人就凭生存嗅觉，四处偷东西，田里、地里，甚至入土三尺，只要能进嘴，都去掏。我算是个读书人，无贼心贼胆，只能靠定量干撑着。当然也学着去扯些野菜，迫不及待地填肚子，结果上吐下泻。在医院住了一年，差点就死了。我一米八几的个子，瘦得只有79斤，形同枯骨。连呼吸都累，一张皮扯得跟拉风箱一般，滋滋滋的。

老威：你周围有饿死的人吗？

唐存理：我饿得神智不清，不晓得四周进出了多少人。可医院的后面山脚就是野坟地，有时一车拉走几具尸，咚咚往事先挖好的坑里扔，那声音隔墙传进病房，朦胧中就听人议论：“扔大炮了！”一会儿，又有人用手电射我的瞳孔，检查是否活着。我怕自己被“扔大炮”，神经下意识地绷紧了。

老威：我早年当卡车司机，经常从那一带翻二郎山进康巴藏区，不知你说的硫磺矿在哪个位置？

唐存理：地名叫脚基坪，有1万多犯人，主要是背矿和炼矿。

记得吴弘达写过“中国的古拉格群岛”，书里也有一张劳改营的分布图，但这远不是全貌。中国到底有多少监狱和劳改农场？恐怕连司法局的官员也弄不清楚。区、县、市、地区、省、中央，我估计方圆几百里就有一座监狱，这还不算私设公堂。

老威：你能从大饥荒年代的劳改营里活出来，真够幸运。

唐存理：但我奄奄一息，许多场景、许多记忆已经被抹去。一人独处时，某个褪色的画面，某个亡友的名字会突然闪一下，搞得浑身起鸡皮疙瘩，可真要追溯，就是抓破头皮也想不起来。就像火山灰烬，还热得烫手，却已看不见、说不出毁灭性的具体细节。

总之，脚基坪毁于山洪爆发与硫磺矿的火灾，死了太多的人，连警察的生命也受到威胁，才不得不转监。62年往大凉山普格县的荞窝农场迁，一长串的密封囚车由公安部门押送着，经过雅安、荣经、汉源，再沿大渡河向上。

老威：你不能像张紫葛那样讲得再详细一点吗？

唐存理：我真的不是作家，记性太糟。我乘的病号车，挤在身边的都是一具具骷髅，偶而抡一抡胳膊，才发觉是人，不过瘦得不行了。一张皮，几根筋，一把骨头。不单病号，所有从脚基坪幸存下来的犯人都这样。颠簸了10天左右，路上能偶而望见衣衫槛褛的老百姓，那真是个十室九空的年代呵。荣经县委书记姚青你知道吗？他可是全国响当当的人物，因为在他的管治下，荣经县的饿殍高居全国之冠，最后连抬尸体也找不到人，就连死人带房屋晾着，恶臭四溢，直到某一天房顶朽了，轰地塌下来。后来，这个鬼见愁的姚青书记被中共当作替罪羊，判了18年徒刑。

老威：你见过这位姚书记吗？

唐存理：在荞窝农场，我曾与国共两党的一些将军、官员关在一个队，其中就有这个姚青。当我问起饿死人的事，他还不好意思。据说他后来不服判决，一直申诉，还平了反。

老威：申诉理由呢？

唐存理：他觉得是上面的政策错误，自己只是个执行者，不该负主要责任。现在这段历史成了中共的糊涂帐，而芝麻官姚青或许早死了。

1963年1月，我在莽窝农业中队解除管制，继续延长劳教……

老威：你的3年管制刑期已满，为啥还要延长劳教？

唐存理：连一纸通知都没有，就口头宣布一句“屡次不服管教”，就继续了。直到1965年，我才拿到《解除劳教通知书》，此时，我已从莽窝转到布拖县的乌依铅矿就业。

老威：你愿意“就业”吗？

唐存理：从大城市流放到穷山恶水的苦役犯，谁愿意留下来就业？待遇和犯人一样，只是多了16元的工资。但那时的钱还是值钱，我也就得过且过地混下去。

可不久，就业人员中的“四清运动”又开展了，由于“反动本性不改”，我又被揪了出来。罪状主要是：1，攻击三面红旗是胡说八道；2，为彭德怀鸣屈叫冤（我认为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完全是罗织罪名，陷害彭德怀）；3，散布江青同志的谣言（我曾对人讲江青是30年代的影星蓝苹）。当时文革即将开始，许多人认为我至少要判20年，但关押到1967年3月份，风头弱了些，就正式宣判为8年刑期。

老威：经过1967年的“二月逆流”，公、检、法已经瘫痪了吧？

唐存理：我是1966年10月遭逮捕的，抓进集训队关小间，一个监舍十几个人，除了放风，大小便都在里面。每天打盘腿，腰板挺直，除了读报纸，就是写反省材料。经过四、五次提审，5个多月后，我从农场的狱政科长手里接过了《起诉书》，还没回过神，又给了《判决书》。上面除了刚才提过的罪状，又戴了“学生出身，家庭成分伪官僚，与我党有杀父之仇”的帽子，后面还添

上“散布一系列反党言论，配合‘三家村’对我党的进攻，企图变天复辟，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结尾。

《判决书》落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普格县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判时还比较优待，没绑绳子，就把我从小间唤到预审室，直接递来两页纸。连念的过场都省了。

此时，乌依和荞窝两个农场合并，我又回到荞窝，回到农业中队种田和教书。我在里面文化算最高的，为许多农民扫过盲。大凉山有许多彝族人，51年叛乱，组织反共救国军，因此入狱，劳改了许多年。我甚至教过协助杀害丁佑君烈士的凶手，目不识丁的文盲，主犯毙了，他是从犯，判了无期徒刑，后来在里面居然做了卫生员。

1974年，在继管制、劳教之后，我第三次刑满就业，分到副业队。原以为永远回不到母亲身边了，因为思想犯们对中共劳改政策心知肚明，就是要让你一辈子刑满而不释放，自生自灭。后来读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和《癌病房》，才知道这套“就地处置”的方式是从斯大林那儿学来的。

如果不发生六四大屠杀，我会同绝大多数受尽折磨的读书人一样，永远对邓小平感恩戴德。正因为他力挽狂澜否定了文革，否定了阶级斗争，我才于1979年38岁时获得平反，回家尽孝。母亲是1987年去世的，享年84岁，其时我已经商多年，丰衣足食，我想母亲当含笑九泉了。我后来意外的发展也是她在苦难中修持的结果。

老威：据说你平反后还辉煌过一段？

唐存理：我同时平了两个反，第一个是1966年在荞窝农场，因反革命言论罪被判8年；第二个是成都市西城区法院判的管制3年，送劳动教养……

老威：按理，你管制后延长劳教两年，还该平第三个反。

唐存理：这个政权欠的烂帐太多，如果每一笔都要还清，早

就破产了。所以我当时觉得不错了。养窝农场还补发了 8 年的就业工资，3000 多元。

母子团聚那年，我都 38 岁了，一无所有。于是经一位同监难友介绍，到成都郊区一家建筑公司做泥瓦匠，由于早年打下的数理和制图功底，不久就当上了技术员。我不敢懈怠，废寝忘食地扎在工地上，指挥修建过好几栋大楼，终于从经济上打了翻身仗。

我前妻比我小 17 岁，同为石室中学相隔 20 年的校友，我在西郊 132 厂的建筑工地当技术员时，她是会计。1980 年，她去石棉县一个劳改农场探望自己的右派反革命老师茅世禄，恰好我的同学吴康立与茅一个队。经过交谈，原来茅老师竟是我们共同的物理老师！错综复杂的师生、师友情令人意外的惊喜，更令人惊喜的是，吴康立托她带信给我，并且说：“唐存理是个好人，你帮他介绍个对象吧。”

我前妻介绍的对象就是她自己，她骑着自行车，好不容易在一条深巷子里找到蜗居的我，竟一见钟情。稍后谈婚论嫁，所谓的婚礼简单得无任何女方的亲属及朋友参加，个中缘由，我想一是因为年龄的悬殊，一是因为人们对已平了反的思想犯还是心存歧视，不愿与我公开地沾边。

老威：近不惑之年才成家，不容易啊，老唐。

唐存理：所以我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有较深的危机。1984 年，我有了一个女儿，于是从建筑工地撤出，自己凭 2000 元钱创业，开了一家五金机电商店。

由于我的技术能力强和她善于经营，夫妻俩珠联璧合。头一个月，还清借款；一两年后，就发展成有两层办公楼的著名五金交电公司。我被媒体和官方誉为“锦城商界的一杰”。

老威：在拜访你之前，我查阅了一些上世纪 80 年代的商业资料，在政府认可并大力表彰的企业家中，你的位置显著。你在无背景、无靠山、无人际关系的情况下，全靠夫妻俩打拼，最终竟

拥有几十员工，上千万的流动资产。80 年代的上千万相当于目前的几个亿吧？

唐存理：我称得上是共产党统治下，第一批靠原始积累白手起家的资本家，当时的赚钱环境比现在健康，凭能力，没一点水分也能做大。另外，我父亲在国民政府时期就有经商的才能，如果他当时从广州只身出逃，如今说不定早就身家数亿了，因为他已被国民政府确定为台湾最大的官营企业——台湾糖业公司的董事长。

老威：这也算一种商业的遗传吗？

唐存理：外表分析是遗传，骨子里却是宿命，因为我毕竟与现政权有杀父之仇。而意识形态的环境令我在经商之余，酷爱读书，关注社会和政治的变革。我对刘宾雁、苏晓康的报告文学爱不释手，并且还热衷于公益事业……

老威：我知道有不少政府官员到你的公司视察过。

唐存理：我经营五金、机电、建材等数百种名牌商品，销售网络遍布全国，真有“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感慨。但 1989 年的学潮因胡耀邦的逝世汹涌而来，我犯了商人的大忌，卷进去了。

老威：你与北京四通公司的总裁万润南一样，有政治诉求？

唐存理：空有一腔爱国热情而已。那个单纯的年代已经一去不返了，天安门的枪声把民众对共产党的改良幻想全击碎了。

老威：六四之前，我就一个文学野心膨胀的诗人，不懂任何政治。

唐存理：天府广场人山人海，有我这种人生背景的成功人士，当然与学生和市民站在一边。我给绝食学生捐献了很多钱，还数次与公司员工一道，驾着所辖的大货车送食品和饮料，还公开发表演讲，为学潮鼓劲。我甚至以公司的名义，在广场上扯起巨型横幅：“打倒李鹏，解除戒严！”

老威：商人和政客一样，有时是需要审时度势，见风使舵的，你可太不明智了。

唐存理：也有不少朋友劝我在商言商，没必要卷入政治，但 80 年代的整个社会环境，使人还能保持那么一股正气和热血。六四一开枪，一切都急转直下，原来共产党的土匪无赖本质永远不可能改变！改良的气数已尽，我在公安部门的一位朋友私底下警告：“当局要抓捕的黑名单上有你。”于是我只好携妻带女，立即出逃。

老威：你已留好退路了吗？

唐存理：我坐牢 19 年，再也不能栽进去了！况且我已有家室之累。

老威：你从广州偷渡出去的？这也算完成了你父亲未竟的遗愿。

唐存理：在六四之前，我就拿到了《往来港澳通行证》，准备去香港探亲；后来铤而走险，侥幸从香港出了关。

老威：你在香港有亲戚？

唐存理：我在台北有个堂兄，比我大 20 多岁，其早年跟随父亲，情同父子，所以堂兄一直在寻找我这个弟弟的下落。他在台湾的政界有许多关系。

老威：你算是投亲靠友？

唐存理：一言难尽。在风声鹤唳中逃到香港，我立即通过“支联会”向台湾和西德政府提出“政治避难”，我在学潮中拍了大量激动人心的照片，同时也有各方面的资料，包括台湾情报部门自己获得的“情报”，足以被认定为“对大陆民运有贡献的人士”。

老威：还比较顺利。

唐存理：当时《中英联合声明》已经签署了 5 年，中共的势力日益渗透，而港英当局出于自保，也不敢过分得罪北京，所以

逃亡到港的异议人士处境维艰，随时面临被遣返的可能。

老威：可从香港出去的民运精英还是不少，90 年我因《屠杀》《安魂》案准备出逃，朋友们找的渠道仍是从深圳蛇口潜至九龙。

唐存理：具备国际影响的头面人物遇到的麻烦自然少些，可我们的在港签证只有 17 天，超过 17 天，即为非法居留，一旦查获，就立即遣返。所以，虽制度不同，但香港远不是自由世界。我们一直躲藏在沙田附近一位朋友家，足不出户 3 个多月。

老威：自己关自己的禁闭。

唐存理：在“政治庇护”批准之前，不能出一点纰漏，许多人就是在这段时间被警察逮住遣返的，不问任何理由。可尽管如此非人道，移民潮还是一波比一波猛。1989 年 11 月 8 日，我女儿满 5 岁，11 月 9 日，我终身难忘，因为这天我女儿被警察抓走了！当时她正与香港朋友的同龄孩子们一块玩耍得高兴，一伙港警突然闯入，查问唐存理夫妇的下落，可能是他们接到有关线报了。刚好我们不在，他们就挨个盘问孩子，我的女儿被迫开口，语音不是粤语；他们又问出她是唐存理的女儿，就把她带走，羁押在一个关小人蛇的地方。

这一事件在香港引起轩然大波，《香港时报》及时登载了该报蔡姓记者的文章：《警方闯入民宅，带走五岁女童》，我们焦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不得不出面，紧急联络台湾救总，即“中国大陆灾胞救济总会”香港办事处。

老威：灾胞？

唐存理：长期以来，海峡两岸的政府都认为对方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以，“灾胞”是台湾对大陆难民的统称，既包括一般的偷渡客，也包括民运或异议人士。其时，蒋介石父子“反攻”和“光复”的时代已一去不返，国民党改组，有台湾背景的李登辉当选为主席，稍后又荣登总统宝座，形势大变。

老威：那么“去中国化”在很多年前就露出端倪了？

唐存理：对，由于当局的逐步引导，加上中共采取的遏止台独的舆论高压，“去中国化”的“台湾共和国”之构想在民众中已深入人心。虽然在六四屠杀之际，刽子手政府遭到国际社会一致的谴责，作为与大陆有割不断血缘的台湾，也不得不表态声援民主运动，但落实到接纳政治流亡者，李登辉当局却采取了与二蒋截然相反的冷漠态度，把门坎提得非常高。如此影响深远的民主浪潮，台湾接受的“符合条件”的“政治避难”者却不超过 14 人，而作为全家悉数收留的，却只有我们一户。

老威：你们真够幸运的。

唐存理：也算老天的眷顾，当我们联络救总办事处的张主任时，他答复：台湾入境证已办好，随即会寄来，并且答应马上同港警交涉。晚上，我们的女儿被送了回来。我抱住她亲了又亲，问她哭没哭？她答没哭。我假装不信，五岁孩子就替爸妈坐了两天牢，咋会不哭？她说，警察叔叔没打我，我还问他们：眼镜在哪儿，压坏了妈妈要骂。我还说：想家了，快送我回去。

没过几天，西德也批准了我们的避难申请，但我们还是选择去台湾，当时我已 49 岁，去西方还得学语言，从头开始。还是去与自己同种同根的地方，也算完成了被共产党杀害了的父亲的宿愿。

1989 年 12 月，我们乘坐华航班机抵达台北，可谓历经了沧桑。

老威：看来在 97 回归之前，香港早就不是自由港，即使你们这种符合条件的，在批准之前，也得贼一样躲起来。

唐存理：父亲的亡灵保佑吧。六四之后，政治难民通过各种渠道涌入香港，可一旦被港警逮住，不问青红皂白就遣返，太可怕了，太辛酸了。我身边有不少北京来的学生，哭着喊着挣扎着，没有用，只要“榜上无名”，就关起来，有什么道义可言？

老威：我在看守所遇到一位中学美术教师，叫刘季华，学潮期间卷入街头政治，六四镇压后潜逃香港，结果被遣返收容好几

个月，吃尽了苦头；第二年，他又写了一篇《国殇周年祭》，满重庆散发后，又在潜逃过程中被逮，被判刑3年；出狱后再次越境，终于成功，去了安徒生的故乡丹麦。若干年前他写信给我，称赞丹麦的冬天，说比北京的冬天暖和许多。

唐存理：这位姓刘的也算幸运儿，只要逃到自由世界，并被接纳的都是幸运儿，因为人的寿命有限，同独裁政权耗不起啊。后来我才知道，我堂兄为了救我于水火，动员了所有的政界关系。你知道现任台北市长马英九吧？他是国民党的副主席，才50多岁，称得上台湾最耀眼的政治明星——他也曾做过蒋经国的英文秘书。我堂兄通过我父亲的同僚周天固、滕杰等人，写信给马英九，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周天固甚至说，如果台湾不接受唐存理这种我党国先烈的子弟，我就个人出钱，哪怕买假护照，也要把他弄到南美洲去，以逃脱中共的魔爪。

老威：这个周天固是什么人？

唐存理：周天固做过蒋经国的新闻秘书和新闻处长，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与我父亲是中央政大的先后同学。我父亲当县长时，他还在当科长。去台后，由于身居要职，影响很大，人称“周三爷”。由于他和最后一任南京市长滕杰等人的活动，李登辉不得不表态。我现在手里还保存着一份马英九给周天固的亲笔回函：大陆民运人士唐存理及一家三人，我们一定要给予重点的关注。等等。虽然写得比较含糊，但意思是明显的。

老威：我听来听去，觉得这种官场斡旋极微妙，表面上慷慨激昂，内里却潜涌着一阵阵的世态炎凉。

唐存理：李登辉上台后，对蒋家父子的班底进行换血，如陈立夫、周天固等人均已失势，但其声望和影响还在。我这个堂兄是在永和市警察局长任上退休的，关于他，还有一个故事：1949年上海被解放后，他本来要响应新政权的号召去“自新”，不料来到国民党军政人员登记处一看，心里凉了半截——排队自新的几乎是上

校以上，中校、少校屈指可数，而自己属于国军嫡系部队的中校，弄不好自新不成，还要逮住杀头。于是立即回家，带上老婆，星夜潜出层层岗哨，从小路逃到尚未“解放”的舟山，然后去了台湾。仓惶之中，把自己的女儿也丢在了大陆。

老威：你堂兄也算几十年的流亡者。

唐存理：他是我父亲带大的，对我惺惺相惜，所以我们到台湾也是变相的投亲靠友。我们在“救总”的招待所住了两个月，就凑款开了家小公司自谋生路，我虽然以八九民运的名义“政治避难”，可民运也不是一种糊口的职业啊。

老威：你亡命天涯，那你们在大陆的公司呢？

唐存理：转到我前妻姐姐名下继续，不过，早没有当年的风光了。我刚到海外时，对民运还挺关注，也见过不少学生领袖，稍后，我感到深深的失望。那种妄自尊大，那种争权夺利，都离我的做人准则太远。所以，虽然我在台湾一时成了新闻人物，但我不怎么参加政治活动，除了做点小生意，就是读读书。转眼间十几年过去，我的女儿长大了，入读了教会学校；我与前妻也因思想观念的分歧各奔东西。由于我一直低调，只做生意，不管政治，大陆当局也对我往来两岸采取了默许的态度。

风风雨雨几十年，回头一看，人生真如过眼云烟。

老威：你在香港躲避了四个多月，如果那时被逮住，就没有今日的回头一看了。

唐存理：对啊，那四个多月，除了蜗居在朋友房里看书看碟，不敢露面，一有风吹草动，就得准备换地方。我一心想的是，绝不能回去，不能坐第二次牢，宁愿自杀也不能！

老威：你对自己的台胞身份满意吗？

唐存理：这是个尴尬的身份。首先，我对共产专制深恶痛绝，其次，我对陈水扁和台独也不以为然。但目前在岛内，百分之八十的民众都倾向于台独。反感中共的战争讹诈。拿陈水扁的话说：

“民主的台湾怎么能统一于专制的中国！”我在两边都找不到归属，在那种高唱“亚细亚的孤儿”的群众集会上，甚至有人责问我：“为什么不说台湾话？”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说台湾话呢？台湾受中共压迫，难道我就没有？我逃到自由世界，却眼睁睁地盯着国民党的近百年老店风雨飘摇，所谓“同种同根，血浓于水”只是一厢情愿罢了。

大陆这边有我的亲情，有我的朋友，有我的记忆和存在的价值；而在台湾，除了生意，谁和你谈六四？谁和你谈劳改？谁和你谈赵紫阳？你表面上成台胞了，里面的五脏六腑还在专制，在意识形态的笼罩下。

老威：六四过去已经 15 年，新一代也不会和你谈赵紫阳了。

唐存理：时间在磨损记忆，就这样吧。

老威：我感觉你已经忘了许多。

唐存理：前不久我读过吴弘达的书，震惊了一下。我今天愿意跟你谈，也与此有关——在没有全忘光之前，还是留一点吧。

作曲家王西麟

采访缘起

作曲家王西麟的名字，我是在 2001 年 2 月听说的。那时《中国底层访谈录》刚出，在北京开书评会，因此认识了前来弹唱助兴的梁和平、赵莉、何勇等人。由于梁和平的生动刻画，王西麟三个字在脑子里扎下了根。

老梁是这样说的——官方也知道王西麟在海内外的影响，北京市文化局 97 年就与他签了合同，按其中规定，两年后筹钱推出他的系列交响乐演奏会。可好不容易熬到了 3 年半以后的 2000 年 12 月 5 日上午，官方却突然下达了“取消音乐会”的通知。这时候，排练已进行一个多星期，瑞典的首席小提琴家 Igeduss 正飞抵北京，也就是说，好不容易筹来的钱已花出去一大把。

忘乎所以的老王顿时六神无主，像一头悲愤的熊瞎子扑入我家门，老远就连叫：“坏了坏了，和平，坏了！”我给他倒水，请他坐下，他偏要站着讲。原来是上月 24 日闯的祸，那是音乐会排练的第一天。早上九点，指挥谭利华为了表达对作曲家的敬意，就即兴请衣冠楚楚的老王对北交几十号演奏员讲几句话。老王稍示客套，就登台以洪亮的嗓门向音乐大厅宣告：“20 世纪过去了，20 世纪发生了许多大事，有两次世界大战，科技伟大的进步。但我认为，在人类发展史上，20 世纪最大的事情就是——共产主义被人类苦苦追求，最后又被无情地抛弃！”

一言既出，万马齐喑，可我们的老王还在彬彬有礼地向发呆的大伙鞠躬呢。我埋怨他一大把年纪还管不住嘴，把最好的

机会给葬送了：“您的交响乐何时才能让更多的国人听到！”

于是老王开始小孩一般检讨，什么“熬夜创作，头痛难忍”啦；“有人告密”啦。“可关键的关键，”他突然一脸严肃道，“我忘了在最后补上一句‘中国除外’！”

2004年大年初四，我终于在梁和平家中听到3年前被禁演的《第四交响乐》，又名《世纪悲情》，以及《黑衣人》《铸剑》等作品，还聆听了王西麟声震屋瓦的民歌个唱和即兴演讲，身心为之倾倒。

于是在芦苇、梁和平等心热者的极力怂恿下，我果真在2004年1月31日下午至2月11日，六入王西麟偏僻、狭窄的家进行采访。此前，在饭馆里喝过一次酒，也算非正式摸底访问。

王西麟今年67岁，性若赤子，喜怒无常。他在对话中频频泪下，继而弹琴示唱时过境迁的曲子，以刺激几近淡漠的记忆。他自揭伤疤，坦承了在社教运动中的“告密行径”，并深表忏悔。这种毁容的勇气，在几代知识分子中都是罕见的。但我要说，正由于此，才有了王西麟晚期堪称“声音证词”的交响乐。

老威：说起来很惭愧，我与同时代的绝大多数文人一样，长期对本土的交响乐只略知皮毛。小时候，经常在革命故事影片的末尾，看到“中央交响乐团，指挥：李德伦”的字幕；二十几岁做诗人，为了凑寻根文学的热闹，也听过瞿小松、谭盾和郭文景；可印象最深的还是《黄河大合唱》，“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之类，有意无意听过上百遍，耳朵都起茧子了。至于您，不好意思，我在上前年才晓得名字——经过梁和平和余杰的嘴巴。

梁和平说：“王西麟是中国唯一把握了交响乐灵魂的大师。”将我骇了一跳。

王西麟：你应该听，必须听交响乐！你应该听，必须听肖斯塔科维奇！潘德列斯基！拉赫玛尼诺夫！柴可夫斯基！多么伟大的音乐，多么深沉的痛苦！中国思想文化界却没有耳朵，不听，不懂，这真是最大的缺憾！

老威：我听过拉赫玛尼诺夫——那希那希那索法索咪……沉郁的曲调，铁锤一般缓慢起落的波涛，您的《第四交响乐》有伏尔加河的影子。本来我当时就该听，可惜，一直拖到三年后的前几天，我才在梁和平家里听到了。

王西麟：怎么样？

老威：非常厉害，令人瞠目结舌！后来又把您的碟子拿回去与芦苇一起再听，渐渐觉得您的音乐完全在演绎你的经历，是一部特殊的个人证词。

王西麟：太对了，我的音乐没有柔情，没有布尔乔亚，它是一个漆黑一团的大湖，什么都从周围朝里面灌，眼泪、血，泥巴，叹息，惨叫，都朝里面灌，你说它能不重不深么？生存或者死亡，哈姆雷特说过，这是一切伟大艺术的源头，其次才是爱和恨。可许多娘娘腔的艺术家说，爱就是一切，有了爱就有了一切。放他娘的狗臭屁，当你活都活不了，哪来的爱？六四开枪，死伤那么多人，你说一千句爱也顶不回一颗子弹。动物也会爱，猩猩，大象，甚至狗，都会母爱和性爱，您能说他们的叫声是音乐、画或者诗？

老威：我从《第四交响乐》中听出一种乡下的哭腔。

王西麟：那是我60年代发配到山西雁北地区搜集到的一种哭坟的调子，以后又把上党梆子融进了这种悲调，我在第三、第四里也用了，原调是“可怜我那兄弟呀”！年轻的女声，背后配有原始的唢呐。到了第四，哭腔延长了，整整9分钟，眼泪模糊成

一片灰濛濛的河流，翻滚的脑袋，没有脸，没有耳朵，看不见任何表情，只有 9 分钟无尽的泪！八把大贝斯，一直低下去，不能再低了，沉得不能再沉了。这是什么？这就是地方戏和民歌。几千年就这么一段，一首歌儿，哎呀呀，这三个字，人类几千年也没变。可突然之间，大鼓，哐啷哐啷，砸下去！把贝斯声带出的泪全砸掉！政治，老毛，运动的绞肉机咔咔响，您被抛进黑屋里，双眼蒙布，喳喳、巴巴、剥剥、各各，这些老鼠般的声音，议论，告密，怒斥，揭发，咆哮，打倒！用脚往死踹！鞭子抽，啪啪，打得你无路可逃！吐唾沫，呸呸！你的脸粘满浓痰，埋下脑袋，头发里全是浓痰。来不及擦，呸呸！通通！拳头又来了，揍你的有男人，也有漂亮姑娘，昨天还做你的学生，今天脸蛋就叫革命运动搞扭曲了，满口脏话。哗啦！最会打人的是一拳捅在软肋上，半天喘不过气，遍地花！

数不清的脚踢你，暗箭把你射成刺猬了，朋友的，学生的，同志们的！你趴在粪坑边，一刹那经历了悲剧、喜剧、丑剧、神剧、肥皂剧！垮了，尊严垮了，我就写屁股颂……

老威：你的音乐是控诉？

王西麟：不仅是控诉，还要复仇，像《黑衣人》，一个不放过。

老威：在想象里？

王西麟：在精神上。记得有一部苏联电影，“解冻”后拍的，一个孩子问在斯大林时期当过狱警的爸爸：“您在集中营时，从背后向犯人开过枪吗？”爸爸避而不答，孩子就再三再四地扭住问，最后这个爸爸受不了了，就跳楼自杀了。还有《悲惨世界》里的沙威警长，忠于职守，不愧为专制政权的一条好狗，结局也是受不了而跳河。而中国呢？中华民族呢？这些人在街上，在饭馆里，在小轿车内，他们或许整过人，告过密，为了往上爬，把别人踩得死去活来。那些杀张志新的人，杀遇罗克的人，如今却活得理直气壮，没有孩子站出来问他们过去干了什么？整过谁？

乌纱帽和钱袋沾没沾血？这些住洋房，开洋车，功成名就的好父亲呀，想到过忏悔吗？像托尔斯泰在《复活》里写的……

老威：那您是怎么“复活”的？王老师，我们从头说起好吗？

王西麟：我1949年就参军了，从12岁到20岁，一直生活在革命军队温暖的大家庭里，受大同志无微不至的爱护。我对共产党的感情本来根深蒂固，因为我的音乐基础是部队打下的，组织上见我是棵好苗，就把我从西北军区调出来，送到北京，进中央军委军乐指挥专科学校的教师预备学校，直到考上贺绿汀任院长的上海音乐学院，才算离开部队。

老威：一帆风顺嘛。

王西麟：57年进高校，我依旧不脱黄军装，并积极投入反右运动，很快就当选为学生会和共青团的干部，还代表上音参加上海市社会主义建设青年积极分子大会。我鄙视白专道路，仗着身体壮，力气大，将音乐大学当作劳动大学，挖河泥，挑担子，垒炉子，炼钢铁，什么都一马当先。那是一种着了魔的时代风气，炼钢炉就竖在操场，连宿舍的铁窗子都撬去炼。可以说，我在三年级前，基本没练功课，校内像个大工地，也没音乐气氛。直到60年下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不搞大跃进了，教学才恢复正常。

老威：缺了那么多课，咋办呢？

王西麟：我当时有大梦初醒的感觉，因为所谓的白专尖子，几乎都是为了音乐而考进学院的资产阶级，音乐世家出身，转眼之间，人家在国际上比赛得奖，拿奖牌，又成了为国争光的香饽饽，比如洪腾、殷承忠。而我，再怎么紧跟时代，也是土包子，大老粗，被漂亮的公子、小姐们瞧不起。况且，我学医的哥哥精神失常，饿死在兰州，我姐姐当了右派，因不服上诉，升格为现行反革命，我也马上不“根正苗红”了。心里窝火，只好暗下决心学技术，与政治互相疏远。开始是独自摸索，听资料，尝试，

毕业前的一年，碰见留过苏的瞿维，对我悉心传授，专业进步，成绩一下子就名列前茅。

老威：据说你创作了《四重奏》？

王西麟：当时没有作曲的主科老师，我学习的主要途径是上音图书馆，我分期分批，大约啃了 30 多部四重奏文献，比如米雅柯夫斯基，肖斯塔科维奇，格里格，菲里宾科等。作了大量笔记，积累了较多资料。于是在 1961 年暑假，悄悄躲进琴房，开始潜心作曲了。挥汗如雨 40 多天，我到底完成了三乐章 25 分钟的《四重奏》，并由丁善德院长的小女儿，女子四重奏组的丁芷诺安排了排练并逐段录音，这在校内有了影响。

老威：可谓三年寒窗，一举成名吧。

王西麟：作为学生和学校，这都是了不起的成就，但是在毕业鉴定会上，我却成了反面角色，遭到同学们的一致批制。正如我几年前鄙视白专，反击右派那样，大伙指出：“王西麟辜负了党的培养，一心走白专道路，已滑到危险边缘。”特别是过去同为积极分子的学生干部，竟拍着桌子斥责：“你快成为右派了！”骇了我一大跳。

老威：您果然从左滑右了？

王西麟：没有，只能算从不务正业里摆脱了出来，懂得了交响乐是西方工业文明的产物，而非下乡采风的产物。马克思讲共产主义的基础，是研究了从圈地运动到大工业社会的 600 年历史，600 年资本积累，而非老毛号召的 15 年超英赶美。交响乐和民歌的差别，是数百年文化和历史上的，而非阶级歧视。挑着粪桶，砍着树，赶着牛车能奔共产主义吗？当然，那是一个在村里打转的农民共产主义。

老威：您思想这么超前？

王西麟：几十年后才认识提高，成为右了；而当时，不过年少气盛，觉得受了压制。毕业分配到中央广播乐团，“天之骄子”

的心态又复萌，觉得自己所学的与广播民族乐团不配套。我以不熟悉民乐为由，在招待所赖着，不服从组织调遣去“民族乐团”，僵持了半个月，领导只好改派我去“管弦乐团”。

老威：有啥不一样么？

王西麟：离群众文化远一点，就离交响乐近一点。我为了进管弦乐团，要尽快完成我的第一交响乐，使用钢琴创作是理所当然，可领导为了刹我的傲气，根本不予理睬。有一次，我偶然发现有一台旧琴堆放在杂屋间，一时冲动，就招呼了几位年轻人，合力将这废弃的琴请出来，准备搬到我的工作室，修理一番后使用。不料轰隆轰隆刚推到走廊中途，就惊动了一位芝麻官员，他挺身拦住：“领导批准了吗？”我答没有，钢琴又被惊天动地的推回原处。这一来，我给团里的印象糟透了，并为此被遣送至号称“13号基地”的中央广播局发射场劳动反省一个月。

1962年秋，老毛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紧接着，以“城市五反，农村四清”为宗旨的社教运动开始了。同历次运动一样，先在中央一级机关试点。1963年秋，中央广播局召开动员大会，公开号召群众批评领导，叫作“领导干部下楼洗澡”。

老威：据说这“洗澡”典故也源于老毛。臭名昭著的延安“抢救”运动误杀误关了许多国统区投奔革命的功臣，闹得人人自危，鸡犬不宁，连军心也动摇了。老毛见这样下去，江山有可能坐不成，于是紧急叫停，斥责了特务头子康生。而自己也亲自跑到359旅，向被整得奄奄一息的人们行军礼。并且说，同志们不原谅，我的手就不放下来。他还说，我是来下楼洗澡的，同志们把水烧烫点，千万莫客气。这流氓天子如此发话，臣民们当然得热泪盈眶，掌声如雷了。

王西麟：这种政治套路57年也用，叫引蛇出洞，然后一棍打昏。在社教中，中央文件大约是怎么说的：平时高高在上的干部，现在要主动到群众中，接受批评，把思想里的脏东西洗掉。如果

主动，虚心呢，就洗“温水澡”；如果不主动，甚至抵触，就洗热水或烫水澡，让他在大批判中受点精神烫伤。这种钓你上钩的诱饵，中国人民在1957年见多了，就成耳边风。在一次次动员会上，女同志们都麻木不仁地织毛衣，只有我这种血气方刚的傻瓜才心潮起伏呢。

终于，我在小组讨论中跳了出来。其实我的初衷同众多右派一样，是要推动乐团工作，让自己的音乐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一句行话，即“为国为民，助党整风”。

当时上面提倡“民族化、群众化、广播电视化”的三化方针，对此，我首先宣读了毛主席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著名阐述：“我们一定要继承和借鉴一切外国的和古代的优秀文化……”然后借题发挥：“民族化与这一论述不吻合，交响乐也无法群众化，而广播电视化根本就文理不通，与芭蕾舞团提芭蕾化，木偶剧团提木偶化一样可笑。”我强调说：“三化方针等于是无思想内容，无思想前提，无思想方向的三无方针。”

开始我还挺注意语言分寸，渐渐，我的神经兴奋起来，口若悬河两个多小时。“业务不过关，就改吃政治饭，凭什么管人？”我当时就这么说。我还提到由周恩来亲自安排来工作的印尼华侨林克昌四兄弟受排挤的情况，人家毕业于巴黎音乐学院，是著名的指挥家和小提琴家，却几乎在副团长的手下待不下去了。

还说了一些什么记不住了，总之，我是在领导再三动员下才帮助他们洗澡的。筒子楼里挤满了人，副团长和几个干部亲自赶过来做记录，我却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老威：这叫整黑材料，恐怕那个时代出生的三岁小孩都知道。您可真够执着的。

王西麟：就这一根筋的脾气，从当兵、反右、炼钢铁、下乡都冲锋在前，党叫干啥就干啥。和平年代没枪，我就把扁担和锄头当枪，把粪桶、马车当反帝反修的坦克。可后来，交响乐成了

我的命，政治上不那么正确了，一根筋就酿成了悲剧。

老威：领导找您了？

王西麟：好几天，上面没有任何动静，但谣言蜂起，传的是以我为首的反党小集团。我心里七上八下，想找人澄清，可同志们纷纷躲避，一个筒子楼，都绕着走。某一天，我在外面碰见首席长笛张海波，就一起上了僻静的馆子，泡了一晚上啤酒。我发愁说：“唉，太没意思了，动员提意见，结果又……”

像头上罩着黑布“熬鹰”，上面觉得火候够了，才约我谈话。在去的路上，我已经垮了，如果那时组织上肯原谅，我肯定会嚎啕大哭，感激一辈子。进了办公室，团长坐在那儿，用恨铁不成钢的眼光盯了我好久，然后慈父一般叹口气。说实话，团长是延安干部，有阅历，人不错，还是拉大提琴出身，虽然他目前代表组织，但看样子不想把我一棍子打死。

终于，团长说话了，语言委婉：“西麟同志哇，你那两个多小时的发言，可真犯下了严重的错误！你怎么不私下找我谈谈心，作为长辈，我还是可以提醒你哪些话该讲哪些话不该讲嘛。而现在，性质变了哇，你的发言相当于1957年右派向党进攻的继续！三化是中央根据全国人民的愿望制定的，乐团不搞三化，难道要按你的方针走？”

我听得头皮发麻，泪水在眼眶打转。团长又说：“又红又专的阳关道你不走，偏要白专！眼里无组织，无群众，像公鸡一样傲！先是乱搬钢琴，影响极坏，组织上为了教育你，调你去13号劳动改造一个月，却不见丝毫成效。你到底吃了那付迷魂药，谁也看不上？唉。”

一肚子苦水倒不出来，我好几次要表白，团长都打手势阻止了。只听得他话锋一转道：“虽然你与党闹对立，严重伤害了同志们的无产阶级感情，但只要老实认错，组织仍向你敞开温暖的怀抱。西麟同志哇，你出身于一个国民党官僚家庭，可12岁参加

革命部队后，组织上没有嫌弃你，还培养你学文化，学艺术，批准你入共青团，送你上音乐学院。知道吗？培养一个大学生需要3000个农民辛勤劳动5年！而你却反对为党，为政治，为人民群众，为你的衣食父母服务，你的良心真被狗吃了吗？”

我顿觉五雷轰顶，无地自容。团长讲了一个多小时，最后，声情并茂地指出：“必须深挖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成名成家，并发展到反党邪路思想和阶级根源，争取党和人民的谅解，否则就自取灭亡。”他还低声启发我：“和你一样，我在延安时也犯过错误，两次涂改发票，贪污了一点钱，可通过改造和挽救，又重新被信任，为党工作这么多年。你看见了，我现在不也是很好吗？”

人落到这地步，是根稻草也要抓住，因为1957年右派们下放和劳改的下场我都目睹了。于是，我痛哭流涕地保证要深刻检讨。

接下来的日日夜夜，我用比作曲更强烈10倍的激情“创作”组织上需要的检讨。回顾人生道路，我王西麟自12岁进部队文工团，学文化和音乐，沐浴在阶级友爱中。每天30公里以上的急行军，双脚起血泡，是大同志替我挑泡，端热水烫脚；当满身惹满了虱子，是大同志逼我脱下脏衣裤，又烫又洗；行军累得走不动，是大同志抢过背包。以后告别部队考入上音，又在反右运动中冲锋陷阵，下乡下厂积极劳动，曾被评为出席全市代表大会的先进人物……可如今，我忘恩负义，“3000个劳动人民以5年的血汗供养了我”，可我却堕落成思想变质，追求成名成家，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或其他什么主义的浑身发臭的坏蛋。

鼻涕、泪水淌了一大堆，我从来还没有以如此恶毒的语言诬蔑、咒骂自己，我诚心诚意地觉得煽自己几百个大嘴巴，不，扣自己几百个屎盆子也不过分。我的精神早就在恐惧中跪下了，天哪，比爹比娘还亲的党！只要你放我一马，不送我去劳改，我愿意添你的屁股！同那个时代所有的文人一样，争先恐后地写屁颂，

屎颂，屁股颂！

就这样，我昼夜兼程完成了厚厚一本自我检讨书，双手交给团领导，盼望着能过关。

老威：我爸爸是中学教师，在文革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自己交代的罪状多达 100 多条，连家庭出身地主，两岁时被长工背过也算一条。

王西麟：我可是向党交心啊。在全团 100 多号人都参加的共青团扩大会议上，我泪流满面地宣读了两个半小时，地点是 120 多平方米的人称“大播”的大乐队录音排练厅，空间高达 20 米，几乎可装火箭了。

老威：这是我听到的最大的室内批判现场。

王西麟：舞台占全厅的三分之一，有合唱台和坐位架；为了确保录音质量，地板上都铺满了一层隔音的厚橡胶皮。这种地方，无论是搞音乐还是搞政治，回音效果都极好。半年中，我被全团斗争 10 多次，每次都在正中的乒乓球台右侧，与左侧的主持人隔台相望。而四周群众围绕，有的还登上排练架，由高处俯视，令我觉得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检讨读到最后，我头昏眼花，嗓子丝丝地窜着火苗，大厅内静得出奇，我还以为大伙被感动了呢。可突然……

老威：断电了？

王西麟：有人发言了。我定睛一认，原来是来自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中国竹笛，本团政治秘书牛君。他的嗓音笛子一般尖而脆，刺得人心惊肉跳：“假检讨！敲响了阶级斗争的警钟！同志们，要坚定立场，打退漏网大右派王西麟的猖狂进攻……”

笛子的高音刚落，广播局党组派来指导斗争的赵政委就定调了：“王西麟的父亲毕业于蒋介石任校长的黄埔军校，曾当过伪县长；姐姐先划右派，后升格为反革命，送新疆劳改；而他本人隐瞒反动家庭出身混入部队后，不思悔改，剥削阶级的世界观和

艺术观恶性膨胀，终于发展到跳出来攻击党。同志们，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刚结束，毛主席指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个子矮矮的赵政委身着象征高干级别的黄呢子大衣，语调低缓，却令在场的每一个人都不寒而栗：“大家要深刻认识这次斗争的性质，掂量一下自己充当了什么角色……”

我如一团臭泥瘫在那儿。“团结起来，打退王西麟的猖狂进攻！”团委书记高呼口号，森林般的拳头举起来，我完蛋了。

老威：不是讲好要挽救你吗？怎么转眼之间就升级了？

王西麟：我当时26岁，哪想得透！后来才明白，这完全是政治斗争的需要。老毛在1963和1964年，发表了两个针对文艺界的批示，批判17年的“死人专政，洋人专政”，以及匈牙利的裴多菲俱乐部，揭开了文革的序幕。而我这种响应号召，帮“下楼领导洗澡”的热血傻瓜，正好被抓了典型，成了大时代下的小小祭品。

老威：团长没再找您吗？

王西麟：大约两三个月，没有任何人敢私下接触我，通知开会，也从门缝塞纸条。其实所谓反动家庭的老底，军队党委在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早有正式结论：“12参军，对家庭历史是逐渐知道的并已交待。参军后工作积极肯干，受其家庭影响不深……”

老威：组织上应该很清楚，一个12岁的小孩怎么懂得隐瞒成份混入革命？

王西麟：我也这样辩解过，但团长的回答是：“相信组织是经过了解的。”至于怎么了解，找谁了解，你永远没有权利问。正如一个人永远没有权利看自己的档案袋，里面或许装着互相矛盾的两种材料，要拉拢，就适当透露一点红材料；要弄倒，那就有大量的黑材料。

老威：面对一个空气一般无所不在的组织，您只能听天由命。

王西麟：如果我当时明白，就像女同志那样开会织毛衣，或者唱唱赞歌。总之，从1963年秋天到1964年4月的大批判中，我成了全团社教运动的最集中的靶子，以我为首，还挖出了一个反党小集团，其中包括首席长笛张海波，首席圆号陈英南，首席双簧管陈大康，首席贝斯魏宝正，都是一流的技术尖子。

老威：是你交待的吗？

王西麟：别咬文嚼字了，是我出卖了他们，因为相信党。经过两三个月的批斗，人人都发过言，但组织并不满足这种疲软下去的战果。于是在“第二战役”打响前，团长在同一间办公室再次召见我，他的手势，眼神，包括唉的一声都和从前一样。我是多敏感的小伙子呀，在没人跟自己说一句话的死水潭里憋了近100天，恶梦不断，神志恍惚，突然有个人，而且是慈父般的领导，用这种温暖的姿态对你，鼻子怎能不发酸呢。

团长说：“西麟同志哇，经过这一段的开会学习，你大概深受教育了吧？不要怪同志们态度不好，虚心一点，组织上对这场运动是有数的！你的错误再严重，能比得上末代皇帝溥仪和国民党战犯吗？他们都能改好，你为什么改不好呢？”

这话意味着通过考察，组织还是把我当自己人，我的眼泪决堤一般下来了。

团长按老套话锋一转：“西麟同志哇，上次你只检讨了个人的问题，现在，组织上希望你扩大一点范围，把你和那几个人的关系也说清楚。至于哪几个人，在这儿我不点名，就看你的态度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组织已经充分地调查过了。你们平常如何议论领导，如何发泄不满，什么‘怀才不遇’啦，说三道四啦，组织都掌握了。你呢，只需要一条一条地列出来，时间、地点，哪些人，我们再与掌握的材料核实，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你要老老实实地负责任。”

见我迟疑不决，团长又说：“党不仅要挽救你，还要挽救其

他犯过错误的同志。你不要认为对不起谁，因为同志关系也是有阶级性，有原则的！向党靠拢帮助同志，你不要错失良机。运动以后，你们还是好同志，大家都是好同志嘛！”

别无选择，就我 10 多年的受教育经历，只能相信“态度越好，处理越宽大”的组织承诺。像打了吗啡，接着的几天里，我在病态的亢奋中挖空心思地坦白。我交待了 100 多条罪状，全是什么时候我和什么人说过什么，他的反应如何；哪一天，我看见谁跟谁在议论谁；有一次，我想就团里排挤华侨专家的事发言，什么人偷偷踩了我一脚；谁在筒子楼与谁碰见，说“江湖刘柳（四个领导）不调走，乐团搞不好；还有 58 年处理的到底是什么人”等等。

老威：鸡毛蒜皮。

王西麟：很恐怖，问题很巨大！当我在全团大会上一宣读《第二次交待——关于反党小集团》，排练厅炸了锅。

老威：反党帽子是您自己戴上的？

王西麟：我自己，因为团长暗示越彻底越好过关。我不敢抬头，只一条接一条往下念，周围紧张极了，每个人都是一颗手榴弹，而弦扣在我的嘴上，吐出一个人名，耳边就轰隆一下，一片哗然。渐渐环绕我的嗡嗡声越来越大，似乎都在猜“下一个轮到谁”或“到底咬没咬我”。当我念到“某一天中午，某某和我站在筒子楼过道上议论领导”时，群众席上竟有人紧张得神经失控，大叫一声：“有我没有？！”我回答没有，那人才一下子瘫下去。

宣读了 3 个多小时，我算松了口气，场子里却沸腾起来，一反往常开会那一本正经的肃静。大伙发言踊跃，几乎争先恐后，不仅骂我咒我揭发我，而且还撕破脸皮互相咬。反党集团的网越扯越大，终于多达十几个人。如果没有领导在场掌握全局，肯定会打起来。我惊呆了，直到宣布散会，“伪君子”“漏网右派”“该千刀万刮”的骂声还不绝于耳。

互相揭发的时尚就这样如战火一般蔓延开来，会又开了几次，闹成一锅粥，而人们在会下的主要工作就是搜集材料，准备打垮他人的炮弹。

经过大起大落的拉锯战，我的脑子出了毛病，白天的批斗会延续到梦里，而群众却换成了革命电影和话剧中的国民党、地主、还乡团，面目狰狞。我死去多年的父亲化作黑影在人海里飘。我在半夜一连串地怪叫，连午睡也叫。12 平方米的屋，我却把窗帘拉死，生怕光透进来，因为外头红旗招展，我害怕突然逮捕。每天清晨，喇叭里一响“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我就腾地跳下床，抱脑袋哆嗦……这种“恐红症”困扰我 20 多年，导致我在许多公众场合情绪突然失控，直到今天，我一看见墙上的伟人像就起鸡皮疙瘩。

老威：您去治疗过吗？

王西麟：1966 年春天，我就被送往疗养院，精神病诊断书我还保存着。我的右派姐姐升格为现行反革命，戴手铐送新疆劳改时，其症状与我类似：梦呓，哆嗦，头发大片脱落。不过，女同志发梦癫的动静肯定不如男的。

老威：经过这样的折腾，您对组织应该绝望了吧？

王西麟：你别忘了，我 12 岁就参加革命，是党培养出来的音乐人材呀。所以，当社教的高潮过去，团长第三次召见我时，我还是感激涕零。

团长说：“西麟同志哇，你前面的交待都很好，态度端正，认识也深刻，这些，在作出对你的处理时，组织会考虑的。现在，希望你向党交心，从思想深处挖一挖自己的阴暗心理，找一找阶级根源！相信组织会把你的家庭问题与你个人区别对待的。”

老威：这不明摆着挖坑让你跳吗？

王西麟：当局者迷，是坑我也得跳。于是我写道：“自从第一次开会叫检讨，我就吓得发抖，害怕别人提起我的国民党父亲

和右派反革命的姐姐；经过赵政委的上纲上线，我的古怪反动思想更多了——一切影片、戏剧中的国民党、地主、反动派们的儿子都是我！我睡不着觉，连隔壁敲门都怕，以为是公安人员抓我进监狱。我是狗少爷，我是狗崽子，我半夜起床，跑到人民大会堂，我意识到自己不该待在这人民代表待的地方，不该来演出。我把毛主席和刘主席的大像看成了我的父亲，我害怕极了。我害怕自己成为向党进攻的困兽！”

我把几十次批斗中人们罗织的罪名都写成了自己的“阴暗心理”，我通篇写了上百个“害怕”。我含泪坦白：“我害怕看见人，我害怕看见红颜色，我害怕听见《东方红》，我害怕看见领袖像！”

几天后，我照组织安排，将几十页“阴暗心理”当众宣读。大厅里静极了，犹如旷日持久的激战转眼间烟消云散，念完就散会。之后的两个月照样没动静，我似乎被遗忘了。

老威：这么斗来斗去，人们也疲倦了吧。

王西麟：不知道，反正我是被抽空了。这期间的64年春节，我居然恢复作曲，为大半年前完成的《云南音诗》之最后乐章《火把节》写了配器。

老威：我刚听过，不愧为一曲热烈欢腾的民族颂歌。

王西麟：20多年后它获得了中国首届交响乐比赛的一等奖，并且代表国家在全世界30多个城市演奏了几百场。

老威：你居然能在极度压抑的环境下写出极度奔放的交响大赋？

王西麟：如果不能这样，你现在就只能在疯人院里碰见我了，我持续紧张大半年了。1964年4月初的一天，团委书记在大会上宣布了将我“开除团籍”的处分决议。次日，团长通知，我被下放到山西省的雁北专区，另行分配工作。而作为“反党小集团”的其他成员，也被下放到甘肃天水 and 浙江新昌等地。

老威：这样的处理也算“保守治疗”吧。

王西麟：虽然从天之骄子一下跌到了底，但我还没有绝望。团长也鼓励我“好好改造，以后还有前途”。我收拾行李，上了火车，还像军人那样，学雷锋，抢着替列车员扫地。到了雁北地区文工团，我从打杂干起，搬道具，装车卸车，打扫舞台。《首战平型关》的话剧中，我也演个群众，就是呼口号，摇三角旗的那种。送戏下乡，搭舞台，扫院子、厕所，拉排子车，烧洗脚水，都我做。我要彻底改造臭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后来，我以比当地高出许多的水平，歌颂战天斗地，好人好事，写出了很轰动的《臧寨大合唱》，革命作家马烽写过《雁门关外一杆旗》，竖的就是臧寨。我搞了好几个乐章——《铁杆社员赞》《支部领导好》《雁门关外新面貌》《三面红旗迎风飘》。

这可是本地区有史以来场面最大的音乐作品，合唱 20 多人，加上乐队 30 多人，我亲自指挥，气势弄得非常宏伟。开演时地委领导都到场，印象大好。宣传部长陈某还公开表扬，要我“别背包袱，改造后大有前途”。

老威：有这么动人？唱两句听听。

王西麟：玩笑玩笑。我弹弹钢琴，这样才能记起来。对，丁玲在这儿写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我受了启发，一开头就是“滔滔的桑干河”，浑厚的男声，不得了。以后我又主动去工厂、农村、军区进行音乐普及，弄的全是“雁门关外有人家/塞上江南美如画/玉米水稻全能种/水库养鱼又发电”之类。

当时许多被下放的臭老九和我一样，摇身一变，组成四清工作团，开赴农村蹲点。我在阳高县罗文皂村 8 个月，与老乡同吃同住同劳动，查农村干部的贪污问题。不坦白交待就不放生产队会计回家过年，结果他终于和我当年一样，彻底投降。但稍后一核实，全是谎言。

老威：太糟蹋人了。

王西麟：可政治天气说变就变，文革开始了，我的问题档案被公布出来，一下子，我又成了批斗目标。下放后洗心革面的“辉煌成绩”也变成罪状，因为曾被走资派的宣传部长表扬过，《臧寨大合唱》也是大毒草。

全团斗我一人，与在北京一模一样。接着是戴高帽、挂黑牌、游街。漏网右派、反党分子、隐瞒成分的阶级异己分子……一句话，这几年白改造了。政治指导员孙广礼，一个老粗，天天守着我交待问题。为了取得组织的信任，尽早过关，我故伎重演，写了一沓检讨。我充分发挥音乐想象力，套用《和声学》里的“调性轴心图表”，不仅重新交待了“历史问题”，而且精心绘制了一张人际关系的《转调图》。我是C大调，即中心主调；围绕我的四周，按关系的亲疏，从里到外，分一级关系调，二、三关系调和远关系调。比如副团长郝瑞峰，《臧寨大合唱》的合作者段连海，一级关系调，或D大调、E大调；两位乐队成员崇拜、同情我，二级，F小或G大调；家里，三级；一般演员，点头打招呼，远关系调，也用A小、B小标明。

老威：你能将这图画出来么？

王西麟：好，我画。真他妈算个创举。

老威：这交响乐里的道道，真跟监狱一样，一圈套一圈，铁桶一般，无任何漏网之鱼。

王西麟：我就这样把自己给搞臭了，大字报铺天盖地，全是骂我的。我的著名的“三怕”又被翻出来，直到死硬了才明白，组织是靠不住的，党的政策是不给出路。

我再次被下放，烧锅炉，强迫干体力活，一身驴打滚的政治阎王债。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深入斗、批、改，工宣队进驻文工团，我就和走资派们一块，抓起来斗了，扔进小仓库，打地铺，窗子全钉死。这儿过去是日本营房，现在集中关押全地区的地富反坏、牛鬼蛇神。

后来又换了好几处关押地。由于有了血的教训，我终于幡然悔悟，走到了人民的反面，拒不交待任何问题。不管万人大会，坐喷气式，还是私下帮助，我都硬扛着，甚至把以前的交待材料全部推翻。

在“从肉体触及灵魂”的清队学习班里，打人是家常便饭。有两个难友不堪折磨，就自杀了。所谓“喷气式飞机”，就是弯腰90度以下，双臂向后抬高，站在平地或凳子上，脖子还挂大黑牌。团里有个曹玉柱，本来根正苗红，可私下议论林副主席“经常打喷嚏，身体不好”，被他的徒弟揭发，就打成现行反革命。老曹是舞美灯光师，经常因陋就简，把废茶壶、铝锅或其它破铜烂铁装上灯泡，安在舞台周围射布景。挨斗时，他浑身就叮叮当当地挂满此类小发明。

在城里大会小会斗厌了，牛鬼蛇神们就被麻绳连成一串，随团去附近几个县，十几个生产队巡回“送戏下乡”。舞台一搭好，我们就和当地的地富反坏分子一块挨斗，先念毛主席语录，“你不打，它就不倒”那一段，然后呼口号，喊“低头认罪”，于是黑压压一片坏蛋全在台下“喷气式”。台上的革命节目一演完，我们的腰也快折了。

白天除了赶路和下地，田间地头，想斗就随时吼“押上来”。有时晚上没找好场地，就寻间大屋，满炕坐着人，让我弯在炕下，交代“三个怕”。我已经坦白了几百次，早遗臭万年了，可大伙等不及开口，就拳脚齐下。还有浓痰和耳光，整得我抱头搂腰，遍地滚。男女老幼都极其亢奋，就像参加现在电视里的娱乐节目。

随着斗、批、改进入高潮，人们的打人技术也趋成熟，公开上台挨斗还没什么，最怕的是一个接一个往屋里叫。人们严阵以待，五个手指宽的小板凳摆在中央，你一进来就站上去，搞“喷气式”。有人早就候在旁边，闪电般出拳，打你亮出来的两肋。甭当倒栽葱，半晌喘不过气，脑门发出金属的声响，哗哗淌汗。

还有跳起来砍后颈窝，双锋贯耳，捣后腰，踢后膝盖窝，这些都是武侠小说里的招数；还有跪钉板，打屁股，揪耳朵，抠鼻子……中国人真有发明创造的精神呀，我的牙齿被“狗吃屎”磕掉了，耳朵也几乎叫扇聋了。

有天夜里，11点钟，我刚睡下就被叫起来。这时院子里黑糊糊的，周围很静，一出门，眼睛就被黑布蒙住，麻绳倒捆双手，口塞毛巾。我像被绑架的人质，被推着拽着往前。我感觉穿过院子，在野地里转了一大圈。突然，我被踹下一个大坑，大约有两米多深，满脚的虚土。我以为要活埋，就又窜又撞，却最终发出绝望的哀鸣。过了一会儿，上面有撒尿声，我被扯上来，口舌干燥，好像心里都填满了泥。

又转了一圈，感觉被弄回来，进了后院的小仓库。这儿已腾空作临时刑讯室。我被贴墙抵直了，毛巾从嘴里抠出，有人左手扶墙，右手罩住我的后脑，把脸按扁在墙面。鼻子一酸，就如乒乓球一般炸开了。一个声音（我听出是本团的赵宝钦）问：“材料室的小箱子是不是你偷的？”

我的心里一松，因为八竿子打不着。我回答“没偷”，裤子就被扒下，鞭子嗖嗖的，抽得屁股蛋子钻心疼。腰以下血透了！凭声响，我辨出打鞭的人是刘慎贤，原是中南海警备师吹小号的。由于政治身份过硬，在文革中鞭打过不少人。

折腾了两个多小时放回去，才知道睡旁边的倪云翔和郝瑞峰都被打过。早起劳动，裤子粘牢两瓣，换不下来，我就冲到工宣队办公室，喊毛主席语录：“要文斗不要武斗！”以示抗议。

老威：没想过逃跑吗？

王西麟：想了好几年。雁北地区，昼热似火，夜冷如刀，革命群众坐马拉车，而我们这些牛鬼蛇神，走着路，背着黑牌子，还扛着乐器和行李，一村到一村，四五个小时，苦极了。刚抬一下脑袋，就有人吆喝：“想逃么？当心狗腿！”稍后有谣传，要

把所有坏蛋送正式的专政机关。于是，我偷偷买了大茶缸和翻毛皮靴，和另外两人密谋脱逃。可没料到，骨节眼上我妈来了。这小脚老太太已70多岁，我姐送劳改后，《人民日报》发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吃闲饭”的社论，街道居委会就借此上门动员，要把她从兰州市里撵往农村。孤老太太没办法，就坐火车转汽车寻儿子避祸来了。

我妈带了20斤面，一个粗瓷碗，还有衣服、肥皂、毛巾。她本想住下不走，但不可能。工宣队拦住她说：“你的儿子是反革命，正关押审查。”老太太还不明白：“我儿子13岁就参军，怎么就反了？”

我被批准出街给我妈找了旅店。可怜的老人，行李还没完全解开，第2天就要回去了。是我让她走的，现在一提都心酸……恢复自由后，我每年都回家探亲。老太太替我姐带两个孩子，前夫一个，后夫一个。我每月给她寄15元钱。

我姐劳改释放，按规定只能在兰州郊区的农村落户，接受群众管制。她在村里挨斗，逃回家，派出所和居委会又找上门，揪她时还把我妈拉去陪斗，喊“打倒王庆凤！”满街撵着用砖头扔。有一次我刚进屋，正和妈坐在炕上吃饭，哗啦一声砖头就进来了。我从遍炕碎玻璃中捡起砖头，找派出所所长：“我是革命干部，打死了我妈谁负责？”

探亲假一个月，但每次十来天就待不下去了。我多次找兰州军区的老战友，都说我家复杂，他们不敢管。姐姐的村子我也去过，一提“管制分子王庆凤的弟弟”，人家的笑脸就沉下去了。连一个普通的民警都敢戳我的鼻尖：“王西麟，你化作灰我也认识！”

我妈是1978年1月13日去世的。肺心病，气管炎，耳背。当时没钱住院，我就请了兰州军区的老首长和谌薇薇（右派，我第一次听肖邦就是她演奏）到医院发话，才住稳当了。谌薇薇1955

年曾送了我 40 元，当时真是一笔大数。

我家像一过道，纵深 10 米，宽两三米，妈在这贫民窟里住久了，生性节俭。在医院走廊住了三天，搬进病房，一直到抢救，一直到死，她重复得最多的话是：“回家吧，我们住不起医院。”

老威：这世道叫人窒息……

王西麟：我雇了辆大卡车，把妈放在一块门板上，就送火化了。带孩子，做饭，缝头巾挣钱，我妈太辛劳了！82 岁，双手都做变形了，枯树皮似的，我让人把这手拍了一大胶卷。现在，我姐的手比我妈还老，一个疯婆子，嘴巴唠唠叨叨，她爱用手抹桌子，一两个小时动作不变。我想和她聊聊，可啥也不清楚。太可怕了，前几天还来电话，说挨打了；又说甘肃省的组织部长看上她了，要娶她做太太，会派民警来保护她，编得有鼻子有眼。我说你都 70 多了，人家会要吗？她回答当然啦，他还知道你是作曲家呢……可能是遗传，连我的外甥女都不喜欢说话，三、四十岁还怕见生人……有什么办法，这一家子就我是清醒的。

老威：这所有的不幸都是您的音乐资源吧。

王西麟：在劫难中，我一直渴望温暖。比如有一次挨斗，坐喷气式，口干舌燥。回到住处时，有个贫农老太娘递过来一碗水，进嘴还有碱味，但我永远难忘，作曲时老想着这一碗水。可我得到的温暖太少了。

老威：其实你是敏感而脆弱的。

王西麟：外面看却很强壮，大个子，大嗓门。我一次次向时代求爱，不，求饶，却一次次扑空！他们不需要！交响乐，苦难，他们不需要！我曾一次次要求平反，我浪费了很多时间！什么党是母亲，我看连丑婆娘都不如，搞不得亲不得，嫌你嘴大！

老威：您使我想起了梵高……

王西麟：我不梵高！我被下放 14 年，关押、拷打！践踏、蹂躏、遗弃、猪狗不如！生活被废掉，就因为那两小时忠心耿耿

的发言。而此前在上音、高等学府、反右、大跃进、下乡挑粪，对西方 20 世纪音乐一无所知。斯特拉文斯基，颓废没落；理查·斯特劳斯，反动；肖斯塔科维奇，洪水猛兽！我们落后了 50 年，直到 80 年代，国门开了，大量的东西涌进来，才感到听不够学不够。

老威：梵高是被生命的铁拳揍成天才的，一降生，磨难就开始了。爱情、事业、朋友，他没有一次满足，他被逼疯了，满耳幻听，他把这种声音画了出来。您和他的区别是您开头很满足：12 岁参军，叫人羡慕；读上音，分配在中央级音乐单位，年少时才华横溢，创作《四重奏》及紧扣主旋律的《云南音诗》，更叫人嫉妒啊。可您为什么要自毁前程？您已经在很高的台阶上，具备做御用音乐家的条件和技术！我注意到，在任何历史时期，您都能轻而易举地弄出时代最强音，《臧寨》不提了，文革环境那么糟，您边烧锅炉边创作“胸怀最红最红的太阳/走在文革的康庄大道上”，还有“太行山高又高哎/两岸红旗迎风摆/革命造反派不畏强暴哎……”还揉进了“上党梆子”，民间上千年的曲艺元素。王老师，您本来能做官方的宠儿，像吕驥、贺敬之，音乐的门都没摸着，却官至部级；还有王酩，据说谱过不少文革歌曲；胡松华，一首《赞歌》，就成著名艺术家，享用了几十年。甚至于你有恩的贺绿汀、李德伦，也具有延安传统。说句难听的话，在新中国，音乐家等同于戏子，极少有拒绝拥抱新时代的。王老师，您的技术比所有的当红戏子都高呀，为啥在毛、邓、江几朝天子的手里都受排挤和迫害？临近晚年，还因交响乐不赚钱被北京歌舞团解聘？您去讲课，每小时 10 元，不及明星出场费的百分之一……

王西麟：但是我写了几十部作品！我写了《第三》《第四》，正在写《第五》！像肖斯塔科维奇是斯大林时代的声音见证，我的创作也是……末日审判用得着……它们是永恒的！

老威：我读过海外的相关报道，您的交响乐在西方 20 多个国

家演奏过，您被称为大师级作曲家。但对于商业社会里的中国人，这既高雅又遥远，除非您跟张艺谋合作搞《英雄》。

王西麟：狗屎！

老威：您在这个赢家通吃的环境大骂狗屎，和您几十年前在社教运动中攻击领导一样不识时务。时代变了，您这种不开窍的性格还不变，所以党和人民不认可。

王西麟：人们听不见我的苦难，交响乐的演出要场地，要资金。

老威：您为什么不圆滑一点呢？

王西麟：我想圆滑，我想拍马屁，但是我的喉咙太粗，一哭，别人感到很恐怖。六四大屠杀，还有其他数不清的大屠杀，吼叫、惨叫和哀叫，满面泪水的无声的叫，多棒的旋律啊，我要全写出来！我要把它们献给统治者，我要追着拍马屁，问他们要不要？我一巴掌下去，不把他个马屁给拍肿了！

潘德列斯基写了《为广岛受难者的挽歌》，我要写这个民族的系列挽歌，屈原、嵇康、王实味，一切冤死者的挽歌。我要打倒封建，为毛主义死难者立声音纪念碑……但是，老威，没人理解，我半夜醒来都哭啊，没人理解……

老威：从灵魂上，您和梵高一样，挨揍的次数太多了，终于被栽培成专制的敌人。蒋彦永，一个已退休安度晚年的军医，去年因为揭穿谎言，公布萨斯真相而成为民族英雄。如果在一个正常的民众可以监督所谓“公仆”的制度下，他也许永远默默无闻；还有丁子霖，人大副教授，如果不是六四之夜儿子被枪杀，她也许会像众多知识分子那样，继续享受体制的好处，做教书育人的好公民。也就不会数十年如一日地搜集死难者证词，发起天安门母亲运动，成为党的危险敌人了。

王老师，我从这么多年的采访中意识到，这个时代几乎所有的堪称优秀的公民，作家、艺术家、学者、科学家，甚至民间艺

人，不管他人生的动机多么纯洁，多么想远离政治和阴谋，可只要其品行端正，天良未泯，厌恶谎言，最终都受尽了磨难，自绝于党和人民。

然而这正如希腊诗人埃里蒂斯诗句：“过去和现在/付出的永远是值得的。”

应被访谈者要求，在此说明：

这只是其人生的一个横断面，或者一个艺术的发端。大大没完。

家庭基督教徒袁福生

采访缘起

我具体了解中国有家庭教会比较晚，那是在 1998 年 7 月份，我应邀往北京主编《沉论的圣殿》。有一天，我上徐文立和白广路 2 条 4 号大杂院内简陋的家，老徐向我介绍在座一位寡言而敏捷的中年人：“徐永海，神经科大夫。”

我们彼此点头，进而彼此产生好感。两位徐先生像弟兄俩，都瘦弱如弓，脸型狭窄而苍白。他们把头抵在一块，大约正在商讨打印什么违禁材料，眼神也不自觉地环顾左右，给人一种地下工作的紧张感。

徐文立已经谢顶，徐永海正在谢，我是秃瓢，早就谢无可谢。正是由于这种相类似的人物标识，徐永海在谈完正事后，转而把头与我抵一块，耳语道：“小心，这屋里有窃听器。”

我在头皮发麻中接着听他讲信仰，讲基督教里的拯世。他当时入没入教我不知道，只记得我曾经回答：“我不进教堂。”

“我也不进，”徐大夫会心地一笑，“现在的教堂都是三自爱国会的。”

接下来的几年，我们偶尔有电话，徐文立“民主党”案发前夕，我曾经托他把放在徐家的《证词》原稿转移出来。再接着，他的旧电话不通了，我从网上得知，徐大夫不仅已入教，而且是北京地区家庭教会中的一位活跃传道人。

再接着，他家住了几十年的老屋被强行拆除，徐大夫求告无门，一度想以死相抗——是废墟上十几位兄弟的祷告给了他活下去的希望。

神的道路高于人的道路——几代蒙难的基督教徒都曾这

么说。2004年初，徐大夫与主内弟兄刘凤刚在浙江萧山地区传教时被捕，从此音讯全无。他的妻子，曾经是神经科护士的李珊珊在网上说，她将继续为丈夫祷告。

同走路、睡觉一样，祷告是人的一种本能。我曾见过佛教、回教、天主教，甚至无神论者的无助祷告。哪怕动物，哪怕凶残的狼，也有在月夜里奔上最高的悬崖，仰天哀号的时候。所以徐大夫妻子的祷告虽然是具体的，却从几千年，或上万年的混沌里延伸下来，并且还将贯穿一代又一代的灵魂，延伸下去。一个制度，一个政府，可以为了统治的需要，尽全力去剿灭这种生生不息的祷告，但一百个制度，一百个政府灭亡了以后，祷告还将无休止地回荡……

因此，我从我的朋友余杰和刘敏那儿，看到了远志明先生的记录片——《十字架：耶稣在中国》，知道在官方许可的教堂之外，参加家庭聚会的基督徒已达七千多万。我想起了徐大夫和他的妻子，目睹了自上世纪初，特别是1949年以来有许多人殉难的“神的道路”，我的内心也开始祈祷。

我希望能做一个老基督徒的访问。

我托家庭聚会的传道人刘敏打探相关的消息，2004年2月25日，星期六的下午，我在阳光明媚中接到刘敏的回音，她向我提供了一个电话，并告之电话的主人正是《十字架》里记录过的，在中国北方最为人敬重的袁相忱夫妇。

我随即拨通电话，与86岁的梁太太取得联系。那端的声音清晰而和气，于是我们约定，在2月28日，星期二的下午登门拜访。梁太太在告之袁牧师的作息时间的同时，还详尽地叙述了去彼处的地铁和公共汽车的线路，我一一记下。

想到这对高寿基督徒的种种不平凡，我不敢怠慢，遂约了台

湾籍的记录片拍摄者温小姐，商讨了几个现场访问的方案。温是个娇小的颇有爱心的姑娘，在台湾拍过多部社会题材的片子，而我是她在大陆的第一个跟踪对象。

刘敏自告奋勇。于是在 28 日下午，一男两女携着摄像机和录音器材，满面春光地出发。将近两点从宣武门上地铁，天气晴转阴，一阵阵冷风从灰蒙蒙的高楼间刮过来，令人不由自主地缩头。眼尖的刘敏率先望见路口旁的天主教堂，云缝里透出的阳光给高耸的十字架染上了几颗金，我们进大门参观了一番，而刘敏乘隙做了祷告。

接着，我们乘车至洋桥，打了电话，开始在几座大楼间转悠。我们先进了洋桥医院，打听了几个人，然后没有结果地退出大门，绕着极漫长的围墙由街面朝里深入。风贴着巷道吹，两位姑娘的头发凌乱地飘着，而我的双臂却紧抱着自己，把寻觅的重任交给擅外交的刘敏。

大约又经过两三座大楼，我们抵拢了目标。由于沿途的波折，刘敏扬了扬她出众的额头，向封锁楼门的一位保安再次核实：“这是正阳家园 1 门吗？有一位 90 岁的袁伯伯住在这儿吗？”

“你们是谁？”保安没有回答，却警觉地盘问道。

刘敏也没回答，却直接按了二层二居室的电铃，刚好有本楼住户进门，我们就乘机跟进去。不知深浅的小温出于职业习惯，从提包里取出机器拍摄起来。

通过电梯和楼道，我们终于进入袁家。这是一个普通而和睦的基督教家庭，四壁有十字架和圣经里的箴言，宽敞的客厅内有十几位家族成员，而迎门的沙发上方是二三十人组成的四世同堂的全家福照片——寿星袁氏夫妇位居正中。现实中的袁氏夫妇一直冲我们微笑。知书达礼的刘敏介绍了来意，就靠着目光清澈的梁太太坐下，那种水乳交融，令人瞬间就升华到神的国；我的身边却坐着袁牧师，由于激动，我说话有点结巴，而袁牧师耳背，

总是抬起右手，扩音器一般搭在耳轮上，于是梁太太和刘敏争相贴过去充任翻译。四周发出善意的笑声，采访的气氛顿时就有了。我拿出笔记本和录音机，而温挺默契地在茶案的另一端架好摄像机，我与她相视一笑，并竖了一下手指。

在这中间，袁牧师送了我一些书和资料，彼此商量怎么开头；而刘敏却坐在靠中的椅子上，向大家介绍她的夫君余杰等一批信基督教的知识分子，以及她主持的家庭聚会的情况。我吐了口气，正庆幸着出乎意外的顺利，门却笃笃响了。

空气顿时凝结了，像一张松弛的弓，突然被拽成满月，聚成圈的人眨眼就分散了。如同变魔术，摄像机、录音机、包，甚至纸条都失踪了。袁家的一个儿子闪到门旁，俯耳又听了两遍门响，才咳嗽一声，放慢节奏问：“谁？”

门外答：“我们是派出所的民警。”

又问：“什么事？”

又答：“我们接到群众的反映，说有不明身份的人上您家采访。”

“没人采访。”

“我们是执行公务，开门吧。”

犹如一个拍电影的剧组，待每个人都各就各位，准备就绪，门才开了。大家都把目光冲向进来的一男一女，男的着警服，是管这儿的片警，女的着便装，据说是刚上任的居委会主任。中间的椅子早腾出来，他们一坐下去，片警就盘问道：“谁在这儿采访？是你们吗？”

梁太太答：“没人采访，是几个慕道友。”

“谁是慕道友？”

刘敏的脸色惨白了一会儿，这时已镇定如初了：“我是基督徒，听说袁伯伯病，特地来探望。他们是我领过来的慕道友。”

我附和道：“我想了解一下基督教，就跟来了。”

片警转而问温小姐：“你呢？”

温板着一张胀红的脸，抬手指了指喉部。

片警道：“什么意思？”

温哑巴似地张了张嘴，镜片后的目光闪烁不定。

刘敏道：“她声带发炎，说不出话来。”

片警道：“哪我倒想听你说说。”

于是刘敏从上帝造人开始，滔滔不绝地侃下去。她的口才天生的，况且传道又是本行，所以把个片警弄得晕头转向。时间不知不觉过去，刘敏讲累了，就让片警提问题，可怜的警察文化底子薄，提不出什么问题。倒是年轻的居委会主任问信仰有什么好处，大家都笑了，主任显得不好意思。

片警的手机响了两次，他每次出门接听，大伙都不禁暗地紧张。待他第三次出去，身后却跟进一位年长的警察，直接与袁牧师打招呼。原来是本辖区的派出所副所长兼特警队长，他二话不说，就要依法检查我们的证件，我和温不敢出示身份证，因此我辩称，大白天出门，没有必要带证明，如今又不是文革时期。刘敏见状，生怕露了马脚，就接过话头，坦承自己是某外企公司的职员，大概是产生了美女效应，警察沉吟一番，放弃了带我们回派出所核实身份的打算。

遵照指令，我们把姓名、电话、地址写纸上，供公安查验。我和温自然是假的，而刘敏的名字太大众，写写也不妨。接着，三个公差稳如泰山一般耗上了，刘敏只好继续传道。其间，警长还提了一连串的问题，比如警察这种职业与基督教有冲突吗？等等。刘敏的回答是，一个忠于职守，服务于社区居民的警察一样会得到神的恩典，因为人人都有安全感的社会更有利于基督教的发展。

公差们点头称是，一副虚心好学的模样。片警还称，他受袁牧师的感召，已考虑了一段时间的信仰问题，今后，他会每个星

期天来参加团聚，交流读《圣经》的心得，居委会主任也附和说要加入。可就在这种感人的氛围中，警长连接了四次电话，每次嘀嘀铃响，三人的目光都不由自主地触碰。我的心悬着，温的脸板着，刘敏还在讲神是如何高于警察（可耶稣就是被古代的警察钉上十字架的），袁牧师耐不住，在半小时内问了三次警长：“您们还有什么要问的？”潜台词是：“快走吧，别在这儿烦我们！”

公差死活不去，没办法，我们先站起来。警察像膏药一样贴着我们出门并下楼。幸好袁家子女多，防不胜防，终于还是把暗号递到了我们耳边。

离开袁家几百米，警察早不见了，我们还在贼头贼脑张望。拢大街，钻入一辆破出租车，我们还在猜疑是否有车跟踪。原计划过几天，由袁家派人把藏起来的東西送到某个约定的地点，考虑到夜长梦多，我让刘敏打电话。

我们在宣武门下车，二进天主教堂，大门内，停了一辆崭新的奥迪轿车，令我们紧张了一会儿。因为奥迪是便衣特务的专用车，两天前，我去探望刘霞刘晓波夫妇，他们楼下就停了一辆奥迪，结果我入屋刚坐下，屁股还没热，警察就敲门了。

在紧闭的教堂穹门外，我们缩头缩脑。此时，我开始用玩笑来抵御寒风，直夸刘敏适合做地下党。刘敏露出女儿本相，连称“紧张死了”，并反击我说谎不自然，辜负了监狱的培养。大约等了一个多钟头，奥迪开走了，袁牧师的二儿子袁福生把一大包东西送到我们手里，计有录音录像器材、挎包、笔记本、通讯录、书籍、资料等等。

袁福生瘦弱、顽强，有丰富的地下活动的经验，他将我们的东西用报纸裹了，再装一条旧塑料袋提着，这样就显得极普通。刘敏与他接头的同时，得到了一个电话号码，两天后的3月2日，全国人大和政协召开的前夕，我正是用这个秘密号码和他联系，并约定次日在地坛南门见面。

3月3日午后风和日丽，但街头巷尾警察遍布，以确保“两会”的胜利开幕。我和袁福生都提前了半小时，可相见却推迟了半小时，原因是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梭巡着，探查四周有无可疑之处。

我们相视一笑，就一齐出了大街，越过天桥，去了斜对面的麦当劳快餐店，在人来人往中找好坐位，要了饮料。我把袖珍录音机用餐巾纸盖着，访谈就开始了。

“太紧张了，每年两会都这样，”袁福生望着窗外说，“我父母让我向你表达歉意，他们欢迎您以后再去。”

我望着对桌的一对情侣，点了点头。

“我父亲在为一个叫徐永海的大夫祈祷，他是在浙江传福音时被捕的，”袁福生又说，“父亲在聚会时公开讲，徐大夫是年轻一代基督徒的骄傲。”

我内心震撼，一股暖流从多年以前涌过来，可眼睛依旧望着别处。

几个钟头逝去，我们出了麦当劳，分道扬镳。黄昏的天空像剖腹产的肚子，将满腔的血泼在大街上，北京的人群、车辆和房屋都在永恒的血潮中川流不息。

老威：我已经在地坛外走了几个来回，还去地铁口逛了一圈，脑袋不动，眼珠子却转个不停。我恍惚觉得每个行人都是特务。刚才有个骑自行车的警察嗖地擦身而过，我居然出冷汗了，真有点悬。

袁福生：我也提前半小时到，在周围慢慢磨蹭，看有没有可疑的人。每年“两会”期间，都特紧张，不能不留意。

老威：这里面还安全吗？

袁福生：麦当劳是挺新潮的去处，进的几乎是年轻人，应该没什么问题。假如有问题，托主的智慧，能感觉得到。不过，您的笔记本太显眼，容易被人逮住，成为“罪证”。我们主内的弟

兄碰面或接受采访，遇敏感的话题，都用小纸片。我兜里揣了很多，您看，就是这样的纸片，小半个巴掌大，互相在上面写，你问我答，我问你答，声也不必吭，旁边人看着，还以为在玩什么文字游戏呢。撞上突发情况，处理起来也方便。

老威：什么叫“处理起来也方便”？

袁福生：警察脑门上没刻字，他不会像演电影那样，让观众一眼就认出来。有时候，他突然就扑上来，控制你，抢你桌上、椅上、身上、地上的一切证据。你的本能反应是尽快碎掉小纸片，如果来不及，就在警察箍你手腕、卡你脖子之前塞嘴里，嚼烂了，咽下去。他不可能马上切开你的肚子取证。

老威：真叫人喘不过气。

袁福生：感谢主，我们坚持了这么多年，现在福音已传遍中国了。

老威：我是通过远志明先生的纪录片《十字架：耶稣在中国》认识您父母的，其中有个场景令我久久地感动：这一对劫后余生的老人用有些干涩的嗓音唱道：“我要高声称颂主十架/直到在主机前见父面/那时听他说——忠心仆人/十字架可换公义冠冕！”

袁福生：这叫《古旧十架》，父亲在坐牢时经常唱。

老威：当时您父亲放开嗓门唱，脸胀红了，双臂也抬了起来，那种激昂一点不像年愈 90 的老人。而您母亲却低声跟和着，清澈的眸子显得羞涩，甚至有少女的天真。我对比了您母亲年轻时的照片，这眼神始终没变——她也八十五、六了吧。我不能不说，您的父母本身就是奇迹，是造物主给这个种族留下的奇迹。

掐指一算，基督教传入中国已 100 多年，《十字架》里，叙述了自上个世纪初到目前的信仰的劫难与传承，让我这类怀疑论者也记住了王明道、宋尚节、倪柝声，以及以巴佛、谢模善等名字，这每一个名字都是一道可歌可泣的神迹……

袁福生：我父亲，还有他们那一两代以身殉道的老人，真是

无愧于“十字架可换公义冠冕”的诗句。

老威：我没能完成对您父母的采访，是一种太深的遗憾。

袁福生：您已经尽力了。听说您写过 100 多个底层人物，那么在您的身上，也有一种信仰的力量。所以，我愿意在如此险恶的情况下和您见面，代我父亲讲讲他的经历，留下见证，让更多的人信主。

我父亲袁相忱，生于 1914 年农历 6 月，具体的生日他忘了，却牢牢记住了自己重生的日子——1932 年 12 月 29 日，这一天，他从内心信了主。我父亲说，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两个生日，肉身的和属灵的。稍后的 1933 年 8 月，由著名的王明道先生施洗，在万寿山后，用从颐和园流出的清水受洗，当时还拍了照片。王明道先生对要求受洗者都进行过极严格的考察，经过反复学习、交谈，让人真正明白受洗的含义——表示我的旧生命在基督里与耶稣同受死、同埋葬，代之而活着的是用耶稣的宝血换来的新生命。

我父亲是在安徽蚌埠出生的，祖父袁禹庭，广东东莞人，因曾祖父跟随广东籍的设计师詹天佑北上，修筑轰动一时的京张铁路，早年就举家北迁，在北京南口镇落户了——这大约是中国最早的铁路员工。由于经常要同洋人打交道，都受过较好的西式教育，懂英文。我父亲是在动荡的家庭环境里长大的，13 岁开始入读青年会办的教会学校，学英文，背诵《圣经》，从这儿，他知道了耶稣。他至今难忘的两位启蒙老师是美国人萧安娜和中国人石天民，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在父亲大量研读孙中山先生的著作，吸取新思想的同时，向这位孜孜不倦的学生传福音。就这样，在他们的引导下，父亲认识了王明道先生。

父亲信主的过程充满痛苦和矛盾，国家、家庭和个人的种种无法摆脱的剧变，令他觉得人生无常，生活无意义，曾想一死了之。有一次，他双手握铁钉，都准备触电自杀了，但刹那间又觉

得对不起生养自己的父母。

1934 年夏天，父亲结束了高一课程，准备升高二。本来照此下去，他毕业后能谋得一份好工作，吃穿无忧，即能够娶妻生子，过比较安稳的日子了。而他却顶住来自父母的巨大压力，退了学，把自己前途交给神，由他来定夺。这是父亲人生中的第一个抉择，他的勇气源于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我主耶稣在其中说道——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父亲通过祷告，按神的指引入远东神学院在北京开办的圣书学院。这是专门培养当地传道人的场所，学期四年，三年半为上课时间，半年实习。条件异常艰苦，父亲却得到系统的知识训练。1936 年夏天，父亲参加了宋尚节博士在厦门鼓浪屿举办的全国第二届基督徒查经会，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同 2000 多人一道，从《创世纪》直到《启示录》，查考到《圣经》的最后一章，灵性充溢。1937 年，父亲开始在远东宣教会的刊物《暗中之光》发表属灵文章，英译并出版了史可福的《个人布道手册》。1937 年秋天，于日本入侵的兵荒马乱之中，结识了从天津一所教会学校读完初中，逃到北京的母亲梁惠珍。

1938 年初，父亲完成学业，到天津圣会所事奉，这个机构是由宋博士创立的布道团演化而来的。由于母亲也信耶稣，不久他们就订了婚。父母的婚礼于 1938 年 7 月 22 日在北京举行，半中半洋，即坐中式马拉车，穿西式婚纱。100 多位客人中，也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各占一半，还有一些外国牧师来参加。

1939 年秋，母亲怀孕了，父亲结束在天津的事奉回到北京，本来他可以接受远东圣书学院的吴智院长的邀请，回校做翻译，挣一份稳定的足以养家的高薪水，而他却选择了离开，去农村传福音。

1940 年夏到 1941 年底，父亲携妻带子，跟随美国牧师裴约翰在河北南部的城安、永年、广平、卫县以及附近的山东五县的各

个村落布道，将福音传给在战乱中精神饥渴的穷人。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日美交战，日本人就抓到的美国人集中起来，关入山东潍县的战俘集中营。于是不久，裴牧师一家四口也从教堂里被带走，父亲受连累，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被抢掠一空。母亲那时年轻、漂亮，怕出意外，就脸上抹锅灰，抱上孩子躲进教堂后的地窖。

日本兵从美国人手里接管了教堂，战火频繁，原先聚在教堂的同工们纷纷解散回家。父亲他受神的鼓励，继续留在农村传福音，并从此与乡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成为真正的农户。稍后，我姐姐安湖诞生了，第一个家庭聚会点也办起来。父亲说——日本人封了教堂，神的羊群却需要牧养，信徒们不能终止信仰生活。

当时的河北南部，白天由日军控制，晚上有八路军活动，父亲他们骑着自行车下乡传福音，身上必须带上日票和八路军通用钱票。碰上谁，不仅申明“我们传福音”，而且得出示谁的钱票，否则就有麻烦。在整个抗战期间，父亲布道的秘诀就是脱胎换骨，成为彻头彻尾的农民，粗茶淡饭，浑身虱子，把兵荒马乱的田野当作无边的教堂。作为独子，他甚至没能为父亲送终。

抗战胜利前夕，父亲一家因祖母病重回到北京。父亲在讲道的同时兼做英文翻译，以维持全家 7 口的基本生活。他一直期待着时局好转，好回到最需要他的偏远乡村，但国共和谈破裂后，共产党施行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毁坏北京周边的铁路和公路，要拖家带口去乡下谈何容易！

父亲很焦虑，他不明白神为什么要让他在城里耽搁，不让他奔赴更广大的牧场，于是他祷告，学习洞察什么是神的旨意。这期间他以每月 300 斤小米的价格，租下了阜成门 160 号，一座原属日本牧师的被查封了的福音堂。自此，父亲作为一个在农村事奉多年的传道人，终于在城里有了固定的教堂，即不依靠任何组织，受神直接供养的属灵地。

由于拒绝挂神召会的牌子，福音堂和家庭的所有开销都要靠父亲想办法。这锻炼了父亲的事奉能力和独立风格，他说：“中国基督徒应该建立自己的教会。我现在靠翻译来维持生活，补贴教会的开支，中国教会应该朝自立自养自传的方向发展。”

1948年底至1949年，国民党兵败如山倒，时局凶险，物价一天飞涨几次。传教士和基督徒担心受逼迫，纷纷逃离大陆。父亲却回绝了远东神学院院长吴智等许多人的劝说，坚持留了下来。49年2月3日，解放军首批部队从阜成门我家门口进城，2月23日，城中各教会成立了“北平基督教联合会”，商讨如何适应新环境，在无神论政权上台后求得生存。父亲却认为没必要自我恐慌，因为宗教与世俗政治没什么关系，况且共产党政策中有“信仰自由”这一条。

开始，政府全力稳定政局，来不及染指宗教生活。有一天，父亲带着几位信徒在大街上打鼓布道，引来许多人围观，同时也招来维持治安的解放军。他们驱散了人群，将父亲等人带到军管会，经过简单的审理，却又释放了他们。当父亲以“信仰自由”为据辩论时，军管会的干部说——信仰当然自由，不过目前刚解放，治安较乱，鱼龙混杂，最好不要在外面传教。

老威：政府对宗教界还是客气的。

袁福生：客气是暂时的，因为有神与无神水火不容，在中共内部，早就制定了对所有宗教实行限制、改造，最终消灭的国策。况且，宗教界也不是一片净土，在历朝历代，都出过配合世俗政权，引狼入室的叛教者。

老威：您指的是吴耀宗先生吗？

袁福生：也包括丁光训、刘良模等宗教界名流。王明道先生称他们为“不信派”。吴耀宗生于1893年，早年信主，曾在纽约协和神学院进修，后来具有明显的亲共政治倾向。照他自己的说法——一生经历了两次巨大转变，第一次接受基督教，从怀疑宗

教到信仰宗教；第二次，接受反宗教的社会科学理论，把唯物论思想同宗教信仰打成一片。

吴耀宗等成为首届全国政协委员，并三次晋见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共同制定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方向，那就是：1、割断与帝国主义的联系；2、实行三自，即自治、自传、自养。

紧接着，朝鲜战争爆发，抗美援朝开始。三自方针迅速演化为爱国运动，基督教界必须要在“支持自己的国家，还是支持帝国主义”之间作出选择。在不爱国就是反革命的时代潮流下，基督教义受到史无前例的歪曲和颠覆，签名拥护三自爱国运动的信徒达 33 万。

可尽管如此，各地仍有许多人拒绝三自。当时北京有 60 多个基督教团体，其中就有 11 位教会负责人公开声明——我们早就自治、自传、自养了，所以没有参加的必要。这 11 人是王明道、袁相忱、毕永琴、王镇、彭宏亮、吴慕迦、王伟明、张周新、陈善理、吴文静、刘秀颖。

由于父亲主张“政治和宗教要绝对分开”，神的东西归神，凯撒的东西归凯撒，不应该在党的领导下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他自 1952 年开始，一直受到了引诱，拉拢和逼迫，自己的福音堂也有大批信徒离开。对此，父亲毫不介意——主托付给我多少羊，我就牧养多少，但我的选择不介入政治。

同时，他也拒绝按政府的要求参加政治学习。

老威：您父亲真是不识时务啊。

袁福生：几年来，宗教事务处的李处长经常找他谈心，就像现在的片警，都混成老熟人了。可到了 1955 年，政府的忍耐期终于结束了。这是继 1900 年拳乱中两万多名基督教徒遇害以来，最大的一次劫难——全国上千教堂被毁，几万名教徒被捕，其中被当作邪教镇压的达好几千人。但是在首都，政府却迟迟没动手，他们希望与三自运动对着干的 11 个团体在大形式下屈服，在军事

战略上，叫“围而不攻”。

老威：但是几个月过去了，却没一个人声明加入三自。

袁福生：对，1955年8月7日深夜，王明道先生及太太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十几位传道人。

老威：《十字架》里讲，这些领袖级的传道人都判了重刑。

袁福生：15年以上至无期徒刑。王明道先生入狱后，因一时动摇，写了《悔过书》，被立即释放。可他回到家中，却受到比坐牢更痛苦的灵魂煎熬，于是他跪在主前忏悔说谎的罪，并再次收拾行装，自投罗网。他说——我要以毕生的牢狱来平息主怒。

父亲他也经历过类似的动摇。8月7日大逮捕后，北京的传道人们终于在压力下参加了政治学习。李处长对父亲表示了空前的宽宏大量，他说：“你才40岁，年轻得很，要好好学习。追求进步。”接着又鼓励父亲发言。父亲一直沉默，其实他内心一直在进行听从神意还是屈从政治的征战。通过祷告和反省，他决定不再犹豫。1957年左右开始，父亲又被叫去参加由李处长主持的三自会议，领导指明让他表态，他缄默良久，退无可退，就把憋了很久的话吐露出来——第一，现行的宗教政策不合理，基督教的信仰没有自由；第二，在三自队伍中有一些人根本不是三自，这些人称得上是“三朝元老”了，日本人来了就投靠日本人，美国人来了就领美国人的津贴，现在摇身一变，成了靠拢政府的三自。其实他们最不“三自”，他们只不过是基督徒队伍中混饭吃的，也就是“吃教者”。

父亲的发言之后是一片寂静，许多人暗暗捏了把汗。父亲却感到从未有过的畅快淋漓，当众说真话原来这么好，他想，以后一定不委屈自己了。

不料，会议刚结束，学习组长就宣布——按政府要求，每个小组要产生四个右派，根据大家的发言记录，袁相忱很突出，被划为右派。

既然一发言就成右派，父亲干脆来个“闭门思过”，不参加任何政治学习。并且照例祷告读经，照例开堂布道，不理睬任何人的劝说。因为“教会的头是基督，而不是宗教事务局和牧师”。

一次，父亲的老朋友祁庭铎牧师来到福音堂，两人一起吃饭，祁牧师忍不住叹气说——袁弟兄，我要劝你几句，虽然你不想听，但作为朋友我不能不说。你的处境已经很危险了！在这种短檐下，你就低一下头，忍忍个人的脾气，至少装装样子，主动去学习，参加三自。如果你还是一意孤行，后果真的不堪设想。唉，看看你家里，上有老下有小，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他们怎么办？反革命家属的黑锅不好背啊。——也许是触景生情，祁牧师流泪了，他还说——共产党要求入三自，我们就不能不入，有什么办法呢？

1957年底，政府对父亲进行了最后一次“挽救”。先由李处长的秘书打电话给母亲，叫她和奶奶次日九点去长安街的宗教事务处。当两位家属依约赶到，李处长就在自己的办公室接见她们，严肃地说——我请你们来，就是要你们做好袁相忱的思想工作，要他赶紧向政府靠拢，悬崖勒马，不然我们再不能容忍他！他还年轻，才44岁，所以你们一定要与政府一道挽救他！你们老小九口，他是当家的，万一出事，你们怎么糊口？王明道的下场都看见了，不要把政府的仁慈当作软弱，我们收拾他太容易了。但是，你们一大家子就惨了！老太太，我知道你就这么一个儿子，没有他，你怎么生活呀！劝他回头是岸，悬崖勒马吧！千万记住我的话！

老威：“悬崖勒马”一词在文革中很流行，有最后通谍的含义，没想到这是独裁政权的一个传统外交辞令，意思是我他妈不讲理，要直接干了。

袁福生：父亲明白，母亲回家一提，他就什么都明白了。

老威：他就不可以为了自己的亲人暂时避让吗？暂时的屈服——难道不是人性吗？您父亲有什么理由让最亲的人跟着受罪？

袁福生：您这些问题，甚至比这多十倍的问题他都想过。但一个基督徒，最大的不幸不是落难，而是为了地下的，背叛天上的。那么，即使您得到或保全了地下的，灵魂也在永劫不复的黑暗中，无得救之日。当时，父亲曾反复给全家人诵读《约伯记》——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于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

老威：我也坐过牢，但却做不到如此心如铁石。假如敌人以迫害亲人好友相要挟，逼我放弃信仰，我会撑不住。写《悔过书》、爬狗洞、说谎，我或许都会干，但是……

袁福生：您不会砍掉自己的右手，发誓永不写字，永不记录人间的苦难吧？

老威：当然。

袁福生：那父亲也不会背弃主。这是他的命，命都没有了，拿什么去爱自己的亲人？

老威：上帝啊，你听听吧。

袁福生：父亲也曾跪在黯夜里，辗转难眠，一遍遍这样祷告。在他自己被捕的前夕，公安局一次又一次当着他的面，在他的福音堂抓走聚会的教徒。“上帝啊，听听仆人的请求！”父亲甚至泪流满面了。

从外表看，当时只有死活两条路——活路是主动表态，参加三自，向政府妥协，保全自己和家人；死路是顽抗到底，这样的下场必然是坐牢，骨肉分离。

老威：还有不死不活的中间道路吗？

袁福生：中间道路？既不用加入三自，违背神的旨意，又不用被捕，与亲人分离，让他在福音堂继续事奉神？

老威：对，上帝既是万能的……

袁福生：可神有他自己成就儿女的方法，有时就是经由地狱，而一步一步地为中国的福音开了出路。父亲祷告了十多天，这期

间，再没人来警告他、劝说他、打扰他了。父亲天真地认为，神已听他的祈祷，要以奇迹救他出患难了——只要基督徒坚决地摆明立场，政府反而会默许。

1958年4月19日深夜11点半，父亲被捕了，此前，他已让母亲备好了劳改穿的棉衣和布鞋。逮捕父亲的方式很特别，先是派出所民警叫门，母亲作为街道主任，以为是安排明天打麻雀的工作（因麻雀偷吃粮食，所以在1958年春天，被中共中央正式列为务必满门抄斩的“四害”之一。于是全国人民充分发动起来，占据所有屋脊、树枝、山坡等至高点，鸣锣、打鼓、吆喝，铺天盖地的噪音令贼雀无处落脚，只能在空中四下惊飞，直到累得掉下来摔死。其结果，麻雀干净了，蝗虫却泛滥成灾，成片啃光农作物，引发了59年的大粮荒——老威注），就开门迎客，不料两个民警却借故“所长有请”，把父亲带走了。

在香家园派出所，市局的警察才露面，宣读《逮捕证》，戴手铐，罪名是“现行反革命”。与此同时，我家被抄了，一大群警察，人人手里都拿着铁棍等工具，从福音堂到每个房间，一寸寸搜查起来。所有的《圣经》、诗本、属灵书刊都掀在地上，任凭践踏。翻箱倒柜不过瘾，他们还每进一步，就用铁棍杵一下，觉得有空响，就立即撬开，这样，房子被毁坏得乱七八糟。连浸池周围的地也翻遍了，仍然一无所获。

直到凌晨4点半钟，警察才把搜检的物品装了一卡车拉走。我们六个孩子从梦中被叫醒，穿好衣服，围在母亲和年迈的奶奶身边，目睹了自己不理解却永远难忘的一幕。

父亲这一去，就是21年零8个月。而作为现行反革命家属，母亲不可能再当街道主任，连17岁的大哥福音，也被撤销了少先队大队长的职务。1958年8月底，我家被迫迁离居住了多年的阜成门福音堂，八口人挤入十几平方米的白塔寺内大街40号。这儿原是白塔寺的西配殿，住喇嘛的，如今却住了落难的基督教一家。

三代八口都挤在砖头垫起来的通铺上，穷困极了。

老威：十几平方米住八口人，也跟监狱差不多了。

袁福生：为了养家糊口，母亲还去建筑单位做临时工。

老威：我母亲在文革中也做过临时工，又累、工资又低，还受人歧视。

袁福生，都是一般人不愿干的苦力，可母亲已感恩不尽了。

老威：《十字架》里讲，自 1955 到 1958 年，随着王明道、袁相忱、谢模善、林献羔、以巴佛等一大批基督教著名牧师的逮捕、判刑，全国的教会纷纷关闭，仅北京地区的 64 所教堂就合并为 4 所，66 年文革开始，所有的教会都关闭了，共产教终于达到了清除一切有神宗教的目标。

袁福生：上帝在人心，是清除不了的。在最困难的时候，母亲和我们仍然天天祷告。有一次断炊，一家八口，连一颗米都没有。于是母亲就跪下祷告——主啊，我们没有米，没有面，没有任何可吃的东西了。如果等到明天还这样，如果您觉得我们应该这样，我也不怨您，不怨谁，我就喝一点暖壶里的水，这就行啦——没想到第二天，有个妇女敲门问——这是袁弟兄的家吗？母亲答是。那个妇女点点头，放下 50 元钱就走了。母亲反应过来，脚跟脚撵出门，却连影子也没有了。50 元钱在那年头，够八口人两个月的粮食钱，母亲赶紧跪下来感恩。

老威：您父亲在看守所关了多久？

袁福生：有大半年，家里不知道他的任何消息。直到 58 年 11 月，法院的人到我家，交给母亲一份无期徒刑的《判决书》。基督徒面对世俗政权的迫害，是不上诉的，于是母亲拒绝上诉。《判决书》所列罪状有七条——1、右派言论；2、破坏三自，污蔑三自领导人是三朝元老；3、开黑会抵制政治学习；4、攻击政府“信仰不自由”；5、坐牢时继续搞反革命煽动；6、汉奸嫌疑；7、里通外国。

父亲后来说，自己被押上囚车，就直接去了北海后面的草岚子胡同，在那儿预审。父亲不爱记琐事，除了传福音，公安要向他核实的事，他都记不住。而一涉及传福音，公安认为有罪，他却认为有功。有一次，审讯员突然问——“老和尚为什么不说话”是什么意思？父亲懵了，真的摸不着头脑，人家才提醒他——这是你说的，老和尚指的是毛主席。父亲纳闷——这是我的话吗？本来我不发言，你们要我发言，还说“言者无罪”，现在却要追究我的右派言行了。审讯员说——你不发言岂能了解你内心深处的反动？你还把共产党比着大红龙，煽动信徒不爱党不爱国。父亲纳闷了——我这样讲过吗？基督徒只记得《圣经》，不记得俗世里的话。把人家气得暴跳如雷。

那年头，监狱的大门敞开着，稍不留意就栽进去了。与父亲同号的两个人，因在国庆游行队列中一走神，把“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喊成“中华民国万岁”，当场就被揪出来，投入大牢。

老威：和我同监有个六四政治犯，判刑4年，罪状也是混入学生游行队伍，喊了两声“打倒共产党”，结果被爱国群众扭送公安局。

袁福生：1958年12月，家里收到父亲从北京监狱发来的明信片，上面写着首次探监的日期，于是母亲带着奶奶和小六在一个星期天赶到自新路。很高的炮楼，很厚的围墙，背枪的解放军或笔直不动，或走来走去地俯视四周。在顶天立地的大门旁，有一扇非常小巧玲珑的黑门，母亲将明信片递给哨兵，验明正身后，她们三人被放进监狱。里面老老少少，挤得水泄不通，都是等着探监的。母亲和大家一样排队，半小时准入一批，大约等了一个多钟头，才轮到母亲他们进去。接着是坐在一张小桌后等待，有解放军按明信片上的名字喊犯人接见。终于见面了，父亲被剃成了光头，走路有气无力。一家子的手都握在一起，太激动了，真不知说什么好。

父亲出事后，又有一批批弟兄姐妹被捕，可当兵的就守在身边，母亲再焦急也不好告诉他，只好聊些家庭琐事。母亲把几包糕点交给父亲，父亲推辞说里面不准带吃的。半小时刮风一般过了，警察哨子响，犯人全体起立，列队回监。

在某一个接见日，父亲还望见了自己的属灵启蒙老师萧太太，她的女儿当时也被判刑劳改，萧太太去探监。他们不能说话，只能互相点点头，以示问候。59年的某个晚上，里面看露天电影，父亲挽着马扎，夹在犯人大队中进入操场，忽然瞅见自己的导师王明道坐在前面。刚好此刻王明道先生回头，两人不能说话，也只有对视一秒钟，然后，都不约而同地仰头看天，意思是仰望星空中的主。再往前挪动坐位时，父亲感动极了，因为他们都读懂了对方的内心。

老威：您父亲在里面经常碰见熟人？

袁福生：偶然能碰见，但不可能有什么具体接触。父亲在看守所曾被一个天主教徒检举过，指他在审讯期间继续传道。吃过亏，他的言行更加谨慎了。1960年夏末，由于饥荒蔓延，犯罪猖獗，首都各监狱都人满为患，于是政府决定把判刑20年以上的重犯迁往黑龙江，在中苏边境的兴凯湖监狱劳改。刚上火车犯人们还是单衣，待下了火车，大伙已经穿上了厚棉袄棉裤，加上皮帽和毡袜，就是过冬的“全幅武装”。

接着，又经军车押运，抵达了目的地。兴凯湖与苏联只隔一条河，刚去时，全是住一座连一座的帐篷，外面圈铁丝网，由解放军持枪把守。因为在东北住帐篷无法过冬，犯人们的劳改第一课，就是烧砖盖房子，也就是自己为自己盖监狱。先砌围墙，再修哨楼和干部房，最后才是监舍和50米长的大通炕。接着的劳改任务是种庄稼，秋收后，又去打草，北大荒的草比人还高，秋天打的草，要烧一个冬。

口粮是玉米面和高粱米，每人每天8两；主要的菜是土豆，

餐餐吃，令人倒胃口。不久，大饥荒又蔓延到黑龙江，在牢里，伙食定量几个月一减，后来连窝头也吃不饱，犯人们饿得受不了，就游泳越境，逃到苏联。结果人家也嫌麻烦，就一批批把逃犯装入麻袋，货物一般送回来。

东北滴水成冰，一次，父亲在零下 30 多度的野地干活，有人瞅见他的鼻子惨白，立即推他进屋。幸亏进去及时，不然，鼻子就冻没了。这不是说笑，曾经有人耳朵被冻，一掰就下来了。父亲听说，常有犯人活活冻死，也不倒下，就树干一样，笔直挺立，嘴巴还噙着。

很难想象瘦弱的父亲是如何渡过这段饥寒交迫的时期，感谢主，熬到 1962 年，中苏关系正式破裂，政府又觉得把重刑犯放在修正主义的眼皮下不合适，决定把他们调回北京。像来时那样，专车专列，重兵押送，大伙又千里迢迢回关内。只不过，来时一件件加衣服，去时一件件脱衣服。

车到天津，2000 多名犯人就留下劳改，而父亲等 50 多位反革命中的危险份子，才重回北京严加看管。不管别人用怎样的目光看他，父亲都认为这是神的恩典，因为回到北京，家人能探监，伙食也比外地好些。比如在东北，父亲常常连野菜窝头也啃不上，只好吃糠窝头充饥，而北京监狱还能吃到白薯干。并且狱方为了减轻口粮负担，也一改不许家属送吃的传统惯例。

按当时的配给制，市民每人每月只有 2 两油、半斤肉、半斤点心。母亲把全家 8 口的点心票留下来，一大早去商店排长队，然后在探监时给父亲送去。所以，虽然在困难时期，父亲的身体却得到了较好的保养。

1965 年 10 月底，我去宁夏生产建设兵团前夕，又去监狱探望。父亲高兴地握着我的手说——你 18 岁就出门在外，自己多保重吧。下农村很好，我过去传福音就在农村。接着他又问我对信仰有没有信心？我答有。他又问还会不会唱诗？我答会，诗篇 23 首我至

今还记得熟。父亲像个孩子一般，点头直笑。

可世事难料，谁知我们父子俩见过这一面，要等 14 年后才能见下一面？

老威：你们这种家庭在中国是极罕见的。我坐过牢，我知道狱外的等候更难耐，更煎熬。若换个人，早家破人亡了。

袁福生：我们都知道，父亲在里面是为主作见证。

老威：我也在作见证，主知道吗？

袁福生：主是万能的，当然知道。

老威：但是我妻子与我离婚，我没有做丢脸的事，她却变了，在生存的重压下重新选择生活了。

袁福生：可您不孤独，失去女人，您也不孤独，因为在冥冥中，主在注视您，选择您，垂恩于您。您不会受到根本的伤害。就像我父亲，厄运中还结识了一个叫刘浩的好朋友，向他传道，让他靠近并最终信了神。

老威：是吗？那么狱中的警察如何看待宗教信仰？

袁福生：除了共产主义的任何信仰，在他们眼里都是封建迷信。巫婆神汉，会道门，一贯道，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他们统统一锅煮，不分何为迷信，何为真信仰。有一次，干部还拿一些破除迷信的小册子给大家学习，父亲说——我不属于迷信，我有真信仰。大家为他捏把汗，干部却好奇地问——你有真信仰？难道你是个和尚？父亲认真地说——我不是中国庙里的和尚，如果要算，也只能算洋和尚。不料干部一听，不仅不生气，反而哈哈大笑。从此，“洋和尚”这个绰号就在北京监狱传开了。

老威：这个干部还挺豁达的。

袁福生：北京监狱的条件和干部素质都比外省好。但好境不长，1966 年，文革爆发了，因外头大抓反革命，牢里又人满为患。共产党为了稳定首都的革命形势，又把父亲等 2000 多名重刑犯迁往黑龙江。这次目的地是音河，同初到兴凯湖一样，犯人们烧砖，

自己盖监狱，连吃的也照样是高粱米、黑土豆。到了年底，监狱里也搞起了文革，到处是“批臭”的大字报，父亲作为“帝国主义走狗”，在政治风潮中从音河农场转押齐齐哈尔监狱，接受严管。

所谓严管，就是天天组织学习，听完政治广播，还要发言、记录。父亲是个政治盲，虽然耳朵听着，心却完全不在那儿。有一次，他听了广播，随口发感慨道——这两天怎么没有刘少奇的消息了，难道他垮了？共产党内也存在党派之争吗？不料，这话说了没多久，就被打了小报告。监狱领导亲自调查，并且说父亲的思想问题很严重。

父亲先安静地站着，只回答是和不是，可当领导郑重其事地问——“袁相忱，你现在还相不相信你的上帝时”，父亲也郑重其事地回答——是的，我还相信。领导又问了两次，父亲还是答——我相信。领导气急败坏地指着父亲责骂——你是个顽固不化，反动透顶的反革命，你的问题不是通过学习讨论所能解决的，必须从严惩处。

于是父亲被打入小号，禁闭反省。

老威：四川监狱也有小号，专门对付逃跑、打架、散布反动思想等严重违规行为。小号是犯人们最怕的地方。

袁福生：就是暗无天日的“狱中之狱”，长宽不足两米，没有窗，甚至没有透气孔，说白了，就是墓穴一般的地槽。父亲被押入小号前，裤腰带被抽掉，衣裤上所有的扣子都剪去，以防他在禁闭期吞扣子或利用裤带自杀。牢门哐当一关，就再也不开了。每日两顿饭，均有人定时从门下地面掏出的小方洞递入，俗称“喂狼狗”。

老威：没想到，四川和东北，文革和现在的小号都一样。

袁福生：小号又叫“一米屋”，犯人吃喝拉撒都在里面。父亲蹲了半年多，不见阳光，不能走动，没洗过手和脸，没换洗过

身上穿的衣服，更谈不上理发和洗澡了。每天，父亲除了躺和盘腿坐着，只能勉强弓腰站一会儿。

不仅如此，狱方还天天派人，透过门缝查看他是否按规定的姿势，挺直腰板坐在那儿反省。稍不留意，就要遭体罚。随着革命运动的深入，受罚入号的人一天比一天多。有时小号不够用，就塞两个人。父亲同好几个陌生犯人挤过，像比目鱼一般扁扁地侧卧，通宵睡不安稳。幸好同住的人出去得快，总把父亲剩下来。

半年多的禁闭，父亲毛发凌乱，浑身虱子，已经折磨得不成人形。由于长期坐着不动，他的小腿细如鸡脚，只有扶着墙才能勉强挪动，虱子成团往下滚，眼睛被阳光一照，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不仅同监犯人，连他自己也觉得这辈子残废了。可没想到，神又一次在他的身上施行了奇迹，他迅速康复，挺过来，没有留下后遗症。

老威：是的，那天我初见您父亲，真不敢相信他已经 90 岁了。头不白，气不喘，腰不弯，除了耳朵有一点背，似乎哪儿都没有毛病。

袁福生：父亲整 90，母亲 86，托主的福，都和谐，喜乐，是远近闻名的一对寿星。感谢主，如果 1966 年父亲不去东北，可能就死在文革中了。因为北京是风暴中心，东北监狱与之相比，斗争的力度只能算小儿科。

到了 1969 年春天，齐齐哈尔的监狱又暴满了，父亲和另外 1000 多犯人，又被转移到嫩江地区肇源县的革志监狱。这是一个更远的地方，父亲来这儿，第一件事还是盖房子，好让自己从帐篷里转进去。

老威：这是您父亲第几次自己为自己盖监狱？

袁福生：从兴凯湖始，他已经是第四次自盖监狱。

老威：这也算造物主特别的安排吧。

袁福生：父亲在革志监狱还遇见了老朋友吴慕迦，当年北京

不肯参加三自的 11 个教会代表之一，后来因此被抓，判刑 15 年。父亲是在菜地里看见这个“同一战壕”的战友的，当时吴在另一块地里。由于狱中规定，劳动时不许互相说话，所以父亲灵机一动，就唱一支属灵歌曲来同他打招呼——主不曾应许天色长蓝，人生的小路花香长蔓。

吴慕迦听到了歌声，果然抬头，注视着父亲，却又低下头去。父亲以为他会接着唱，可是他没有。父亲感到惊讶，因为吴不仅是老熟人，更是一个共患难的基督徒呀。直到后来，他通过接触才明白，吴已经放弃了信仰。这没办法，中国社会太让人绝望了。

老威：在《十字架》第二集里，我读到了您父亲那批老基督徒的苦难阅历，世俗政权越逼迫，他们殉教的意志越坚定。银川的以巴佛老人，坐牢多年，体弱多病，当狱方以“认罪服法”为由提前释放他时，他不肯。后来他被不由分说地释放了。再后来，他回监狱的要求被拒绝。他就在监狱的围墙外搭了间小房子，住进去，每周禁食五天，维持了 20 多年，以此平息主怒。他说，为什么要释放我？我没有认罪，因为信仰上帝不是罪。

还有上海的谢模善老人，被折磨得受不了，就在监室里站上凳子，想触电自杀。他在临终前祷告，请求神的宽恕——主啊，您让我去吧，我为什么要受这种苦呢？冥冥中，他似乎听见了神的回答——孩子啊，我的恩典够你用的。一遍又一遍，谢模善重复着神的声音——孩子啊，我的恩典够你用的！他啜泣着，满面泪水，就凭着这种支撑，他活了下来。

袁福生：是啊，父亲也没有想到他还能够活到今天，继续为主做工。父亲坐牢 21 年零 8 个月，有 16 年的光阴在黑龙江。他刚入狱时，皮包骨头，戴个眼镜，不仅自己，连家人都不相信他还会活着出来。一般情况下，无期徒刑以上的重刑罪犯有三个结果——一是上吊或投江，一死了之；二是疯掉；三是通过灵肉的熬磨，受到了神的特别看护。我的父亲正是被神选中的，在冰天

雪地的北大荒，吃猪狗食，干牛马活，关小号，挨批斗，好多次都该没命了，但他却没生过病。在劳改中，父亲常干的活儿是担土，沉甸甸地压在肩上，必须直着腰，才不会在冻土冰面上栽跟头。天长地久的锻炼，令父亲受益，直到现在也腰不弯，气不喘。

1979年12月20日，父亲收工吃午饭时，监狱领导进来宣读公告——父亲被释放了。原来毛主席的阶级斗争已成为历史，邓小平上台，政策开始宽松了。父亲已65岁，改造了20年以上，刚好符合分批假释的条件。

父亲的假释《裁定书》编号为“79刑清字第655号”，里面写着——对罪犯袁相忱予以假释，考验期限，从假释之日起，至1989年10月3日止。按刑法规定，剥权期不能离开居住地北京，还得向当地派出所定期汇报思想。

父亲拿到《假释证》后，就马不停蹄地回家。从监狱步行3公里到汽车站；再赶车到革志县城转最慢的普通列车，经黑、吉、辽三省，方能抵达北京。

而此时，全家人正沉浸在沮丧之中。因为不久前，大哥福音根据邓小平“拨乱反正”的政策，写信给法院，要求为父亲平反冤假错案。法院为此约大哥面谈，并且像审犯人一样说——你父亲的问题错综复杂，不能跟你说。他和王明道一样，是反革命集团首恶，不能平反。大哥辩驳说——我父亲的问题再复杂，也能讲清楚，要不你们凭什么判他的刑？刘少奇当初不也被判反革命吗？后来你们不也说弄错了吗？连国家主席都敢乱判，更何况其他人？法院的人一听这话，顿时面红耳赤——你父亲怎么能和国家主席比？人家判错了，你父亲就是没判错，以后你不用来了。说完就给大哥一张纸条，上写——袁福音，你的来信已收到。经审查认为：原我院（58）中刑字第1013号刑事判决，对袁相忱的定罪、量刑都是正确的。特此函告。落款是1979年11月16日，还有北京市中院的大红官印。

老威：那么，1个多月后的12月21日，您父亲就被假释了。

袁福生：对，党的政策有时就像小孩的脸，说变就变。

老威：您们还不知道父亲要回家？

袁福生：知道，信和电报都收到了，全家人都去接人，但却错过了，归心似箭的父亲一出火车站，就直接搭夜班车回家，到了白塔寺，找不到庙门，他就一边绕着墙走，一边扯着喉咙喊“梁惠珍”。幸好大嫂在家，把第一次见面的公公领进门，打热水让他洗脸洗脚，正在烫脚的时候，一家子就回来齐了。主的恩典太大了。

老威：关了哪么多年，您父亲能够适应社会吗？

袁福生：在生活上确实落伍了。监狱发给他60元遣返费，他还认为是笔大数目，要母亲收好。可在信仰上，他一如既往。本来79年以后，许多因宗教信仰坐牢的知名人士都获得平反，只要他们表态，相信三自，宗教局就既往不究，安排工作，得工资，分房子，社会地位也直线上升，像吴慕迦，就在燕京神学院教书，生活优越。可父亲不仅不信三自，甚至觉得没必要平反，因为《圣经》里讲，基督徒不必要求申冤，申冤在我，要听凭主怒。

1980年春天，我家的聚会就有近10人，几年后，聚会人数不断增加，已达两三百人，是北京地区人最多的家庭教会。白塔寺的家太小，里面坐不下，窄窄的胡同也挤满了人，连我们睡觉的床都拆了，放小凳子。我家什么都缺，就是《圣经》和凳子不缺，好几十只凳子都是信徒送的。而美国、香港，还有个叫“敞开的门”的组织，都找到我家，通过父亲，向那些拒绝三自的受迫害的人送《圣经》。父亲主张政府与教会要截然分开，神的归神，凯撒的归凯撒，因此，既然家庭教会不属于“人民团体”，所以不必登记。一直坚持了16年，尽管被多次抄家、骚扰，但信徒仍然成倍增加。

1989年发生了六四大屠杀，那天晚上戒严后，满街满巷都是

兵，不时能听见嗖嗖的枪响，可就这样，家庭聚会仍没中断。白塔寺的公车停了，我父亲凌晨五点钟起床，匆匆出门，赶了30多里地，到我姐姐家去传福音，谴责天安门事件，以主的名，安慰那些正在蒙难的人们。过后一想，真为他捏把汗，子弹不长眼睛，那时小老百姓谁敢出门呀，可父亲他，一个快80的倔老头，揣着《圣经》就走了。

警察每年都以“非法聚会”为由，威胁要抓父亲进去，教会的“聚聚散散”也与政治形势的敏感有关。像两会、六四、国庆或西方国家首脑来访期间，都是全天候监视，电话要么窃听，要么掐断，但每一次，父亲都顶在前头，对峙着。他经常大声对警察说——信徒要来我没办法，除非你把我家的门封上，把我带走，他们就不来了。至于我个人，是信仰至上，国家的法律如果和我的信仰抵触，我只有顺从神。”

公安部门经常在一些重大日子，例如香港回归，克林顿访华，宗教、人权组织来访时，提前把父母接走，软禁在某个宾馆，不让他们与信徒在一块。

老威：与“天安门母亲”丁子霖，以及我的朋友刘晓波的待遇差不多。

袁福生：但是，父亲的行为不是对抗政府，而是要完成神的使命，拯救在中国的失散灵魂。一不靠势力，二不靠金钱，而是靠对主的信心，很难很难。感谢主通过父亲指明了这条道路，我们全家二三十口都信了。

老威：据说美国总统克林顿曾邀请您父亲参加有全世界各行业基督教领袖在场的每年2月的“早餐祈祷会”？

袁福生：是的，但父亲拒绝了邀请，原因之一是美国也邀请了三自的负责人，父亲与他们无话可说，更不愿和这些屈从权势，放弃信仰的人在同一个场合面对神。原因之二是美国政府也是政府，他不愿参加任何政府形式的宗教活动。原因之三是政府不给

办护照。但根本的原因是——他向神祷告，心中始终没有感动到要去参加——因为基督徒的头是基督而不是政府。

民刊《野草》主编陈墨



作者（左）和陈墨的合影。蔡楚提供。

采访缘起

我最早晓得《野草》是在成都学者肖雪慧的家里。记得时为 1995 年春夏之交的下午，我和友人李亚东前往位于西南民族大学宿舍楼的肖家拜访，闲谈之间，肖学慧从书架上抽出一本诗选对我说：“你是诗人，你晓得《野草》这群人吗？”我摇头，肖说：“他们从 60 年代就开始地下写作了。”

我暗暗吃了一惊，却故作平静的接过那本过时的诗集，随手翻阅。相隔多年，其内容已经淡忘，却还记得诗集选编者为九九。肖说：“这个九九为国民党将军之后，长在新中国这几十年，吃尽了苦头，却突然于 70 年代末时来运转，去香港找到父亲，并继承了遗产，成为某某集团的董事长。”

后来，我上海外的网页时，读到过九九《魂断台北》的片段，也有些打油风格的诗，但由于 20 世纪 80 年代留给我的现代派文学的偏见，就本能地忽略了其中透露出的某种尘封已久

的顽强信息。

1999年5月作为在国内出版的《沉沦的圣殿——20世纪70年代中国地下诗歌遗照》一书的主编，我赢得了广泛而持久的名声，但该书对发生在皇城北京之外的若干外省地下诗歌只字不提，这不仅受限于视野及地缘政治的屏蔽，而且受限于我个人的文字偏见，包括“什么是能经得起时间自然过滤的文学”之类的偏见。

稍后，我与泊居美国的贵州地下诗元老黄翔夫妻有了电话和文字交往；日本的双语杂志《蓝》也开始从史料的角度，做贵州，上海，四川等外省的地下文学专集；特别是胡杰先生耗时5年拍摄完工的记录片《寻找林昭》在知识界的流传，给了我更深的震撼。被谋杀的圣女林昭也是个验证种族灾难的诗人，她和另外两位同案诗人在60年代初就筹办了一份刊登有泣血长诗的油印民刊。这份致使他们锒铛入狱，并最终引发杀身之祸的“反革命罪证”，比在1978年借着思想解放运动和北京西单民主墙而诞生的《今天》杂志早出现了近20年！

两年前，通过电话和电邮，我进一步结识了泊居美国的《野草》诗人蔡楚，他目前的职务是中文独立作家笔会副会长，并且以早年编辑《野草》的阅历和经验，主管着这个国际性作家组织的网络。在蔡楚的一再牵引下，我与住在成都另一端的《野草》主编陈墨见了面。

陈墨木讷，除了一张脸比较大，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之处。他送了我一厚叠《野草》杂志，16开本，每本80来页，装帧简单，黑白两色，封皮上印了些勘称文学思想格言的话。内文排版也比较老套，油墨味扑鼻而来，且有些字的颜色还深浅不一——由此可推断，印刷此物的设备和工作人员均老掉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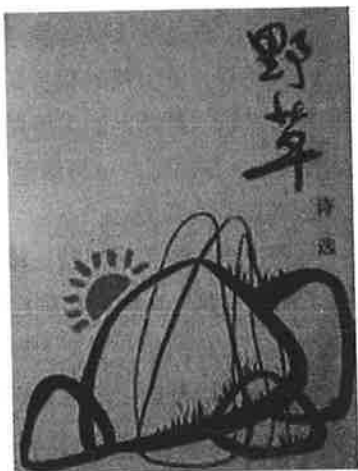
从 20 世纪 80 年代算起，我也称得上是地下出版的老手了，凭直觉，我就明白《野草》及其主编因装帧过于简单而容易被忽视，容易将它混同于成千上万的自生自灭的文学印刷品——我当时接过有陈墨亲笔题赠的《野草》时，也只是随手翻阅，瞅见目录上除了老“野草”若干，尚添了流沙河、冉云飞、肖学慧、王怡等熟人的名字，就随口问：“他们也投稿啊？”陈墨笑了笑：“新鲜血液嘛。”我接着又问：“已办了 90 多期？”陈墨答：“断断续续几十年，也该有这么多了。”

我终于从这平淡的回答中嚼出一丝辛酸滋味。

我和陈墨有了交往，但不是太多，印象中他总是驾着一辆八面透风的老面包车，并且乐于在文友们高谈阔论之际，不吭一声去付酒饭钱。有一次，他于茶桌旁当着众人称赞我的狱中诗，还说已从网上下载若干首，恳请我应允登在《野草》上——这一时期，《野草》刊登的外稿量越来越大，海内外著名的北明、贝岭、蔡楚、万之、流沙河、王怡、肖学慧、冉云飞、蔡咏梅等等均成为常客，

与老野草们交相辉映或旗鼓相当。海外一些杂志也有了事关《野草》的评价，以及历史追溯、定位——尽管作为老资格的民刊，

《野草》也在 1979 年全国性的思想解放运动中上成都的闹市区张贴过，甚至风传被当时的成都市委取缔过，但它毕竟是个风格稳健，如今印量只有 100



《野草》诗选封面，蔡楚提供。

本的文学交流杂志，我没想到它会出什么事。

我曾经与陈墨开玩笑，大意是：“你和邓愚诸兄上个世纪60年代就开始写地下诗，并且从70年代末到目前，将《野草》断断续续地办了90多期，居然没有问题！”陈墨的脸红了，含含糊糊地检讨道：“有问题，有问题。1979年，《野草》被成都市委书记杨以希定为‘反动’，差点就抓人，全靠当时的省委书记赵紫阳一句话，才保全了坛坛罐罐。我逃跑了好几次呢！”我问：“没有人栽进去吧？”陈墨答：“孙路坐过牢。”我问：“是办《野草》吗？”陈墨答：“是为六四。他在89年5月底因上人民南路广场拍学潮照片被捕，市电台还播过。”我嘴脸可憎地笑道：“与《野草》无关？”陈墨悄声道：“是的。”

我本想借势抬出自己在80年代为弄地下诗刊，曾跳下印刷厂二楼突围的革命事迹，向这位厚道得过分的老大哥吹嘘一番，却忍住了。我只隔靴搔痒地总结道：“成都的文化政策还算宽松吧。”陈墨愣了愣，我又补充道：“也许警察还看几本书。”

陈墨垂头丧气道：“写了几十年，快到抱孙子的年纪了，我还没在官方刊物上发表过东西。办《野草》的目的无非是发出点声音。我们这些人，经历嗑嗑绊绊，只是觉得文学这种嗜好总比其它嗜好，例如打麻将、钓鱼、东家长西家短地搬弄是非，以及整人害人来得高雅些。可我们不搞政治，你让我们反动，也许都反动不来嘛。”

我被噎住了，反动派又不是天生的。即使令当局如梗在喉的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也谈不上有什么具体的政治诉求。有一次我和远在瑞典的笔会秘书长万之通电话，我极力称赞他登在《野草》上的一篇坦白自己是好色之徒的随笔，不料他叫屈道：“这个马虎的蔡楚！他怎么把我的私信拿去发表了？”我笑

道：“一个人在好色和正人君子之间举棋不定，岂不可爱？”
他说：“男人觉得可爱，女人看了就很麻烦。这个没睡醒的蔡楚！”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这个好色的国际长途通了没多久，《野草》就出大事了。大半年后，一直隐忍不发的陈墨终于在身心交瘁之际接受了我的单独采访，时为2005年2月2日下午。连续几天的阴雨连绵，把成都变成了一个似乎永恒的冰窖。陈墨依着头天的约定，缩头缩脑地浮现在金沙遗址旁，那张醒目的大脸在若干个不眠之夜里窄了许多。我们像两个特务在细雨中一声不吭地走着，约十几分钟后，钻进了一个茶楼。封闭的单间不另收费，我们坐了下来，相视一笑。我掏出笔记本和录音机，暮然之间，我想起了前苏联流亡作家纳博科夫的一本书名：“说吧，记忆。”

老威：在这次谈话之前，我把你送我的《野草》都找出来，从头至尾地看了一遍，突然间觉得异常亲切，因为我读中学的时候，就有那么一种自办文学刊物的冲动。后来当了卡车司机，还和老同学杨然、荆纪民等油印过两种诗歌传单，命名为《行云》和《诗种》——按当时的出版政策，这种未经有关方面批准的少年文学冲动就已埋下了犯罪的种子。

陈墨：我们虽然相差十几岁，但“受害”的源头都是文学。

老威：我在近期《野草》上读到一个《悼念鲁连》的专辑，感到有些鄂然。因为对照你们自印的《野草之路》，我从照片上认出了这人，他是《四川文学》的编辑，自己也发表过不少小说。上世纪80年代，我进《星星》诗刊做见习编辑，还在布后街2号的同一个省作协大院里，天天碰见他。

陈墨：“鲁连”是他的笔名，他的真名叫周永年，因为与本城的另一位作家同名，又更名为“周永严”。

老威：对，周永严，四川写过小说的人都记得他，贺星寒和林文岫比他成名还晚哩。我至今记得他的眼睛，非常忧郁，连点头微笑时也很忧郁。我还曾递诗给他，他仔细看了，啥也没说，就还回来，好像嘴巴打了封条。

陈墨：周永严是唯一从《野草》走向官方文坛的作家，但他的命比谁都惨。太冤了。1964年，他才16岁，就参加工作，到了千里外的屏山茶场。那地方气候恶劣，工资非常低。前几年，成都电视台还专程去采访过，拍了长篇的专题片。那地方的知青，疯的疯，死的死，至今还有留在那儿回不了故乡的。周永年最早到那苦寒之地，不过半年，就因为写“反动日记”被同一宿舍的人告发了，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被当作典型揪出来，批斗，并判劳教。那时的劳教比劳改还厉害，由于不走法律过场，就没有期限。他在屏山茶场，一劳教就是12年

老威：有这么长的劳教？

陈墨：两三年期限满，就强迫留场当工人，天天有枪杆押着劳动和收监，其待遇同劳教也差不多。周永严的身体完全给搞垮了，茶场方面觉得榨不出油水了，才允许病退回乡。他有劳教背景，找不到工作，就进了街道生产组，与婆婆大爷们一起糊火柴盒。熬了两三年，邓小平复出，政治气氛开始转暖。

周永严最早化名“鲁连”向《野草》投的文章是《马克思捍卫出版自由》，写得太好了。他引用共产党老祖宗马克思的原著，指出“现代国家无不把‘出版自由’的条文，写在各自的宪法上”，因为“出版自由关系到普遍的自由，预防性的法律不应存在，检查法永远非法。”

老威：这些一百多年前的论述似乎是针对目前的中共当局来的。

陈墨：的确，马克思正是一百多年前的《新闻检查制度》的激进抨击者，他认为新闻出版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前提，是支撑社

会拱门的最后一块石头。没这一块基石，整个拱门就将垮掉。

在1979年的思想解冻初期，能读到这样的违禁文字，怎不叫人拍案叫绝？我和社长邓垦等编辑同仁一合计，就在《野草》第二期隆重推出。当时我们赶印了495册《野草》，如创刊号一样，往各处邮寄了40多份，还在盐市口和总府街大量张贴，围观者连日不断，社会反响强烈。

当时北京已开始查封西单民主墙，风声陡紧，我们甚至做好了入狱的准备，但几周后，居然没事儿！《野草》又印了第三期，却被成都市委正式定为“黑刊”，因此被迫改名《诗友》，不定期地在‘地下’流传。而鲁连作为我们的主要作者之一，一直很活跃。

1980年10月19日是鲁迅先生的逝世纪念日，我、邓垦、罗鹤、徐沛在鲁连狱友张仁荣的引荐下，见到了真真实实的鲁连，也就是你在作协大院天天见面的作家周永严。自然是促膝深谈，心意相通。他当时30岁，却坐了12年的牢，在谈到自己引起轰动的杰作时，他突然挺起弱不禁风的胸膛大声说：“‘检查法永远非法’这句在中国最反动的口号，却是马克思在100多年前喊出来的！”

鲁连和《野草》朋友们的蜜月持续了几个月，却有“内部消息”传来：当局查明《诗友》即《野草》的变种，已加强了对这些异己分子的监视。一时间人心惶惶，蔡楚接手编成的第27期《诗友》也不知所终。鲁连此时已是《四川文学》编辑，彼此的“热恋”自然在心惊肉跳中嘎然而止——这个匆忙划上的省略号直到20余年后才重新接上。

老威：同在一个城市，20余年没一点联系？

陈墨：彼此如去了月球，音讯杳无。

老威：周永严在80年代还算有名啊。

陈墨：个中滋味，一言难尽吧。总之，在2002年10月31号，

九九突然打来电话，称已打听到鲁连下落。邓垦立刻照图索骥，电话那端终于传来那久违的弱不禁风的声音：“真没想到……”

在文坛混了这么多年，我们还以为他名利都有了，因为比他成名晚的好些作家都飞黄腾达，占尽了共产党体制的便宜。可没料到，当《野草》同仁们邀约着去西门茶店子一栋临街四楼拜访时，这位昔日文友的惨状叫人窒息。门开了，我们被一位长年累月在此看护的乡下汉子领进逼仄的卧室，一张大床横据了大半个房间，两只近一人高的氧气瓶触目惊心竖在靠门的壁角，而鲁连盖一薄被，勉力支撑着斜躺床头，鼻孔还插着一根长长的输氧管。

老威：他才 50 多岁吧？

陈墨：不到 55 岁。20 多年前成为《野草》成员时，不过 30 岁；而他因写反动日记被抓起来坐牢之际，才 16 岁。人的一生就这么蹉跎而去，眨眼间就到头了。

老威：鲁连得的什么病？

陈墨：多年坐牢落下的病，我没忍心问。他够虚弱的了，凌乱的长发，脸颊没有一丝血色。塑料窗帘遮断了所有户外光线，却阻不断嘈杂的闹市声。无论昼夜，顶棚的日光灯都永远亮着。鲁连说，这也是坐牢，早年坐牢还有刑满释放的企盼，而现在是彻底没指望了。

老威：我坐牢四年，无论在收审所、看守所还是劳改监狱，顶棚的日光灯都永远亮着，没有一丝一毫的黑暗，连梦境里的黑暗也没有。我想，永远的光明就意味着无处藏身吧。

陈墨：鲁连说，他已卧床五六年，除了通过电视节目了解外界的变化，就与世隔绝了。“几乎没有人来，”他一一捏住我们的手，竟激动得大喘起来，于是又把输氧管往鼻孔里塞……

老威：唉。

陈墨：我们尽可能地回避眼前，只去回忆。比如 40 年前在茶

场劳教，鲁连和廷孝、剑秋往来的情景；《野草之路》上的某一篇文章，如何记录了邓垦、明辉、陈墨 1964 年春游昭觉寺“题竹”的逸闻；当然，也说起《马克思捍卫出版自由》。终于，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我们必须告别。3 个多月后，我们才晓得这就是永别！鲁连是 2003 年 3 月 30 日夜 11 点 40 分去世的，我们于次日上午前往灵堂默哀，耳边犹然回荡着他 1965 年为自己撰写的《墓志铭》：“死者生前辗转于苦难/ 如今，他沉睡了/ 从此与世无争。”

老威：鲁连的一生也算《野草》的某种象征吧。

陈墨：《野草》的多数人都如鲁连，“生前辗转于苦难”。比如邓垦、九九、蔡楚、乐加等等，都是黑五类的子弟，当知青、社青，坐牢、打临工，却又不甘心沉沦，酷爱读书，始而与文学结缘。鲁连的命说不定还比其他人好些，因为他毕竟是唯一从《野草》走上官方文坛的人，享受过几天热闹。

老威：你遗憾文学没能成为你的职业？

陈墨：我已 60 岁，迄今为止，文学没给我带来一分钱的利益。

老威：据我所知，你曾经有过机会。

陈墨：我 1969 年就编纂过《中国新诗大概选（1918—1928）》，还通过向《诗刊》投稿引起重视，并进一步地认识了著名诗人孙静轩。79 年思想解放运动中，《野草》也曾“吐故纳新”，汲取四川作协里的开明人士组成新的编委会：主编贺星寒；编委骆耕野、万一、邓垦和我；艺术指导孙静轩。可没弄多久，风向急转，就宣布散伙了。

老威：黄粱一梦？

陈墨：我去文坛晃悠一圈，感觉不对劲，可能从根子上就是两路人吧。说实话，我对同官方合作兴趣不大。我，还有邓垦，九九等人，珍惜自己的在野身份，到老不悔。做个不在官办刊物上发表作品的在野的爷爷感觉也不错嘛。1999 年，你编著的《沉沦的圣殿》一出来。我们就四处打听，托人买了七、八本，互相

传阅。见书上只谈到北京西单民主墙，只谈到从白洋淀到《今天》杂志的那条线索，却没有一个字涉及《野草》和外省。就觉得郁闷。因在《沉》书之前，公开出版过《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其编者杨键，中央戏剧学院教授，曾专门来成都采访过《野草》同仁，搜集去大量珍贵资料。我们太看重非官方的评价了。

老威：就西方对中国大陆思想和文学史的开掘研究，西单民主墙和《今天》早已成为主流；虽然法国的高行健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可魏京生和北岛至今还是“地下”不可替代的象征符号。所以《沉》书的作用，不过是捅破了现行强权体制的屏蔽，向国内读者展示了部分为西方所认同的历史真相。然而，揭开一种真相的同时，是否就屏蔽了其它真相？我不敢再问下去。我受限于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环境，当时对现代主义文学的求索达到了顶点……

陈墨：通过供党内高级干部阅读、批判的“内部发行”的黄皮书、灰皮书和白皮书，《今天》派诸君接触现代派文学比你我都早一二十年；“太阳纵队”的张郎郎说，他们一帮人在50年代就听摇滚乐了，而我和邓垦最多在啃古典诗词或新月派诗歌。所以，《野草》和《今天》不在一个起跑线上。

老威：在对文学艺术实行垄断及配给的社会，“起跑线”不仅仅是一个创作概念，它意味着你所处的阶层，有无资格进入某种特殊的文化环境。

陈墨：你的意思是《野草》在起跑线上就输了？

老威：这是我的检讨，因为单以作品论，我更认同《今天》派。我的确忽略了作品表层之下的漫漫人生——血泪、蒙难与挣扎终会因为时过境迁而失去观赏价值。

陈墨：作为中国大陆最早的民刊之一，《野草》几乎要成化石了。或许在二三十年前，它站在过思想文化阵地的前沿，吸引过人们的眼球；但二三十年后，它就落伍了。其实在《野草》内

部，总有分歧，一二三期社会反响巨大，大伙就情绪高涨，认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可风声一紧，有人就要退出，甚至要抽回底稿。我曾被当局点名要抓捕，后来又因赵紫阳的一句话，阴转晴了。《野草》好几次由公开转入地下，比如1979年，魏京生入狱不久，《野草》就被迫更名《诗友》，以手抄的形式流传；至27期，终于被成都市委查明，《诗友》为《野草》变种，要清查，于是大伙作鸟兽散达十年之久；1988年，自由化气氛浓烈，《诗友》又恢复。可不久，老《野草》孙路卷入学潮，风声鹤唳，《诗友》又停办。1990年10月，《诗友》又复刊。至1994年为止，共搞了81期，并在九九、罗鹤的张罗下，编了本《野草诗选》。

之后，又歇了七八年。海外成立了中国独立作家笔会，已去国外多年的老《野草》蔡楚为创始人之一，他在负责笔会网络的同时，搞了个《野草》网页，作了大量的宣传，《野草》作为存在多年的文学社，才首次引起海内外的关注。著名流亡作家贝岭、万之、北明、郑义、蔡咏梅、黄翔夫妇都曾通过蔡楚和《野草》取得联系，热情鼓励。《野草》最近一次复刊后，他们，还有国内的肖学慧、王怡、流沙河、冉云飞、杜导斌，或还有你，这些良心作家都成了我们的作者。

贝岭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地下文学》一文中最早介绍《野草》：“在四川成都地区，60年代文革时期产生了一个重要的地下文学团体野草诗社，其中的诗人有邓垦、蔡楚、杜九森、陈墨、冯里、乐加等，他们相识于文革地下书市，他们的作品也流传于当时的四川地区。”

其实我们中的许多人相识得更早，在1964年，诗社的雏形就有了。

老威：我记得蔡楚和蔡咏梅都写过《野草》。

陈墨：许多人的论述中都提到《野草》，蔡楚和蔡咏梅的文章更有影响。特别是蔡咏梅，在民运中资格很老，她的大作在《开

放》杂志上头条登出，《野草》的地位一下子就提升了许多。

老威：她是怎样定位的？

陈墨：她着眼于地下文学反抗专制，追求民主自由的特质。老《野草》们传阅后，一方面很振奋，觉得这反映了我们骨头里的东西，另一方面却觉得自己目前的思想境界跟不上这种评价。但是，进入历史是每个文人的梦想，为了回应，复刊势在必行了。

老威：有些功利色彩了？

陈墨：都到抱孙子的年纪了，才得到这么高度的肯定，无论如何要搏一搏！可具体到复刊，矛盾就来了。我发现原来的某些老朋友，由于长期应付生存压力：菜米油盐，下岗问题，儿女，甚至孙儿孙女的问题，原来的棱角都磨平了。不仅不读书不思考，连这方面的兴趣都缺乏。也有人提出，应该坚持《野草》原有的传统文学方向，外界的评论是一回事，我们不要迎合，以免带来政治上的麻烦。

老威：你们都是几十年的朋友啊。

陈墨：从少年一直交往到老年，现在剩下一条生命的尾巴了，人却变得如此现实和平庸，那还不如压根儿就没有追求，就与社会同流合污。平庸到底，说不定到老也成富翁了。尾巴上再改变最没意思，失败了嘛，过去的罪都白遭了嘛。想想鲁连的下场，搏一搏太值得了。

要配得起外界的评价，《野草》不能有名无实。我当时就这么想的，要把《野草》办成有质量、有激情、有锐气的文学刊物，依靠老一批的原始资源已经不行。必须争取外稿，注入新鲜血液。

我不顾一些老朋友的反对，把《野草》的门越开越大，既然我们没有政治诉求，没有社会改革的诉求，那不妨把嗓门放大些。逐渐，给《野草》投稿的海内外作家多了，与本地的自由派人士联系也密切起来，流沙河夫人吴梦华还参与了编辑，使《野草》的内容历史性地焕然一新。

老威：你没料到会出事儿？

陈墨：这仅仅是个话语权嘛，况且在 20 年前，鲁连就发表了《马克思捍卫出版自由》！然而到了 94 期，果真出事了。

老威：就是在网络上影响很大的“甲申 300 年成都大屠杀祭奠专号”？

陈墨：对，就是张献忠的农民政权屠城 300 年的祭奠专号。这个题目是冉云飞最先提出来，他此前已写了文章，并收集了大量的资料。流沙河也写了文章，对当今政权把杀人不眨眼的张屠夫立为农民起义英雄表达了愤慨。

老威：沙河老师曾经说过，六四屠城之后的十几年，他读得最多的是记载清军入侵的《扬州屠城记》。

陈墨：流沙河的学问和人格，对后辈的确有较深的影响。

老威：请把筹备专号的经过讲一下。

陈墨：大约在 2004 年 6 月初，我邀约《野草》的无慧、维才、雨樵，还有王怡、冉云飞、吴梦华等下馆子，在饭桌上，冉云飞谈兴颇高，并在言谈中随之建议，《野草》作为本土老资格民刊，做这种关系屠杀的历史翻案文章最合适。其他人也一致叫好，我就当场拍板，与在座的诸位约定，每人为“成都大屠杀祭奠专号”写稿一篇，限一个星期后的同一时间交稿。

稿子很快就齐了，流沙河、王怡、冉云飞、余杰、肖雪慧等等，清一色的川籍上乘作家的上乘之作，使《野草》抵达了几十年来最辉煌的至高点。其“借古讽今，影射当政”，令我等拍手称快，却让有关方面难以容忍。王怡的文章揭露了某地发现张氏大西政权万人坑的史事，指出内族入侵比类似清朝的外族入侵更残忍；余杰甚至把张献忠和毛泽东作了比较。据说冉云飞还借张献忠屠城引申到了六四屠杀，不过，被责任编辑吴梦华删掉了。

打印稿出来后，我在喝茶的时候，亲手交给吴梦华，由她做最后一校。吴梦华很谨慎，所有文章中较为露骨的地方和攻击性

的字眼都被作了删节或修改，有的还用红笔作了记号与批注。她熬了一个通宵，在6月9号上午还给我，并翻着校稿作了些说明。

我当即送印刷厂，那是我们的一个老关系户，一直没出过问题。

老威：你估计是怎么暴露的？通电话？还是人多嘴杂，走漏了风声？

陈墨：我至今都没弄清楚。一些老朋友说，《野草》有案底，种种情况公安局早就掌握了，并且暗中监视，看你几爷子要干啥。如果一直保持原有的以老《野草》为主的纯文学风格，就不动你；如果要继续纠集牛鬼蛇神，太冒靶，太出格，就随时一网打尽。所以在出事之后，从《野草》分裂出去的一些人兴师问罪，要罢免和开除我，因为正是我的一意孤行（当然还有蔡楚的遥相呼应）把《野草》引向了绝路。

我虽然万分沮丧，却不同意这种分析，我认为事出偶然。我想起一个细节，6月8号上午，我去取校稿，见印刷厂里人心惶惶的。一打听，原来那天全城的公安机关正在搞拉网清剿，名目叫“扫黄打非”，其实是搜查地下天主教的宣传材料。

老威：这和《野草》有关系吗？

陈墨：看上去是两码事，但地下传教太厉害，当局的神经都绷紧了。那天他们出动了上万的警力，搜查每一处个体和集体打印复印铺子，搜查每一个有印刷设备的地方。据说情报还挺准，他们终于在城南的某个“窝点”缴获大批违禁品。

老威：《野草》算此次“扫黄打非”的意外收获？

陈墨：也怪我的疏忽。因为我找的老关系户搬家了，新厂址在火车南站派出所的隔壁。由于经常替派出所打印资料，民警们天天窜上窜下的。当时我认为厂家和派出所的关系不错，印《野草》不会出纰漏，哪晓得，一查地下教会，只要带字的东西都不放过。

老威：类似的“误会”也在我身上演过。那是1999年3月，我去李白故里江油。当时我带了一沓《中国底层访谈录》的打印稿，托一位税务局的朋友帮忙复印。可没想到，当这位朋友在一家理发店门口将一纸袋复印稿交给我时，一伙便衣特务一拥而上，在大街上“人赃俱获”。我气坏了，顿时在警车上破口大骂。经过一个通宵的突击审讯，原来搞错了——当地国安局不知从哪儿得到情报：中国民主党有大批宣传资料在江油印，他们就把正好在这时出现的我当作嫌疑人了。我要他们澄清并精神赔偿，狗日的恼羞成怒，竟反诬我“非法采访”

陈墨：我是神鬼不觉地撞进天罗地网，可能是派出所民警一瞥见打印稿上有“大屠杀”等敏感字眼，就绷紧了。还来不及汇报，就查封了印《野草》的现场。6月9号傍晚7点多钟，我忙碌了一天，刚回家，武侯区公安分局的两个刑警就脚跟脚地进门了，我被控制住，只好一筹莫展得坐在沙发上。大概十几分钟后，大批人马才轰地涌进来，领头的掏出一张没有公安局长签字的《搜查令》，逼我签字，接着抄家开始……

老威：没局长签字，啥意思？

陈墨：显然他们兀地遭遇《野草》，需要马上采取行动，就顺便摸了张还没生效的《搜查令》来抄家了。

午后4点钟，茶楼的服务小姐敲门而入，换去桌上的水瓶，我受惊一般从笔记本上抬起脸，却见刚刚闭嘴的陈墨正死盯着玻璃窗外的泥泞街道。乌青的天色像浸饱了墨汁，而散乱的车辆和行人是溅动的淡墨点。我皱着眉头说：“这种阴天已持续了半个多月了吧？”

陈墨道：“或许还要长，我在成都生活了60年，记忆中的大半都是阴天。有时早晨起来，感觉上已是傍晚了。”

“所以成都人酷爱搓麻将，一进入麻城，夜与昼的界限就糊涂了。”

“我对麻将没感觉，我一生的嗜好就是书。”

服务小姐幽灵般地闪出门去，我想起一位朋友曾私下告诉，陈墨长期患忧郁症，甚至有过自杀的情结。我叹口气，嘴唇翕张两下，却问不出口。而陈墨似乎懂了，悄声而决绝地说：“无论有多难，我都要撑下去。”

“你怪蔡楚吗？”我问，“正是由于他在海外宣传《野草》，引起关注，你们才应运复刊，一步步走上了这条不归路。”

“老朋友们指责我犯了路线错误，该开除出党。”陈墨居然笑了，“其实这种路线错误，我、蔡楚、邓垦、九九、鲁连、乐加等等，一出娘胎就犯了。我们都是黑五类子弟，父辈往往非关即杀。接着又迷上诗歌，错误就更大了。比如蔡楚，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写地下诗，21岁就因为诗歌《乞丐》被揪出来批斗，25岁因屡教不改被关押了100多天，26岁被缺席判刑，并逃亡在江湖上打临工，直到1979年文革结束后，成都中院才撤消原判，宣判无罪。后来，他移居自由世界，继续写诗，宣扬《野草》，筹建独立笔会，都是早年路线错误的延续。”

“如果你重新活一次呢？”

“没想过。总之，搓麻将是一辈子，爱文学也是一辈子，哪种错误更严重呢？”

“不晓得。”

老威：这是创办《野草》以来，你遭遇的第一次抄家？

陈墨：中共统治这几十年，政治气候总是乍寒乍暖，所以根据以往积累的教训和经验，老《野草》们暖则聚，寒则散，几乎每个人都有为避风头而逃亡的经历。我在1970年下乡当知青时，曾遭遇清理阶级队伍，那阵林彪副统帅刚外逃遇难，全国人民还懵头懵脑的，就开始集体学文件，民兵三天两头还查夜。我是黑五类子弟，又从成都带了几大箱子中外名著下乡，因此“做贼心虚”，就抓紧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半夜，在房子中央挖了一个深达

几尺的大坑，忍痛埋书。

老威：九九在他的纪实小说《魂断台北》里，曾描述了你坑书的情景。你当时光着膀子，锄头、碗、盆交替使用，书坑刨成了，自己还跳进去，捡起一本本“贼赃”，东翻西翻，一副舍不得的守财奴相。后来，你听出暗地有人监视，竟吓得一哆嗦，失声尖叫：“哪个？”

陈墨：他只得现身了。这真是书生骇书生，他不睡觉，想干啥？莫不是分赃来了？于是我装着填坑，他也装糊涂，支吾着走开了。

我跟着又把书挖出来，转移到更秘密的去处，再坑一次。并在周围绕着圈子侦察，确认无人窥视，才松了一口气。因为那年头，谁说得准？直到几十年后，好奇的九九还在问：“墨黑兄，你把宝贝到底藏哪儿了？”我也说不清了，只好回答：“广阔天地，藏几本书岂不容易？”九九不满地笑道：“狗日的警惕性真高过头了。”

老威：那你这次没把文字罪证先埋了？

陈墨：我算开窍了，是祸躲不过，根本来不及挖坑！两个刑警一进屋，就问：“你是陈墨吗？”我答是。又问：“你是否在火车南站的某某地方印刷非法出版物《野草》？”我也答是。于是他们宣布：“从现在开始，这屋子里所有东西都不准动，否则你要负法律责任。”

我只好陪他们在客厅里干坐，心里想着电脑里存着许多犯禁文字，很着急。刑警中的一位只有20多岁，同我儿子一般大，他稳操胜卷地冷笑着，大约是专门搞电脑的——待大队人马开到，他才如临大敌地坐到电脑前，开始检查。他们抄了两三个小时的家，抱走了电脑，里面存有网上下载的500多篇文章。除了廖亦武、王怡、余杰、肖学慧、冉云飞等的个人文件夹，还有与蔡楚、万之、北明、贝岭等海外作家的通信，以及我个人历年的文稿、

中文独立作家笔会的所有资料。

我精心保存的从创刊至眼下的全套《野草》及《诗友》都损失掉，其中包括剩下的《野草》成品，作者和读者的来稿、来信。当然，《野草诗选》《野草之路》《野草》成员的照片，我与蔡楚合著的《鸡鸣集》，雪梦、九九等人的文集，我个人的《何必集》，北明送的光盘，王怡接受台湾采访的CD，统统在劫难逃。3.5吋的软盘就有17张哪！

老威：一个文人的一生被一网打尽了。

陈墨：我感到从里到外被掏空了，心脏一抽一抽地疼。这辈子逃过藏过多少次！十几个警察搜查时，我就翻江倒海地呆立一旁，脑子里走马灯似地转，文革中的黑书市，我和邓垦等人经常去“非法淘书”，正在兴头上时，突然有人喊：“联防来了！”于是没命地狂奔……

为了看一点书，做梦都在狂奔！做梦都在埋书！被人发觉了，还在梦中把身子扑上去，盖住书坑，任人踢任人踩也不让开。还有关闭《野草》联络处，还有自我悲壮地宣称“我已做好坐牢的准备”，当然还有鲁连之死……可没料到，大祸当真临头时，却没有一点征兆！

我一生的主要价值就是《野草》啊，但面对国家的合法抢劫，我只能干瞪眼。

老威：你还算幸运，自1949以来，没被抄过家的文人很少。我先后被抄过10来次，神经弄得比耗子过街还过敏，而你虚惊了那么多场，才撞上一回真的。

陈墨：警察们满载而归，我也随之被押到火车南站派出所。这时成都市公安一处的人才出面，一直审讯到凌晨3点多钟。

老威：请把审讯过程讲一讲。

陈墨：公安一处又叫政治保卫处，很有些整人的经验。他们先由两个人来与我摆闲龙门阵，并声明不记录，这两人东拉西扯，

绕了一个多小时，才换上正式审讯人马。开始前，还向我念了一段印好的官样文章，如“与本案无关，可不予回答；但与本案有关的，必须回答”之类，接着就在笔录抬头写：“非法出版《野草》案。”我看了，表示不同意，就争辩道：“《野草》只是个内部刊物，文学交流，谈不上非不非法。”

双方争论了一阵，主审警官就说：“好好，那就《野草》案嘛。”

审讯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1.《野草》文学社的组织形式是否具有非法组织性质？是否有较为严密的章程及入会手续？这太可笑，因为“野草”们的交往很松散，几十年一直停留在“以文会友”的层面，所以我实事求是地否定了。2.花大量时间纠缠历史过程，比如《野草》那年创刊，那年复刊，哪年改刊名，谁和谁怎么认识的？杂志上的作者情况，主要和次要人物，笔名和真实姓名，住址，工作单位等等。我拒绝回答，我说牵扯到《野草》作者的情况，你们自己去调查，我是不能回答的。

老威：老“野草”们几乎是笔名，要警察自己查清，还比较麻烦。

陈墨：但也有极个别真名。他们正是这样顺藤摸瓜，先后传讯了殷明辉、无慧、维才、雨樵等人，有的还不止传讯了一次。

老威：也就这么回事吧，让当局摸清一帮秀才的情况又能咋样？如今毕竟不是毛时代。

陈墨：他们最后追问我的工作单位和经济来源，我说这与《野草》案子无关，我有权拒绝回答，由于我的口气显得急迫，激发了他们的种种想象，认为有欲盖弥彰之嫌。

老威：欲盖弥彰？

陈墨：在抄家过程中，他们搜出了三张《房产证》，房主分别是我爱人李明达，以及她厂里的出纳和会计，并且还有收房钱的字据。

老威：这的确与《野草》无关嘛。

陈墨：我当时本能地产生了戒心，因为从审讯中，我渐渐明白，要从《野草》中找出漏洞，定我的政治罪，可能没那么容易。社会还是在进步，至少在面子上，当局还是在强调“依法治国”。公安编不出非法和反动的证据，那检察院、法院也通不过。所以，公安机关面临新形势，不得不改变策略，政治上寻不出突破口，就从其它方面搞垮你，比如在网络上激起公愤的“刘水嫖娼案”。刘水是中文独立笔会成员，在网上发表了大量抨击社会丑恶的时政文章，被深圳公安视为眼中钉，却无可奈何，就蓄意制造了“嫖娼案”，将刘水劳教两年……

老威：大约在七、八年前，上海著名陈姓诗人被公安机关“现场捉奸”，关押了8个多月，从此脸面扫地，精神垮掉了。我见过陈，小个子，老实巴交，就因为他曾是海外反动杂志《倾向》的国内编辑，公安老是找他的麻烦，却碍于国际影响不便直接下手。于是迂回作战，雇了一个鸡，去和陈交朋友，双方逐渐混熟了，陈就领她上自己家。不料这厢刚一入室，公安就破门捉奸，把陈搞傻了。

陈墨：我过分戒备，因为如此下三滥的手法令人汗毛直竖。但是，我越拒绝回答，他们越认为抓住了把柄。终于在几个月后，他们对我爱人下手了。

老威：从凌晨3点你被释放回家的情况看，他们没在你身上捞到什么。

陈墨：11天之后的6月20号上午，我被传讯了第二次，在成都芳草街派出所，直到下午五六点钟才放出来。审讯单位还是一处，开头还较客气，后来态度就变了，很粗暴。因为他们已根据《野草》上的某一真实姓名寻到线索，并由此追踪，掌握了较详细的情报。紧接着的21、22、23、24号，雨樵、维才、无慧、邓垦又被传讯，重复审问了《野草》的组织性质及形式，经费来源，

有无海外资助，一期印多少本，发行方式等等。

老威：这些我大致了解。当时人心惶惶的，大伙聚在一起喝茶，七嘴八舌地出主意。海外的万之、黄翔、郑义等作家还提名《野草》群体为笔会“自由写作奖”的候选者。我记得你像一个闷葫芦，总是坐在那儿不吭气，蔡楚让你写写事件始末，你也迟迟不动笔。

陈墨：我生性好静，不想做新闻人物，更不想因此而接受海外采访，我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风风雨雨就过去了。我根底上是个读书人嘛。

电脑和其它东西都要不回来，按《扣押清单》上的单位找武侯区刑警大队，推说一处管；找公安一处，门也不让进，太窝火了。

一直拖到2004年12月份，一切风平浪静，我仍旧懵懵懂懂地过日子。许多朋友问我《野草》还办不办？我总是回答：再拖一段时间。

我永远难忘2004年12月9号下午5点，我爱人李明达刚开门进屋，随即涌入十几个警察。其中有第一次抄家来过的，也有从未露过面的。《搜查令》宣读后，我还以为抓我，就主动问：“你们是哪个单位的？”来人回答：“七处，就是经济犯罪侦察处。”接着直奔我们的卧室。这次抄家与《野草》和书籍无关，主要目标是《房产证》、帐本、存款、各种字据。

第一次没收电脑后，我无奈之中又买了一台，才没用两天他们又要第二次没收！我急了，不禁心疼地叫唤起来：“你们要检查，把主板取走就行了嘛！头次的电脑还没还！”他们回答：“我们使用一天，后天叫你儿子来取。”于是达成书面协议。而待我们如期领回电脑，一开机，却发现是台报废的死机器。

直到李明达被带走许久，我仍觉得在梦游，刚才是我签的字，我还以为是针对我，唉。我们父子俩如热锅蚂蚁，在家熬到半夜，

方接到公安方面拘留李明达的通知。

她被关到成都市看守所，这是刚从城里宁夏街迁过去的新监狱，占地几百亩，能羁押几千人。李明达患有心脏病，人也刚强，我担心她一时想不开，出意外，就请了律师，花大量的人力物力去办“取保候审”。可直到前天，我才接到“不予取保候审”的通知，理由是“不利于侦破；有可能串供。”

老威：听说你爱人已正式逮捕半个月了？

陈墨：是。

老威：罪名呢？

陈墨：职务侵占罪。

老威：余杰和王怡讲，你找过一处处长？

陈墨：余杰回成都探亲，一处处长曾建就借机找他和王怡喝茶。王怡要求他们不要插手此事，曾建答应了，彼此的印象还不错。可我这个小人物的找去时，曾建的脸色就变了，他明确答复：“这桩经济案是我们在查《野草》之际发现的，我们当然要交给七处。目前已到检察院了。”

老威：你莫太难过，墨兄。

陈墨：回天无力啊。

老威：请讲一讲这桩案子的始末。

陈墨：我和李明达都是老知青，1970年在农村结婚，1975年底从盐源县双河公社双双办病残回城，无资格参加正式工作，为了糊口，于1976年入街道生产组。由于在一群婆婆大爷中显得有文化，不久，我当了副组长，她任会计。几年后，形势变化，我退出来搞个体户，她却与生产组共同发展，当上了厂长。

这个厂由估绵组和纸绳组合并而成，其中有四分之一的残疾人，而且年龄偏大。所谓“估绵组”，就是把汽车修理厂擦过机器的废棉纱捡回来，用碱水煮了，再放河里淘洗干净，晒干了卖出去。这种变废为宝的脏活粗活，正常人都不愿干，而丧失其它生计能力

的老头老太太们只能走这条路。

而“纸绳组”就是生产中药铺里捆扎药包的纸绳，以废纸作原料，搓了，用胶水固定。这种原始手工活利润太薄，于是李明达绞尽脑汁，率领大伙脱贫致富，她根据市场需要，组建了“成都市武侯区胜利弧型玻璃厂”，生产汽车挡风玻璃。还请来几个玻璃匠，手把手教大伙划玻璃，配窗户框，这活儿简单，又比较赚钱。以后厂里加大投资，开了三个门市部，研究出弧型玻璃，供不应求。

后来由于时代的发展，交通部对汽车玻璃的质量有统一的要求，李明达的厂被迫退出市场，停产了，门市部也承包给老职工了。幸好她有先见之明，在做厂长的次年，投资几万元买下红瓦寺共和村的一亩地盘，搭建玻璃库房。转眼至1988年，这块位于四川大学和成都科技大学学院区之间的地盘增值，于是我介入，先找私人贷款20来万，搞成都望川校园文化站，后通过四川大学教授珠玛，与市电影家协会签共建合同，他们出资金，我们出地盘，将文化站扩建成娱乐场所。执照主管单位是市文联经济管理处，我是法人代表，利润按四六分成。

联合经营了四年，生意极火爆。稍后，玻璃厂的主管单位——致民路街道办事处与厂长李明达协商，撤消联合经营，把隶属关系转回办事处。

在2001年之前，学院周边的录像、台球、旱冰、电子游戏、卡拉OK都火爆，我们却是开这些连锁娱乐的先驱，连公用电话也是第一家，那时候，学生为了打长途，在门口排起拐弯的长龙。可2001年副总理李岚清视察四川大学，见学生们贪玩，就强令关闭东侧门。一道墙阻断了财源，加上修路，去校园非得绕道，我们的生意就猛地淡了。

亏本三年，文化站终于要拆迁了，2003年出了告示。根据拆迁政策，那一带营业房的赔偿最低也应为每平方米500元，按1000米算，玻璃厂该得550万元。所以，这是一块令人眼红的肥肉。

老威：从原始的生产组起家，你爱人的创业史真不简单。

陈墨：玻璃厂停产，转型为文化站后，原来的老职工在家休息16年，照发工资，照买劳动和医疗保险，而李明达的工资才227元，多年没涨。

老威：停产这么多年，名义上还是集体经济吗？

陈墨：97年改制（股分制）流产，留下了后遗症。以后把隶属关系转回办事处，也算重大失误，因为一旦脱离市文联，文化站就直接面临8个主管单位。他们像一群狼，围着这550万的拆迁补偿打转，只要扳倒厂长李明达，剩下的老弱病残职工就好打发了。

而李明达生性倔，不拐弯，她叫人守住地盘，拆迁费不兑现就不搬。坚持了一年，由于拆迁问题在全国都闹得凶，中央就指令改制，让拆迁公司与政府职能部门分离，以免官商勾结，鱼肉老百姓。

一群狼正愁找不到吃羊的借口，况且这是只迄今不妥协的、脾气大的羊，恰好出了《野草》案，借《野草》又牵出经济案，况且又是一处交办的有政治背景的经济案，谁也插不上手！

老威：如果你爱人这只头羊被吃掉，那剩下的老弱病残羊咋办呢？

陈墨：弱肉强食嘛。只要李明达的罪名成立，哪怕罪不大，法人资格也得取消，而这个名义上的集体企业就任人瓜分了。

老威：那么“职务侵占”能成立吗？

陈墨：这话题要追溯到1997年，玻璃厂拆迁。李明达为了维护职工利益，与开发商谈判，对方为了勾兑关系，在拆迁合同之外，奉送了三套面积70平方米的住房，位置在玉林小区。当时每套价值13万元。

开发商把《产权证》办成了厂长李明达和会计、出纳的名下，因为其它职工有自己的住房，而厂长在任多年，却一直以厂为家，

没有自己的房子。这就构成了“职务侵占”，因为这是以“玻璃厂拆迁”为前提的赠与，一旦拆迁办说，这房子是属集体的，我爱人就没希望了。

老威：你家有几套住房？

陈墨：就眼下构成“职务侵占”的这一套。97年前，我们住了10年厂房，还是1988年发大水，街道办事处救济安排的。真是心急如焚，因为一旦判下来，我们父子就得搬出去，没有家了。

老威：你家平时没有积蓄？

陈墨：我们这代读书人，受够了传统束缚，生活观念很老。李明达当了24年厂长，这次检察机关查帐，却没有任何问题，也没小金库。冤啊，老威，说到底都是我爱文学、办《野草》的结果！我原准备即使喝粥举债，流落街头，也要把李明达保释出来，我曾托了好几个人，我甚至还筹备了几万元，可没人敢接钱，在这个贪官污吏招摇过市的盛世，我却勾兑无门。

李明达有心脏病，个性又强，在家我还得让着她。这次坐牢，真担心她想不开，出啥子事。我曾向公安部门要求，关我，判我，换回李明达，我毕竟是个筋骨较强的男人嘛。

老威：这一招太狠了，抓了老婆，把你逃跑的路也堵死了。不过，纵观古今文人，你毕竟不算最倒霉的。保重吧，墨兄。

寻 访 记



北京南站铁道边的棚户区

“是你欠了两个月的房租没交吗？
是你凭一副可怜相在这儿招摇撞骗吗？”
劈头盖脸不由分说的一顿毒打。
围观者齐声叫好，
吵嚷着送派出所。
“啊打吧打吧！打死我吧！”反正我不想活了。
从眼眶里流出墨水，
从哭泣里学会写诗。
从陌生的人群中学会装鬼，
从北京，哦，从北京这只空酒瓶的底部仰望天空。

——引自底层诗人曾德旷的长诗《殴打》

2004年1月15日中午，我乘列车抵达北京，按老习惯，住入元大都故址附近一位老朋友兼赌徒的家。稍后，与众多旧人共度了旧历年关。再稍后，我与艺术家高氏兄弟通长途电话，约定了碰面的时间。

此前，我和高氏在成都和济南，一南一北，两千里路的两端，同时上网搜索北京上访村的条目，并同时对署名“上善若水”的文章——《上访村，谁的眼泪在飞》产生了兴趣。我的兴趣读者们也许理解，因为这在已进行了两年的《中国冤案录》的范围以内。而高氏的兴趣在回避政治的观念艺术，属于超出范围的异端，或革命加异端。他们不玩两性关系和东方神秘，却老是在街头巷尾出钱雇民工、乞丐，拉拢其投入艺术活动。在某一年除夕，他们曾邀请了两大桌露宿街头的乞丐一起吃年夜饭，并把那些脸暗拍下来，合成一个观念作品——《与无家可归者共餐》。

由于网上文章均未标明上访村的具体地址，只以方圆多少里来概括，所以，我又给不少关注民众疾苦、以写道德文章而著称的学者打过电话，均无结果。最后，我想起湖北籍酒鬼余世存，他主编过《战略与管理》，消息来源甚丰。果然，电话一去一来，老余就敲定了。

2月17日早晨，已经阳光明媚了好几天的北京令人神清目爽，柳树发芽了，坚冰正在融化。我，高氏，还有诗人陈勇和回地，同余世存在五星级的建国门饭店见面。神通广大的老余请来《纽约时报》驻京记者储百亮做东，于是大伙利用美帝国主义的公款吃了一顿广东好饭。席间，老余作了介绍，我与储百亮聊起来。他驻京8年，普通话地道，那种带“儿”的卷舌音，令我等川耗子汗颜。更令人惊诧的是，他把上访村“摸了个底儿透”，哪儿进哪儿出，假上访和真上访，桥洞和旅馆等等。他还随手画了一

张路线图，并特别强调“铁路以南”。

很遗憾，储先生是一眼就能辨出的正宗老外，不可能给一群中国人做上访向导。为缩小目标，余世存及陈勇也留下了。我捏着巴掌大的美式路标，与高氏、回地一道打车上路。都市繁华纷纷退却，20 多分钟之后，路面开始坑洼起来，尘土飞扬。大约过了一座公路桥，沿着倾泻着垃圾的肮脏河岸，北方的天空和地貌显现出它荒凉的本质。我们在陶然亭一站下车，向路口的几个人打听上访村，他们均习惯性地笑着，不接话茬，却反问我们是不是外地来的，住不住旅馆？一个面色粗砺的妇女还拍着路旁的面包车说：“专门接送。”高氏随口问价格，回答是 20 元至 50 元不等。高氏说：“我们要找最便宜的上访人员住的旅馆，就是一宿 3 到 5 元的那种。”周围的人打量着我们还算齐整的衣着，哄笑起来。妇女说：“最低 15 元，再低就没赚的了。”我敷衍说：

“你留个号吧，回头打电话给你。”于是妇女叫一个更加粗砺的北方汉子留了手机号，并且指出：“你们不是上访的。”高氏说：“怎么不是？这地方我 25 年前就来过。”

高氏没打诳语，他的确在 25 年前，为了父亲的平反昭雪来过这里，他还依稀记得这路口，拐进去，就是一条深 200 多米的死胡同。高氏边走边拍照，并让我留意斑驳的老墙间的文革遗迹，“团结、紧



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来访接待室门外
情景（2004 年 8 月）

张、严肃”，“活泼”二字辨不清楚了。不过这倒是眼下处境的写照，进入这条上访胡同的人，似乎一生都“团结、紧张、严肃”，而“活泼”的多余的尾巴被国家给切除了。

胡同右边还有印刷厂和印刷公司的招牌，看那衰败的痕迹，要么是 60 年代一直苟延至今的老国营企业，要么是 80 年代残喘过来的乡镇工厂，我怀疑里面是制作盗版书的窝点。紧挨着这窝点，还有个打着饭馆旗号的窝棚，卖大饼、馒头、干饭和炒菜。这是上访淡季，老板，小工和一条脏兮兮的狗都无精打采，全无城里饭馆拉客的热情，可见其不愁没生意做。

往里再行几步，就到头了。普通得过分的大门，看不出这是国务院的信访处，倒有点像一县级的职工培训学校。门栅闭着，我就领头从侧口入，不料被戴红袖章的门卫拦截，并棒喝一声：“干什么的？！”

高氏答：“找人。”

“找谁？”

“找来上访的舅舅。”

“进来说清楚！”

我辈闻风丧胆，连称“不必了”。门栅内，好几个红袖章关注我们，而左侧停着一辆面包警车，司机正抱着方向盘装睡。此时我才看见门外的两间平房，监狱的号子那么大，紧凑的窗户竖着铁栏，其中包含两个巴掌宽的窗洞，像 1958 年公社食堂的饭窗。这就是所谓的“人民来访接待室”，功用不过是收取材料并填表格登记。

我记得位于成都文武路的四川省高院信访处也在大门旁边，面积不足这儿的一半，而中国各地的法院审判庭都巍峨、庄严，似泰山压顶，令人联想到古罗马凯撒时代的殿堂。相形之下，这“人民来访”的地方犹如积满蛛灰的狗洞。

这是一个休息日，政府似乎消失了，而被各族人民统称为“二

政府”的红袖章在警界线那边，暗示着几十年前“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毛时代。而上访的人们，从巷口到巷尾，东一堆西一堆，如祖国皮肤上治不好的牛皮癣。他们都持有一个齐腰深的盛满上访材料的编织袋，这种源于日本的原始化肥口袋我小时候就见过，上印“日本尿素”，据说为田中角荣首相首次访华带来的“日中友好”的礼物，特别结实。可谁能想到，它的寿命竟敢长过毛、邓、江，目前，法律意识禾苗般生长起来的乡民们，又拧着它，走进了胡时代。

由于较为入时的穿戴和长相，在这条光阴倒流的巷子里我们不被理睬。我写过 100 多篇对话，在这儿却插不上嘴。上访者，一律的蓝布衣裤，一律的焦枯的脸，或坐，或站，或行，如冬日阳光下的幽灵。偶尔有风声，偶尔有露出袋沿的纸页被风卷跑，于是那人就爬起来，无声无息地去追。秃枝也在房脊上晃动，最高的纸页挂上面，灵幡一般哆嗦着。诗人回地说，那大概是递给上帝的申诉材料吧。

高氏靠近一位北方老大娘拍照，她埋着头，与地上的字纸混淆一体。我们轮流与她搭话，她却沉浸在自己的意境中，把字纸一张张码齐，嘴里还念念有词。我蹲下去，只瞅见“冤情陈述”四个字，老人的破袖就掩住了。

警车鸣了两下喇叭，我们被惊醒了。“走吧”我说，“这儿什么也访谈不到。”

出了巷口，我们又碰见那些拉客者，此时那个妇女问道：“你们是记者吧？”

“不是。”高氏答。接着反问道：“你怎么知道我们不上访？”

大伙又笑了。其中有人说：“瞧你的脸白白胖胖的。”

“白白胖胖就不上访吗？”我不服气。

“也上访。”妇女说。“但那些脸是苦的，是愁的，一瞅就

知道。”

2

隔着冰封的宽阔河流，彼岸楼群如正驶入无尽时空的豪华游轮，而此岸的3个人却左顾右盼，向有限的街沿寻觅着。大约100多米的陶然亭老墙根下，展开了含几十人的乞讨或上访的露天社区，有的锅碗瓢盆都带齐了，饿就随地掘个灶坑煮食，困就靠墙根倒卧，没头没尾地裹进砖头般生硬的被子里，面上再罩一层塑料布。而几米之外，就是车水马龙的街面。

我们在这种半人半鬼的流淌风景里显得不伦不类，往往刚要开口说点什么，对方枯柴棒子一般的黑手就直送跟前，给不给钱，你看着办，别废话了。

在半个多小时的搜寻中，我们还撞见了几个初来乍到的上访人员，衣着像70年代的生产队干部，他们居然向我们打听“哪儿有便宜的旅馆？”我们还在一位摊贩的指点下钻了桥洞，结果空荡荡的。据说这儿曾聚居好几百人，是个免费的吃喝拉撒地。可惜春节前政府重拳整治，出动几辆大卡车，把上访难民统统弄到东郊昌平县挖土筛沙去了。

这一时段记忆最深的是一位贵州老大爷，来自黔南山区。当他拄着打狗棍，从墙边凸现时，我随口问他上哪儿去？不料他却站住了，并用与四川话相近的贵州话回了句“啥子”。于是我们隔着两道铁栏杆吼开了。老人已77岁，浑身烟熏火燎，可腰板硬朗。他当过彭德怀的兵，打过国民党，并在朝鲜战场出生入死。后来彭老总倒霉，他受拖累回老家，“我们那个地方嘛，离公路还有半天路，”他说。胸前的军功章在日照下忽闪着古董的暗光。

“我见过世面，就代表全村群众来上访，”老人比划着，嘴里竖一颗孤零零的黑牙，“转了十来天，车到北京，又摸了五、

六天到信访，材料递上去了，等得人心焦嘛。”

“你回去等嘛。”

“回去就出不来了，乡头搞计划生育，一超生就罚款，想钱想疯了。你不交，就扒房子，杀耕牛，砸东西，收土地。好凶哦，还捆人。这是共产党的世道哦？我这个老共产党，看不惯，就要向上反映群众的疾苦嘛。还说影响不好，到处堵我。我是哪个？彭德怀的兵！身上有弹片，胸口有勋章，几十万敌人都堵不住，几个村乡干部还收拾我？”

“现在政策变了，允许生二胎。”我提醒道。

“狗日的乱搞嘛。”老人一愣，继而恍然大悟。

“你回去嘛，在外头生病咋办？”

恰好一辆卡车过路，老人没听清，就抬棍划了个半圆，答非所问道：“我就在这一带到处住，就当年轻时蹲战壕了。”

话别老人，三五辆号称“京牛”的机动三轮围了过来，都称知道上访村。惊喜之余，我们二话不说就打开了背靠驾驶座的三合板嵌成的密封笼子门，笼内为亲密无间的情侣双子座，眼下却硬塞进三个男人。司机在外头通通连踩五六下，这种盛行于各地的鸡婆车才崩崩地吼起来，蛋门乌烟瘴气，笼中刹那弥漫开刺鼻的柴油味。我与回地不得不互相搂抱，他说有点晕，想吐。我说如果旁边是女的，你就不想吐了。高氏半蹲半坐，还一直端着破数码像机，手肘在我们的膝盖上磕磕碰碰。“到哪儿了？”他正猜着，车却轰隆蹦了个高，我们的头都撞了顶箱。

跳坑之后，又是上坡、红灯和拐弯。我逐渐适应了，觉得偷渡就这滋味。回地反驳道：“这种速度也叫偷渡？等到了西方，你我都80岁了。”

下车付过5元，我们开始踢腿伸懒腰，呼吸带垃圾味的新鲜空气。蓦然发觉没走多远，始发点就在对岸，我们不过绕冰河兜了大半圈而已。

接下来有点像行为艺术，高氏戴军帽披长发，我光头，回地介于两者之间。我们在热闹的街上逮住人就问：“附近有没有上访人员住的便宜旅馆？”都答有，但又指不明确切之处。我们来回回耽误了不少时间，情急中擅自闯入了两家夜总会，三家小客栈和几家当街为铺面的单位。其中有个打着“招待所”招牌的黑店尤为可疑，门脸狭隘，阶梯曲折狭长，上了黑咕隆咚的二楼，才见一平米左右的服务台。我们与登记小姐打了个照面，她问：“住店的？”高氏应道：“多少钱一晚？”她答：“有50、20、15。”高氏道：“有更便宜的吗？就是上访人员住的那种几元店？”小姐生气了：“没有！你们要住就出示《身份证》。”并且强调：“这儿没上访的！从来就没有。”

我们还是在这超长的筒子楼里打了个来回。百分之九十的门紧闭着，我们曾冒昧推开虚掩的门缝，大多是六人间，也有五人和四人间，入住率大约一半以上，但住宿条件只达到文革时凭证证明睡觉的水平。有一房内住了老小五口，行李却只有两个编织口袋，我问：“你们上访吗？”他们却哑巴似地发呆。

在服务员的驱逐下，我们又出大街，继续逮住人问那句“便宜”的老话。我与高氏和回地商量，万一今天没结果，我们就找家10元店住下，“耗它三天，还没个结论？”我发狠道。

“京牛”又过来了。还是那种腔调：“上访村么？知道知道。”我们一再求证，还是“知道”。于是三人又被塞进活动肉笼，崩崩崩地上路了。

出于诗人的敏感，回地感觉不对劲，但叫停已经晚了。我们沿着河岸又兜了大半圈，居然不差毫厘地返回原地。进巷口时我向笼外瞄了一眼，失声叫停，但憨厚的司机充耳不闻地前进。高氏又插车篷，司机还是一意孤行，非要抵拢国务院信访处的大门才肯熄火。

我们与之理论，回地气愤地强调：“刚才我们就是从这儿出

发的！”司机一头雾水地嘀咕：“是么？这就是上访地呀。”

无奈之下，高氏想起留下手机号码的客栈老板，就掏出纸条拨过去。对方接了，但回声表明正在往目的地拉客，过不来。于是我们要无赖，逼着司机带我们去上访村。司机说：“好吧，不过再加3块钱。”

兜第三圈了，三个路盲的警惕性自然提高，就敞开后车门，沿途察看。从此岸到彼岸，嘎地又停车——“又回来了！”高氏嚷道。

司机指着跟前的单位大门，毕恭毕敬地解释：“这回没错儿！里面全住的上访户。”然后急匆匆地接过车钱，逃之夭夭。

电动栅栏封住了车道，20多米的深处，有一幢三层的老式楼。我们企图从门警室下的豁口进入，却被一只戴红袖章的手臂拦住：“干什么的？”

“找人。”

“有证件么？”

“没有。”

“那就不准进。”

“我们是来上访的，”高氏道，“听说里面吃住便宜。”

“是很便宜，”红袖章不屑道，“一人一天五块钱，吃住全包。但是要介绍信。”

“什么信？”

“国务院、人大、高院信访处的证明你合法上访的介绍信。”

“有多少人合法上访呢？”

“我没数过。”红袖章挥挥手腕，示意我们该离开了。“那楼里还没住满呢。”

三人喏喏而退，沮丧地压了一会儿马路。我无意间抬头，瞥见了横空出世的“××宾馆”的楼顶广告牌，突然记起诸百亮

“见了××宾馆就右拐”的提醒，不觉豁然开窍。

3

××宾馆不过六层，却是永定门车站一带最高的建筑。加快速子绕过去，时光顿时比我们初入陶然亭上访胡同还倒流得快。两层或一层的平顶房屋像粘成一片的火柴匣子，污泥浊水一般涌出来自塞外的旅客们。犹如胶片发黄的老电影，我们在上苍的导演下，与那些挎包扛箱的，拉家带口的，左呼右唤的难民们擦肩而行。灰尘，人头和阳光搅和着，泛滥着。有两分钟，几乎走不动，我们就退进一水果摊，作出选购的样子。其实纸箱里的桔子和苹果干得像油画里的，并隐隐有生漆味。

人潮时起时伏，我们又在火柴匣子间穿梭了几回，有个两颊呈膏药红的五短汉子在腰间捅了我一下，并递来一张内蒙古赤峰住京招待所的名片。“多少钱一晚？”“50。”“太贵了。”“你出多少？”“我们不住店。”“要我？你妈个傻屁！”

终于望见了铁路，但在检票口里面的候车厅外。我们没票，况且眼下关门闭户，看来一时半会儿也没有列车。诸百亮强调过“铁路以南”，但飞不过去呀。

于是我们在周围的胡同里迂回，疲惫而固执地打听。人们要么不知道，要么躲躲闪闪，有个客栈老板还指着一个断腿的乞丐开玩笑：“他一直在这一带上访，你去问吧。”高氏果然逮住问，那拄拐人专注地刺了我们一眼，向屋檐下僵卧着的另一同类呶了呶嘴，就迈拐而行。

太阳偏西了，再这样耗下去，结局甚为不妙，情急之下，我们又上了一趟“京牛”三轮，不料眨眼功夫就进了一条背巷。司机开门见山道：“只能到这儿，那边我可不敢去。”

“你怎么说话不算？”我们质问道。

司机求饶道：“我退一半钱好不好？真的不敢去。打了招呼的，谁去砸谁的饭碗。”

一听这话，我们便揪住不放：“你总得指一条道。”

司机略略迟疑，方边掉头边点拨道：“这胡同里总有不怕死的……”声未尽，车就轰轰几下没影了。

三米之内停着一辆平板机动三轮，一个虎背熊腰的白发老者横在车前注视着我们，周围还有些衣衫褴褛的孩子和妇女。刚要开口，老人就拦住道：“别说了，我带你们去，三个人六块钱。”

这是北方常见的货运三轮，不过，大平板上铺了一层油乎乎的毡，我们从四周垫脚一撑，屁股就尘埃落定了。老人回过脸叮嘱道：“坐好，路可颠了。”

大概是轱辘有些锈，车的发动绳一拉，就扎扎呻吟。老人持续猛拽，半边肩头倾斜。轮子病人一般滚动了，比牛车还慢。但三个人都感觉颠的很舒服，也许是叫“京牛”挤怕了。

很不幸，没出百米远，就熄火了。我们要下车，老人连称“马上就好。”三分钟后继续上路，巷口拐了弯，就一溜下坡。为了节约油，老人关掉发动机，凭惯性朝下冲，不料对面来了辆卡车，险些把我们逼下地沟。老人刹不住，就跳下来，像扯头犟牛似地扳住车把，身子都绷成弓了。我急忙窜下，高氏则把双腿收拢。卡车醉汉似地晃过去了，接着又一辆手扶式拖拉机，我们罩在黑烟里步行几米，抵达较平展的道路再上平板。老人扎扎拽绳，车动起来，跟长跑一般快，我们终于出了这条阴险的胡同，来到视野开阔的敞地，车也快了，只比骑自行车稍慢。太阳偏西，行人稀稀落落，我们居然还绕过了一块枯草地，草尖如秃子头上的绒毛。超级蜈蚣一般的铁路近在咫尺，地貌略略起伏。车在翻土坎时又熄火了，拽绳发动，过了铁路，再熄一次，把老者逐渐累得敞胸露怀，十分豪迈。

就这样停停跑跑，我们也像猴子似地上窜下跳了五六次。高

氏边拍照边说：“北京有这么大块敞地不容易，起码值好几个亿吧。我说：“中间那块已铲平了，还有人锻炼呢。”回地说：“那就是房地产开发的中心了。”

又过了半个多小时，我问老人还有多远？他嗯嗯着，注意力却在脚底，像在伺候一个少爷。眼下的坡又弯又长，我们干脆全下来步行，路旁有座孤岛般的房子，半壁江山已塌，剩下的半壁顶敞开一半，床、柜子、桌、椅等家具乱七八糟地堆放。中年女房主则站在这被推土机日夜威胁着的焦土前，对往来围观群众控诉，极度悲愤将她的脸都扭曲了。

“这是我世代的家呀，说没就没了。”这唯一的钉子户指着周围的地基，房里还蜷伏着她的孩子们，“拆迁办和地产商串通好，半夜开着机器来，探照灯射在床上，烤得人受不了。都吓跑了，就我还在，昨夜他们又来推墙推房子，我还在……”

高氏拍照，我在逐渐散去的人堆旁发现了一只猫，它钉子般稳扎在断壁间，显得极有尊严。那是它的窝，哪怕明天这儿夷为平地，它凭嗅觉也能找回来。而狗却守着露天的饭锅，不时无奈地冲人们叫两声。

老人在坡顶催行，我们终于上了正道。不过几分钟，就抵达大马路边的棚户区。老人刹车，揩汗收钱，并急着离开。

“是这儿么？”我问。

“我已经送到了，你们自己找去吧。”

4

在路旁半个篮球场大的洼地间，三四个异味呛鼻的污水滩令人望而生畏，我们小心翼翼垫脚绕行，松软的泥地印下乱糟糟的“牛蹄窝”。夕阳像个溃烂的大桔子嵌在远处拆迁的废墟上，腥红透过马路不息的车流，平扫过来，使眼下的青砖矮屋显得像怀

旧电影的外景。顺着一人高的矮墙，胡同朝里蜿蜒，有左右两个入口，我们略略迟疑，凭感觉走右。两三个男女擦肩而过，眼神有点异样。高氏不管不顾地逮住问：“这是上访村吗？”“上访的人在哪儿？”

无任何回应。路也越走越窄，由两米到一米，有的地方，半米都不到。我们以为此路不通了，可一抵拢，却意外发现不止一个出口。简易板棚和矮屋混杂，首尾相接，有时人过去，头皮擦着屋檐，高氏则要弓腰。三个路盲在迷宫内盘桓，常为了猜路而停步。桔红的阳光在这片大过足球场的瓦顶上燃烧，而瓦顶下却安静极了。我曾窜入五、六个窄门脸，以为是一户，进去才发现尺把宽的通道老长，底部黑黝黝的，两边陡立着笼子屋，一溜好多间。“有人吗？”我喊着，只听见了自己的回声。

我麻着胆子敲门，并透过窗户窥视，暗处除一超级大床或两中级床，就是我熟悉的化肥编织袋。我心里一热，提高嗓门再喊：“有没有人？”头顶的天缝接着网，核桃大的蜘蛛闪耀着。

高氏和回地分别拜访了几个较正规的院子，喝酒、夹菜、打扑克都见着了，就没一个上访户。“当地的农民，现在都拿城市户口了，”回地说，“所以过得这么潇洒。”

“没苦像么？是不是装出来的？”我疑心道。

“肥头大耳，苦什么？”回地沮丧道：“连狗都不苦，毛色透亮。我还以为是戴红箍的联防呢。”

在三岔路口，我们拦住一个大嫂问，她却说：“上访的不住这边。”高氏问住那边，她随便指了一方向。高氏提醒道，“您指的就是马路那头吧？我们从那儿过来的。”

大嫂习惯性笑了笑，隐隐有汽车的喇叭声传来。“巷道太复杂了，耗到明天也钻不透。”高氏叹道。

“比人的肠子还复杂。”回地表达了诗意的赞同。我是地道的川耗子，仍旧哑攻着那些充满诱惑的窄门脸。有一次，我撞见

一姑娘在檐下的蜂窝煤炉上支锅炒菜，鲁莽地问一句：“您上访吗？”吓得人家躲进屋里不出来了。

转悠了大半个小时，我们从左边出来，兜了一圈。高氏看手机，离天黑还有点时间，于是三人从头开始。“今晚住在这一带？”我问。高氏答：“看情况吧。”

依旧没一个上访的。迷宫里炊烟四起，关门闭户。除了三个闯入者，几十条短巷内再没人了。这是我在北京城这么多天以来最安静的一刻，偶尔的喇叭声像来自遥远的梦中，脚步、心跳、甚至焦躁的脑门跳都被夸张得异常清晰。我们倒变成了声调凄楚的叫花子，下意识地重复了上百遍“有人吗？”但凉透的心里知道不可能有人，墙角的蟋蟀也同情地叫开了，接着是剧烈的耳鸣。

“我可找回当年失恋的感觉了。”我开了个不合时宜的玩笑。

回地还在东张西望：“有上访村吗？3块钱一宿的旅馆在哪儿呢？”

“我感觉就在这附近，明天再接着找。”我抠脑门道。

“像在打《地道战》，人民都下地缝了。”回地说。

“哪就掘地三尺。”

“没那么严重。”高氏友好的笑着，憨厚得像个地道的傻瓜，“会找到的，老廖。”

接着高氏有了重大收获，他在一堵鹤立鸡群的两层楼墙面上，寻见一则公安及联防的告示。时代变了，这类官方文告却从49年共军进城到反右到文革，一直贯穿了下来，成为这个种族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告示抬头都是为了社会主义首都的形象，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不蒙受损失云云，接下来是“根据xx法律政策”，列出1、2、3、4、5、6、7款，均系胁迫大伙的条文，其中的核心为警告当地居民，不得出租房屋给上访人员和法轮功，若发现可疑人等在周围活动，务必举报，否则，将承担法律后果。

我们细细端详着那破纸，猜测“法律后果”到底是什么，“关还是罚？关多久？罚多少？”高氏钻研道，“这上面都没写。”

“《治安处罚条例》80年代就有吧？”回地也钻研起来，“人民币和人口涨了多少倍？小丫头都成大姑娘了。”

“我身上没带任何证件，是否‘可疑’呢？”我习惯性地联想到现实问题，肩头做贼似地矮了一截，缅甸女人昂山素姬的一段话刹时浮出脑海：

极权主义是建立在敬畏、恐怖的暴力基础上的系统，一个长时间生活在这个系统中的人会不知不觉地成为这个系统的一部分。恐惧是阴险的，它很容易使一个人将恐惧当成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当作存在的一部分，而成为一种习惯。

可谓一箭穿心，我脸色刹白地愣在原处，直到高氏拍完照，搂我的肩。回地还在咕哝：“真他妈此地无银三百两，上访人员肯定在这一带最集中。”

“或许刚被清剿过。”高氏说。

为了从幻觉陷阱里挣脱，我又敲开了一扇门。见五个人蜷在一张大床上，各自清理着什么东西，却异口同声地否认“上访”。我边道歉边撤退，接着又拿出赌博的勇气，一把拉开一筒子屋，一个乡村女孩从床铺起身，腿一伸，就站在屋外了。她说：“有事吗？”我尴尬地笑了笑，就问这么个单人床的空间租金几何？女孩弯下腰提上鞋跟，才回答“80”。

5

依依不舍地出了巷口，夕阳下去了，洼地上笼了一层薄雾。

尘世的车流在马路上周而复始，高氏隔着污水滩与几个脏小孩对望。“这地盘年头不浅了，”他叹息道，“如果上访十来年，孩子也该这么大。”

我注意着村头的小卖部，店主坐柜后。捧了一盆面条在吃。紧邻的筒子屋，蛤蟆一样张着口，一个健壮的妇女正埋头洗碗，肩背门板似地朝外。我趄上去，凭多年的访谈直觉，我认定她是上访者，因为她比本地居民更土，又住民工也不入的窄地儿。我满有把握地轻声问：“大嫂，您知道谁是上访人员吗？”

她缓缓扳过身，拦住入口：“哼，不知道。”

我赖在原地，定定地看她，齐耳背的短发，一张黄泥色的大饼脸。右眼黯淡愁苦，左眼却闪着刺人的血红。我本想问她的眼睛被谁打啦，却忍住了。

她被盯得不自在，就泼掉碗里的水，回转头。我再次问：“大嫂，您知道这地儿谁在上访吗？”

“给你说了不知道！”

我失望地撤退半步，右脚险些踩进积水。收腿时我死乞百赖地再问：“大嫂您上访吗？”

妇女冷笑了一声，终于抛出一句：“你是间谍吧？”

“间谍？！”

“对，瞎转一下午，屁也没得到吧！人家都不愿搭理你们。”

我张口结舌，只好抽身求助高氏：“那女的说我是特务，你再去……”

高氏不愧老江湖，大腮帮子老远就挤出笑纹。接着，挺和谐地站到妇女身旁，一团和气如一家人：“嫂子，您看是这么回事，我们呢……”

“社会调查？”妇女边琢磨这新字眼，边审视高氏，疑云渐消：“真的不是间谍？”

“哪儿的话！”高氏摊开双手说。“间谍都是国家单位的人，

岂敢留光头和长发？您瞅清楚，我的头发是真的，没戴头套。”

“我还以为你们要偷上诉材料！”妇女松了口气。

“什么？！”

“怪我老爸没让读书，我不识字，哭了多少。”妇女的话匣子打开了，语速如疾风骤雨。我急忙掏出录音机，与高氏互换了位置。我欲采取习惯性的一问一答，但根本插不上嘴。“来北京两个多月，材料被偷了两三次。有人冒充公安，专偷上访材料，连车票，医药发票都不放过。我不识字，材料要花钱请人写，后来没钱了，请不起了……”

“您请律师了吗？”我见缝插针道。

“律师？真正的律师请不起，上事务所，不见；写材料，标明 200 元一份。假律师倒经常上门，许多人初来乍到，就请了，结果便宜无好货。去哪儿都遭殃。现在我不怕了，你打，你找黑帮，你冒充公安，你扣留关押，你下耗子药，我都不怕，我豁出去了，我不相信共产党的天下这么黑暗！什么手段都使，怕杀人灭口，我妈也跟着来这儿。你们看吧，横着两米挤两人的洞，我和妈一个睡一头。这样也好，凑合着过，材料压在铺下面，白天一人跑信访，另一人就在家防着。不在乎，关过七、八次了，我借别人相机拍的证据全搜走了，毁坏了。血白流了吗？高院让我回去，在当地解决。当地能解决我还跑到北京来？市里、县里、乡里都是他们的人，黑帮也是公安局家养的，我回去就没命了。没钱也不回！讨口也不回！租这房每月 120 块，我就去讨，有剩下的，就买点米面。吃菜就去市场上捡，没人要的菜帮子，肉案边的渣子余料全捡回来，洗一洗，放点盐，还能吃。妈说，什么苦日子没过？周围这么多上访的，至少没生命危险啊！一喊，人全出来了……”

趁她喘气的间歇，我赶紧问：“您是哪儿的人？”

“安徽淮南凤台县七一乡的。”

我恍惚记得安徽是改革开放以后，最早推行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地方，作为邓小平的干将，省长万里因此名声大噪，官运亨通，终于当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你们那地方还富裕吧？”

“当官的都富裕了，一个乡的书记一年的收入都 100 多万。土地承包得比较早，大概 80 年代初，我家就承包了河坝。当时那河坝光秃秃的，连根草也没有，离村子又远，谁也看不上。可我爸性子拗，非要承包。我爸属小龙，今年 64 岁，能吃苦，毛泽东那时就是劳动模范，从吃公社食堂到文化大革命，年年是公社的模范，掏河挖沟、耕地耙田、砍树植树都冲在前头，奖状得了一屋子，有的贴不了，就卷在柜里放着，还有草帽、毛巾、鞋子、一人得的奖品全家都用不完。我老爸琢磨报纸上的社论。觉得政策不会变了，就瞅准河坝，把全家赌上去，栽上许多果树，还有其它树。路远麻烦，我老爸又领着全家在坝上建了七、八间房，驻扎下来，日夜操心。

后来树长成林，经济发展，河坝地越来越看好。公路也修过来了，也有人骑自行车来旅游了，我家就在路边修车补胎，扩大经营范围。日子过得红火了，就有人眼红，先是村官借钱，许多次不还，我老爸就不借了。稍后的 88、89 年，乡里来谈，‘为了整体发展，共同致富’，要收回承包地，我家当然拒绝了，从此就结下了梁子。

到了九几年，河坝成了风水宝地，水果卖不过来，林子钻进去，连人影子也见不着。而政府也一再派人，要收回承包，还在坝边挖沙，搞建筑，把河坝搞塌了好几块。我家坚持不退让，他们就让黑社会的人来骚扰，偷、抢、打人。到了去年，政府强令拆迁，声称坝是国家的品牌，我家不搬就是不爱国。这帮贪官都想从这儿捞好处，可我老爸牛脾气，宁死不迁。

有个半夜，我家八间房全失火，转眼就红透了半边河水。村

里都知道是当地黑帮“十一少”放的火，但没人敢惹。房烧了，我老爸就原地搭窝棚，还不搬；于是十一少就打上门来，我爸，我妈和我，全挨揍。我和两个弟的头发被烧了，大弟当过兵，被当胸一拳砸睡下，至今胸口疼。

整了好几次，还拿刀砍，我爸和两个老弟的胳膊、腿都被捅，血流了一地。报案到派出所，公安不仅不去抓凶手，还要我家出示证据。身上的伤，相机拍的家破人亡的照片都不算，他们要目睹证人。十一少很猖狂，就堵在派出所门口，一出来就追我们，公安就当没看见。市、县、乡都穿一条裤子，没小百姓的活路。

没家了，断了后路，还要躲黑社会。我老爸和两个老弟，三个伤病人，躲在亲戚家不敢露面。只有我到处告状，市里告不了，到省里，我不识字，吃了多少哑巴亏！但是人怕逼，我一个女人，你能把我剁来吃了？我被拘留过8次，最长47天，最短7天，不服，就是不服！你们要打要剐，也要在光天化日之下，让群众雪亮的眼睛罩着，这就有证人。有一次，七、八个人拽我进黑屋，我死抠着门把喊：“我不挨黑打！我不挨没证据的打！我永远相信共产党，死也要盼包青天。有个当官的嫌太难看，就出面阻止了……”

正听得入神，却有手扯我衣角。惊回头，见一皮包骨头的老太太贴在身后，厚镜片里目光充满恳求。我问“有事吗？”老太太点点头，更紧地攥住我说：“去我屋吧，你不能光听她一人的。”我为难道：“还没完呢。”却不提防一个鲁莽的男声吼道：“她永远没完！”此时，周围冒出了一堆人，都喊着叫着：“去我屋！”幸好有几滩污水，大伙才没从正面挤过来。高氏和回地见状，急忙高声打掩护：“我们不是记者！我们是做社会调查！”但人们的情绪波动起来，我只好关了录音机，想随贴身的老太太去。正倾诉的妇女见势不妙，急忙拽着我胳膊。人们愤怒起来：“你还要哆嗦什么，你把大家的时间都占用了！”妇女见犯众怒，就边

放手，边去床上抓起一大块写满字的白布，叫高氏“快点照”。

天光不足，妇女就出了屋檐，将冤情白布掀开。高氏按下快门，又叫我与她各牵一角，拍了张完整的。此时，店主冲了出来，大喝：“干什么？！”还推了她一把。不料她反而冲店主笑。原来，这是她的房东。

店主又冲人们吼：“散开！散开！惊动了联防，我连生意也做不成了。”

离开的刹那，我才知道在这儿录下的第一个声音叫“桂兰”，只有 28 岁，可她愁容满面，头发夹白，看上去接近 40 了。

6

瘦老太太一直狠拽着我，生怕猎物被其他人夺走，我的羽绒服领子歪斜，小半个肩头都露了出来。我跟她转了两个弯，进入一条两米宽的巷道，看来这一带经常遭水淹，所以两边笼子屋的地基足有半米高。在我迈上三级台阶，被挟持进屋之际，脑后还有人叫：“去我屋吧！里面有十几号人等着呢！”

终于扣上了那扇破门，老太太松开我，歉意地一笑，我却差点流泪了。她的脸比巴掌还窄，耳边的两根筋像两根醒目的鞭子印直插进领口。当她的笑从喉管里咕咕两声冒出，进而自嘴边牵动面皮时，两眼却在圆镜片里直勾勾的，没一点笑或者哭的意思。那种惨，那种活在坟墓里的惨，我写不出来。

稍后了解到，这个所谓的“老太太”还没满 50 岁。此刻，她直挺挺地屹立床尾，而床上还坐着三个女的。靠里的两个人年龄大些，凭肤色和衣着，断定他们是乡下的普通妇女；而靠床边的女孩白皙、文静，高氏与之聊天，知道她还是中专生，由于无辜遭受当地化工厂放射性物质的侵害，患上了无药可救的怪病，省市求告无门，所以上访到北京。

四个素不相识的女人同租一屋，除了一架超大的炕板床，就剩横竖两过道。上访的材料或垫枕头下，或装入口袋塞在过道尽头。碗筷锅盆叠在一处，“老太太”勾腰朝里收了收，方重新站直，有条不紊地将她的申诉状取出，一张张摊开纸页，在床的一角摆了个四方阵。她口中念叨着页码：“1、2、3、4……，”从左至右，三排，不差毫厘，然后，还有一沓照片。

我比高氏矮半个头，“老太太”比我矮半个头。隔着床角，几寸之间，我的呼吸吹动她的发缝。她的头发非白即灰，并且脱落得绽露出头皮。我不忍深看，就拿出录音机，并偏移目光。

“老太太”第三次站直，两臂下垂，贴紧裤缝，真像在文化大革命中认罪似的。她问我：“开始录了吗，同志？”

“好，开始。”

于是她清咳了两声，一字一顿地开场。看来她已重复操练过若干次，积累了相当的临阵经验：“我是黑龙江省富锦市 101 医院人氏，我是医生，我叫徐惠芬，89 年由于同事纠纷，被李长成侵权伤害，住院花掉 1100 多元，后来他自己同意报销药费。可不久，他又当着邮电局长的面，纠集牟桂山、李海波将我再次打伤，药费又花了 1700 多。因生命无保障，我将一伙打人凶手和背后主谋李远航告上法庭，先是富锦市法院，后来又上诉到佳木斯法院。李远航是医院院长，有钱有势，他向公安、检察院、法院行贿，致使这起简单的行政诉讼一拖近 10 年，他还当着我扬言，要我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我不吃他那一套，李远航就雇黑社会的瘪三杀我，瘪三没来杀，说我是好人，他妈还认识我。后来李远航就亲自到山东，雇黑道上的李燕亭去学校绑架我的女儿和儿子，当时有学校校长、班主任和体育老师在场，李燕亭没下手机会，就找到我说：“是公安局让我这么干的，你不拿钱我就找公安局。”还把一张写着“王抚红，11 岁，在某某学校”的条子给我。我撕掉了，还给在场救我女儿的校长他们下跪。后来到

了1998年，我女儿考上中专，读石化专业，李远航又雇哈尔滨市的杀手丛松将我女儿绑架，以500的价格，拐卖给桃山（我通过录音和地图反复查证，黑龙江境内无此地名，只好记下音译——老威注）红玫瑰娱乐城的老板王玉良，逼我女儿做三陪小姐。我女儿不甚忍受摧残，就逃跑，可没出5里地，王玉良就雇了辆伏尔加堵截，将我女儿抓住，活活地打死。我有照片为证。”

直到此时，“老太太”的嗓音才情不自禁地抖了一下，而之前，她的“认罪”腔调始终是不紧不慢，似乎在宣读一份报纸。她的手也在下面机械地翻动，正念着的一页将完未完，眼角就透过镜片斜溜下一页。额头出汗了，由于弦绷得太紧，她可能捡错了页码，因为录音机里录入了纸响、喘息及小声的嘀咕：“在哪儿呢？”

她跟着又念，但似乎没衔接上：“学校知道，他贪污学生保险费，现在只给我3300元，还差6000多。这是谁呢，学校校长吧？贪污保险费……”

她有点念不动了，但我和高氏都不好吱声，因为对沉侵在往事里的一根筋头脑，不能随意插嘴，否则就越搅越乱。果然，几分钟后话题绕了回来：“这儿有1999年3月7日，我女儿逃跑，被殴打致死的证据，红玫瑰娱乐城和派出所开出的遗物清单；还有1999年7月3日，桃山市公安局副局长廖国庆的批示：“查处王玉良一案，立即刑事拘留，依法办案。”他们没有依法办案，凶手继续逍遥法外。

“1999年7月3日至8日，中央李瑞环去伊春和铁力视察，怕我喊冤告状，廖国庆和一名刑警，用车把我接到桃山，住进酒店，睡沙发床，每顿饭四个菜，还陪我游花逛景。当时有三个女的照顾，指导我写‘犯罪嫌疑人的证据’。这样搞了几天，估计李瑞环走了吧，他们就说：‘材料备好就没事儿了。’还掏出一大把钱晃了晃说：‘你去过伊春吗？检察院副检查长家？’我回

答：‘找过，没去过。’她说：‘我去！带上材料替你去！’可说了就说了，还是没处理杀人凶手。

“这是我女儿（在逃跑前）亲笔写下的犯罪嫌疑人许德利的电话号码：0451—3644202；0451—7493801。通过刑警大队的现场勘察，10分钟就破案了；可他们却伪造证据，说我女儿叫火车给撞的。同志你看，这是火车站当天的《无行车事故概况表》……”

“老太太”觉得热，就取下起雾的眼镜用衣角揩擦，高氏小心地拍照，并对床上的三人点头微笑。她们每人手里都有材料，大约是在看“倾诉冤情的幸运”能不能轮到自己。床边的女孩轻声说了句“我这种特殊的病……”高氏就埋下撑竿一般的腰，将耳朵凑过去。不料，门咚咚地响了几下，我们的心卡地一下提到嗓子眼。“老太太”抢在大伙前头问：“谁呀？”外面没回答，只叫“开门”。“老太太”说：“别理他们”，又接着念道：

“命案就拖下去了。到了2002年11月10号，我上黑龙江省人大告状（之前我还去了佳木斯，人大、政协、高法都找过了），可富锦当地派人派车到哈尔滨，给了省信访处孙处长3000块钱，行贿受贿，勾结封口，后台是公安局长刘X X，检察院、法院的X X X，X X X。我被拉回富锦，进拘留所关了15天。接着在有一天早上6点，大街上还清静，不见人影的时候，将我捆绑着，几个人抬上车，直拉进精神病院。说‘留宿’，还给院方李彦咏6000多元。我不服，喊冤，他们就堵我的嘴，给我捆绑打针，睡电床，还用电棒子电我，弄了两次，弄得我死去活来。他们还命令我服药，我接了。人一走，我就扔水盆子、厕所、床里面。我没病，同志你们看，这儿有北大第六医院的诊断书：“徐惠芬，女，48岁，无精神病历史，特此证明。”

门又响了，不再是几分钟前探究而客气的“咚咚”，而是拍门，通通通，整面嵌着窗棂的墙都抖起来。我警惕地收起录音机。高氏摇头，表示若真有情况，一切都徒劳。我们三个都没带随身

证件，却擅入虎口，“搞不好，”我说，“要被公安弄到昌平县去挖土筛沙了。”

“收容已取消了，我们这种情况，如果不暴露身份，最多遣返。”高氏苦笑道，“但又不可能不暴露。”

拍门声更急了，跟着是更急的吼叫：“开门！开门！！”

高氏问：“还能继续访下去吗？”

我说我没事，看她的。可录好的带子塞哪儿？

“老太太”从我下巴底挤过去，凑拢门缝朝外瞅了瞅说：“急什么！没完呢！”又挤回原处，认罪一般重新站好，开始宣读。而此时，机灵的床边女孩已和高氏聊上了。我一咬牙豁出去了，所以随着重新按键，磁带里进了两个声音，女孩若有若无的低诉作为前台悲剧的背景，令人觉得这世道的确不合适人类再呆下去。

“老太太”终于挺了挺腰板，双手执纸宣布：“我现在要求将杀人犯王玉良绳之以法。我女儿逃跑是老板娘魏玉霞发现的，告诉王玉良，并叫上魏东志，李海达，四人用伏尔加车到处堵我女儿，堵住了，用大棒子活活打死，我有照片为证。还有铁力公安局长武铁夫，报假案，隐瞒证据，现场8张照片，只给我4张。我女儿中专生，14周岁，16虚岁，逃跑5里地，还是打死了。你们看这照片，腿上、身上全是伤，眼珠子也抠了下来。还有验尸床上照的，这都是……与我女儿一起逃跑的几个女孩，躲进了公共厕所里……”

这时照片全铺开了，有整个凶杀现场的，有局部的，到处是血和打折了的木棍。死者的脸一团模糊，像在地上拍烂了的番茄。高氏轻声问：“我可以拍下来吗？”“老太太”说：“你拍吧，都拍下来。”接着一张张指点照片：“全是伤，多疼心哪。14周岁的孩子，成这样。你看这大棒子，到处扔的是，逃5里地，还不放过……”她到底绷不住，哽咽起来：“这4张是铁路公安局照的，瞒了4张；这8张是我找人照的，在验尸床上……”她终

于泪流满面。

高氏拉亮昏黄灯光，反反复复地拍照。屋外的喧闹更剧烈，拍门已转化为嘭嘭的擂门。窗棂和薄墙地震一般摇晃开来。我和高氏交换着目光，要豁出去开门，又被“老太太”给死拽住。

只听得她加速度地宣读：“王玉良，桃山红玫瑰娱乐城老板，拐卖、绑架、轮奸、故意杀人，触犯《刑法》232条，239条；中国黑龙江省检察院违反程序，故意包庇、伪证、不调查、隐瞒证据。王玉良明明杀人，却写成‘非法拘禁一案’；原先他们抓我，收容了5天，我出来告公安局‘非法拘禁’，结果王玉良跟我罪名一样，取保候审。深圳孙志刚被打死，公安部长周永康批示，犯罪嫌疑人抓了11个，我女儿被打死，凶手一个没抓……”

咣咣的擂门已相当恐怖，我寒毛直竖，已无心听下去，可右手仍机械地把录音机举在她嘴边。高氏已收好像机，催促道：“老廖，恐怕不行了！”“老太太”闻之疯狂加速，继续公布了从省到地方公、检、法部门的行贿受贿和包庇等罪状，最后，她突然抬头，猛吸一口气，像被撻上摊头的鱼，上下唇剧烈翕张着：“强烈要求维护法律尊严，严惩杀人凶手，替无辜受害者申冤……残害生命，罪大恶极，灭绝人性，内外勾结，上下串通，性质恶劣，手段残忍，阴谋杀人……请中央领导、检察院、公安部打黑除恶，秉公办案，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尽快把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超期羁押我一共80天，予以赔偿。上告人徐惠芬，徐展地（音译），李军，李红林，宋燕。2004年2月16日。”

7

惶急之中，我居然忘了按键，就把录音机装进兜里，所以在大半年后回放整理时，各种凄厉的吼、叫、哭依旧回荡在我的写字桌上。在高氏抽去插销的同时，门嘭地一下弹开，我们站在三

级台阶之上的门口，膝下两米宽几十米长的巷道全挤满了人，其中好些还穿戴着涂有大“冤”字的孝服。天色昏沉，手臂招摇着，举着上访材料。人们狂呼：“申冤哪！”“我们怎么办哪！”“采访我吧！”“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才有个头哇！”女人拖着哭腔，那种突兀的，往后拖得很长、很尖的哭腔调子，犹如一把长锯，在我们的中枢神经上一来一回地拉扯，切入，激起阵阵痉挛。回地明显受不了了，眼里浸出了泪光。我领头刚下一个台阶，无数的手就伸过来，接着是高氏。我们像落水的旱鸭子，坠入人流，被拽着，扯着，挽着，甚至搂着。每一个人都把材料往我们身上塞。巷道太窄了，我们被困了近 10 分钟，才慢慢腾出被粘连住的手臂，船头般侧着单肩向巷口划去。有个身高近一米九的大汉在为我们开路，他不停地喊：“让别人走！让别人走！”直至决堤一般轰然出路口。

又是我们刚抵达上访村时那块污水四溢的洼地，小卖部老板和我的第一个访谈对象桂兰都鹅一样伸脖叫着什么，但脚跟未定的我一点也听不清。人潮还在涌，由表及里，犹如卷心菜，一层一层将我们裹在中心。可一两小时前，这儿冷清，孤寂，犹如一座空城的入口。

这些从地里一茬接一茬冒出来的饱经蹂躏的庄稼汉，就是被精英们所定义的“沉默的大多数”吗？据上访的村民告诉我们，这一大片，方圆约 5 公里，都叫“上访村”。桥洞，工地，屋檐，废掉的建筑，正在拆迁的老居民房等等，都住着上访者。到了所谓“旺季”，这儿就是一口不停地往里下饺子的露天大锅，连墙根也没空的，许多人就随地支起编织袋和塑料布为篷顶的窝棚。

我们问：这方圆 5 公里到底有多少上访者，如何区别申冤与乞讨？谁也回答不上。“年还没过完，政府机关不上班，所以这时人最少。”那大个子村长说，“但最少也不会下万。我们这儿，出租房有好几百，就算一间平均塞 3 个人，也有好几千，可

也不及旺季的五到十分之一。你们没见着巷道里全睡人，马路两边全睡人，汽车都得绕着开。”

只正经说了几句话，人潮又起伏了。有个妇女给高氏下跪，高氏急忙扶住，但妇女如软体动物，双腿向下坠，高氏花了很大力气才将她提至胸前。我应人们的恳求，在一张张小纸上留电话号码，那是高氏的手机号，因为我本人没固定电话。此时我兜里已揣了一大卷上访材料和陌生号码。

又有妇女给我们下跪，并且接二连三，刚拽住这个，那个又跪下了。还有震耳欲聋的哭喊，这影响了我给大伙留电话，于是我和高氏一边匆匆草就，一边喊：“大家互相抄一下！”有个自私的小伙子刚接了电话纸条就塞衣兜，于是五六只手将他逮住，硬把那拳头掰开。“记者给我的！”那小伙嚷道，立即招来群众围攻：“什么东西！明天你就搬出村去！”

高氏后来说，还是有两三个私吞了没拿出来。有个人某一天来电，称自己在警察的拉网清剿中被绑到某某拘留所，求高记者去保他出来。高氏问他具体关在何处？他答不出，只说“大概在长城脚下”。

看来大个子村长很有威信，有了他的护驾，我们才得以脱身。“别死缠！”他吼道，“你们这样，下次谁敢来呀？！”于是人潮稍稍平静。

“人太多，我们也不知怎么办？”回地说。

“这算啥，五分之四的人还没回来。”村长苦笑道。

“这么晚还在外面？”

“到处寻吃呢。”

我们顿时哑然。缓了分把钟，高氏说：“我给大家拍个照。”

人们又忙开了，一转眼，就拉开了照集体相的架式。所有人都穿上了胸口或背心涂有大黑“冤”字的上访服。这漂白土布或蚊帐布裁剪成的统一外套，粗一见，还以为是乡间下摆过膝的孝

衣。我估计，每件的成本大约十几元钱。

上访服上除了大冤字，还有密密麻麻的叙述冤情的小字。真不敢想像成千上万的人穿戴如此冤装出现在国务院信访处、人大或高法门前的情景！如果在深夜，那将是鬼片的外景，或题目叫“不人不鬼的世道”的行为艺术作品。

高氏往坎上退，俯着拍，又正着拍。“这相机太破，我只有尽量把人给框进去。”他啧啧表示遗憾。我和回地伺候左右，那在暮色中白花花的片令人想起西北地区的回民葬礼。

相机太小，我真怀疑能否把如此多的内容装下，况且人影也模糊了。“能行吗？”我小声问。

“还剩一点自然光。”高氏挺有把握地望望天，又按了两下快门。“做这种事，上帝也会照顾的。”

“有摄像机就好了。”回地说。

“哪谁知道。”我说。“今天真神了，直到现在，还没个警察钻出来。”

眨眼天就全黑了，在昏黄的路灯下，人们撵过马路来送别。村长说：“你们快走吧，别撞上便衣了。”就招呼着人们，领头回到洼地。呼天抢地声仍旧此起彼伏，一辆卡车驶过，把那个上访的幽灵世界隔断了几秒钟。

村长还在喊：“争取把照片发表出来，让更多的人看！”

而我们回答：“还会回来的，放心吧。”

夜色笼罩，从原途折回，太复杂，怕我们迷路，桂兰悄悄地跟过来带路。谈到曾把我们当作“间谍”，她不好意思地笑了。她一直把我们送出几里地，到了大街才依依惜别。

“你们一定要再来呵！”直到大半年后的今天，我的脑海仍回荡着她干涩而渴求的声音。

尾 声

随后的几天，我和高氏设想了几种记录方案——其一，借一台摄像机，把寻访的过程再复制拍摄一次；其二，住进陶然亭附近的鸡毛店，将上访村的人一个接一个约来单独访问；其三，约一些关注底层的人文学者与上访者对话，交叉碰撞一番。

“主意都不错。”酒鬼余世存说，“但仍有点难度。”

“是吗？”

“第一是谁愿意跟你们去拍。看能否找一个报社记者，否则遇上麻烦，或身份暴露了，也好有个抵挡。说实话，真为你们捏把汗，去了没出事算有点神；第二是你们住那种旅馆，又约的是那种人，都太扎眼，总之不透风声很难；第三嘛，不用说了。”

“为什么？”

“你是要砸人家的饭碗吧，老廖？”

“他们还盼我们去呢。”高氏说，“接了材料，录了音，拍了照，又不起一点作用，真的有些愧。”

“等机会吧，”老余安慰道，“这种事急不得。”

十几天后，我与台湾的纪录片拍摄者温小姐相逢，并约好日子去探上访村。不料在采访 91 岁的老基督徒袁相忱时，遭遇公安盘查。虽然有惊无险，但足以让在彼岸自由世界茁壮成长的温姑娘改变主意。苦劝无效，稍后，我离开北京。

与高氏兄弟的联系和上访村的话题一直没断。2004 年 8 月 2 日，我返京，又与高氏碰面。此时摄像机到手，本可以跨出实况纪录的第一步，但风声骤紧，一查网络，上访村成了比中国政府更敏感的词。原来是警方刚排除了一起 8 万上访者分头潜入天安门广场，举行八七大示威的危机。

上访领袖、复员军人李小成被捕了，由他起草的关于游行示威的申请书在网上不胫而走。高氏提出将计划延后。

8月11日下午，昏日歹毒，我孤身一人，什么也没带，就沿陶然亭——永定门火车站——过铁路往南的老路线去探上访村。尘土飞扬，房地产已经动工了。可尽管喧闹，但已没人敢往那个方向拉客。雇不了三轮，我只好步行，感觉T恤衫和短裤像铠甲一般箍在身上。好不容易迈过铁轨，在毒日头下望见上访村的影子了，不料一辆警车刹到跟前，前坐警察摇下窗玻璃，厉声喝问：“去哪儿？”

我愣了一下，本想回答：“逛着玩儿。”可出口却是：“永定门车站。”

“你走反了！”警察指出。

“不是从前面可以绕过去吗？”我装傻道。

“绕远了。”警察说，“看样子你不是本地人吧？有证件吗？”

“出家人四大皆空，带什么证件。”我抚着熠熠闪亮的秃瓢说，“四川普渡寺的。”

“和尚？”警察绽露出笑脸，“往回走吧，前面过不去。”

我只好转身。警车嗖地冲出去。

我依依不舍地边走边回头，从另一条叉道抵拢一条河边。沿着堤岸，有行人有乞丐，也有坐在凉棚下喝冰的便衣。“太冒失了。”我自言自语道。

正沮丧着，一个左肩倾斜的女乞丐向我伸手，我下意识地掏口袋，女乞丐却眼一亮说：“我认识你！”

“是吗？”我惊讶道。

“你春节到村里来过。”

很惭愧，经她两次提醒，我才依稀记起这个姓贾的残疾女人，她是上访村最矮的成年人，43岁，不足一米四。因被流氓和当地法官多次殴打，求告无门，就走上了漫漫上访路。

我请她喝可乐。并随意聊了两小时，问了案情，也问了上访村。“有证明的记者也过不去，”她说，“抓了很多，公安在马路上日夜值班呢。”

我答应写关于她的文章，并问怎么寄给她。不料她挺了挺畸形的胸，豪迈地说：“只要能发表出来，寄不寄没关系。”

我老感觉四周有眼睛盯着，就起身告别。此时为午后 5 点，微微起了点风，有个声音在耳边说：“快回到正常的生活中去，把苦难、恐怖和荒凉都忘掉。”

但是能忘吗？我恨这个国家，然而我能忘掉吗？即使有一天，我挣脱了它，逃得远远的，但这个国家的一幕又一幕也会像癌块嵌在骨头里。

有人标榜自己与失败者站一起，说得好听。让一个文人在上访村去住一个月，试试看，你的神经有多坚强？沉默的大多数真愿意沉默？不，如果你让他们说，他们的嗓门说不定比天天有发言权的精英更大更有力，也更喧嚷。

人，甚至昆虫、蚂蚁，都不是天生愿意沉默的。

2004 年 8 月 11 日至 31 日完稿于成都

附录：

[编者按]高氏兄弟的《寻访上访村》一文亦将此次采访实录作了翔实记录，已发表在海外网络上，故省去全文，只收录文中的一段公告。

公 告

本地区房东、房客你们好：

鉴于本地区的情况，关于安全、卫生问题向房东、房客公告如下：

一、虽然用电有关部门多年没计费，出现用大功率电器和电炉取暖烧水等问题，为了房东、房客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要求合理用电，不允许用电炉子、电褥子、电水壶等大功率电器，请房东严格监视检查房客安全用电，出现火情造成人员财产损失，房东、游客要接受经济、治安处罚的。

二、为了维护本地区环境，严禁出租给上访人员、法轮功人员及闲散无业人员，一旦这些人出事造成社会安全问题，房东是要接受经济处罚、治安处罚的。

三、房东要到右外房管所办理房屋租赁许可证：到右安门派出所办理安全许可证，严格要求房客办理各项进京手续，以备检查。非常时期对违法出租者加重处罚。

四、房东不要把房租给捡破烂的人员。

1、造成环境脏乱，久治而没有成效。

2、人员素质低，容易造成治安、安全等问题。

3、对房屋也是一种损失。

4、出现各种问题房客跑了，但房东逃不脱经济、治安处罚。

五、卫生环境要加强，设（应为“所”）有扫、收垃圾人员，要求配合，不允许往墙外、铁路边乱扔，破坏环境，房东要严格监督。

六、房东要把出租房间安上风斗，用正规取暖灶具，安烟囱，严防煤气中毒，出现煤气中毒是要接受经济治安处罚的。

为了大家的安全和卫生，也为了自身安全、财产安全，请自觉配合工作。

谢谢大家！逐户张贴

右安门派出所

花园村委会

2003年3月4日

残疾妇女贾凤珍

采访缘起

2004 年春节后，我曾经在京郊上访村见过这不足一米四的残疾女人，可转眼之间竟忘掉。当时群情激愤，我、高氏和回地几乎被分割、围困，数不清的嘴巴冲我们喊冤。贾凤珍说，这当中也有她的声音。

半年过去了，由于政治气候敏感，我们重返上访村的计划泡汤。沮丧之余，我于 8 月 11 日下午在上访村外围的一条污水河边巧遇贾凤珍。经她一再提醒，我才对半年前的她有了点似是而非的印象。

“怎么会这样健忘？”我一边听她说一边内疚地想。“我已访问过 100 多个低层人，难道这种记录也像俗话说的猴子掰玉米，得到后面的就丢了前面的？”

燥热和对自己的失望轮番夹攻着，我虚汗直淌。

然而贾凤珍平静地讲述着她的故事，挨打和受辱。她的两眼熠熠发亮，我被吸引住了。

两个多月后，为了给《中国上访村》一书补充图片，高氏兄弟终于故地重游。据他文章里说，当时我们接触过的上访群体已“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另一拨上访者，并且大部分是妇女。

男人们到哪儿去了？在经历过无数次的截访和清剿以后，那些向我们递过冤案材料，并且涌入过我们梦里的面孔如今在哪儿？

还有一把枯柴似的贾凤珍，她也曾被截访，下落呢？

许多年以后，是否还有人问：“他们的下落呢？”

贾凤珍：喂！记者，先生，同志！

老威：您叫我吗？

贾凤珍：对，您不记得我了？

老威：有点面熟。可好像，记不起来了。

贾凤珍：春节的时候，您，还有另外两人去过村里。

老威：哦。

贾凤珍：开始您们在村里东张西望地窜，大家以为是特务，就躲着不露面。后来您拿出录音机采访，人就全出来了。我个头小，腿残疾，动作慢。您们就被别人拽去了。上访的都是苦人，每次都一样，喊爹喊娘的，把外头的记者当救命稻草。我扎不进人堆，即使扎进去也挤不到您们跟前，更别提说话了。

老威：太惭愧了。请您坐下来慢慢讲吧。

贾凤珍：天气真热啊。

老威：大嫂您等着，我去买两个可乐，降降温。

贾凤珍：真凉快呵。

老威：那我再去买？

贾凤珍：不要了，多喝坏肚子。我十几年前还批发过雪糕呢。

老威：日头这么毒，为啥不呆在屋里？

贾凤珍：板棚内像蒸笼，白天呆不住人，况且风声这么紧，只能在外头晃着。

老威：我刚才碰到警察了。

贾凤珍：明的暗的，到处都是。一不小心打个喷嚏，至少有三四张脸回过来盯你。李小成贴了告示，说要八七大游行，几万人开进天安门，这一闹，把整个国家都吓瘫了。这方圆几公里，虽然是有几万上访冤民，但锣齐鼓不齐，要一下子召集起来，还真不容易。

老威：讲讲您的冤情。大嫂，我可以记录吗？

贾凤珍：您可得防着四周的眼睛，因为我们长得不太一样，凑一块，气氛就紧张了。

老威：是有些紧张。看运气吧。

贾凤珍：行，看运气（此时，她轻咳两声，挺了挺身板开始背书）。尊敬的报社记者先生，感谢您坚持正义，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采访我这残疾弱女子。我相信党中央、国务院、江泽民、胡锦涛里能出清官！几千万党员至少能出一个包龙图！用社会主义法制的虎头铡为我主持公道。

我叫贾凤珍，43岁，家住辽宁省台安县台安镇一街道振兴委一组。我和丈夫都是残疾人，可我们人残志不短，为了生存，为了不给国家增加负担，上世纪90年代初，我就起早贪黑，做批发和零售雪糕的生意，还能勉强维持温饱。

1992年6月下旬的一天，太阳红火，我和往常一样，雇一辆拉苞米的小货车出台安县城，去几公里外的西佛镇批发雪糕。到站后，苞米车的司机在附近办点事，让我边装雪糕边等他几分钟。正在这时，一辆出租车吱地刹到我跟前，司机于大勇伸出脑袋，招呼我上车。我急忙说：“对不起，已经有车了。”于大勇钻出驾驶座，要来抢我手里的雪糕箱子。他说出租车又快又舒服。我躲闪说：“我不能雇两份车。况且小本生意，也打不起的士。”于大勇有点恼火，骂我不识抬举，我不敢回嘴。不料，于大勇的兄弟伙李彦军出面了，他在团结粮站工作，是个人人都怕的街痞。姓李的甩着赤膊过来。踢了苞米车一脚说：“就这破车？不准雇。”我说：“雇不雇是我的自由。”姓李的冷笑一声，把货车钥匙拔出来，大吼一声：“开车的在哪儿？！”开车的其实就在周围，见是街痞，就躲着。

气温高，耽搁一久，雪糕就不行了。可李彦军还逼着我打的士。我急得说不出话，姓李的就指责我“无言的反抗”，在我头上挥拳头，还把我买的雪糕一箱一箱抱到阶沿下，让太阳晒。我

气得眼泪一串串掉，就大声说：“我不坐你们的车！”姓李的抓住我的胳膊叫：“你必须坐，还得多加一倍的费用！”我喊：“不坐，就是不坐！晒化了雪糕还要你们赔！”姓李的扇我一大嘴巴：“赔你个死矮子！”

两人不由分说，按住我拳打脚踢，逼我答应打的士。我直喊：“打死人了！没王法了！”姓李的疯了，把我当皮球，踢得满地滚。见我还不松口，两人就把我抬起来，打夯一般朝地上摔，脑袋磕在砖头上，我一下子失去知觉。

醒来时躺在医院里，经检查为脑震荡。后来脑伤使我的肌肉都萎缩了，不得不住院 158 天，连大小便都失禁了，真是地狱般的日子啊！（话至此，她已成了个泪人。）

老威：当时有群众围观吗？

贾凤珍：街两边都站了很多。

老威：没人出面阻止？也没人报警？

贾凤珍：我被打糊涂了，不知道。住院抢救，许多天失忆，连住哪儿都要想半天，才能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不能想事，一想，脑门子就疼，眼睛直冒血。姓李的有后台，一般群众惹不起。为了讨回公道，我只好拿起法律的武器。

1992 年秋天，我出院，去找台安县公安局和民政局，他们推脱说管不了，我就告到县法院；那儿的人让登个记，还是处理不了；我就再告到鞍山市中级法院。不久，中院判我胜诉，责令出租车司机于大勇赔偿我医疗兼营养费 1500 元，李彦军赔偿我 1714.47 元。

老威：在 1992 年，这个赔偿金额还算过得去，可行凶者应该拘留嘛。

贾凤珍：我们这样的残疾人，能忍就忍吧。

老威：法院判决执行了吗？

贾凤珍：于大勇的钱给了，李彦军至今分文没付。

老威：那法律岂不成废纸了？

贾凤珍：总算得了一半钱吧。本来我想，剩下的一半慢慢要，会有结果的。不料一拖就是10年，人民币都贬值很多次了。比如当时在银行存钱的利息是百分之十二点几，现在连1点几都不到。可姓李的就是不给。

2002年6月16日早8点，我凑巧在县城恩良路碰上李彦军，就掏出随身揣了10年的《判决书》，向他索赔。但他一把推开说：“要执行找法院，你个人无权向我要钱。”我一时懵懂，感到他说得有几分理，就去了县法院。我已记不清去法院的次数了。当时接待室内有七、八个人，都捧个茶缸，堆在那儿说说笑笑的。我一进去，他们的脸就板了，还没等我讲完来意，他们就吼叫：“管不了！”我问：“谁管得了？”于是有人说：“中院判的，你找中院去。”还有人侮辱我“小得像只猴子”，应该找孙悟空。我气急了，就垫脚去摘法院门口“最佳单位”的铜牌子，还没够得着呢，他们就打电话报警，于是几分钟后，110的警车就把我拉走了。

在南街派出所关了一会儿，被放出来。我越想越不通，就又返回法院评理。可这次，我迎头撞上民事庭的庭长梁彦山，他是李彦军老婆的同班同学。姓梁的一见我这个找茬的“老熟人”，眼睛一下子就红得像公牛，他不吭一声，拽我到法院内的一间空屋，关上门就打。还把人当作皮球，端起来朝墙上踢。屋子很空，他行凶的回声很大，我顿时感到天旋地转。我抬手护住脑袋，他咋刺一下，把我柴禾细的胳膊反扭过来，屁股一脚，我被踢得腾空而起。

老威：法官打人？真没王法了！

贾凤珍：他还边打边笑：“我打你了吗？谁是证人？你长成这样，活在世上多累赘！万一你现在断气了，那肯定是摘铜牌的时候不留神被砸的。”

老威：魔鬼啊魔鬼。

贾凤珍：他把行凶当作体育锻炼了，打热了，就脱下法官制服，最后连汗背心也刷掉，光着上身将我踹出屋，又踹进来，再踹出去，搞了好几个回合。我昏迷了两次，终于吐血了，姓梁的才住手，把我扔到走廊外面。他拿起制服和背心，还有一顶嵌着国徽的大盖帽，洗澡去了。

老威：诺大个衙门，就没人出面阻止？

贾凤珍：同10年前一样，没人管。上次是大街，这次是法院，我不知道在地上睡了多久。苏醒时，我四肢着地爬出法院，觉得四周特别空旷，有脚来来去去，可都绕着。我坐在法院神圣的台阶下等车，好几辆出租车刹下来，又开走了。那些车主都探出头问：“喂，你没事吧？”

老威：您该报警啊。

贾凤珍：让公安局去抓法官？您没犯迷糊吧？我在毒日头下熬了很久，心想这次是活不下去了。哦，对了，我在爬过法院大厅时，梁彦山洗完澡，还走过来看了一下。恍惚中听人说：“老梁，哪来这么大的火？出人命咋办？”姓梁的说：“可能是小鬼附身了，是小鬼用我的手打了她。”那人说：“鬼话么。”姓梁的说：“正经话，不糊涂我会动人一指头吗？”

老威：您已经在鬼门关了。

贾凤珍：我一直挺着，泪已经枯了，我怎么办？终于遇上一个好心的司机，扶我上车，问：“去医院吗？”这时一个念头闪过，我回答去“沈阳第一时间”。这是省高院为了健全法制设在这儿的的一个点，意思是在“第一时间”接待告状群众。

不巧正撞上休息日，门卫和附近的律师都让我把告状材料备齐再来。无可奈何回到家里，熬不过，住进了医院。大夫一检查，马上抢救。

第二天，伤势稍缓，我又溜出医院去法院喊冤。院长拒不接

见，梁彦山又出面，捉小鸡一般把我扔出大街。这次围观群众很多，梁彦山缩回去，并给门警打招呼挡驾。

老威：您一个弱女子，真够顽强的。

贾凤珍：我豁出去了，我不怕死。我一边住院治疗，一边去法院评理。我天天去，扳不倒你这仗势欺人的梁庭长，我也要让天下人知道，你是执法犯法的恶狗。我在县城出了名，姓梁的不敢公开整我，可在2003年7月13日上午10点左右，这狗法官的岳母又欺上家门行凶。她牛高马大，像摔跤运动员，一下子把我这个一把骨头的残疾人提起来，扔出门外，再拎起来，两大嘴巴。真是雪上加霜啊，我本来就卧病在床，旁边还有80多岁的卧病的公婆，这是我第四次挨打，起因是10年前无意得罪了一个街痞。

这次围观群众看不过，一齐叫：“不准打人！”家才没被砸了。

老威：于是您就背井离乡上访来了？

贾凤珍：当时还想不到这茬儿。住院的费用日积月累，四次遭打，经医院诊断，已造成脑组织严重损伤，天天头痛，视力不清。再发展下去，就真成一个没有自谋生路能力的废人了。于是，我只能与法院，与梁彦山死磕到底。为了息诉，2002年10月，姓梁的通过县人大转给我3000元钱——好心人劝我算了，因为从古至今，法官赔钱给小老百姓，在这台安县还是头一遭。

老威：3000块钱治病都不够吧？

贾凤珍：县人大说，人家的面子是给够了。

老威：这种口气跟黑社会差不多。

贾凤珍：再黑也不怕，因为没活路了。于是病情一稳定，我就砸锅卖铁，凑齐旅费进京了。家里还有残疾的丈夫和公婆盼着，度日如年。

老威：您的冤情一目了然，应该一告一个准。

贾凤珍：经人指点，我住进花园路旁边的上访村，三四个人

合租一间屋。我请人给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和最高法院写了控告信，到处张贴和散发，赢得了许多人的同情，有记者还采访过我。

老威：您去了陶然亭的国务院信访处吗？

贾凤珍：才来的时候，几乎天天都在找国家机关，我填了数不清的表格。2004年2月2日上午，刚过完春节，我去中央纪委递材料。刚办了填表登记手续，还没走出门，突然有5个穿皮夹克的彪形大汉拦住我和另外一个上访同乡，让我们跟他们回家。我说：“凭什么？我又不认识你们。”其中有个领头的回答：“我们是鞍山的，你们越级上访，给鞍山人民抹黑。”我们心里害怕，就没敢再回嘴，但绝不跟他们走。当时街上人来人往，他们也不好硬拽，就让开了一条路。

我们慌慌张张地逃跑，急走半站地，到了北京第五中学门口。一直吊在背后的面包车却呼的超过去，车身一横，阻断我们的出路。四周行人稀少，他们就扑过来，把两个弱女人逮住，强行抬上车。我挣扎着喊了声：“你们截访啊？”嘴就被塞入一只脏手套。我的同乡个子大些，一只手把住车门不进去，有个人就抬起皮靴，狠狠踩了一脚。我的同乡惨叫，一松手，就被塞进了后座。

截访车东拐西绕了一会儿，把我们拉到云翔宾馆，这儿有鞍山市政府住京办事处的牌子。我们被抬下车，弄到一间屋子看押起来，磨了几个钟头，直到天擦黑，外面亮路灯了，才又将我们倒入另一辆面包车。我注意到车牌照为“辽H15870”。

老威：你还挺有心的。

贾凤珍：每一个上访人员都会注意的，因为法律讲证据。第一辆截访车是辽西0牌照，只有政府和公安局才用0牌照，表示一种特权。而第二辆车显然是雇来的，或者换了个牌照。

老威：这有点像革命小说里的情节，国民党特务绑架中共地下党，才这么神神鬼鬼。没想到改朝换代了，这手段还没作废。

贾凤珍：可我们这种小人物算什么呢。

老威：在上访村有几万小人物，这就成了大事情。

贾凤珍：我不太懂。当时，我们两眼一抹黑，还以为这下子回台安县城了。我的同乡却发现方向不对头。她掐我一把，我就麻着胆子问：“我们去哪里呀？”前排回答：“送你们回家办案。”还嘀咕说：“不就几千块钱吗。这么兴师动众地闹，丢人。”

过了一会儿，车外连路灯也没有了，里面也颠簸地厉害。回辽宁的路挺好走的啊。我着急起来，啪啪直拍前排靠背，叫喊：“这不是回家的道！”司机却呵斥我：“你清楚还是我清楚？这就是回鞍山！”

车摇摇晃晃地上坡，这是条碎石的盘山道。我们两个抱在一块，呜呜地哭了。前头的几个人却哈哈笑了：“害怕啦？敢跑来北京告状，还胆小？”我说：“你们干嘛跟一个残疾女人过不去？”他们说：“是你跟我们过不去，害得大家年都过不清静。”

车快上山顶了，他们才咔地刹住，拉开车门，命令我们下去。风轰轰地往里灌，外头伸手不见五指，我们宁死也不下。有个人说：“不是要逃吗？不是不上我们的车吗？怎么现在又下不了？”又有人说：“与截访车有感情了吧？”于是他们又笑起来。

领头的掰下靠背，命令说：“磨蹭什么？推下去！”任你怎么挣扎都没用，我们被扔路上，眼睁睁地瞪着面包车跑掉。大约过了一会儿，那车又晃着大灯返回，故意在我们身边轰了一脚油门，一眨眼就拐弯了。

这地方前不沾村后不沾店，仔细辨认，发现周围都是黑黝黝的山峰。风刮得哇啦啦地响，我估计至少5、6级，因为背着风也站不稳，我们只好互相抱着，蹲在地上。路旁是万丈深渊，我们就躲向靠崖壁的一边，又冷又饿又惊吓，我们不禁痛哭起来。我的同乡说：“这样捱下去，只有冻死呀。”我点头：“那就死得不明不白了。”

我们挽着胳膊，顺着坡路朝下摸索，跌了数不清的跟斗，三个多时辰才下了山。累得够呛，可又不敢歇气，因为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离城有多远，一歇就有危险。我说：“多走一米，就多一点生存的希望。”

风一直没有停，隔着棉衣还戳进去，像刀子在割。路面白白地结着冰，我们就捡了两根棍，小心地拄着走，我隐隐约约听见鸡叫了，才想起从上午到现在，没喝一口水，没吃一粒饭。人这种动物真是贱啊，心里怀着冤，怀着气，就不会倒下。

终于过来一辆货车，我们站在路中把它拦下来。我们在光柱里央求：“带我们一段吧。”并且把受害的来龙去脉哭诉一遍。车主叹口气，就让上货厢，把我们带回北京房山区。并且帮忙联系区派出所。

老威：派出所警察对你们怎么样？

贾凤珍：当车主打电话时，我们还挺紧张，他就安慰我们说：“他们是靠纳税人养活的，这时正好派出用场。”果然，警察初见已不成人形的我们，吓了一跳；问清情况后，就给我们热水喝，还让我们吃饭。接着，又在风雪交加中送我们回住处。

老威：真不错啊。

贾凤珍：还有那个车主，免费送我们回北京，没得一点好处。我说：“大恩人，没您我们就成冻死鬼了，请问您的大名和地址，将来有能力，我们再报答。”车主说：“有您这句话我就心暖了，出门在外，要小心啊。”

老威：天底下好人不少嘛。

贾凤珍：您也算好人，大热天，陪我两个多钟头。我40多岁，我们的年龄应该差不多。读小学时闹文化革命，加上残疾，没读多少书。但是我从小受的教育，就是相信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可对比一下我们被截访的前前后后，真是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同是公安人员，鞍山的比谋杀犯还坏，北京房山派出所比

菩萨还好？同是公民，不知名的车主那么好，李彦军、梁彦山比豺狼还毒？我一个奉公守法、自食其力的身残妇女，碍着谁了？挡住谁升官发财、出国泡妞的道了？非要一次次加害于我？人总得讲点良心吧，你不讲良心也行，但损人总得利己吧？我死了，谁又能炫耀他的本事大，斗垮了一个不足一米四的妇女？

老威：您的事，起因因为鸡毛蒜皮，却把整个人拖进去了。打人赔钱，就 1000 多块，10 年执行不了，要法院来干什么？我接触过许多人，性质和您一样，起因都小，久拖未决，于是上访，结果把全部生命都搭了进去。

贾凤珍：从前我还考虑值不值得，经过三番五次的迫害，我不考虑了。我要出这口气，中央总有清官！有一天我告赢了，回到台安县，总能抬起头来做人。我把狗法官也告倒——从古至今，还没有这种事。

老威：大嫂，还是祝您平安吧。

贾凤珍：谢谢。您也小心啊。

附录一

恶法比无法更恐怖 ——给王力雄的一封信

雄哥：

你的电话令我感到温暖，随后几天，我一直在考虑是否听从你的劝告，就12·18抄家事件起诉成都市公安局一处，但最终还是决定忍耐，不与隶属于强权的司法机关打这种消耗战。我已经累了，接着是从骨头里渗出来的悲凉之雾，我辨不准方向，因为我实在不明白在如此可怕的“犯人的祖国”里硬扛了这么多年的意义何在？

从十几年前因创作长诗《大屠杀》而锒铛入狱算起，我已经被抄了很多次家，同以前相比，最近这次算是较文明的，至少在表面上，走了法律的过场：第1，出示了《传唤证》和《搜查令》，虽然上面只字未提涉嫌何罪；第2，整个抄家过程均录了像，并特地强迫我站起来，脱帽面对镜头；第3，认真填写了《扣押物品清单》，一式两份，由我保存一份；第4，抄家过程一丝不苟，且有条不紊，没有文革式打、砸、抢行径，还找来一位派出所所长为见证者。

然而，同以往任何一次抄家一样，这对我心灵的震撼将是长期的。隆冬的凌晨六点，天色还漆黑一团，我这类习惯于夜里伏案的动物，大概才入睡两三个小时吧——电话铃突然响了，并且一声接一声，响了四、五分钟！由于早有预感，我倒没怎么惊慌。宋玉披衣起床出卧室，却骤然炸起猛烈的打门声，她立刻感到出事了，就退回来叫我。这时，电话铃和打门声交织着，已相当恐怖，宋玉从猫眼里看见了一双放大的不屈不挠的拳头，只好应答。

跟着是三个陌生的粗壮男人涌进家门，此时我刚钻出卧室，

披衣赤脚，睡眼朦胧。领头的中年男子叫声“廖亦武”，然后就宣布对我进行“传唤”。接着又打手机叫来五个穿皮夹克的小伙子，这样，在宋玉急匆匆地出门上班之后，我就被八个大汉挟持着展开了搜查。电脑是重点，其次是抽屉和书房，有些死角我都忘了，他们居然能从里面搜出“魏京生接受美国之音电台采访”之类的违禁资料——这是四年前，不知什么人寄给我的。

电脑抱走了，里面有我几百万字的文稿；还有境外的“反动杂志”《倾向》9本。搜查进行了大约3个小时，这对于我60多平方米的家，足够了。一大堆字纸摊在客厅里，我随他们下七楼，上警车，被带到抚琴派出所接受审问——主要是系列政治签名和在海外网站发表《底层》《冤案》系列文章的事。

当然也包括你牵头的“活佛死刑案”的签名，“中国民主党”关于16大的什么签名。我一口回绝，连海外的文章也回绝，在虎口里我不会多想什么。下午5点左右，我被释放了。临出门前，警察叫我在家里待着，随时准备接受他们的“司法传唤”。

我立即找了家网吧，快速干净地清除了所有的邮件和联系人，哪怕最一般的交往，也统统删掉。经历过太多的人和事，我最怕的就是连累朋友，在当今中国，大约也少有人情愿为“人际交往”而成为警察的猎物。

雄哥，我能做的也仅限于这些：《底层》和《冤案》的写作；小说《活下去》及其它作品的写作；我酷爱吹箫、朗诵、制作光碟，除此，就是与朋友们的自由交往。像你，像晓波这类理想主义的朋友，我从内心佩服、尊敬。虽然我们从性格、背景和人生取向上太不一样，但我这个曾经饱受践踏的底层的穷孩子，一个曾经随波逐流的野家伙，从你们身上汲取到一种向上的企及精神天堂的力量。我曾读过徐文立的《狱中家书》，非常健康，非常平凡，他关心妻子和女儿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成绩单，家长会，营养结构，买菜的讨价还价。我想，如果不是专制的压迫，他本

来可以做一个好父亲，好医生。但是为人温和的徐文立居然成了中国判刑最长的政治犯！

我做不到，也许在文字之外，在箫声之外，我一事无成，但是我仍然在任何时候都支持你、晓波、丁子霖、徐文立这种也许注定战败的理想者。这个国家可以剥夺去我的一切，但不能剥夺去我引为自豪的朋友们。

我不懂政治，也不懂法律，但平生阅事无数，我知道，在“活佛爆炸案”的司法程序的诉求上与你站在一起，已经是我作为一个人的最低最低的底线了——但这不意味着我对一手遮天的恶法抱什么指望。

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恶法比无法更恐怖。活佛判死缓是“法律”，“不锈钢老鼠”突然失踪也是“法律”，我被抄家还是“法律”，当年你在新疆被逮捕照样依据法律，还有成千上万冤死、打死的人，都是依法办事……仔细想想这一桩桩，一件件，气都透不过来。我老是在想：逃跑吧，逃离这恶法笼罩的“祖国”，去一个无法无天的野人世界，一个靠情感和本能辨别善恶是非的世界。孟子曰：“苛政猛于虎”，米兰·昆德拉在《笑忘录》里说：“孟加拉大屠杀的血流，很快就冲淡了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记忆，阿连德的遇刺又掩盖了孟加拉国的呻吟，西奈沙漠之战则使人们忘记阿连德，柬埔寨大屠杀又使人们忘记西奈沙漠，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明天早晨醒来，又会是怎么样呢？这个时代的抗争者还会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么？告诉我，雄哥。

你的朋友：亦武

2002年12月圣诞夜于成都

与强权的斗争，就是与遗忘的斗争 ——给廖亦武的回信

亦武：

你问我的问题：抗争者会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么？其实不必问我，你早有答案。

1999年10月1日，北京举行五十年“大庆”。在天安门广场结束阅兵的队伍经木犀地撤回军营，我正好在木犀地。开始市民是站在路两侧观看，继而有人鼓掌，接着鼓掌的人越来越多，随后变成了欢呼，人们拥下人行道，挤在机动车道两侧，奋力地挥手和摇动手中国旗。站在装甲车和军车上的军人，则频频向两侧群众敬礼和挥手致意。

1989年六四那天早晨，我也在木犀地，那时的木犀地如同刚打完大仗的战场，几十辆被烧毁的军车冒着余烟，军人已经不在，簇拥在一起的北京市民，个个面呈悲色，群情激昂，似乎只要手中有枪，就会向军队开战。

这两个画面现在经常在我眼前重叠在一起。

有一句话似乎也是昆德拉所说：“与强权的斗争，就是与遗忘的斗争”。

亦武，你现在所做的一切，就是正在同遗忘进行斗争！你做得比我们都好，我为你感到骄傲！

王力雄

2003年1月2日 于北京

附录二：蒲勇档案

命在旦夕

2002年10月21日下午，天空阴冷有雨，蜷缩在家中的我突然接到六四政治犯蒲勇之胞弟熊伟先生打来的长途电话，他说：“我哥哥因胃癌晚期，生命垂危。”震撼之际，我立即致电四川省南江县城的蒲家，躺在病床上的蒲勇已气若游丝，可神志尚清醒。悲从中来，我喉头梗阻，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因为我的父亲十几天前也因肺癌晚期过世。我清楚对于正被病魔一点点撕碎的临终者，任何世俗的安慰均无济于事。

然而蒲勇却反过来劝我：“廖胡子，你别难过。”接着时断时续地讲述自己的病情，“肚子一天比一天大，”他说：“不是怀孕，是腹水。”我问：“能为你做点啥？”他答：“不需要。”我问：“你的判决呢？”他答：“存在公安局档案里。你去查1989年10至11月的《四川日报》，上面登有我的反革命罪行。”

这种蒲勇式的黑色幽默，我在牢里早已领教。当每日傍晚放风时，我和难友李必丰总是习惯在监区空地兜圈儿暴走，而蒲勇不过来问：“去哪儿？”我说：“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蒲勇说：“那就上山打游击。”李必丰说：“书生打个屁的游击。”蒲勇笑道：“那就上美国念书吧？闭上眼睛，走着走着就到了。”于是我们心领神会地兜着圈儿笑，警察在二楼露台上远远地注视着这三个人。

幸福的日子一去不返，而今，兜圈儿的三人，一个命在旦夕，一个于1998年3月“二进宫”，再次判刑7年，投入四川省雅安监狱改造。大约一个月前，他来信说：“身体每况日下，已做过一次手术……指甲盖莫名其妙地渗血出来，一滴接一滴，不容易止住……我怀疑得了什么绝症，还能熬多久呢？”

还能熬多久！也许最后我会剩下来，因为我的刑期最短，胃口最好，也就最健康。至少目前我还坐在桌子旁，一边咀嚼有关蒲勇的材料，一边写字，尝试着在一个赢家通吃的时代介绍一个已被人淡忘（或压根就没人记起的）失败的政治犯——

蒲勇，四川南江县人，20 来岁即出任副乡长，原本极有政治前途，却因在 1989 年六四惨案之后散发、张贴传单，谴责政府的屠杀暴行而被重判 10 年有期徒刑。在狱内被分配到翻砂车间，于砂尘弥漫中从事重体力劳动，患上严重胃病，却得不到治疗。1999 年 10 月，蒲勇刑满出狱，心气浮躁，曾跑过大江南北，与难友侯多蜀、许万平、我以及许多民运中人联络，均失望而归。记得有一次，蒲勇来我家打听因“中国民主党案”而偷渡去泰国的杨伟的消息，我察言观色，不得已将美国驻泰使馆把要求避难的杨伟扫地出门的真相告之。蒲勇铁青着脸，半晌方道：“那以后，我们这些无名的人咋办？”

我无言以对。从我的沉默中蒲勇终于醒悟：谁也靠不住，只有靠自己的顽强活下去！再次见面时，他已是成都中医药大学的一名学员了，“虽然岁数大了点，”他笑道，“但学几年，我就能开一个小诊所，凭真本事过上正常的生活。”

他大约一两个月登一次门，寡言少语地坐上一会儿，我们共同的话题是监狱和牢友的音讯，他叹道：“余万宝、李必丰、许万平进去了，剩下的，除了你有固定的地址，其他都在江湖上飘着。”我安慰说：“你也快过上正常日子了。”他摇头道：“外表正常了，心里却过不去，除非六四有个说法，我啥都不要，只要一个说法。”

写到这里，脑子一片空白。蒲勇，亲爱的兄弟，我知道每时每刻你都很疼，钻心，钻骨头地疼，我知道越到后来，杜冷丁那样的毒品已不能缓解你的疼。我祈祷上苍，让你早日解脱，离开这个不公正的精英主宰的世界。天堂很棒，地狱也不赖，总之都

比人间好，去吧，兄弟，我会记住你，像记住我喘不过气的父亲，我曾忍住泪水，在“放弃抢救”下面签上廖亦武三个字，我曾用颤抖的手为他抚上双眼……虽然这种生离死别的回忆是有毒的，会损害人的健康，但我将让这种幸福的毒素占据灵魂，直到某一天怀旧的病灶转瞬癌变，毁掉我，那么，我所为之珍藏和捍卫的这么一点可怜的真相也将随之葬入坟墓。

2002年10月23日 成都

蒲勇弟弟熊伟致廖亦武的信

廖亦武先生：

你好！

非常感谢你的热心，我哥哥现在的这种状况我们作为亲属的实在是痛心疾首，心中苦不堪言，命运对他太不公平了，这些跟狱中的待遇着实有着非常的关系。

我们怀疑政府是否在这些年里，对政治犯和民主人士采取了暗害的策略，会不会在一些食物、生活用品或者周围环境放置了致癌物质，表面上不打击民主人士，但暗地里使他们患上绝症，在出狱后慢慢生病而死去。但我们这只是猜测，没有证据，因此，我们想建议，如果有这么一个组织，可以来调查这些，统计一下出狱的民主人士现在的健康状况，也许能说明一些问题。

我哥哥现在的状况是一天比一天差，癌症是个绝症，我们都知哥哥最后的归属，我们作为亲人的非常不愿看到这一天的来临，但我们却毫无办法，我们现在都非常的无奈，束手无策。父亲现在每天皱着眉头无奈地痛惜和痛心，母亲更是伤痛欲绝，以泪洗面，作为同根生的胞弟，血浓于水的情谊，更是一种十指连心的痛楚。

蒲勇的联系方式，电话：0827-8226284，手机：13981652531

另附简历 1 份，照片 2 张，照片中是已经病重的蒲勇，均摄于 2002 年 10 月 3 日，背景为南江县县城。

拜托你了！

“蒲勇的简历和患病经过”和照片两张请见附件！

注：你收后回信一封，我好确认你收到了。

熊伟（我现改名为“熊柏渊”）

2002 年 10 月 22 日

蒲勇简历



蒲勇，1993年狱中照。

蒲勇，男，生于1967年8月20日，四川南江县人，于1989年10月11日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四川南江县公安局拘传，10月12日被四川南江县公安局拘留，10月22日被四川南江县公安局逮捕，捕前为四川省南江县下两区凉水乡副乡长。

1989年六四事件后，蒲勇因同情学生的遭遇、向往民主制度，于1989年10月国庆戒严期间，在四川省南江县县城散发揭露“六四事件”真相、抨击专制体制、建立民主制度的宣传传单。事发后，惊动了县、地、省以及中央各级政府和党委，被国家公安部、四川省公安厅定为“特大反革命”案件，并限期侦破。

蒲勇于1989年10月11日被四川省南江县公安局拘传，10月12日被四川省南江县公安局拘留，10月22日经南江县检察院批准，被四川南江县公安局逮捕，于1990年3月20日被四川省达县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为“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并判处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刑事判决书》达地刑字（1990）第1号）。先后关押在四川省南江县看守所、四川省蓬安监狱（九

一厂)、四川省第三监狱(四川省大竹县),于1999年10月11日刑满释放。

服刑期间,蒲勇先后与民主人士廖亦武、侯多蜀、雷凤云、杨伟等被关押在一起,并参加了在狱中组织的各种人权、民主要求签名、呼吁活动。

蒲勇于2002年7月18日在四川省人民医院因“胃溃疡”做手术时,被发现已经患上晚期胃癌(大网膜型,腺癌,病理诊断证实),并伴有淋巴结转移。并于7月29日、9月15日在华西医科大学附一院生物肿瘤治疗中心进行生物化疗两次,但治疗效果不明显,病情继续加重,身体消瘦,进食梗阻,疼痛,每天需注射“杜冷丁”。10月15日左右在上述症状的基础上出现腹水、黄疸、肝功能损害、疼痛加剧,现每天都必须要注射两支“杜冷丁”,B超提示:肝转移。

附录三

四川冤民再次呼喊—— 请求：依法办案、司法公正

四川省人大司法委员会主任 张宗源并呈

四川省委书记 周永康

省人大主任 谢世杰

省政府省长 张中伟

省政法委书记 王景荣

省政协副主席 曾平江

省人民法院院长 敬瑞祥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肖杨

冤 民 申 诉

四川省 181 个法院、789 个法庭司法腐败、办案不公、人情关系、枉法判决，造成一万多冤假、错案，有的含冤而死，幸存遭遇者忍受着政法的、经济的、生活的种种压力，我们从各地上百次的去到高院告申庭接待室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申冤，要求再审纠正、改判、还正于民，对枉法判决，要求依法撤销。自 1998 年 9 月到至 1999 年 12 月，省高院、院长、庭长接待共 32 次，接待人数 1600 多人次，由于有的法官拖压案件不办，致使积案基本未得解决。根据省高院院长敬瑞祥在有关会上强调，今年全省法院将严惩司法腐败，对各种违法违纪线索务必一查到底，坚决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构成犯罪的要坚决绳之以法，以树立人民法院和法官的公正司法形象。尽管如此，仍有的法官继续违法违纪，

拖压案件不办，有的一拖就是几年，甚至十几年，如法官彭自必、吴文学拖压申诉案件不办长达十年之久。法官吴文学公开回答申诉人说：我们只有五人，收了全川一万多案件无法看烧了，你们有意见去省人大反映。如此情况，我们实在无法理解。那是迫使恶性事件发生，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为了避免恶性事件的发生，维护安定团结，我们联名恳请有关领导，实施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伸张正气，维护国家法律和共产党政策的权威和尊严，按照国家法律规定的程序，实施法律监督，保证国家法律和共产党政策的正确贯彻实施，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维护国家稳定发展的大局。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保护国家、保护人民”恳请为人民排冤解难。要求从快从速依法解决我们的冤、假、错案。

申诉人：

刘友军、陈国财、倪福芝、杜国贤、钟兴和、杨一、李家树、杨世和、王永勋、邓世昌、罗芳等 201 人联名

2000 年 3 月 7 日

附录四

静坐示威申请

公安部并北京市公安局治安处：

申请人：汪益刚、张靖、胡昌林、汪文英、张体光、于景法……等 30 余人

案由：均属历史积冤，极左重案，落实政策遭压制所引发或遗留之各类刑事、行政、经济、民事故意伤害（等案）。

理由：恶仆欺主，恶鸠霸巢，侵权乱道、枉法渎职、职能扯皮、索贿行贿受贿、丧失原则、久拖无果。

申请人作为极左政治、极左经济体制期间的被害者，都是社会忠良，从来没侵过国家、集体、个人们的任何权。拨乱反正后，大都经过数十上百次上访，走访过所有相关联的管理职能（部门）。经中办、国办多次协调，总是在归口分级后的主管职能范畴内请求不到直接、及时、恰当、规范、正确的依政依法解决。长期来，给当事人的人力、物力、财力、精力、健康、精神……都造成了严重损害。生活无着、重病无法治、人身主权、产权、名誉、各种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均被地方与行业保护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国家专制主义等混账行为和快餐文化思维方式架空！

案久拖不决就是在乱办案！办错案！特呈达此申请。

目的：除谋求及时公正、迅速结案，维护合法权利外，以实际行动配合党中央、国务院与社会整体理性之正义良知向腐败行为、官僚作风、封建文化之残余惯性惰力作斗争。呼唤所有的天道良知合力，以促正本清源工作，全面深入微观调控。

对象：一切职能行为中之横蛮粗野赖痞混账手段与现象。

口号：主权不容侵犯！主权不容协商！秩序不容颠倒！必须依政策依法律无条件归还！打倒官僚主义！打倒国家专制主义！严惩腐败行为！严惩暴力凶手！坚决拥护十五大的英明决议！坚决拥护法制十六字方针！捍卫法律尊严与司法公正！

标语形式：横幅规格为 1×15M 布条，配以图片、解说和各种生效文书及相关的证据、资料。

时间：2001 年 6 月 12 日起至 6 月 15 日止（三天）。

地点：各申请人案件之具体管理职能机关内外。

以上各项，强烈请求公安机关能依法支持批准。

附注：本请求一式二十六份，同时呈报：

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共中央、中央政法委、国家信访总局、最高人民检察院……（与游行申请中所呈报职能同）

申请人：

汪盖刚、张靖（执笔）

2001. 6. 11.

附录五

给国家领导人要求昭雪的信

尊敬的胡锦涛主席、吴邦国委员长、温家宝总理：

我叫张德怀，男，现年 61 岁，汉族，初中文化。现住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永安镇社区（小地名：李家祠）。原系四川省石油管理局 32100 钻井队职工。我现在恳求中央的领导了解我的非人的遭遇，替我申冤。事情是这样开始的，1965 年年底，当时我在成都市的四川石油局上班，回自贡老家探亲，当地的农民就给我聊起了他们的情况，出于对国家命运的关注和做人的良知，我于 1966 年 1 月至 4 月给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接连写了 4 封信，信的大致内容是：要求取消“人民公社”、取消公司合营、取消阶级斗争。就是这几封信，成为造成我一生厄运的导火线，最终使我失去自由 35 年。

1966 年 4 月 5 日我收到中共中央秘书局的回信，寄给我“通行证”通知我到秘书局的 20 号办公厅报告当地情况，同年 4 月 10 日我到达北京，20 号办公厅的工作人员接待我，并要求将信件上反映的情况填写在“中央秘书局内务片”上。之后我一直住在北京，同年 8 月 15 日中央秘书局通知我到 20 号办公厅，告诉我，毛主席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刘少奇被清华大学的红卫兵打倒了。同时秘书局交给我两封机密信件，要求我转交四川省委和自贡市委。此后我便回四川并转交了信件。

1966 年 9 月我参加了自贡市的五军一兵（保皇派），同年 11 月我被永安公社造反司令员邓根荣等打为“直通刘少奇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此后长时期遭到毒打和批斗。1968 年 1 月 3 日我被邓根荣等抄家，并在我床上搜到我用钢笔书写的“撤了毛泽东”

的纸条一张。因此当晚我就被扭送到沿滩军管小组关押至 1969 年 5 月 15 日，被自贡市沿滩区革委会军管小组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被判管制 3 年。为此，我被石油管理局开除，在管制期间我也遭受到多次捆打和批斗。

1970 年，我的同学林学明因参加“爱民党”，被造反派追捕，请求我为他找一个工作，我便在宜宾电厂帮他找了份临时工作。同年 8 月 6 日，自贡市造反司令部文功武卫指挥部杨泽峰、胡伯超等，凭林学明供述我为他找了工作的事情，把我抓到看守所，要我承认与林学明合谋反革命的反革命罪行，因为我不承认，杨泽峰等使用“灌水葫芦、刺刺刀、踩杠子”等残酷的刑罚对我刑讯逼供，现今我身上仍有被刺刀刺伤的多处伤痕。虽然我没有承认，没有任何证据和当事人证明我犯罪，但是在 1971 年 9 月 1 日，自贡市军管会仍然宣判我犯反革命罪，执行死刑（同时还宣判我同妻子离婚）。后因林彪事件的出现而未执行死刑，1972 年 4 月 6 日，自贡市军管会、人保组（公军法字 72 第 202 号）还是以现管反革命分子，改判我为无期徒刑。同年 5 月 30 日将我押解到宜宾监狱服刑，1982 年 2 月 20 日又移送到四川川中监狱（位于南充市）服刑。我在服刑期间，遵守规章制度，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并曾多次向各级领导（甚至包括现在流亡的刘宾雁先生）反映我的问题，书面材料就达 300 多份，并要求平反，但始终没有答复。直到 1991 年 1 月 15 日，我的刑期才减为 19 年有期徒刑，此后先后减刑 5 次，于 2003 年 8 月 14 日服刑期满释放回原籍。

中共中央召开的 11 届 3 中全会制定了《中共中央第五号文件》，它规定：凡是“文化大革命”中书写反动标语，呼喊反动口号等一律不算犯罪，一律平反昭雪。现在这个文件已经公布 20 多年了，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革委会军管小组在 1969 年 5 月 15 日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名判我管制 3 年的判决却没有得到任何纠正。

四川省自贡市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管制委员会公军法字（72）第 202 号判决也是明显错误的。既然是反革命武装集团，那么是谁人介绍我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加的“反革命武装集团”？暴乱在什么地方？又是在什么时间？用的什么武器？又打死多少人？有多少人参加了暴乱？公安机关指控我炮制“反革命纲领”又在那里？那么“反革命纲领”的内容是什么？“反革命纲领”的书面文字又在哪里？什么人看到过它？这些最基本的东西判决机关都不能够说明，又怎么证明我犯有反革命罪？（72）公军法字第 202 号的判决明显是根据猜测想象定罪量刑，纯属枉法判决，是个天大的笑话。

我出狱后，先后多次到四川省人民法院、自贡市人大市委等部门反映我的问题，都不能够解决。还给省市各级领导写信 20 多封，都是如石沉大海，没有半点音讯。

我在 2004 年 1 月 19 日，根据《刑法诉讼法》的规定向四川省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刑事再申请书》，让人寒心的是，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知法犯法，拒不收我的材料。后来经过我的再三请求，在 2004 年 5 月他们收了 my 材料，却制造已经立案（没有的书面通知）、我的案件现在还没有排上号等种种借口哄骗我，拒不办理，到现在已经 1 年了，让我看不到一点要解决问题的希望。所以，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不得不给各位日理万机的中央领导写信，恳求你们抽出一段时间关注一下我的事，迫切希望能够尽快的解决我的非常现实的非常痛苦问题。

由于我的兄弟姐妹愚昧冷漠，不了解“反革命”的真相，使我从来没有感受到一丝亲情的温暖，我在狱中的 30 多年的时间里，他们没有一个人来看过我，也没有寄过一封信，一点钱财，更不要说把我的冤屈向各级部门反映和上访了。现在我出狱了，他们不仅不帮助我一分钱，还骂我反革命，与李洪志一伙的，使我在精神上倍受非人的折磨。如今，我孤苦伶仃，形影相吊，饥寒交

迫，没有工作，没有任何亲属可以依靠，没有一分钱，还不时忍受病痛的折磨，比在监狱里面还难度日，不知道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才是尽头。

一年一度的春节将至，在这全国人民都在欢庆的日子，我非常诚挚的恳求尊敬的胡锦涛主席、吴邦国委员长、温家宝总理督促并且责令四川省自贡市的有关部门解决我的问题，尤其是督促并且责令四川省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出发，让他们务必贯彻“三个代表”和依法治国的精神，务必依法受理我的案件，务必依法解决我的问题，还我一个公道，以剪除我精神和物质上的双重折磨，让我这个曾经为国家前途忧虑过的人得到一丝安慰，不至于沿街乞讨而横尸街头，不至于被病痛折磨而无声无息的死去，也让我能够度过一个快乐的春节。在此叩谢！

张德怀

于 2005 年元月

联系方式：0813-3701572 或者 013890058179（都是转）

附件一：判决书（一）

毛主席指示：坚决地将一切反革命镇压下去，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使我们的革命专政大大地巩固起来，走到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

判 决 书

四川省自贡市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管制委员会
公军法字（72）第 202 号

张犯德怀：男、汉族，现年 27 岁，自贡市人，系现管反革命分子，张犯思想极端反动，积极参加文革武装暴乱，组建劳动党中源独立游击队，炮制反革命纲领，进行反革命活动。拒不认罪，罪恶严重，民愤很大，特依法判处张德怀无期徒刑。

四川省自贡市革命委员会人保组
军事管制委员会
1972 年 4 月 6 日宣判

附件二：判决书（二）

最高指示：“对反革命分子，必须实行专政。”

判 决 书

自贡市沿滩区革命委员会

人民保卫组军营小组

（69）公军法字第 13 号判决书

张德怀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直通文革修正主义刘少奇叛徒，书写反动标语，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罪行严重，判处张德怀管制 3 年。

革委会国营小组

1969 年 5 月 15 日宣判

【注】王勇法宣判的、此人现还在自贡市沿滩区.。

附录六

民主和法制的呼唤（代申诉状）

党中央、国务院及各职能部门：

我们是四川省蓬安县长梁乡中坝村村民，怀着无比沉痛和悲愤的心情，对制造蓬安县长梁乡中坝村五社村民阙定明的冤假奇案，特向上级领导提出申诉：四川省蓬安县委、政府个别领导人（县长孙明均）利用手中大权，伙同长梁乡乡长彭会昌、副乡长唐杰超、乡农经站站长代文平，长梁乡中坝村支部书记谢天战、村长谢兴志、中坝村九社社长吕生元等人，目无党纪国法、贪污腐化、打击、报复、陷害好人，制造冤、假、奇案，实施政治迫害，强行加重农民负担等重大事件。事实如下：

1996年2月份以来，蓬安县长梁乡中坝村五社村民阙定明对所在村社干部有贪污行为曾数十次向蓬安县锦屏镇党委、政府（当时长梁乡合并入锦屏镇，1997年还乡），蓬安县委、政府及职能部门，南充市委、政府及职能部门反映和举报，同年7月20日，蓬安县委、政府委托蓬安县农工委就针对蓬安县锦屏镇中坝村所出现的村社财务作出调查和处理意见，调查和处理意见中避重就轻地袒护了村社干部和贪污行为，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于是不服。1996年11月份，上访了四川省人民政府信访办、四川省农牧信访办，得到上级支持，并赠书和批复意见。12月30日，蓬安县委政府及职能部门组成调查组来长梁乡中坝村了解、调查，当时常务副县长刘光福同志表了态，根据中坝村的实际情况，同意中坝村五社村民阙定明和各社代表清查中坝村村主帐务（中坝村社帐务从未公开过一次），1998年2月初，阙定明和各社代表三次来到了乡政府，当时乡政府只有副乡长唐杰超在，其他干部到乡治

安员唐建国家吃喜酒去了。代表们找到副乡长唐杰超，请求查帐，副乡长不同意，说代表们没有会计证，无权查帐，代表依法根据中央（1996）13号文件精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组织法问之，最后副乡长想通同意了，签了字，并在他的领导下，来到乡农经站找到站长代文平提出 92-97 年的帐本，有组织有领导有安排地进行，从 1 社开始，各社帐本由各社代表负责，正查到中途，乡长彭会昌吃喜酒回来，赶到乡农经站大叫大嚷：“帐目坚决不许查，要打要杀，陪到来。”9 社代表中吕功辉上前问道，你作为一乡之长，这样说对吗？并拉他到南充市去评理，发生了口角争吵。后来乡长借故来到乡供销社后打了手机，又到乡治安员家去了。下午蓬安县委、政府接到密告，组织调查组来到长梁乡，了解实情后，并在乡电影院召开了会议，县委、政府的副书记兰坤发和副县长卫磊讲了话，根据中坝村代表的意见和反映的问题，同意并支持村民代表查帐，对反贪污、反腐败这样人的要大用、重用。由蓬安县检察院副检察长唐联喜任组长，检察院另一个领导和长梁乡党委副书记唐树全任副组长，村民代表任组员的中坝村社帐务清查小组正式成立，还说到对查出问题的干部，不管职位多高，权力多大，都要依法惩处，会上代表们掌声雷动，经久不息，代表们深受感动，蓬安县出了个好官，包青天卫县长。后来在蓬安县检察院副检察长唐联喜的正确领导下，开始对反映较大的九社、十社展开帐务清理，查出十社社长漆文光贪污金额达 2.7 万多元，再查九社时发现有多笔巨额款项（建能上能下回电站，九社全社房屋搬迁，国家下拨的巨额款项物质，九社新建房屋街道款）跟蓬安县县长孙明均（原任能上能下电公司董事长、总指挥）有着很大的牵连，扯出萝卜将带出一堆泥，更大的经济案件将要水落石出时，引起了县长孙明均惊觉和恐慌，并从中作梗，这样一来，中坝村帐务清查小组从此停了下来。

依法查帐代表受冤入狱！？依法作证村民进城受阻！？

在蓬安县县长孙明均的精心策划下，一个震惊嘉陵江畔“4.14”案件出现了。1998年4月14日，在蓬安县县长孙明均的亲自指挥下，百余名公安、武警荷枪实弹，兵分两路，封锁了长梁乡各交通要道，第一路人员在长梁乡电影院里，把欺骗到会的代表阙定明、吕长君、谢自为三人打倒在地，用手枪抵住每人的脑袋，左右扭手，拖出电影院，拳打脚踢，让其跪在公路上，戴上手拷，当时在场的中坝村十社村民表示抗议，蓬安县县委副书记兰坤发公开叫骂道：“今天接到密令，如有妨碍者，不管哪个先枪毙了再说，来几个杀几个，先斩后奏。”然后开出藏在一里外的囚车，把人拖上回车，随后还抓走贪污分子漆文光，向蓬安县看守所开去。第二路人员来到中坝村九社，实行大搜捕，私入民宅，还到庄稼地，警车武装人员损坏庄稼，把正在地里干活的代表何文有突然扑倒在地，戴上手铐，押上囚车。在场目睹这种违法行为的九社青年人吕德良（20岁）说了几句公道话，也是一顿拳脚，戴上手铐押上囚车，还打伤几名抗议的村民，又警车长鸣火速追赶代表吕功辉，追赶到嘉陵江边，险些命丧江里。囚车开至蓬安县轮渡码头，把代表阙定明拖下车来，并令其跪在地上，又是一阵拳脚。

在蓬安县看守所里，他们受尽折磨，特别是阙定明本来身体有残，行走不便，还连续受72小时的严刑逼供，按照他们既定的罪名承认，不然又是一顿毒打。但是同被抓进来的贪污分子漆文光却毫发无损，为什么？

后来，长梁乡中坝村村民特别是村民代表，处于在白色恐怖之中，在县长孙明均精心策划下，专案调查组来中坝村进行大搜捕，恐吓中坝村村民，搞逼供取证，并拿出拘留证、手枪、手铐等，吓得村民有的外出，至今未归。村民代表十余人不敢在家睡

觉，睡在河边荒草地、庄稼地里，时间长达 20 余天。

在看守所里，无辜青年吕德良和村民代表吕长君、谢自为、何文有在长时间的人身摧残下，违心地承认了罪名，先后于 5 月 14 日左右释放，名为“取保候审”，并给他们定纪律三条：一不准对外说案情，二不准走亲访友，三不准上告，不然再次抓进来罪加一等。只有五社代表阙定明一个关押达数月。

1998 年 9 月 14 日，蓬安县人民检察院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向蓬安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蓬安县人民法院于 10 月 7 日在公开审理中，认定阙定明犯罪证据不足。在审理过程中，蓬安县人民检察院于 1998 年 11 月 3 日书面撤回起诉。11 月 5 日，中坝村村民不服，要求蓬安县人民法院放人。蓬安县刑事庭庭长刘永秀背后跟村民说：“阙定明的确无罪，我们法院判不下来，可是蓬安县委、政府个别主要领导人要我们法院强行判他的罪，我们叫县委、政府个别领导人签字，只要他们签了字，我们就判他的刑，他们又不敢签字。

1998 年 12 月 1 日，蓬安县人民检察院第二次向人民法院以同样的罪名提起公诉，12 月 22 日蓬安县人民法院第二次公开审理阙定明。他们动用了大量公安、武警、全城戒严，并阻塞了中坝来县城的公路和水路交通，出动了水上派出所驱艇阻拦去公审旁听的群众及证人上庭作证，电话中断数小时，就连从成都、南充等地来蓬安采访的记者都被拦截在蓬安县城 1 公里以外。法庭公审至中午时，旁听群众数千人对蓬安县人民检察院对阙定明无中生有的指控鸣不平，数千人喊冤，就连行政执法机关内部干部和各界人士也为之动容，热泪闪烁。法庭审理到下午 3 点多钟，蓬安县人民法院在县委、政府个别领导的行政干预下，被迫判处阙定明有期徒刑四年。

蓬安县长梁乡中坝村地理位置特殊，位于嘉陵江畔，四面环水，为水中小岛，属于低洼坝地，含沙量高，不产水稻，主产花

生、玉米、叶烟、油菜、小麦，老产品广柑老化劣变。全村 2300 余人，负担人口 1910 人，耕地面积 992.5 亩，人平不足 5 分地，有的社还不到 3 分地，人多地少，实属村情。常年还遇到不同程度的干旱、虫灾和洪灾，遇上特大洪水，颗粒无收。中央和四川省农民负担管理条例实施后，93 年人平负担 40 元左右，94 年人平负担 50 元左右，95 年人平负担 60 元左右，（95-97 年人平纯收入 483 元），96 年突变，人均负担高达 170 多元，与 95 年相比，人平增加 180%，中央三令五申指示：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中坝村不但不减，反而大大增加农民负担。

上正中歪下乱搞，国穷官富民遭殃

1997 年冬，蓬安县委、政府组织党的十五大文件精神宣讲团来长梁乡中坝村宣讲会议精神，在大会上，长梁乡副乡长唐杰超宣讲道：“江泽民的讲话，李鹏的讲话，朱镕基的讲话，中央文件和四川省农民负担管理条例，只管中央，只管其它那些地方，就管不到我长梁乡，在长梁乡就要听我的，我说了算。”并用自己的大手指着自己的鼻子，公开颠覆党的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蓬安县委、政府于 1997 年 9 月 1 日在蓬安县信息报第一版公开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和《四川省农民负担管理条例》，公开发表：认真贯彻执行中央（13）号文件精神，真正落到实处，切实减轻农民负担，蓬安县委、政府制定了规定：

“村提留”、“乡统筹”不准超过县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的数额，《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和《四川省农民负担管理条例》第九条明文规定：农民每年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上交集体提留和统筹费的总额，以乡（镇）为单位计算，不得超过上一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百分之五，我村提留中的管理费在 97 年就高达

1.6%以上，全村管理费就多收 8000 多元。

93 年中坝村上坝到村加工房达 1 公里多，价值 4 万多元的高压线，电杆及其零附件被中坝村支部书记谢天战和九社社长吕生元私折倒卖，集体报帐收入 3000 元外，其余合伙贪污。

94 年，原任村长谢天战与同党为达到贪污目的，私自降低村企业承包款，合伙贪污万余元，并且长期霸占村企业电动机一台（价值 1 千多元），使其村企业的打麦机无法加工，现已成废铁一堆。

1997 年，长梁乡中坝村支部书记谢天战的儿子谢鹏（17 岁）未到法定年龄结婚并非法生育一胎，谢天战还让其内弟吕功敏超生第二胎而不罚款。谢天战作为中坝村村支部书记，谢兴志作为村长、村计生工作负责人，不维护党的计生工作，反而破坏党的政策，使全村 20 多对夫妇予以效仿，未到年龄而结婚和非法生育，至使中坝村级组织瘫痪，无法正常工作。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早在 1954 年宪法中被明文规定。然而在蓬安这片天地里，资本主义思想这颗毒瘤依然存在，我们呼吁“依法治国，先应治官”。

以上所述，全属实情，我们殷切期盼上级领导能高度重视，专案彻查，清出党和人民的败类，为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给阙定明依法作出公正的解答，真正作到民主和法制，还给人们一片明亮的天。

此致

敬呈

中共中央、国务院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四川省蓬安县长梁乡中坝村村民
1999 年元月 1 日

附四川蓬安县长梁乡中坝村村民申诉名单(略)

劳改基金会出版书目

《黑色文库》系列

- | | | |
|-----------------------|--------|------------|
| 《我以我血荐轩辕》 | 2001 年 | 徐文立著 |
| 《沧桑岁月》 | 2002 年 | 陈文立著 |
| 《凄风苦雨四十年》 | 2002 年 | 成中和著 |
| 《雪山下的火焰》 | 2003 年 | 班丹加措著/廖天琪译 |
| 《苦难的历程》 | 2003 年 | 文彻赫恩著 |
| 一个人的两个故事：（上册） | | |
| 《昨夜雨骤风狂》 | 2003 年 | 吴弘达著 |
| 《永远的北大荒》 | 2004 年 | 黄湛著 |
| 《从诗人到囚徒》 | 2004 年 | 尚建国著 |
| 《红尘白浪》 | 2004 年 | 叶少华著 |
| 《中国冤案录》第一卷（2001-2003） | 2005 年 | 廖亦武著 |
| 《我和我的三个半奴隶》 | 2005 年 | 闵和顺著 |
| 《梦断未名湖》 | 2005 年 | 陈奉孝著 |
| 《中国冤案录》第二卷（2003-2005） | 2006 年 | 廖亦武著 |

人权书目（中、英文）

- *Communist Charity*

A Comprehensive Report on the Harvesting of Organs from the Executed Prisone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00 年

- 《共产党的慈善事业》

——关于中国摘取死囚器官的报告

2001 年

- 《国策下的国难》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评析

2003 年

- *Better Ten Graves Than One Extra Birth*

2004 年

China's Systemic Use of Coercion to Meet Population Quotas

- 《劳改手册》2003-2004

2004 年

- 《劳动教养和留场就业》

2004 年

- 《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2005 年 刘晓波著

订购请联络: laogai@laogai.org

电话: 202-833-8770

网上浏览地址: www.laogai.org

神州透视

中国冤案录

(第二卷 2003-2005)

廖亦武 著

作者简介

廖亦武，1958年生于中国四川。经历过饥荒、失学、政治批斗等磨难。中学毕业后当过司机，从事过多种工作。1982年涉足文坛，以叛逆诗歌见长。1990年因政治入罪被判刑四年，出狱后以卖艺为生。由于对底层百姓生活有深度了解，他随后写出了《证词》、《沉沦的圣殿》、《中国底层访谈录》、《漂泊——边缘人采访录》等贴近生活、具有震撼力的作品，部分被海外译为多种文字发行。廖亦武可谓中国大陆“黑色纪实文学”的先驱。从2005年起，劳改基金会推出廖亦武的《中国冤案录》系列作品，本书为该系列的第二本。

黑色文库 第十三集
劳改基金会

Tortured Souls: Stories of Lost Happiness

Vol.2 (2003-2005)

By Liao Yiwu

Black Series, Volume 13

The Laogai Research Foundation

Washington, DC, 2006

www.laogai.org

ISBN 1-931550-50-6

Printed in Hong Kong

U.S. \$ 18.00

